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一九二七)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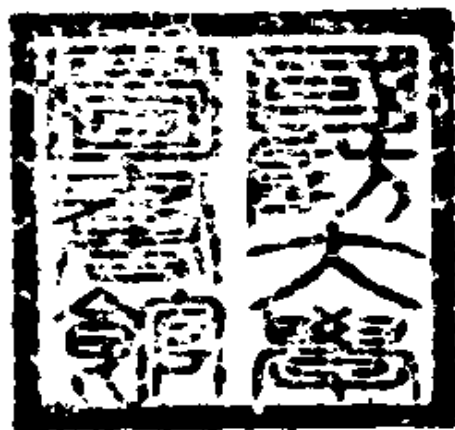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三册

(一九二七)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责任编辑： 冯世平

封面设计： 王 波

中 共 中 央 文 件 选 集

第 三 册

(一九二七)

中央档案馆编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20.5印张 390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3次印刷

印数：13000—16000册

ISBN 7-5035-0127-8/D·64

定价：11.00元

编辑说明

一、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公开出版建国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公开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是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内部本的基础上编辑的，各册篇目都有所增加，并广泛收集了每个文件的各种版本，经考证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刊印。

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著作，凡已编入他们的选集或专题文集的，在编入本选集时，只列目录，未印正文。

三、本选集编入的文献，均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或资料的原貌刊印；对于其中文字错漏等的订正，一律用符号标出，错字改正用〔 〕，漏字填补用〈 〉，衍字改正用[]；辨认不清的字以□代，缺字以△代；标点不全或无标点的，加了标点并加注说明。

四、编入本选集文献的标题，一般均照原题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而由编辑拟定、修改的，均加*以示区别。

五、对于某些文献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个别词句，也作了初步的考证，并加了若干注释，按顺序排于篇末。重复条目只在本册第一次出现时加注。

六、编入本选集的非正式中共中央文件及其他文件，除原作为附件的外，均作为附录按时间顺序排于卷后。

七、本选集使用国家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照排。

一九八八年十月

目 录

中央政治报告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主要工作

(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1)

中国共产党为汉口英水兵枪杀和平民众宣言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8)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宣言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13)

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

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

的解释

(一九二七年初)(19)

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24)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为肃清军阀势力及团结革命势力问题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三日)(27)

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

级书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32)
关于上海工作的决议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通过)	(35)
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	(39)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	
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	
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	
之决议	(47)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	(48)
土地问题议决案	(60)
职工运动议决案	(72)
组织问题议决案	(87)
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	(90)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二七年五月)	(94)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	
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	(109)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	

- 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112)
- 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议决)(116)
- 附：工商联席会议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二日)(118)
- 中国共产党对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128)
- 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鄂省委拟，五
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134)
- 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议决).....(136)
- 关于湖南事变以后的当前策略的决议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通过).....(138)
-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
(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议
决案).....(142)
- 中央通告农字第五号
——农运策略
(一九二七年六月初)(156)

-
- 中国共产党告全国农民群众
（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164)
-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关于政局的公开信
（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168)
- 中央通告农字第七号
——纠正农民无组织行动
（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173)
- 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
——农运策略的说明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四日）……………(178)
- 中国共产党致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195)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198)
- 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
（载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出版的《向导》）……(209)
- 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
——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215)
- 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223)
-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

革命同志书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227)

中央致前委信

——关于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及特别委员会问题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238)

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240)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小引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247)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249)

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294)

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298)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302)

中央致湖南省委信

——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

(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307)

中央通告第一号

——八七会议的意义及组织党员讨论该会决议问题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311)

- 中国共产党为汉宁妥协告民众书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四日)(315)
-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常委通过)(327)
- 中央通告第五号
——最近妇女运动的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常委通过)(343)
- 中央通告第六号
——今后学生运动方针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常委通过)(346)
- 中央复湖南省委函
——对暴动计划、政权形式及土地问题的答复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350)
- 附：湖南致中央函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日)(354)
- 中央通告第八号
——关于职工运动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五日)(357)
- 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常委通过)(363)
- 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369)

中央致广东省委函

- 对《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工农军作战方法》的意见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372)

中央对于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

- (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376)

中国共产党为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

-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378)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反对军阀 战争宣言

-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387)

中央通告第十三号

- 为叶贺失败事件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394)

附一：李立三报告

- 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405)

附二：张太雷报告

- “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
(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南方局广东
省委联席会议席上)(422)

附三：张国焘报告

- (一九二七年十月九日)(426)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

——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中央常委通过) ……(433)

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 ……(445)

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468)

政治纪律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478)

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 ……(485)

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 ……(487)

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 ……(487)

职工运动决议案 ……(504)

中央致两湖省委信

——两湖军阀混战形势下党的任务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520)

附：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523)

中央通告第十六号

——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与意义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527)

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 ……(533)****中央致广东省委信****——关于广州暴动问题****(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541)****中央致江苏省委信****——关于乡村暴动问题的答复****(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 ……(545)****中央复陈独秀函****——关于革命形势的估计和暴动问题****(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九日) ……(550)****附一：陈独秀来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554)****附二：陈独秀来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556)****中央通告第十九号****——关于党团关系****(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见《任弼时选集》《纠正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倾向》)****中央通告第二十号****——关于组织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 ……(558)**

- 中国共产党为广东工农兵暴动建立苏维埃告
民众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562)
- 中央通告第二十三号
——广州暴动形势下党的任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569)
- 中国共产党为广州暴动再告全国民众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574)
- 中国共产党反对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对俄绝交
宣言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583)
- 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
——对国民党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87)

附 录

-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一九二七年三月）
（见《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集》）
-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 (593)
- 周恩来：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一九二七年四月）
（见《周恩来选集》上卷）

-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
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五月)(595)
- 全国农民协会之重要训令
 ——农运新规划五项
 (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613)
- 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
 ——反抗土豪劣绅之武装袭击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617)
- 湖北全省总工会解散纠察队布告
 (载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汉口民国
 日报》)(621)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
 (一九二七年七月)(622)
- 谭平山苏兆征辞职书
 (一九二七年七月)(629)
- 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635)

中央政治报告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主要工作*

(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1〕

1. 北方奉系内部对于向南用兵，虽有急进派和缓进派之冲突（前派之代表者为张宗昌，后派之代表者为杨宇霆），但最近奉张已依照杨宇霆计划渐趋一致，杨的计划之要点是：

A. 容纳急进派及英帝国主义所企图的继续与北伐军作战，不让北伐军得到一刻休息，养成势力，然而这个战争是要奉军嫡系以外的军队去抵挡，至于奉军仍极力避免现时与北伐军直接的冲突。

B. 他的目的是在让他所不满意的别部分反赤军队去牺牲，明知他们单独没有战胜北伐军的可能，无论何方胜败，他仍拥有全国最强的军备，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C. 因此他现在对东南方而是利用孙传芳与张宗昌进攻北伐军，先让这两部分军队去牺牲；对河南方面是极力设法拉拢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寇英杰、米振标等，以抵制党军及国民军，预许靳云鹗以河南地盘，并要靳云鹗组阁以疏通乃弟，奉张自己集中二万精兵，静观变化。

既然奉张现在拥有全国最强的军备，杨宇霆这个计划又不是十分空想，只要他肯决心对南用兵，英帝国主义者会试以最后之努力。则是在奉张对于杨之计划当然是十分同意，惟在河南方面，恐不能若杨之如意算盘，奉张最恐惧的是国民军与党军联合豫中军队，打成一片，对付奉军，便给奉军以很大威吓，再则阎锡山态度，亦是奉方所当引为顾虑的。

2. 国民军受奉军之逼已退出包头，奉军的企图是尚欲取得五原，完全断绝国军械源。国民第一军共有八万人，只有三万人留在五原，五万人已开入陕西及豫东，其二、三、五、六军均在陕西。国民第一军兵士的训练虽好，惜子弹及物质的给养非常缺乏，而且炮队骑兵都在南口败后丧失，很难抵御奉军充足精利之武器，国军现时是急欲打通一条与国民政府交通的出路，而因与党军及豫中军队的联络尚未十分弄好，且弹药缺乏，故尚逗留阎乡灵宝一带，未往前进。

3. 河南方面，自国民军攻入豫东后，形势非常紧迫，不仅吴佩孚不安，即张作霖也十分焦虑。一面奉军已进至彰德，置重兵于京汉路上，预为防御；一面吴佩孚出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解决动摇倾南之靳云鹗部队。惟吴张终不能整个的拿住河南所有的军队以对付南方，虽迭下总攻击令，而效用甚小。

4. 阎锡山在现时战争中的关系十分重要，奉军与北伐军谁取得与阎锡山的同盟，就是谁胜。阎现在特别

应付；D. 所以赞同上海市民自治运动以为北伐军及奉鲁军间之缓冲。

6. 国民政府方面：

一、在北伐军所占领的湘鄂赣等省的民众运动，的确是已走入革命道上，革命已深入到乡中去，每个小县每个小村中的人民，均感到一种新的映象，充满着新的企图，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在乡村中非常普遍，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的事数见不鲜。这次中国社会内层的震动较之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更为深刻。惟民众自己尚缺少武装力量，而反动派社会仍极深厚，不仅各地农民运动时受压迫，即 K.M.T. 组织亦时遭他们显明的攻击，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必不免来到一极大的反动。

二、在军事方面有以下的困难：A. 久战疲劳且缺乏餉项，补充又未完备，故目前作战极难，急须一个相当期间的休养；B. 目前军餉无着，兵心很涣散，在江西之七军三军均有部分哗变事实，兵士中有因为领餉不得而反对政治宣传者；C. 内部将领间又多冲突。主观情形虽然如此，而客观环境却逼起非战不可，亦只有积极作战的布置。

三、在政治方面，国民政府及 K.M.T. 中央移汉后，合组一临时委员会，维持这个政府，事实上我们不能不赞成此政府，蒋介石暂时亦不反对此政府，惟湖北地方的 K.M.T. 员多站在地方主义的观点上，颇有反对倾向。

应付；D. 所以赞同上海市民自治运动以为北伐军及奉鲁军间之缓冲。

6. 国民政府方面：

一、在北伐军所占领的湘鄂赣等省的民众运动，的确是已走入革命道上，革命已深入到乡中去，每个小县每个小村中的人民，均感到一种新的映象，充满着新的企图，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在乡村中非常普遍，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的事数见不鲜。这次中国社会内层的震动较之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更为深刻。惟民众自己尚缺少武装力量，而反动派社会仍极深厚，不仅各地农民运动时受压迫，即 K.M.T. 组织亦时遭他们显明的攻击，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必不免来到一极大的反动。

二、在军事方面有以下的困难：A. 久战疲劳且缺乏餉项，补充又未完备，故目前作战极难，急须一个相当期间的休养；B. 目前军餉无着，兵心很涣散，在江西之七军三军均有部分哗变事实，兵士中有因为领餉不得而反对政治宣传者；C. 内部将领间又多冲突。主观情形虽然如此，而客观环境却逼起非战不可，亦只有积极作战的布置。

三、在政治方面，国民政府及 K.M.T. 中央移汉后，合组一临时委员会，维持这个政府，事实上我们不能不赞成此政府，蒋介石暂时亦不反对此政府，惟湖北地方的 K.M.T. 员多站在地方主义的观点上，颇有反对倾向。

四、广东现时仍是中派政权，近虽极力拉拢右派，招致左派，向 C. P. 及接近 C. P. 的左派进攻，但 C. P. 本身并没有受着什么损失，张静江走后，李济琛纵右倾，但李处事比较持重，不致有很大的反动事发生。

五、国民政府内部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各领袖间的冲突，最致死命的是汪蒋不相容。蒋表面虽赞成迎汪，实际他现时反汪较前更力。我们实际考察，迎汪的人主观并不是倒蒋，而汪回的客观结果，汪蒋冲突势不能免，因为在军饷分配上，在一切用人行政上，只有蒋容忍汪的公平处置，或者汪容忍蒋的专断，才能够相安无事。我们认为弄好汪蒋间及各将领间的关系，比别的问题还更重要。如措置不好，立刻可以使全局崩坏。

7. 帝国主义对于国民政府的态度，现时最主要的英日两国，虽已由炮舰政策转变到讨论承认问题，然而他们一方面赞成南北分治，一方面仍积〈极〉援助奉张对南进攻。英国二五增税的提案，只是借以和缓欺骗中国民众，实质更多帮助奉张和苏孙的财政收入。最近汉口英兵的枪杀华人便明显的表出英帝国主义的凶恶面目。日本帝国主义者一面因英国以二五增税拉拢奉张而妬忌而反对英国提案，一面以南北分治说欺骗南方和缓其向奉张进攻。

8. 总括以上的分析，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是：

一、是军事上继续对奉作战已成为不可免的事实，盖我虽欲休息而奉鲁军与帝国主义者均不容许，在河南在

江浙，吴孙溃败即不免与奉鲁军直接冲突。因此我们在军事上的策略应该是：

A. 积极作战争的准备，特别注意京汉线上。

B. 对浙取攻势，迅速击破孟昭月主力军，以兵临江苏边境影响上海自治市运动。

C. 鄂东九江均取守势以备鲁军之进攻。

D. 上海进行在 K.M.T. 影响之下的市民自治运动，市内不驻兵，江苏让给白宝山、冯绍闵、李宝章等与鲁张冲突。

E. 国民政府国民军应尽可能的拉住阎锡山联合反奉。

F. 国民军当联络豫中一部分军队与党军结合占住河南(黄河以南)，一面抵御奉军南下，一面东向南下的奉鲁军威吓。

二、是政治上仍极力调解国民政府领袖间的冲突，继续汪蒋合作的口号，要汪回来建立一个左派指导权的政府。至于迎汪实际进行中的困难，只有随时临机解决。

三、是在民众中积极宣传民众起来拥护国民政府，帮助国民政府解决目前财政上的种种困难，提高兵士的革命热情，促进兵士与[兵士与]民众间亲密的关系，消灭反动派利用群众站在左的方面说话来反对国民政府的阴谋（例如大商买办阶级利用反抗增加负担的口号，鼓动群众反对国民政府）。我们现在只应提出“铲除贪官污吏”“剔除中饱”的口号，而不能提出“减轻人民负担”的口

号，尤其在反奉战争中。

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五期刊印

注 释

- [1] 原件未标明时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所存本文俄文件和英文件，时间均为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
- [2] 苏常道，行政区划名，民国初年设置，属江苏省。辖吴县、常熟、昆山、吴江、武进、无锡、宜兴、江阴、靖江、南通、如皋、泰兴十二县。

中国共产党为汉口 英水兵枪杀和平民众宣言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

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

英国水兵受长官命令，一月三日在汉口英租界枪杀和平讲演的中国市民一事已经引起很重大的事变。愤怒的民众对英国帝国主义这种进攻和屠杀已经决定相当办法对待，务使其永不会再发生了。武汉工商学群众大会通过一些要求，请国民政府向英国提出。这些要求，根本是在永久取消英国人屠杀并高压中国市民的那种侮辱中国人民之特权，这些要求无疑地是全中国广大民众的要求。这些要求表示中国工人及一切劳动民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斗争已进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亦即表示从一九二五年“五卅”英国人屠杀上海工人市民开始的中国民族运动进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英国帝国主义者在汉口企图于一月三日以挑拨手段惹起革命群众的骚动借以为向国民政府进攻的张本，因此，假意退步并迫国民政府来保护他们抵御群众的愤怒。国民政府很了解英国人挑拨手段的凶辣，因此，即刻采取各种办法，防止中国民众和英人及其机关的冲突。国

民政府赞助武汉民众的这种举动，即担负维持英租界治安责任并建议英人撤退其武力，是唯一正确的。在英租界的英国武力本负屠杀中国民众责任的，此种武力之驻在不能保证再不会有挑拨手段发生。

英国帝国主义者对此是怎么一种见解呢？他们在愤怒的革命民众前面迫得接受国民政府的建议，但他们以为这种状况是暂时的。他们在中国和伦敦，经过政府官吏和报纸，公开宣称，他们所以接受国民政府以中国警察维持租界治安的建议，是因为他们此时在汉口没有充分的武力，故与国民政府妥协俾得从容派遣兵舰入扬子江来。英国帝国主义者，不管由兰浦生^[1]口中怎样说出愿意开始对华的“新”政策，但事实上没有一分钟放弃其干涉中国的阴谋。差不多与兰浦生赴汉口与国民政府谈判同时，英国帝国主义者却在天津与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一起准备进攻南方的大计划。谁也知道，英国帝国主义者是准备这计划的重要脚色，并继续站在北洋军阀背后，从政治上和物质上帮助他们。

现在，英国帝国主义者，在其本国和全世界正在造成干涉中国的舆论。他们在汉口的挑拨手段，就成为他们对于中国解放运动疯狂的攻击之发端，并以此证明帮助北洋军阀武装进攻革命军和国民政府，是对的。

在中国的一切英国报纸，一切英国代表以及一切大资产阶级报纸和半政府机关报纸的通信员，都制造无数虚伪的消息，仿佛以为：

(一) 英国人及一切外国人，现在正处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并举出他们所伪造的杀人越货等无稽事实来证明；

(二) 汉口一月三——四日的骚乱是少数极左派的煽动家主持的，大多数民众甚至国民党都反对此种骚乱；

(三) 在中国，人们准备向一切白种人作战，如拳匪之乱一样。

英国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是十分明显的。为在政治上准备干涉，他们必须在其本国建立联合战线，如有可能，又须立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间建立联合战线。为着这个，必须把中国形容得象上面所说的一样。

全国民众们！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干涉中国的危险，是没有一刻不恐吓我们的。现在这个危险扩大了，特别是在与最近联合一致的北洋军阀作战的前面。英国帝国主义者任何挑拨手段都做得出来，以帮助中国的反革命，如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并不惜以任何战争的恐怖恢复其在全东方首先在中国所失去的威权。

他们现在正由阿马利⁽²⁾与国民政府开“和平的”谈判，这种谈判乃是他延宕时间的阴谋，企图于此时期内在中国集合大势力，如有可能，并与其他帝国主义者建立联合战线。

唯一能够打破英国帝国主义者这种狡猾计画的，只有中国民众本身在本党和国民党领导下的反抗，全国民众对国民政府的拥护，以及中俄的联合。

本党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在目前帝国主义者以英国为首直接危害中国革命这一危险的顷刻，赶紧站立起来，拥护国民政府，在群众会议中，在舆论中，在议决案中，公开表明对于国民政府的赞助并要求英国人承认汉口一月五日群众大会所提出的条件。为取得保证一月三日的挑拨手段不至重演和英国帝国主义者不帮助北方进攻南方起见，我们起来要求撤退英国驻华海军，取消治外法权，收回英国租界，撤退一切帝国主义之驻华的军队。

全国民众们！中国革命已经开始，并继续下去了！革命的胜利应该是帝国主义的失败。胜利是靠民众帮助国民政府并自己努力的，而依靠在被压迫民众上面的国民政府也要坚持到底，不对英国帝国主义让步。

前进，向帝国主义和反革命作战！

本党同时并向西方无产阶级提议，在各国举行抗议英国帝国主义者这种挑拨手段及其干涉中国的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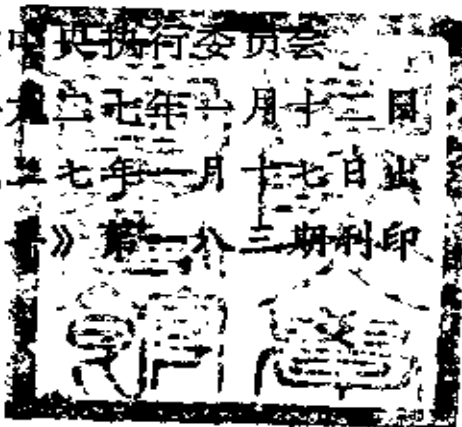
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革命万岁！

中国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联合万岁！

中俄联合万岁！

打倒英国及其他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三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出版
 的《向导》第一八三期刊印



注 释

[1] 兰浦生，当时任英国驻中国公使，又译作蓝普森。

[2] 阿马利，当时任英国驻中国使馆头等参赞，又译作欧玛利。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宣言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革命的民众们!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一日高涨扩大似一日，工人农民的大群众起来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而争斗，在许多大城市中罢工运动如潮而起。许多省的农民也起来成立他们的争斗组织，和反动势力的地主劣绅争斗。这些革命势力之兴起，无人能止之。工人群众渐渐组织到战斗的工会之内，冲破了以前地方的行业的界限，成功了强有力的统一势力，以领导全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的争斗。农民群众日益卷入革命漩涡，并且工人阶级领导农民争斗这个事实也就要到来。在此革命高潮中，革命的军队也渐渐接近工人农民及被压迫的民众，虽然其首领有些还在动摇中。

由于革命军之胜利，由于工人农民的争斗，并且由于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之进攻，多数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手工业工人都一天一天革命化了。

这些现象都使帝国主义者及其所雇用的一切反动势力见之发抖!

自前年“五卅”到今年“一三”是一切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向中国武装的进攻时期，也就是中国国

民剧烈的向帝国主义反抗时期。帝国主义者加紧进攻一次，中国革命的工农及一切民众反抗运动更扩大更加强一次。

“五卅”运动，是中国革命的国民运动之真正开始，帝国主义者知道不是那一国的问题，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帝国主义者联合的以武装势力在上海在汉口在广州等处向中国民众进攻。“五卅”运动，被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势力及他们间接的武装势力即奉直军阀镇压下去。不久同情于国民运动的国民军起来反奉，占领了天津，帝国主义者大起恐慌，他们又知道这不是简单的国奉冲突问题，他们知道民众开始与军事势力结合是革命运动发展的表现，国民军如果占住了北方的第一交通大港——天津，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北部的统治权力将根本动摇；于是他们第二次一面直接用自己的武装势力出兵满洲，封锁大沽口，炮击大沽炮台，复在辛丑条约国名义之下联合的以哀的美敦书威胁国民军，一面间接的用奉直军阀武装势力以讨赤名义向国民军总攻击。

国民军在京津南口苦战了半年，终于为英日帝国主义所雇用的武装打手奉直联军所败，退出南口；可是同时南方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得广大的民众援助，一直攻下长岳武汉，帝国主义者更是惊慌失措，他们更知道北伐军之目的不是简单的南北战争，并且不是单纯的军事势力，而是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反动势力之一种有力的表现，其胜利结果，将使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

的经济的统治权力全部动摇；于是英日帝国主义者分途力助他们所雇用的武装打手奉直军阀，一面在南方使孙传芳攻打北伐军，一面在北方巩固张作霖张宗昌的势力。

自孙传芳在九江败退，北伐军进到浙江，一直到最近汉口“一三”事变，一切帝国主义者更惊慌得发狂起来，他们都知道“一三”事变不是汉口民众和英国水手冲突这样的简单的问题，乃表现中国国民革命的势力和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的势力直接的决战时期渐渐接近了；于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在英国帝国主义者领导之下，第三次一面直接用自己的武装势力联合的在长江一带示威（英美法日帝国主义者除原有驻华海陆军外，现又由英国帝国主义的提议，成立四国出兵协定大派海陆军集中上海：英国已由本国派遣第一舰队及水兵一千陆军八大队，由印度派遣英兵及印兵两大队到上海；法国则增派舰队及安南兵到上海；美国则令亚细亚舰队全部动员集中上海；日本已从佐世保派遣驱逐舰四艘，又巡洋舰一艘载陆战队到上海）；一面复间接命令他们所雇用的打手奉直军阀向北伐军及国民军进攻。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其陆军部最近计划：五十日以内将有英兵二万要集中上海。他比法美日本帝国主义者更露出了凶恶的面孔。

帝国主义者向中国国民运动的势力进攻，不但用直接的和间接的武装势力硬的方法，而且还用软的方法，从国民运动营垒中诱惑所谓稳健分子所谓温和派，和他们妥协，以打击所谓急进派，根本削弱革命势力，破坏国

民运动的联合战线。

我们很明白的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者此次联合的向中国国民运动进攻，无论在硬的方面，在软的方面，都比前两次联合进攻凶恶而且阴毒。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最严重的历史时期！

他们（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所雇用的打手奉直军阀，帝国主义者的好友稳健分子温和派）的胜利，即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

什么是国民革命的胜利？必须是：收回海关矿山航权路权为国有，一切帝国主义者无条件完全放弃他们对于中国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统治权力，及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雇用的军阀，解除其武装。这个胜利是全国一切被压迫民众的利益，一部分资产阶级，也需要这个胜利。可是，这个胜利决不是什么稳健温和方法能够得到的，只有不断的争斗与牺牲可以得到。有些人提议可以用温和稳健方法向帝国主义者收回权利，不取急进的革命行动，这种反革命的说话分明是帮助帝国主义者消灭中国的国民运动。这是辛亥革命前，辛亥革命后，许多稳健分子温和派所试探而失败的旧路，现在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再去试探了！

〈工〉人农民及一切革命的民众们！决定革命运动命运的时期已立在我们的面前了！一方面是国民革命运动之高潮日益增涨，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及其雇用的反动势力联合进攻，很明显的表现出中国革命决胜负的决死

战之时期日近一日了！我们须立即准备！在此时期中，我们比以前要有更坚苦的战斗！在此时期中，凡是不反对帝国主义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必须是枪口向着帝国主义的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必须以革命的行动拥护帮助正在和帝国主义及奉直军阀争斗的国民政府，扩大巩固我们有组织的力量以拥护帮助国民政府！我们因为拥护帮助国民政府革命的发展与胜利，我们对于反帝国主义以及反对帝国主义所可利用的反动势力（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劣绅土豪等）之争斗，一刻也不能休息！

工人们！集中你们的势力于你们的工会！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统一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无产阶级的目的，统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帮助国民政府与国民党！

农民们！起来！集中你们的势力于你们革命的农会！推翻地主劣绅的政权，帮助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创造在农会领导之下的乡村政权！你们的争斗和城市工人的争斗联结起来！

国民政府的领袖们！大半个中国还是国内外的黑暗反动势力统治着，即国民政府统治之内，外面帝国主义的势力，内而买办官僚地主劣绅土豪，仍在横行，国民革命之成功，还须要你们长期的努力争斗。此时帝国主义及其所雇用的奉直军阀联合的向革命进攻，更是说明你们需要更广大更有组织的民众为后援；农民对于买办官僚地主劣绅土豪的革命爆发，更是为你们肃清所有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所可利用的反动势力，巩固革命政权，

更是你们最有力的后援。民众势力高涨起来，正是你们的敌人所恐怖的事，也是一班稳健分子温和派所恐怖的事，而不是革命政府所恐怖的事。你们若因民众势力之〈高〉涨而怀疑，而动摇，而有一点反对工农民众，你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所雇用的军阀，立即可以利用之以反对革命。不离开革命，不离开民众，全世界革命的民众都站在你们这边，你们并不是孤立的，大胆前进！我们应该一致高呼：

一、反对英国帝国主义领导的四国对华出兵协定！
打倒帝国主义者对华阴谋！撤退各国驻华海陆军！

二、巩固工人农民革命的军队及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联合战线！

三、推翻一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有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权力！

四、解除奉直军阀的武装！

五、肃清全国反动的旧势力！

六、在乡村中城市中省会中建立革命的民众政权，
召集革命民众的国民会议统一全中国！

七、中国国民革命万岁！

八、中国工农运动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出版的《向导》第一八六期刊印

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

(一九二七年初)〔1〕

以前中国革命发展的程度，未能将他的性质与内容，具体的在国际上表现出来；因此，以前国际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提案，不是抽象的指示一点东方民族运动的一般倾向，便是分析中国眼前较琐屑的事象以及目前一些工作方针。最近(去年十二月)，国际第三〔七〕次大会〔2〕所议决的中国问题提案，则不然了。自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力量伟大的表现出来，又加以北伐胜利及南方工农运动有了普遍的发展，不但促起国际对于中国问题之注意，并且中国革命运动本身，已经发展到略略可以显示他的性质与前途；因此，此次国际扩大会对于中国问题，抓住了要害，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撇开一切枝叶问题，大刀阔斧的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质，并且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及整个的中国革命之一贯的方针与战略。

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

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挪〔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做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

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截然划分为毫不衔接的两个时期，将要发生什么毛病呢？通常所谓国民革命，包含着很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意义，若死守着这个意义来做国民革命，并且以此自画，对于一切有超过这个意义之必要与可能的企图，都等待将来的下次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再来做。若照这样的方针这样的战略来做国民革命，那末，我们的革命还在将来，现在只是参加或帮助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则我们自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所高叫的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所高叫的和资产阶级争领导权，都成了好听的一句空话；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实际上领导这个革命，他们或者要领导我们，并且还要领导我们断送国民革命。

此次国际扩大会的决议案告诉我们：中国的革命前途，在客观上不会是这样，在主观上更不应该是这样。国际告诉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快崩坏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已开始发生的；他的性质是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而不是纯粹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主要成分是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农民和其他被压迫

的劳苦群众，而不是富裕的资产阶级；因此，中国国民革命前途之发展，得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即是不断的努力，由现在的国民政府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

国际这个提案，不是说现在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说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国民革命，而立刻就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说现在的国民革命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性；不是说我们离开国民党，不必继续和他们革命的合作；不是说已经不需要民族的联合战线，而由无产阶级孤军独战；不是说要推翻国民政府，而就要实现无产阶级独裁制的苏维埃；而是说要更扩大更强固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仍旧要和国民党合作——和一部分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仍旧在现有的国民政府政权之下，继续发展国民革命，以达到革命的民主独裁制，将国民革命发展到超越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以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从民族解放到工农解放，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看做整个的中国革命。在这整个的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自不免有先后轻重的现象，而且我们的革命方针和战略上，必须抓住这两种革命的连

锁，使之一气呵成，不能够机械的将他画为截然不相衔接的两个时期。

在此次国际提案中，自然未曾说将来中国不会有第二次无产阶级的革命，或不需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只是指示我们必须准备整个的中国革命能够一气呵成，而不可在主观上注定了我们必须有第二次革命的运命，准备还有第二次革命，对于现在的革命遂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自限，一步也不肯超越，一切都等待到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再说，这便是我们过去方针和战略上根本错误。革命是活的，不象演剧和做影戏，必须演完这一幕才能开演那一幕。

这是此次国际中国问题提案的根本方针与战略，这个根本方针与战略决定了，其余若加入国民政府，若采用急进的农民政纲，若注意军事工作，都是相因必至的问题，便不要再加以原则上的讨论了。

* * * *

中央政治局已经过详细讨论与辩难之后，接受国际这个提案；并决定不必俟第五次全国大会之讨论，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据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

各区委各地委各特支，接到国际此提案，即须召集负责同志详细报告及讨论，随即分派负责同志到各支部讨论。讨论的重要点，首先决定赞否此次国际提案的根本方针与战略，然后再讨论几个特殊问题：（一）关于中国革

命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二）民主独裁制；（三）和民族资产阶级争领导权；（四）农民政纲。这些问题，各级党部讨论的结果，都应有一决议案；每个同志如有疑义或意见，都可写寄党报登载，以便共同讨论。甚至于第五次大会后，仍然要继续讨论。因为国际此提案之执行，影响到我们党的政治生命非常之大，不在乎盲目的一致接受，而是要全党同志都能懂得此提案的全部意义。与其由盲目一致而到实际不一致，不如由意见不一致而得到实际一致！

根据一九三〇年一月出版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决议案》刊印

注 释

- [1] 原件未标明时间。文中说：“最近（去年十二月）国际第三〔七〕次大会所议决的中国问题提案，则不然了。”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九二七年二月）中说：“最近中央政治局又通告讨论国际的议决案”，并引述了本文内容。据此判定，本文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初。
- [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时间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十六日。

中国共产党 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全国工人们及革命的民众们！

全中国工人阶级不避牺牲，率先和黑暗势力奋斗，不只一次了，此次上海工人反抗孙传芳的总罢工，也是这样。

此次上海工人总罢工五日，不但说明了工人阶级的集体势力，并且表现出工人阶级为全民族利益为全上海市民自由而不畏艰难不避牺牲奋勇先进的精神，而且证明了国民革命军是有广大的民众同情与援助，不象军阀只有孤立的横暴武力。所以此次上海的总罢工，在中国革命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国，最近聚集兵力于上海，在上海各马路列队游行示威，如入无人之境，并且简直是对于国民政府武装谈判。直系军阀余孽孙传芳，因在浙江兵败，犹拟在上海勾结英国作困兽之斗，摧残工会，大捕工人，压迫舆论，甚至勾结帝国主义者租界逮捕国民党的新闻记者与商人。全上海的市民，对于这样残暴的统治者——帝国主义的英国及直系军阀孙传芳，无不切齿愤怒，革命阶级的工人群众，已至忍无可忍地位，怎

能不不计成败利钝而起来宣告总罢工，以表示对于内外黑暗势力之反抗！

在总罢工五日中，工人学生及其他市民的热血，点点滴滴的洒遍了上海南北市，横在街路上的烈士血尸，到处都可以看见，许多烈士的头颅都挂在电杆上。全上海市民们！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孙传芳的剑子手李宝章之残暴，我们也不能忘记国民党右派（即西山会议派所号召的什么国民本党）教唆李宝章放手屠杀工人及革命民众之狠毒！将来应该再没有人能够拿任何理由反对革命的工人与市民，“以革命的恐怖回答反革命的恐怖”！

全国工人们！全上海的工人们！此次上海的总罢工流血争斗，只是你们全部罢工流血争斗史中之一页，前途正复辽远。即以上海一隅而论，乃各帝国主义者最后根据地，亦即彼等最后奋斗地，同时也是奉直军阀死力争得海关附税和鸦片收入之目的地。这两种内外黑暗势力复相互勾结起来对付革命的民众，以保持彼等在上海之统治地位：李宝章未走，鲁军的毕庶澄又来了；各国海军，也已经公然联合行动，干涉中国海军对于军阀之表示反抗了，各国陆军也侵入华界了；全上海的工人，全上海革命的市民，必须有不断的巨大努力与牺牲，才能够获得最后胜利。

此次总罢工之复工，诚如总工会复工宣言所说“非因退让而复工，乃为准备更大的争斗而复工。”换句话说，即是以宣告复工而开始另一新的形式之争斗，求得最后

胜利之争斗。

全上海市民们！工人是革命的市民中最急进的先锋，你们须继续与这最急进的先锋携着手前进。这最急进的先锋，不但为自己的利益奋斗，而且是为全市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每个革命的市民，都不可因为国民党右派的造谣而摇动自己的革命意志，而离散革命势力之联合，右派们一向是站在帝国主义及军阀那边而企图离散革命势力的。

全上海革命的市民，应该在上海市民公会上海总工会领导之下，立刻全体动员，

反抗孙传芳的刽子手李宝章！

反抗直鲁联军南下！

反抗外国海陆军和军阀联防干涉中国革命。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则中国的武装市民及将来的北伐军必进入租界，“以武力回答武力”！

工人及一切革命的市民起来夺取武装，响应北伐军，拥护国民政府！

由市民公会召集全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一切权力归市民代表大会，实现国民政府之北伐目的——市民会议的政权！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二月二十五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出版的《向导》第一八九期刊印

中国共产党 致中国国民党书

——为肃清军阀势力及团结革命势力问题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三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鉴：

中国国民革命之主要目的，自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之统治及其在中国的基本势力，即实际上垄断全中国一切财政工业及交通机关。而肃清帝国主义所用以统治中国之工具——军阀官僚势力，以间接打击帝国主义，亦为达到此主要目的所必需的手段。

贵党自改组以来，与本党密切合作，共同领导全国革命民众向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及一切反动派作战，经过“五卅”运动，尤其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以来，实行武力与民众结合，全国革命高潮，已摇动了帝国主义及军阀官僚之统治中国的地位。

帝国主义鉴于中国革命高潮中，革命的武力与革命的民众已结成不可侮之势力，彼等对于统治中国之全部优越权利虽尚未根本放弃，而对关税及租界之特权，已不得不表示相当让步。军阀方面，直系之吴孙相继破灭，

孤立之奉鲁军阀亦已在苏皖豫晋一大弧线包围之危险的环境中，首尾不相顾，旦夕即有溃败之势，榆关以内，肃清军阀势力，以成革命的统一之盛业，已非理想而近于事实了。

在这样情况之下，帝国主义已经懂得其利用本地军阀做破坏中国国民革命的工具之传统方法，现已不完全实际适合了。于是帝国主义者尤其是帝国主义的日本，指挥其工具奉天军阀，以“南北妥协”“南北合作”“驱除赤化分子”“压迫共产派”“驱逐左派”“共同反赤”等口号勾引其所谓南方稳健分子，这分明是欲用“以赤制赤”之妙计，以离散南方革命势力之团结，以破坏革命，以重新巩固其濒于崩溃之地位。倘使此类流言仅属于帝国主义及军阀的片而宣传，吾人固可一笑置之；奈一月以来，“南北妥协共同反赤”之声浪喧腾于中外报章（详细另纸抄录奉阅）〔1〕，最近日本帝国主义的《顺天时报》，且有“蒋介石……现正与国民党旧人及中立各派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义与北方携手……蒋之联北计划现甚积极，已倩人提出条件”之说，介石同志对于此等流言，不但不曾有一语声辩，而且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演讲中，竟谩骂武汉的左派为败类，要制裁左派，要制裁共产党，预言共产党将要失败，自称有干涉和制裁共产党的责任及其权力，这似乎是表示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奉天军阀的提议，因此英日帝国主义的报纸，都一致极口称赞他这篇演讲。

在北方将领纷纷脱离讨赤的安国军归附国民政府之时，而国民政府之最高军事领袖反有“以反赤名义与北方携手”之流言，则不独使革命的民众，对于国民政府怀疑，即新附之北方将领亦觉进退失据。此事若系介石同志个人行动，一经贵党最高权力机关明白制裁，则介石同志当未便一意孤行，将见君子之过如日月之失〔食〕；倘系贵党多数之意思，则事态便十分严重了，本党为革命前途成败计，不得不具函请教于贵党者一也。

复次，本党自与贵党合作以来，在政治宣传上，在前敌作战上，无时不严责同志为国民革命努力工作，其结果在北京天津保定大连青岛济南开封郑州武昌九江南昌上海南京蚌埠杭州等处，牢狱中无不有共派的囚徒，刑场上无不有共派之血迹，武昌南昌富阳〔2〕决战中，无不有共派之惨壮的牺牲，自问于国民革命虽无殊勋，亦无大过。在党务工作上，湖南一省，纯粹国民党发展到七万人以上，共派不及其半，他省亦称是，而右派却有“亡党”之谰言。并且我们认识三民主义的革命的国民党，非他国纯资产阶级的落后的国民党可比，尤其是带社会主义性的民生主义，实有与本党长久合作之可能，不图贵党右倾分子时有两党分离之运动。

此次介石同志在第十四次纪念周演讲中，一则曰纠正共产党，再则曰制裁共产党，本党乃代表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匪独不受他党之纠正与制裁，并不愿受他党之扶助，亦不曾受他党之扶助。介石同志所称纠正与制

裁之理由，谓共产党党员对待国民党党员加以排挤压迫。使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中果有排挤，压迫国民党党员之事实，不独国民党得据党纪加以纠正与制裁，即本党最高机关亦应加以处分，然而事实恰正相反。试问本党对于贵党的党务整理案有过异议没有？事实上有违反过此案的决定没有？不但事实上未曾违反过此案所决定，而且为避免纠纷有超过此案所决定以上的退让。中央委员，共派本来不及全数三分之一，新近广东及江西省党部之改选，经贵党中央之圈定，广东十五委员中共派只三人，江西九委员中共派只一人，这是谁排挤谁，谁压迫谁？介石同志自己也说：“譬如中央有一个决议，有一个命令，或委一个干事，有许多同志来问这个决议，这个命令，这个干事，究竟是那一个执行委员提出的？这个执行委员究竟是跨党分子不是？”这又是谁排挤谁，谁压迫谁呢？

在本党的立场，只知随事随时努力工作，对于一切职务分配，一向不愿争持；而在贵党的立场，在革命工作的立场，一切职务之分配，似应以工作能力为标准，不应以跨党与否为前提，倘不以革命工作为前提，而专以防闲跨党分子任职是务，是则只愿共派分子在国民党为挂名党员，还有何合作意义？介石同志为贵党负责领袖之一，对于腐败官僚投机分子方尽量容纳，而于他自己也承认是革命分子的共产党员，却防闲之，排挤之，且一再声言制裁之，这究竟是出于何项动机？贵党最高机关若听任此种状况继续下去，是否有碍合作之精神？

本党为两党共同进行革命工作计，不得不具函请教于贵党者又一也。

以上二事，一则关于肃清军阀势力问题，一则关于团结革命势力问题，对于革命前途均有重大意义，故敢于坦率直陈，希即一一赐教是幸。专此，谨祝〔致〕革命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三月十三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出
版的《向导》第一九二期刊印

注 释

〔1〕指《向导》第一九二期登载的《南北妥协消息一束》。

〔2〕本文在《战士》周报第三十七期（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出版）登载时，此处为“浔阳”。

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 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全中国工人同志们：

三月二十一日从今成了中国革命史上最最有价值的一个纪念日。此次上海八十万工人就在这一日举行总同盟罢工并暴动起来反对直鲁军阀的统治。整整经过二日一夜的巷战，工人终于解除直鲁军的武装并自己武装起来了。正因工人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始不经战斗安全占领全上海，而上海各界民众亦得避免数千直鲁军抢劫之惨剧。

上海工人阶级此次英勇的胜利的斗争，真可为全国工人阶级之模范。上海本来是全国产业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工人阶级本来是全国工人阶级中，数量最多组织最好奋斗历史最长久的一部分。

轰动全世界的五卅运动，就是由上海工人首先发难的。自从五卅运动以后，上海工人时时刻刻都站在最急进的地位，为全国工人阶级之先驱，因此更为全国革命运动之先驱。

此次武装暴动起来并胜利以后，上海工人就以自己的血和肉从事实上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

可是，上海工人此次的奋斗及其胜利，却惹起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官僚、土豪、劣绅及其他反动分子——大大的恐慌。他们在中国无产阶级面前发抖，他们认识了工人阶级是他们的劲敌，尤其是数量最多组织最好行动最革命的上海工人阶级，尤其是现在暴动胜利并自己武装起来的上海工人阶级。所以他们尽力注定目标向上海工人进攻。他们除直接的公开的用尽种种方法进攻工人之外，又用挑拨离间之诡计，诱惑国民革命中右倾的势力，他们以此诡计使本同在一战线上的革命武装势力之一部分，怀疑更进而敌视工人阶级。革命战线之分裂正是反革命的利益啊！所以上海工人现在虽然驱逐了直鲁军阀，虽然一部分武装起来，虽然联合各被压迫阶级建立了革命民主的上海市政权之基础；然而这些革命的胜利品时时刻刻都在危险状态，时时刻刻都有被内部妥协分子葬送即被敌人夺回之可能。而上海革命势力失败，上海工人牺牲白费，即足以摇动全中国的革命潮流，全国工人的势力自然因之受重大的打击。所以全中国工人同志应该崛起，视上海工人暴动的胜利即是全中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亦即是国民革命的胜利；应该自信工人阶级的力量能够解除军阀的武装，并建立新

的政权，上海工人的武装就是国民革命胜利之保证。起来！

学习上海工人暴动巷战的教训！

拥护上海工人的武装——总工会纠察队！

拥护上海革命民主的新政权——上海市民代表政府！

拥护武汉国民政府，继续并扩大革命的争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出

版的《向导》第一九三期刊印

关于上海工作的决议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中国
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

上海无产阶级在中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支持下发动起义，协助国民革命军占领了这个城市。作为这次群众革命行动的结果，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形势已经成熟。蒋介石的反动将领白崇禧率领的国民革命军从一开始就出卖了群众。当时，蒋介石及其将领采取了破坏革命群众运动的措施(镇压市民会议，解除纠察队武装等等)。这样，国民运动内部的反动资产阶级分子同各被压迫阶级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因蒋介石占领了上海而尖锐化起来。反动资产阶级不但在谋求同帝国主义妥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且在行动上表明，他们在极端仇视革命群众这一点上，同孙传芳、张宗昌、张作霖之类的军阀没有多大区别。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革命危机中，当人民大众各种力量联合在无产阶级周围进行争取民主和民族自由的决定性战斗的时候，所有各种反动势力(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大资产阶级等等)就会形成一个反革命联盟。上海起义就遇到了这样

一个虽非正式出现但已客观形成的联盟的反抗。

无产阶级想通过建立一个完全由国民政府控制的革命民主政权来使上海摆脱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所做努力的失败，其原因之一，是由于缺乏坚定、敏锐和有阶级觉悟的领导。上海出现目前局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不懂得大资产阶级已经变成了反革命。急于想同大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情绪导致低估小资产阶级民主群众。起义失败在上海无产阶级中间造成了严重的混乱。随之而来的是沮丧和消沉。整个运动迷失了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是立即采取措施加强上海无产阶级的领导。

事实说明，反动派已经暂时占有了上海及其周围地区。只有由无产阶级充当领导者来进行一次决定性的革命斗争，才能使上海从蒋介石新军阀统治下解放出来。我们的当前任务是使无产阶级为这场不可避免的斗争作好准备；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革命力量，使他们聚集在无产阶级周围和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

反对蒋介石新军阀统治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立即发动正面攻击，那将招致毁灭性后果。如果那样做，无产阶级将被蒋介石、北方军阀（他们正在重新向上海推进）和集中了强大兵力的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粉碎。斗争的发展必须是有阶段的。当前的任务是要保存上海无产阶级的实力和审慎地指导他们对反动派进行斗争。

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以一个载有明确要求的政纲

去开展群众鼓动工作。这个政纲将迫使蒋介石一步一步地暴露真面目。这样就会使小资产阶级群众，甚至一部分自由派资产阶级摆脱在对蒋介石本性的认识上的某种错觉。

宣传鼓动必须按下列要求进行：

1.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国民革命运动的最高当局。
2. 建立统一的民族主义政权。
3. 一切权力属于选举产生的市民代表会议政府，它是上海市民的权力机关。
4. 实行在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军事统一。
5. 财政和外交必须集中。
6. 反对同帝国主义和军阀妥协。
7. 保护一切工人组织。
8. 成立工人自卫队（纠察队）。
9. 保护共产党。

除了这些一般的要求以外，还必须加上能吸引工人群众、小资产阶级群众、江苏和浙江的农民以及对反动联盟进行战斗的士兵的特殊经济要求，从而扩大国民革命阵线。当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阵线中成为领导力量时，这种策略是绝对必要的。

所有这些要求现在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但是，会遭到蒋介石的反对。现在除了最后一条，

他会假装同意其他各条。他的这种伪善行为欺骗了很多的人。我们的任务是逼迫他对这些要求切实照办。他是不会干的，因此，他将被迫公开以他真正的反革命面目出现。这种鼓动工作的结果将使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进行决定性的斗争；追随蒋介石的各种力量将会分化瓦解，而一切人民大众的力量将团结为一个由无产阶级掌握实际领导权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

我们在军队中进行鼓动的目的是要使真正的国民党队伍从蒋介石将领的军队中分化出来。必须使他们看清：蒋介石已经背叛了国民党，他本人已经变成一个反动军阀。关于侵吞军费的事实，我们在军队中进行鼓动时要加以利用。

鉴于上海无产阶级面临着对一个对反革命联盟进行严峻革命斗争的阶段，它的组织形式必须改进，以适应新的形势。在进行群众鼓动的时候，必须建立秘密组织，以期在反动派实行突然袭击时，不致使整个运动遭到破坏或瓦解。

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档案英文稿

中国共产党 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

中国共产党完全赞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罢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除党籍和拿办的决定。

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现在决不能容许他再留在国民革命的党内了，决不能再信任他当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了。他反叛国民政府，他谋推翻国民政府，这个革命的叛徒值得国民政府最严厉处分的。工人阶级是极端拥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去肃清内部一切反动分子和战胜国民革命的敌人的。

国民党内部的冲突，结果采取了这种严厉而且必须的对付蒋介石的行动，这是有很深刻的社会意义的。这不一个人背叛党国，背叛革命。蒋介石与他的党羽是代表国民党内与党外一种社会成分。国民党自从改组后，成了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的革命党。可是资产阶级甚至反动的封建分子仍然留在党内。直到如今，这些分子总

是设法使国民党脱离革命的道路。于是发生了内部斗争，这斗争趋向于解决以下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国民党应该变为一个阶级的党或者是一个人民党——就是，国民党的政纲与政策应该依照上层阶级（大资产阶级与封建分子）的利益而决定，或者依照被压迫剥削的大多数的民众而决定。这就是随着北伐发展后，国民党内严重危机的社会背影。

上年三月二十号的政变，国民党内资产阶级与封建分子推翻了广州革命的民主政权。他们得到政权后，于是计画依照他们阶级的利益去领导革命。为着要巩固他们的政权，于是破坏拥护国民党革命派的群众组织（进攻工农运动，解散党部等等）。

群众拥护北伐，为北伐而牺牲，以求发展革命，资产阶级与封建分子却认为是夺得更大权力的道路。但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的进展，发动了伟大的革命势力，使国民党之资产阶级与封建派发生恐慌。很显然的，北伐的胜利有取消三月二十号政变的危险。群众反抗封建与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拥护三月二十号被推翻的国民党中的革命派。于是国民党内封建资产阶级的右派与革命民主的左派之斗争遂厉害起来了。

国民革命军达到长江流域后，已经危害及帝国主义的基础。很明显的，帝国主义是不能不用公开武装斗争而根本让步的。帝国主义一方面与国民政府协商租界问题，一方面准备武装干涉。国民政府要能够对付帝国主

义及其走狗国内军阀之联合势力，必须发动广大的群众自觉的起来拥护，只有他们的力量的牺牲是革命唯一的保障。换句话说，民族主义的中国必须建设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政权。这个意思就是国民革命应该首先是一个农民革命。

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若经过农民革命，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政权是不能够建设的。法国农民拥护拿破仑二十年，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对于农民给了一个改善的办法。在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各省，农民运动如野火一般的散布起来。如果国民政府能根本改革农民数千年来所受之奴隶境遇与痛苦，国民革命就有了真正的保障。——国民革命军将更成为不可抵御的势力。法国农民帮助拿破仑战胜封建的欧洲。中国的农民将拥护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使中国脱离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统治。

农民革命是与国民革命不可分开的。但是在现在的中国情形之下，农民革命是与封建分子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仇视的。农业既为中国之基本产业，农民既为主要的生产阶级，因此农民便成为一切剥削的目的物——封建、帝国主义与资本家的剥削。所以国民革命再进向前发展便需要一个农民革命，这种事实已经是很明显的。国民党内的革命派承认这个必要，而国民党内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却感觉他们的地位动摇了。他们企图领导革命向别一条道路走去，结果必致与反动势力妥协，向帝国主义投降。他们宁可出卖党的主义，污辱孙中山先生的

遗嘱，出卖整个的国家，而不愿减损他们的阶级利益。蒋介石所代表的就是国民党内之反革命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之反革命的倾向。自从三月二十号以后，他就举起这些分子的旗帜。等到他不能够将整个的国民党变为封建资产阶级之反动的工具时，他就与国民党宣战了。如果民族运动不照着这个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的资产阶级所企图的那条路走，他们就不迟疑的要分裂他，叛逆他，不犹豫的与军阀帝国主义勾结以镇压他。蒋介石便代表国民党党内外之封建资产阶级分子做出了这些事实。

国民党决议将蒋介石免职、开除党籍、拿办，这个意义就是国民党宣布在他的行伍中之封建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反叛革命，应该公认为敌人，为国民革命之完成与最后胜利计，必须战胜这些敌人。这个决议案是表现随着革命之发展而发展的阶级分化之一个时期。共产党坚决的拥护这个决议，因为无产阶级坚决的要巩固革命的民主政权，而且是民主革命政权的主干。

蒋介石与封建资产阶级已向国民党宣战，他拿工人阶级做进攻的第一个目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极凶恶的向江西、浙江、安徽、南京、上海、广东、福建的工农大肆屠杀。共产党成为他最仇恨的目标，蒋介石知道，除非破坏工人阶级组织的力量，左派的政权是推不翻的，民族运动是不能作为封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的。无产阶级方面也明白蒋介石不过是反革命的封建资产阶级的刽子手。消灭蒋介石须要战胜国民党内外之封建资产阶级。

假使蒋介石所代表的反革命的社会力量一日不消灭，那末打倒一个蒋介石之后，难免不有更残忍更流血的蒋介石之继起。

封建资产阶级分子以前勉强的同着国民革命走，现在已经跑到反革命的营垒里去了。蒋介石新军阀已经成为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国民革命的新工具。封建资产阶级抢不着民族运动的领导权，遂想分裂国民革命党，设立一个对抗的党部与政府，用民族主义的假面具来出卖党出卖革命，勾结反动军阀，与帝国主义妥协。单是开除蒋介石，但还没有根本取消这个危险。他还是要想设立一个对立的国民政府。不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他仍然还是带领很多军事势力。他想欺骗民主主义的民族分子，散布反对武汉的谣言，说国民党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工具。他以及他所代表的阶级已经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他还想用阴险的造谣手段，来混乱这个情形。

开除蒋介石党籍之后，蒋介石主义的根芽还可以在所有国民政府领土内找得着。这就是反动的社会阶级——地主土豪劣绅等，只有国民革命用激进的农民改革政策，才能消灭这些势力，使蒋介石主义衰弱下去。从前封建资产阶级分子跟着国民革命走，所以策略上尚须有步骤的发展阶级斗争。现在他们已经采白色恐怖屠杀政策宣布阶级战争了，那末任何策略上的顾虑都不能阻止向反动的阶级的进攻了。这是推翻新军阀蒋介石，破坏他

设立对抗的“国民政府”的企图，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的联合势力之最有效力的唯一方法。

打倒蒋介石——封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代表，帝国主义的工具！

打倒军事专政！

革命民主主义的联合万岁！

无产阶级农民与中等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汉口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出

版的《向导》第一九四期刊印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 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

.

.....

.

.

.

.

.

.

.

.

.

.

.

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因为国际决议案中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指示，及革命策略的规定，都适合于现在革命阶段中之客观的环境。第五次大会认为现在革命阶段的特质是需要建立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只有这个政权，以无产阶级作领导，才能解决现在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并引导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方面进行。

第五次大会必定使全党研究与明了，并按照国际决议案所指示的，努力工作。

根据中央档案原铅印本刊印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

1. 从上次本党大会以来，革命发展得很快，党的长大也同样的快。从第四次全国大会到现在，党员自九百余人增至五万余。党的政治影响比数量的增加更快。本党无疑的成为全国工农的领袖；领导无产阶级经过两年的不断的斗争，斗争中包含好几次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武装暴动。在党的领导之下，四年短期之内，二百八十余万工人与九百余万农民，已经组织起来。本党已成为群众的党了。

自“五卅”起，上海无产阶级的斗争，香港罢工，汉口无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斗争……都是中国革命史中重要的事件。在过去的二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站在最主要的地位上。如今他已取得斗争的领导权。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这样的地位，足以保证革命的前途，将来不会开出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而是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

2. 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符合第七次国际扩大会议决议案所指出的道路。民族革命之发展加紧了阶级斗争。国民党内的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想领导革命，以与本国

反动派及外国帝国主义妥协；然而包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左派，则反对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于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之中，发现了危机。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看见不能依了他们的阶级利益而领导革命，他们就把国民党分裂了。他们不但离开了国民革命的斗争，并且转而反对之。他们已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上海无产阶级，做了两次英勇的暴动以欢迎革命军，他们在反抗北方反动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南军占领上海后，不久蒋介石就在上海下命令屠杀工人。

现在革命已进到第三个阶段，封建分子与大资产阶级已转过来反对革命。在这阶段中，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在这革命的联盟之中，无产阶级将实行其领导权。

3. 革命运动发展，无产阶级势力增加，同时，反革命的势力也渐渐形成。反革命势力的形成，有下列的表演：(A) 帝国主义列强之联合的直接武力干涉，(B) 反动军阀与大资产阶级同盟反对国民革命。帝国主义者看到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政权，足以给帝国主义者及其同盟军以最后的打击，他们便想用武力恐吓手段强逼革命的国民政府采用妥协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帮助并鼓励军阀与大资产阶级建立反革命的同盟。革命运动中第三阶段之初期，就遇到了帝国主义军阀与大资产阶级联盟的这种威吓。但是，革命运动正要在坚决反抗这反革

命联盟的斗争中，更加向前进展。革命势力定能巩固集合民众的精力，巩固一切革命力量，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权，以反抗并破坏反革命的同盟。

4.从“五卅”起，无产阶级开始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领导权而斗争。这个斗争建立了广州革命的国民政府，获得暂时的成功。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看见这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将走得太远，客观上危害了他们的阶级利益，于是他们也开始用全力使民族解放运动移转到他们的指挥之下。当时我们的党，却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互争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第一个表现就是三月廿日的事变，蒋介石推翻了左派政府。

三月廿日事变，开了争夺领导权的第二阶段。在此时期，资产阶级占了上风。他们利用他们在广东的胜利，而想把他们的权力扩大至于全国。在这时间本党没有正确的政策。固然，资产阶级一天留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我们就一天须与他们结合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但是资产阶级将来的作用，在三月廿日之后，已经更加清楚了。然而本党没有懂得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得到民族革命的领导，并想消灭革命。因为本党对于大资产阶级在此后革命阶段中的作用，没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在讲联合战线时，没有致力于给劳苦群众的利益以足够的保障。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三月廿日以后的反动时期中，要立

刻倒蒋。本党的任务是继续的去争领导权，——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的领导，这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领导，客观上是必将出卖革命。这个任务并不与联合战线不两立。

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在农民中得到同盟者。无产阶级要提出急进的土地改良之要求，以巩固与农民之团结，向封建分子资产阶级之反动奋斗。本党没有实行这个任务以领导无产阶级。联合战线做得太广泛了，甚至乡村中的封建宗法的反动分子也联合在内。在本党领导之下的广东农民运动，除要求组织农民协会与减租外，没有更急进的要求。当时封建分子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已经准备使革命妥协，至于消灭，而本党没有认明，应当在乡村之中攻打他们的根基。实则只有进攻这种封建分子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才可使革命的社会基础更加深入。这件事没有做，为了这个原故，广东便很容易地失掉了。

5. 北伐之主观上的动机，是资产阶级想扩大他的权力。但是客观上北伐是发展革命的方法，所以帮助北伐的政策是对的。但在此革命地盘扩大之时，本党未能充分注意使革命的社会基础同时深入之必要。这种疏忽，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过分估量了大资产阶级的作用。那时的策略，是先帮助资产阶级完成其革命的第一阶段（扩大），然后再来做第二阶段的深入。因为这错误政策，所以

不能征调全国革命的民权派的力量，以限制封建分子资产阶级想利用军事胜利之帮助，而加强其势力之企图。最后封建及资产阶级分子的势力已经很强大，于是他们公开宣告包办整个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实行其分裂革命之政策。因为对于联合战线的见解错误，所以在革命军所占据的地域中，一切反动的社会基础，仍任其存在。因此，到蒋介石叛党的时候，不能使他孤立，封建的资产阶级分子，居然带着很大的力量，从民族革命中分裂出去。倘能及早在城市与乡村中（特别是乡村中）加紧阶级斗争，那末，早就可以摇动反动势力的地位，——例如广东之失，也就不会这样容易的了。

6. 对大资产阶级估量不确，甚至于过分，于是对小资产阶级的估量就过小。小资产阶级不会成为一个独立政治力量的，当大资产阶级与封建反动势力联合而预备使革命势力妥协之时，无产阶级应非常注意小资产阶级，否则，他将与资产阶级一路走。上海暴动之失败，最大原因是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赞助。

蒋介石并不是在四月十二日突然变成反革命，而命令在上海的街道上屠杀工人的。从三月二十日起，他已经是革命的仇敌了。但党没有指出蒋介石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他要消灭革命，因此，也就未能充分号召城市中民权派的群众，使他们围绕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以防止蒋介石能够在上海建立其新军阀的独裁。

7. 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以为上海无产阶级的二月暴动

是太早熟了，在那时候的革命热情中，党不能有计画的指挥群众，建立苏维埃式的市民政府的尝试，更是太早熟了。

大资产阶级一开始时便没有帮助这个运动；白色恐怖起来，小资产阶级也吓退了；于是无产阶级陷于孤立。二月暴动失败后至三月暴动之间的时期，是很可以利用之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亲密联盟，以为革命的民权政府的基础。但是因为第一次早熟运动的失败，使党跳到另一个极端；因此，过于重视资产阶级，拉他进市民政府，而忽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本党的另一错误，是于不自觉之中把上海运动做成是一种独立的，而未顾及全国民族运动的联系。

8. 第五次大会认识上海无产阶级在本党领导之下英勇斗争的历史意义。大会认为：虽然上海事件有许多失败与错误，但不失为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之斗争中的重大事件。在这时期中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民权联盟，已经成为革命的唯一的社会基础。上海无产阶级仍为革命的柱石，上海仍是斗争的重要中心之一。上海无产阶级从“五卅”以来就继续不断的在本党领导之下做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他的斗争必能坚决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妥协，将来一定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

9. 第五次大会坚决的认为：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叛离，不足以削弱革命。现在的时期不是革命低落的时

期，而是紧涨剧烈的革命斗争时期。在这时期里无产阶级成为斗争的原动力，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当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留在民族运动中的时候，他们阻碍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政纲的实现，因此，群众的革命力量是被遏制的。现在革命的民权派力量之自由发展的障碍已经减轻，所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的运动可以加强起来。

革命基础之地域，需要很快的扩张，但是同时在这地域之中要把革命的社会基础使之深入。广东之失去，表现出革命只扩大而不深入的危险。这个时期里革命的主要任务，是除去反动根基，以巩固革命。要做这件事，必需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政纲和创造乡村的革命民主政权。

10. 革命势力的发展使帝国主义的干涉更加严重。于是小资产阶级之中发生一种恐惧失败的情绪，想要将革命根据地从帝国主义威胁之地，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第五次大会警告全党：应当反对这种无根据的失败主义的趋向。帝国主义的干涉，确实存在。中国共产党应当领导工农群众从坚决的斗争中，保护革命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要巩固革命于中国的中部及南部，并不是忽视扩大革命地域之可能与必要。但中国共产党必定反对以扩大革命地域为借口，而实际上抛弃或削弱现时革命根据地的倾向。

第五次大会认为共产党应当竭力执行深入革命的职

任，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如果认为要先完成北伐而后始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与民主政权之创造，那么，这正可以使资产阶级在他所占领的沿海诸省，戴着民族主义者的假面具而在极短时期内巩固他们的势力，以帮助帝国主义。东南诸省是经济上最先进最富饶的地方，我们不能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否则，这就是使帝国主义更加强固（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太弱，不能独立的生存）。如果这样，中国将要走进一个时期，在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的领导权之下，发展经济，使世界资本主义有很大的稳定。中国将继续处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虽然统治方式上或者略有改变，然而实质上这就等于消灭革命。

第五次大会认为共产党必须领导劳苦群众反对封建资产阶级等的反动派，以巩固革命的胜利。革命的根据地一定要在那种省份里巩固起来，那边要有久经战斗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农民组织，以及高度发展的国民党及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不能想出一个更天然可靠的基础，如上海无产阶级，广州工人阶级，广东江西湖南湖北的革命农民。第五次大会丝毫不减少扩大革命地盘与打倒张作霖的需要，同时也以为党有一个目前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浙江诸省，毫不留情的与反动势力作战。这个任务的完成，其意义是在很大的地域上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这地域在社会情形及经济上都是合宜的。这样可以铲除封建资产阶级消灭革命的企图。客观上的条件（国内的与国际的），都利于中国革命发展

到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这个革命前途不仅是国际议决案所指示的,而且是由事实所产生的。如果对于这种前途有分歧的政策,那就是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其意义就是消灭革命。

11. 四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两种条件之下,加入中国国民党,(A)保持组织的独立,(B)有批评的自由,以执行其拥护工人阶级利益之政治的主张。在此合作中本党曾很坚决的反对右派,因右派系主张限制本党的独立组织者。但是本党在国民党内,以前只有离开国民党而求所谓“独立”的政策,而实际上并未能将真正独立的工人阶级之政策执行起来。主要的原因就是本党对于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未能正确的认识。在现时这一革命的阶段之中,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影响,应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政治上很明显的很坚决的表现出来。

革命的现时阶段之中,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比以前应当更加密切。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原动力。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共产党一定要使一切革命政策,政纲与策略之决定中,都考虑到工农的利益。共产党不能做国民党的旁观者或反对者。这革命的联盟,必定要立在一个共同的国民革命的政纲上。

共产党的加入国民政府与省政府,以及由联席会议讨论革命的实际问题之新方法,都已表现国共两党的关

系更加密切了。在这新的情况之下，党团工作变成非常重要。要经过党团使政权与党的机关影响群众。第五次大会警告全党：决不可以因为我们与国民党关系的新方式而发生取消派的倾向。要知道一个革命的联盟并不就等于一个党。

现在阶段之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这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土地革命），是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所必需的；工人阶级领导着这个革命。第五次大会不赞成“共产党是工党，国民党是农党”的机械理论。土地革命就是推翻封建宗法的革命；这种革命当然要当代最革命的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是现在中国最革命的阶级，他应当领导农民去实行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

12. 现时的革命阶段的主要特质，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在斗争之中取得领导权。然而必须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有了保证，他才能完全实现这个政治上的功用而行使其革命的领导权。须有英勇的革命斗争，才能获得光明的政治发展。工资低微，营养恶劣，衣服褴褛受尽剥削的工人，决不能负担这个责任；所以要领导工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第一条件，就是共产党要很坚决的为提高工人生活程度而奋斗。第五次大会认为：为实现工人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起见，应当为工人力争下列的要求之实行：（一）八小时工作，（二）足够供给生活的工资，（三）劳动保护法，（四）救济失业，并为失业者觅得工作，（五）劳动保

险及恤老金，(六) 保护女工与童工。

13. 现时大资产阶级对于国民政府仇视，组织一个很显著的反革命大联盟，会同着帝国主义的干涉及经济封锁，来威吓国民政府，于是国民政府在财政方面感觉很大的困难。如果财政困难不能解决，那么，革命的斗争便不能继续进行，军队便不能改造，将要发展而成民权独裁制的政府机关，也不能建设。共产党应坚决的反对增加劳苦群众经济负担的企图，因为这不是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而恰巧相反，这种企图却会削弱国民政府的基础。第五次大会认为：对于财政困难唯一的稳当的解决方法，便是农民革命。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向来交付给地主的的地租，便可以有一部分以地税的形式交给国家，使国家增加了一大批财富。现在暂时解决财政的方法还有两点：(A) 征收很重的财产税，(B) 发行革命战争的公债，而把公债的担负加于不劳而获的阶级身上（资产阶级和地主）。

14. 在革命运动发展中，中国的青年们有很大的作用。在各种斗争中，青年们在C.Y.指导之下，总是站在前线上，而给党以很大的帮助。在现在时期中，当革命运动要深入和扩大之时，青年的革命意义格外增加了。党对于青年之革命的意义须加以严重的注意。从前党对于青年运动，未尝加以充分的注意。将来党对于C.Y.必须建立一种亲密的联合，必须积极的领导C.Y.，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帮助。C.Y.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主要

的一部分，C.Y.是一条运河，党须经过个这条运河，而影响到广大的劳苦青年群众。我们现在如果把C.Y.的数量上的增加和C.Y.应负的任务比较起来，就可以看见现时C.Y.组织上的发展是很不够的；这是因为以前在各种斗争中，C.Y.的群众工作太薄弱，或者C.Y.不能在他的组织下面巩固他的政治影响。C.Y.将来的工作，一定要很注意于群众运动的发展，要利用一切的机会，在工人之中以及乡村和军队之中去发展青年的群众运动。党盼望C.Y.的第四次大会能根据这个精神去进行他的工作。

15. 党对于被剥削的妇女群众的工作，必须较之从前更加注意的去做。在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之中，被剥削的妇女们，一定无疑的是很重要的因子。妇女是人民中最受压迫的一部分，她们在革命队伍之中，也是最为热心于革命的。

16. 去年的经验，已经认明了一切无党的普通群众组织，特别是济难会，在革命战线上，对于革命群众，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党以后对于这些组织也必须加以重大的注意，为的是经过这些组织，而在工农和知识分子之中扩大和巩固党的影响。

根据中央档案原钤印本刊印

土地问题议决案

1. 土地问题意义

一、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大半尚建筑在封建的关系之上。大部分的田地(约百分之六十六)为收租的大地主所占有。佃农及半佃农耕种田地，而没有享有田地的权利。田租的方式既不确定，租佃权也不能永久享有。田租大抵要占农民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五十，除此而外，农民对于地主阶级以及握有政治的军阀统治者，还要交纳种种苛捐杂税。

中国田地只有百分之三十四属于农民。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的农业，固然除北方各省如山东、满洲外，几乎无有。然寺庙、祠堂等所属之地，占有耕地之数目，亦实有可观。井田之制，久已消灭，惟所谓公有田产之管理制度，尚遗留于乡村间，作为乡村中宗法社会政权之基础。此等田地的主有权，已为乡绅所篡夺，耕田者反而失却享有的权利，乡绅等得变为地主，更利用此种权利，以行使其宗法社会的威权及统治。

军阀的统治，就建筑在这种土地关系之上，因为地

主阶级的权力，实使封建宗法制度，在中国农村之中，仍旧保持其为经济政治组织及行使制度之重要特质。

二、同时，初期的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亦已深入于农村经济之中。所以中国农民实在同时受两种剥削：一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即封建制度式的）剥削，一是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其结果，中国农民日就穷困，国民经济制度特别落后。

地主阶级所提取的田租特别的高，致使耕者反无剩余的收获。他们所得的，不能供给日常的需要。此种形式，即资本主义前期的剥削。在此剥削下，不许农民改善其生产方法，结果中国农业依然保持其原始状态。实际上就等于奴隶制度。农民只为消费而生产，其剩余都为地主所占有。

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也在这种封建式的关系上建立起来，地主所收的佃租多属谷类（这又是封建制度的遗留），农产品的剩余，多归他们手里。但是地主得因此而变成商业资本家。不过他们的原始的封建性阻碍那充分的资本主义化的趋向。他们以原始式的剥削手段而积聚起来的财产，并未变成生产的资本，仍用到购置田地及重利盘剥等的投机事业。

经济的落后，阻止了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同时全国经济形成了破碎不连的现象，将全国区分为多数孤立的商场，此等商场即为掠夺剩余农产品的地主所操纵。在此情形下，地主阶级便能强行抬高物价；如此不仅剥削农

民，而且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亦在被掠夺之列。工资极低的无产阶级，却要出高价换得食物；就是小商人，也变成了地主阶级垄断的投机事业之牺牲品。

重利盘剥制度，即在此复杂的原始的剥削形式之下，很快的发展起来。此是唯一的交易制度，唯一的资本主义式的积累方法。然而重利盘剥者的资本，并不能促进商业或产业，依然用到土地投机事业上去。残酷的田租征收以及其他封建式的压迫，重利盘剥等的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再加上军阀机关的榨取，致使农民陷于永久的饥饿之中。

军阀在多数省份中占据着最高的政权，其统治机关在种种不同的方式下，剥削一般农民，以下即为其中最厉害的：

- A. 正税与苛税(预征钱粮)；
- B. 军事给养(米粮、靴鞋、马匹等)；
- C. 战时苛酷的征收；
- D. 拉夫(运输军用品)；
- E. 滥发无价值的纸币(军用票)；
- F. 厘金征收。

三、帝国主义的统治，阻止中国经济的进展；于是中国产业特别落后，形成农村人口的过剩；而农村人口过剩的现象，实足以延长军阀封建式的剥削制度之生存。可见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农民问题有极密切的联系。

帝国主义因欲为其本国的产业找到贱价的原料，为其商品找到市场，于是力求殖民地的扩张。劳动力是最

可宝贵的材料，殖民地半殖民地充满了贱价的劳动后备军，当然是帝国主义国家中之产业的凭借。结果帝国主义的统治造成了殖民地产业的落后，而殖民地永久停滞于原始农业生产的状态。因此新式产业的发展，农村中的劳动力，不能充分向城市中转移。这样的退步现象，造成农村居民过剩，维持了封建经济的生命；否则，新式生产的发展，早将他们打破了。

帝国主义所引起的农村人口的过剩，延长了封建制度及其剥削。破产农民继续不断的增加军队的数量，致使劳动者的工资，落到最低限度，帝国主义的根基，因之更形巩固。综起这许多原因，造成了农民中极端的贫困与荒芜。失业的农民，既无处施用其生产的劳动力，于是变成土匪与雇佣的兵士。中国的军阀，确是一个奇特的社会征象，其形成在乎国家经济的不完整不统一。军阀是封建势力剧烈的表现，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这种军阀会同买办及地主乡绅重利盘剥者，组成一个极大的机器，混合封建反动式的剥削与初期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于一炉而冶之，炼成压榨农民的铁钢。这一个机器吮吸了农民的血汗，破坏国家的经济组织。在此背景上，帝国主义进行其最完备的资本主义的掠夺。

经济的破产，驱使农民于重利益剥者的铁腕中，利率渐渐增高，致使农民永不能脱离债务的负担，以致出卖或抵押其土地，土地遂集中于高利益剥者之手。再则帝国主义者买办及土豪等还要借此以垄断原料，如预先

放债给农民，使他们不得不以贱价将原料抵债等；这亦是对于农民的一种很苛酷的剥削。同时，帝国主义者，如基督教教会及农业公司，还有直接以贱价勒买田地的；这种剥削方式便更加是帝国主义殖民地政策的表演。

四、中国的军阀吮吸全国的膏髓，外国帝国主义阻碍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他们两者的根据地都是农村中的封建组织。所以中国民众欲达到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的目的，基本的条件就是肃清农村中封建势力的残余及宗法社会式的政权。急剧的变更土地所有制度，是国民革命中唯一的原則，非然者，为真正民权的自由战争，将停滞而不能前进；欲消除上层的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组织，必须破坏他的根基。

五、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没有他们自动的自觉的来参加，国民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农民的精力的，必能贡献于国民革命，如果农民的剥削机关能澈底解除。农民革命——打破封建制度——是建立民权制度的革命所不能离的。在通常社会的发展中，资产阶级能为农民破除封建的锁链。但是此种通常的社会进化，在中国已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所扰乱。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未形成一个反封建势力的成分。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因为是从地主阶级产生出来的，依然同地主阶级保持亲密的结合，甚而至于变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众的工具（如买办）；在这两个情形之下，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剥削农民的势力有密切的连系。所以他不能作农民革命的战士。中国资

产阶级仇视农民革命，他不但不能为民权自由而奋斗，反而作民权自由的敌人（蒋介石的分离革命即其一例）。

农民将要受无产阶级的赞助（并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为助手），而从事于历史的战争，消灭封建势力及其党羽。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系反对帝国主义垄断中国经济的；帝国主义的垄断，是保持乡村中封建关系的主要原因。但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关系亲密；虽与他们阶级有利，他们也不能完成土地革命以促进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六、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剥削之影响于经济者，为食料价格的增高，商业的停滞。此两种影响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共同感觉到的。所以这两个阶级都是反对剥削农民的，农村的急剧改革，使耕者有其田，不但农民本身获得利益，全部人民都蒙其益。农民群众生活程度的提高，商业因之而大发展。设若耕者能享用其自己生产的剩余，债主的铁腕将失掉其作用，农民可用由农产得来的资本，从事于改良耕种的方法及工具。结果全国农业产额必为发生自由的市场，可使物价降低。最终，因封建式佃租的取消，国家税收可以得到新的源泉。

七、要取消封建式的剥削，只有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才能实现。要破灭乡村宗法社会的政权，必须取消绅士对于所谓公有的祠堂、寺庙之田产的管理权。为保证农村急剧改革的实行，农民必须握得乡村中的政

权，乡村中之武装势力，必须由绅士手里，夺回来交给农民。失业的农民既然得到土地或能从事于生产工作之后，军阀的祸患，将不复存在于中国。重利盘剥的现象，也因为他的经济根基既行取消，势必消灭。国有农业银行的建设，信用合作等的设立，必使重利剥削者完全丧失作用，这种打倒重利益削〔剥〕的斗争，亦是农村革命的重要工作。所有这些工作，都有相互的关系，不能分离解决的；唯有从事这些工作，使农民群众从封建宗法的剥削下解放出来，国民革命的成功才有保证。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以为必须要在平均享用地权的原则之下，澈底将土地再行分配，方能使土地问题解决，欲实现此步骤必须土地国有。共产党将领导农民从事于平均地权的斗争，向着土地国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度的方向，而努力进行。土地国有确系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的党纲上的基本原则。

2. 中国农民运动之趋势

一、中国农民运动，依粤、湘、鄂等省的经验，大半都是以贫农(佃农、半佃农、雇农及地少的自耕农)为中枢。农民运动的这种社会基础，很明显的指示农民运动的前途，必然是土地革命。最迫切的现时的运动趋势，已经是铲除宗法封建的政权，而建立农民的政权。自然在这种斗争中农民武装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种

总的趋势中，有些地方已经进一步而到了实际开始解决土地问题。

二、各省农民运动发展之阶段，现在还有许多参差。北方各省在军阀残暴的压迫剥削之下，农民协会尚在秘密组织之中，没有很大的发展。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省，农民运动在胚胎之中，减租抗税的斗争，反对重利盘剥及土豪乡绅的斗争都已经开始。但是他们遇见蒋介石反动的压迫。广东农民运动发展最早，但是，客观上虽然农民群众早已从减租的口号进而要求政权，要求武装，甚至于土地，然而我们党在广东农民两年艰苦的剧烈的斗争过程中，没有确定的一贯的政策去指导。李济琛的反动，使广东农民现在处于非常之大的压迫之下，土豪劣绅的反攻更加残暴起来。江西、湖南、湖北在革命的国民政府之下。江西农民虽然已经开始减租等的初步斗争，但是大致说来还在组织集中力量的时期，这是因为江西久处于蒋介石势力之下，经过左右派政权两次转移的斗争。现在农民运动发展的阶段之中，要算两湖的为最高，尤其是湖南。湖南不但实际上农民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至少已经动摇他们的权力，而且要自己起来建立政权，有些地方，并且参加县政权。不但如此，两湖的农民斗争，已经开始要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并有分配土地的运动。

三、中国农民运动，大部分都在无产阶级的指导之下，不得无产阶级的领导，他的发展不能有正确的革命

的道路。但是如红枪会、硬肚会等运动，也是农民运动的一种方式，他们是中世纪式的组织和斗争方法，这在阶级分化不甚清晰的地方，如河南等处，往往以地主土豪为领袖，有一部分甚至会受反革命派的利用。然而这种运动，当他们反抗军阀，代表小农利益而抗捐抗税，反对县官的时候，确是革命的。

四、农民运动发展的时候，封建宗法的反动政权（所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自然竭力压迫。他们勾结军阀，利用自己的武装（民团、团防等）以及土匪，来进攻农民，屠杀农民，要想镇压农民运动。然而国民政府的革命政权之下，农民运动至少得到相当的自由。所以农民运动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而形成伟大的势力之时，土豪乡绅的势力大大削弱，他们就实行消极抵抗，阴谋破坏，如运米出境，拒绝借款等，或者自己冒充农民，组织假农民协会。蒋介石派的反动势力之下，差不多只有这种土豪乡绅组织的所谓农民协会，才能存在。就是国民政府之下，土豪乡绅亦在联合军队中封建分子，时时刻刻在那里力谋反攻农民。所以现时农村中的斗争，实在是非常之剧烈的。

五、农民的斗争大致初起总是减租、抗税、减息等等及反抗土豪乡绅的压迫，但是随后的发展，往往立刻便要进到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进到夺取武装，以至于武装冲突。而在革命战争的军事时期，农民斗争一开始便是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治势力，这是因为不但取得土地，就是

实行减租，也非有农民自己的武装和政权不可。所以农民斗争必然要经过一个猛攻宗法封建势力的时期。这种猛攻的革命斗争中，总是以贫农为中坚。农民的革命政权，实际上不能不以贫农为领导者。这种推翻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的运动，客观上是以开始解决土地问题为目的，中国农民，尤其是贫农，他们很深切的感觉土地之缺乏，田租杂捐的剥削。他们实行革命斗争的目的，是要自己拿住政权，是要推翻土豪乡绅包办税捐的制度，而自己来管理，是要取得土地，而夺回地主等剥削他们收入的大部分——由减租直到耕地农有，平均耕地。

六、现在革命的阶段之中，农民运动——乡村中农民反抗豪绅地主的阶级斗争，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他的发展阶段很有参差，但是大致的趋势，已经是摧毁封建宗法政权而开始解决土地问题的时期，这是中国革命现时的新阶段之主要的特点。现在乡村中阶级斗争的开展，及农民革命的深入，不但要澈底铲除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而且就是严重的打击反动的封建分子及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使帝国主义的势力无所凭借而组织反革命运动，这就是说：现在革命的趋势，是要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实行改良农民的经济地位，一直到分配土地。

3. 国民革命中的农民政纲

按照上面的分晰〔析〕，农民运动客观的条件与主观的力量都已经可以知道。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决议在目前的革命阶段中，为农民问题之解决，须要以下的策略：

一、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此等没收的土地之管理，应付诸土地委员会。此等土地的管理形式，是否采用公有制度或分配于耕种者的农民，皆由土地委员会决定之。

二、（甲）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乙）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丙）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不没收。（丁）革命军兵士中没有土地者，于革命战役完竣后，可领得土地耕种。

三、耕种已没收的土地之农民，除缴纳累进的地税于政府外，不纳任何杂税。未没收的土地之租率，应减至与累进的田税相当的程度。耕种未没收的土地之农民，只缴纳确定的佃租，不纳其他杂税，并永久享有租佃权。

四、取消地主绅士所有的一切政权及权利。建立农民的乡村自治政府，对农村各被压迫阶级所组织的乡民会议负责。农民协会并当参加民权的县政府之创造。

五、解除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保障自治政府及革命的胜利。

六、建立国家农业银行及农民的消费、生产、信用合作社，改良水利。

七、取消重利债务的利息。限制重利盘剥，规定最高限度的利率。

根据中央档案原铅印本刊印

职工运动议决案

(一) 职工运动两年来的发展 及现在的形势

本党第四次全国大会时，正是职工运动复兴时期的开始，两年以来，经过五卅运动、省港罢工，反奉战争中河南、天津、唐山职工运动的勃兴，铁路工会的恢复与发展，北伐后湘、鄂、赣、皖、苏、浙的发展，以至上海三次暴动，虽然有此仆彼兴，时起时伏的现象，然整个的形势，都是在不断的争斗继续高涨中。在政治上已经推进了国民革命的发展，给帝国主义以莫大的打击。从争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一直到参加政权的实现，充分的表现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经济上，劳动条件，已有很显著的改善，从要求待遇的改善，团体契约权之获得，直到要求参加国有产业的管理的实现。群众生活的水平线，已有很显著的提高。在组织上，工会的权力，已渐次集中。纵的方面，从零碎的行会的组合，发展到统一的产业组合（虽然现在还是很弱小的）。横的方面，各地方总工会，更具有最高的权力。

工会会员数量上，由五十四万增到二百八十万。所以这两年来英勇斗争的结果，的确有很显著的急速的进步。

中国职工运动发展的结果，使资产阶级受了莫大的威吓，渐次背叛革命（蒋介石叛变），不惜与帝国主义妥协，专力来打击工人阶级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帝国主义因见旧有工具军阀系统的崩溃，亦欲在中国找到新的工具，因此帝国主义与中国资产阶级之中，发生一种亲和力，互相吸引，因此资产阶级将渐次变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新工具。

资产阶级在这个新的企图之下，遂尽力打击工人阶级。一方面组织法西斯蒂，来屠杀工人领袖，破坏工会；现在苏、浙、闽、广、皖、赣、川等处，已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了。另一方面，又欲以改良主义来欺骗工人阶级，如蒋介石颁布的工会条例，几乎全抄上海总工会提出的上海工人的经济总要求。并企图组织御用的黄色工会。在武汉的资产阶级亦欲以改良主义，来缓和工人阶级的进攻，如提倡分红利制度，甚至要工会来代管生产，以红利的大部分分给工人等。虽然我们在经济的分析上，看不出中国资产阶级有实行改良主义与工人阶级改良主义化的可能；但资产阶级在他的政权区域内，为欲巩固他的政权，与在工人阶级参加政权的区域内，欲缓和工人的进攻，的确有企图采用改良主义的倾向。我们应该加紧工人阶级的团结，组织工人阶级的武装来抵抗法西斯蒂，动摇资产阶级的政权。同时要极力提高工人的要求，

发展经济罢工，揭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假面具。

(二) 职工运动的新方针

在党的政治议决案上，已指明“中国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了，中国革命将要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政权之下，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在党的总的政策之下，职工运动自然应该定出新的方针。其主要点：

第一，要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一直到要求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企业、大工厂等归国有的实现。

第二，要求参加国有产业的生产管理，监督生产。使国有产业能向非资本主义的路线发展，不致官僚化。

第三，要求政府实行高度劳工政策，颁布劳工保护法、工厂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及最低限度工资等，使工人生活水平线，能随时提高。这些工作都应该是劳工部主要的工作，并须设立监察机关，保障这些法令的实施。

第四，要求社会保险之实施，救济失业工人，同时要建立工人宿舍、公共食堂等。

第五，要求设立国家商店，公买〔卖〕一切日用品（食粮、燃料等），并发展合作社等等的组织。

第六，各地总工会应该随时提出工人的行动总纲，为各地工人阶级奋斗的目标。

第七，发展全国一致的政治的经济的总的斗争，各

全国产业总工会应即提出总的经济要求。

上面七项是职工运动方针之骨干，在国民政府管辖之区域内，应该加紧争斗，使能加速的实现。在蒋介石政权之下（资产阶级政权），北方军阀政权之下亦须极力宣传，各级工会提出之要求总纲中，都应该尽可能的提出（自然要特别注意当地工人阶级当前的最迫切的要求）。必须如此，才能兴奋工人阶级革命的勇气，抵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侵入。必须如此才可以保障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

（三）经济斗争

过去有些地方（如反奉战争中北京、天津、唐山等处）偏重于政治斗争，不注意工人的经济斗争，结果反减了工人对政治斗争的认识和勇气，并影响到组织的发展，这是我们很可宝贵的经验。所以在第四次大会的决议案中所说的，只有提高工人的经济要求，才能兴奋工人政治斗争的勇气，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经济斗争是工会的日常生活，必须如此才能吸引广大的群众，加紧群众的组织。这是以后工作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在蒋介石统治之下，有组织黄色工会实行改良主义的倾向，我们应该极力提高工人的经济要求，尽量发展经济斗争，攻击这些黄色工会的组织，才能使工人不致受改良主义的欺骗，而扩大我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北方军阀统治

之下，自然没有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可能，但我们应该注意工人日常的迫切的生活痛苦，发展工人部分的零碎斗争，在可能时，仍须举行大的斗争，使工人群众在这些争斗中团结起来。但是在宣传上仍须提出总的经济要求来吸引群众。在武汉工人群众已经普遍的经过一次经济争斗，但是资本家随时将物价提高，使工人生活几乎毫无改良，甚至挨饿，因此一部分群众发现对政治斗争的消极。这是职工运动一个很大的危机。挽救这个危机的方法，只有一面提高工人的经济要求，继续争斗，另一方面要求政府限制物价，或设立国家商店，公卖一切日用品。还有一种危机就是用革命危急的恐吓，来限制工人的斗争。这样可使工人阶级成为其他阶级的工具，我们应该极力与这种主张奋斗。

自经济罢工发展后，而资产阶级及其代表者倡为“罢工循环”之说，其用意则在打击工人阶级，就是国民党左派中亦往往有人因此学说而动摇。要知一般物价之增加决非因罢工所致，而有其根本原因，即供给与需要的关系及种种政治战争的影响，所以我们应尽力根据事实作广大的宣传，与此类学说奋斗。

手工工厂工人与店员的争斗，成为目前很重大的问题，许多人以为欲保证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须绝对停止争斗，这句话未免矫枉过正。工人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和领导小资产阶级，决不单是消极的方面让步可以得到的，而是要在积极的方面加紧反帝国主义运动，

加紧反大资产阶级的争斗，不断的提出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扩大一般市民的要求等。所以我们对手工工厂工人和店员的争斗，仍是要积极的拥护，才可以取得这些群众。第一，中国产业无产阶级的数量太少，必须使手工工厂工人与店员，完全在团结〔团结在〕产业工人的周围，力量才能伟大；第二，手工工厂工人与大部分店员生活极为痛苦，只有发展经济争斗，才能组织起来；第三，手工工厂工人与大部分店员的劳动关系，多半是一种封建式的主奴关系，不经过争斗，不能打破封建势力的束缚。尤其是非产业的区域（各县、市、镇），手工工厂工人与店员，就是地方的无产阶级的代理人。应该是这些地方政治上的领导势力。但这是他们被小资产阶级利用封建思想与权力所束缚，我们要使他〈们〉组织起来，成为政治斗争的领导力量。自然，在手工工厂与店员的争斗中，要注意资本家的经济能力，提出的要求不可超过他的能力之外，对于团体契约权的争斗，也应就客观的形势而相当的让步。〔1〕

在工会参加管理的国有产业中，将有一种反对经济争斗的倾向发生。这种倾向发生的根源，一方面将是政府中代表资产阶级的分子要使这些国有产业能按照他的利益发展，而限制工人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将有人误认这些国有产业已经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工人阶级自己的产业）。这种倾向不单是要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线低降，并且要影响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发展，我们应该极力的与这个倾向奋斗。只有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线能随国有

产业的发展而随时提高，才能保证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所以在这些国有产业下的工会，应该注意这些产业的发展，随时提出进步工人经济要求而争斗。

在劳动保护法已经颁布以后，监督这个法令之实施将成为工会主要责任之一。工会应该注意资本家对于工人的欺骗，随时代工人向监察机关提出抗议，使工人阶级的生活，真能得这些法令的保障而提高。

(四) 组织问题

现在工会组织有几个重大的缺点：第一，无论在纵的方面（产业组合）横的方面（地方组合）还是很零乱散漫，直到现在全国产业总工会，只有海员、铁路、邮政建立起来，并且没有力量。中华全国总工会完全没有尽他对于下级工会指导的责任，甚至毫无关系。各地总工会，虽然权力比较集中，但是所属各工会的组织，亦是非常散漫。所以目前职工运动在组织上的第一个责任，就是要强固中华全国总工会，强固并建立各产业总工会。合并许多小工会成为有力的产业的大工会。第二，许多工会还带很深的行会主义的色彩，甚至仅将行会组织改了一面工会的招牌，所以我们要极力与这种行会主义的工会组织奋斗，要限制手工工厂厂主、店东、包头等加入工会。第三，为准备参加生产管理，须组织强固的工厂委员会。过去虽然在许多地方的工会，有类似工厂委员会

之组织(每工厂一委员会),但实际上仅仅做了一些工会的日常工作。以后的工厂委员会,除了工会的日常工作,还要注意本工厂的一切的经济情形的调查和统计,然后将来才可以尽他的监督生产的责任。第四,在广东、上海……等处,已经有黄色工会的组织,我们要使这些工会统一起来,只有在这些工会下面的群众中去发展我们的影响和极力提高工人经济的要求。决不可以专与他们的几个首领联欢,希冀一种上层的统一。第五,手工业工人与店员的组织(尤其是在各县市中),许多地方都以一种产业的方法去组织他。这是不可能的。这些工人,我们应按照他的职业和他过去组织的习惯,来做组织的原则。中华全国总工会应该即刻颁布一种关于手工业工人与店员工会的组织大纲,来做各地的标准。第六,铁路工人运动本为本党最早的工作,而且曾有伟大的斗争,因本党年来政策之极端与对此运动之轻视,到现在几乎完全放弃了,这是本党莫大的错误。以后应特别注意铁路工人,把铁总强大起来,在各铁路组织秘密工会,须由铁总派特派员到各路工作,以建立铁路工会的系统性,同时须在各地党部指挥之下,以建立党与工会的亲密关系。第七,第四次大会后,海员转变到本党指导之下,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本党应该继续加紧海员中的工作。惟海员运动,虽渐次在各轮船推行支部的组织,特别以省港轮船组织为最有成绩,但是宁波籍海员仍未完全组织在海员工会之下,内河轮船分会有放弃轮船而只组织

木船划子的倾向，都是应该纠正的。第八，矿工运动在此二年内仅唐山曾有一度之发展，但党对于矿工甚为漠视，如北方及关外矿域最多，而我们只注意了城市的工人运动，未注意矿工，此后对于抚顺、开滦、山西、山东、焦作各矿工，本党应积极去做，以树立矿工运动之基础。第九，重工业，过去对于重工业工人很少注意，如上海轻工业同志达数千人，而重工业如某一造船厂仅只几个同志，可以证明，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重工业工人，在职工运动上应占重要的地位，在全部的数量上亦复不少，如我们不计划的加紧在矿工工人中去工作，则重工业工人已经有广东机器工会之影响，不难为黄色派所取去。

工人领袖官僚化之危险，是目前的严重问题，其原因广大的工人群众缺乏健全的组织 and 充分的训练，工会干部人材太少，我们党的发展赶不上工人运动的发展，以致工会多为少数领袖包办，脱离群众的监督或党的指导，而趋于官僚化。救济这个危险，应该切实执行“工会民主化”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应该且必须要经过工人群众大会、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各种会议中决定工会的工作，要在这些工作中去健全工会组织，训练工人群众，培植工人运动人才，产出工人运动领袖，必须如此，才能挽救这个官僚化的危险。

国民党应该是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而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之政党，因此应无限制的引导工人阶级

加入国民党，充实其内容，才能实现领导之作用。

（五）失·业·问·题

现在全国各处都有广大的失业工人，尤其是被帝国主义封锁的武汉，差不多有十万以上的失业，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如果我们不为失业的恐慌而争斗，可以影响整个的职工运动。第一，在武汉政府之下，应即刻要求社会保险制度之实施，救济失业工人，同时须加速大产业国有及国营的经济政策的实现，才可以挽救失业的恐慌。第二，应该使失业工人完全在工会组织之下去争斗，在可能的地方，应该在工会内设立职业介绍所及互济会等组织，总之无论如何要使失业工人不离开工会的影响，而为资本家或其他反动派所利用。

（六）童·工·与·女·工

童工与女工问题，在党的过去议决案上，都有很详细的规定，但到现在各地还未能正确的执行。各级工会均少注意童工与女工的利益，不引导童工、女工参加工会工作，以致童工、女工不了解工会的意义，不积极的拥护工会，或另外成立组织，形成如另一工会的形势，这是很危险的现象。以后各地工会要积极的拥护童工、女工的利益，每次经济罢工均须提出童工、女工的要求，引

导童工、女工参加工会工作（工会的各级机关均须有童工、女工参加），才能挽救这个危险。

现在劳动童子（团）的组织，超越了他的教育宣传的意义，差不多变成了一种童工工会，以致与工会常常发生冲突。这是由于工会未能注意童工，和在童子团工作的同志不了解童子团组织的性质和意义的原因。以后各工会均须设立童工委员会（或学徒运动委员会）。童子团在组织上应该隶属于工会组织系统之下。尤其要注意童子团的童子化。

（七）宣 传 与 教 育 工 作

宣传工作在职工运动上占很重要的地位，过去很少注意，以后在各工会应极力发展宣传队的组织，各地方总工会至少须有一周刊和会报的发行（尤其要注意群众化），中华全国总工会已有发行日报的需要，务在最近期间实现。各种小册子的编辑，亦极为重要。

过去工会的教育工作，在提高工人阶级文化程度上多未注意，此项工作，极为重要，在各地方总工会均须有教育委员会的组织，并须极力利用各级政府的教育经费来发展工人教育。在教材的方面，要多注意政治的教育，并须编制劳动教科书，供各地工会应用。

(八) 工人纠察队与武装

工人纠察队，不管公开或秘密的地方皆须有普遍的发展。工人有武装在最初仅止自卫(对付工贼流氓等)，维持秩序，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而认为工人纠察队是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所以只要有工会的地方，不管是秘密的或公开的，都应该有这样的组织。其注意点：(一)要是真正工人的组织，不可让流氓混迹其中，失业工人也不可过多。(二)纠察队应采用征兵制，使全体工人有受军事训练之机会。(三)纠察队可有相当之常备队。(四)中华全国总工会应公布工人纠察队统一的编制法及设立一部以管理之。

现在的军队，多半是游民无产阶级的分子，很难使他革命化，所以我们要使军队革命化，和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必须有多数的工人去当兵。因此到军队中去、拿枪去的口号，应该很广大的在工人群众中去宣传，打破一般不愿意当兵的观念！

(九) 工农关系

现在资本家借口工人工资的增加，任意提高物价，使一般农民对工人不满，因此在许多地方都发生工农冲突的事。这是可以影响到整个的革命前途的。要使工农

关系更加亲密起来，自然要把工人生活的痛苦，及物价增高的原因(完全是市场需要与供给的消长)，完全是资本家的罪恶，尽量的宣布出来。但是仅只这样的消极的宣传是不够的，一定要各地工会能够与农民发生亲密的关系，帮助农民的组织，拥护农民的争斗，直到帮助农民取得土地。这样才能〈使〉农民了解只有工人是他真正的朋友，不受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派的挑拨和利用。

(十) 与各国工会建立亲密的关系

中国革命的完成，一定要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所以中国工会应该与各国工会发生经常的亲密的关系，把中国工人的痛苦及斗争的情形尽量的向各国工人群众中宣传，以取得各国工人的深切的同情与拥护。尤其是在太平洋沿岸各国工人，只有中国工会比较进步，所以太平洋劳动大会，无论如何要在最短的期间召集，并须由此建立经常的宣传通信机关。

(十一) 党与工会的关系

党与工会，在过去仍未能有正确的关系，不是使工会成了党的附属的机关，即是工会完全脱离了党的指导。其实工会的斗争应当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同时不能使工会失了他独立的性质。具体的说，就是党对于工会的

指导，第一，应该是党的支部在群众中起作用，使群众完全受党的影响；第二，在工会的机关中，应该有党团的组织，使党的意志去影响工会的一切工作。这样自然可使工会的机关和群众，都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了。同时，党在每个时期的政策（如宣言、主张等）应尽可能的使公开的在工会中讨论，增加群众对于党的认识。

中央工委过去几乎完全停顿，因此党对于全国职工的运动的方针与策略，完全缺乏指导。以后应该极力将工委强健起来，使能充分的工作。以前许多区委工委都很懦弱，甚至无工委的组织（如北方），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应该积极的纠正过来。

现在各处工会，无论是上层领袖或下层的干部人材，都极缺乏，这也是可以阻碍职工运动发展的。要训练人材，第一，要使工人群众多参加工会的工作，使在许多斗争中，增高他们的经验和工作能力。特别要注意工人代表会的建立和训练。第二，在各地总工会都要设立短期的职工运动训练班。党应该选择很好的工人同志，办一高等职工运动学校，养成高级的干部人材。

根据中央档案原铅印本刊印

注 释

〔1〕莫斯科中山大学一九二七年出版的《五大决议》，此后还有：

“还有一种以为店员是小资产阶级，店员与店东的争斗，是小资产阶级内部的争斗，我们不必为店员的利益，而失掉了整个的小资产阶级，这也是一个错误。固然大部份的店员在思想上，有很深刻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但根本上是一种雇佣劳动者，且在全国的数量看来很可惊人，尤其是各县市镇有很伟大的力量，决不能够漠视他。自然在产业区域，手工工厂工人与店员的地位，远不及产业工人的重要。”

组织问题议决案

本党最近一年半以来，已变成了真正群众的党，有五万人以上的党员。革命运动的发展，使本党有更加发达的增大的可能性。革命之深入，在本党面前提出了迫切的任务，即领导无产阶级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并建立这些阶级的民主独裁制政权。

为要完尽这种任务，本党不仅应该变成群众的党，而且应该变成波尔札维克^[1]的党，在思想上如此，在组织的原则和实际上也是如此。

然而，本党迅速的发展，党的干部人才缺乏而幼稚，我们的党部自然没有完备的组织和巩固之可能。在这里隐藏着很大的危险。

第五次大会认定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组织问题之指示是完全正确的，特训令新的中央须将党的一切组织工作，建立在共产国际此种指示之上，并须特别注意底下几点：

(一) 努力扩大党的数量，并吸收产业工人，进步农民，和革命的智识分子到党的队伍中来，同时党应该尽可能迅速实行党的教育，训练新党员，用通俗的书报方

法和实际党的工作方法。全党的积极工作，乃是党正确的发展和增长之最好之方法。

(二) 中央应该尽力使党的基础建立在产业支部上面，并使所有大工厂铁路码头等都有我们的以支部为基础的组织，积极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做政治工作，这才是真正领导工人群众。

(三) 中央应该强毅地实行集体的指导，从中央省委以至支部。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不应将党的纪律在日常生活中机械的应用。要解决上述二种任务，其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吸引工人到所有党部的指导机关来。

(四) 在党面前，将来又有一个问题，即集中各方面的指导，在工会，在农会，在国民党及其他团体。为着这个，必须明显组织党团，严秘服从党的指导。

(五) 党应该严重注意在党外劳动群众的工作，在他们中发生影响，并指导他们。这些任务，经过济难会运动，妇女协会运动，学生会运动及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团体运动，是能够做到的。吸收劳动群众到国民党来，乃是本党解决这些任务之一种方法。

根据本党自第四次大会以来党员数量激增这一事实并根据本党目前的任务，第五次大会认定必须改正并补充旧时党章。

根据莫斯科中山大学一九二七年
出版的《五大决议》刊印

注 释

[1] 今译布尔什维克。

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 工作决议案

一、C.Y.是党指导下的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组织，其任务在扩大共产党主义的宣传与共产党的意识和政策的影响到扩[广]大的革命青年群众中去，吸收他们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积极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各种斗争。中国青年大多数都深切的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没有别人能比他们更激烈的与这压迫奋斗。因此，C.Y.应当特别注意反帝国主义反其他工具军阀的斗争〔1〕，扩大反对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反对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及拥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并领导青年无产阶级参加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及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政权的争斗。

二、C.Y.夺取广大青年群众的唯一条件要注意他们日常的需要与争斗，用部分的要求具体的口号才能将革命的青年群众团结在C.Y.的周围。C.Y.必须领导青年工人全体加入工会，在工会内组织青工或学徒委员会，注意青工童工和学徒经济斗争工作，改善他们的生活。在工会中做青年工作的C.Y.团员须组织团组〔2〕，

受工会内的党团及团的执行机关的指挥。在工会工作的同志须向一般工人宣传青工利益与成立〔工〕及整个工人阶级利益之相关，而打破旧的行会的保守习惯或拒绝青工童工学徒的利益和要求。C.Y.须要组织青年〈在〉农民协会之下，参加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政权的争斗，并发展农村中教育文化工作，在农民协会中设立青年工作部及团组。童子团在数量上已有发展，必须要继续争得童子团的领导，使广大的劳动儿童在共产主义的影响之下组织起来，教育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后备军。国民革命军大都是失业的青年农民，这种军队实为革命重要力量，C.Y.应在C.Y.〔C.P.〕指导之下注意在兵士中努力发展工作，改造这种军队，社会成分扩大并深入下层兵士群众的宣传〔3〕，使成为真正民众军队革命军队。C.Y.的工作要努力向青年化的方向走去才能获得广大革命群众。

三、C.Y.在革命学生中与青年工农中的影响，自C.Y.第三次大会以后有相当的进步，但是在组织上的发展颇为迟缓，落在党的后面，这是C.Y.工作最大的缺点。今后须要注意在广大的青年工人青年农人青年军人店员学徒与革命学生中积极发展组织，团结广大的青年于其周围，努力做到团的群众化。过去C.Y.的教育工作等常缺乏，团员对主义与政策之认识均甚幼稚，没有在工作中注意培养新的干部人才，党必须处处帮助C.Y.改进并加紧内部教育训练工作，提高团的

政治兴趣，不断的培养新的工作人员，吸收好的工人同志在各级机关中工作，以巩固C.Y.各级机关的组织，特别是中央指导机关。

四、过去C.Y.与C.P.的关系不甚密切与完好，重要原因是因党没有注意〈与〉团的工作斗争以帮助，甚有些妨害团的工作（如调动C.Y.工作人员过频），这是很大的缺点。今后党因〔应〕处处积极指导团的工作，精神物质以与团帮助。团在政治上受党的指导，但团有讨论政治问题提高团员对于政治的认识与兴趣的责任。为工作的便利及团能迅速执行党的决议并〈培养〉青工人才起见，中央及各级党部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均应经常的有C.Y.代表参加。C.Y.应随时供给党以新的工作人才，但党调用C.Y.工作人员时须要顾及C.Y.工作，使不致受妨碍。为使党团分化及工作发展的对象识别起见，团员最高的年龄应减低到二十一岁。党须要帮助团在青年群众中发展，应继续注意C.Y.本身青年化的工作，即是说将共产主义的政治工作使做到青年群众中去。C.Y.应以习青年本身利益的争斗和文化体育等运动着手，引导青年群众参加党领导的一切政治争斗，这就是青年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革命教育。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注 释

[1][3] 原文如此，疑有误。

[2] 团组，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一般社会团体中实现团的主张，统一团的行动，加重团的力量组织，受同一组织中的党团和当地团的执行委员会领导。

中国共产党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二七年五月)

全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们!

过去二年之间，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伟大迅速的发展。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用压迫，剥削，抢掠，攻袭的手段以获得并巩固其势力，如今这些势力已经发生摇动了。当此革命胜利的斗争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确是主要的动力。因为劳动群众的拥护，国民革命运动曾在广东得到过巩固的基础；因有工农群众的帮助，国民革命军曾使革命的领域扩张至长江流域。当帝国主义者实行以武力侵占上海镇压革命军时，首先立身于帝国主义炮火之前者，就是英勇的无产阶级。促成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削弱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之势力的，也是革命的民众势力。在过去，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已经为革命而战斗而牺牲了，革命的前途也要依他们的战斗意志而前进，以他们的决心而胜利!

在这严重的革命进展的阶段中，国民革命战线内的阶级分化确系一个重要的现象。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如

果没有反对大资本家及封建势力的剥削之斗争与之相伴而进，是决不能发展的。阶级的斗争和国民革命的斗争，势必同时进展。现在国民革命阵线之中，因为大资产阶级的背叛而日益冲突，最终结果，乃至分裂。

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并非新的发现。自帝国主义建立其统治以来，早已有这种斗争的发生。过去革命运动（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庚子之役），都是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情绪之原始的表现，然而一般反动派称他们是排外运动。

帝国主义之统治在中国的形成，由于两个方式：第一，帝国主义兽性的武力侵略；第二，国内满清皇族及封建官吏的贪婪腐败。第一种是在帝国主义侵入时期的主要方法；第二种能促成帝国主义统治的巩固。过去的革命运动，都为列强的新式武器和中国的封建军阀的政权所镇压下去了。此后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渐见民权主义的色彩，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遂推翻满清统治的皇朝。所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推翻封建势力以及其他反民权分子的斗争，总是同时并举的；这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现象，乃是近百年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共同的主要原素。中国革命运动愈进展，民权和封建势力之剧战，也愈显著。

中国辛亥的革命虽说将贪淫的满洲皇帝推翻了，但未曾将民权主义实现于全国。其原因就是革命的社会基础太狭隘。当时参加革命的只有资产阶级和自由派的智

识分子，他们的力量决不敌帝国主义所卵翼的反动势力。所以第一次的共和终归天亡，革命运动亦遂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所保护的帝制运动(袁世凯)，只因帝国主义者内部的嫉忌，方被扫除。

欧战以后，国民革命运动，获得了广大的民权派的社会基础。在反对巴黎和约口号之下，恢复民权运动的生命。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的主力，就是城市的民权派，当时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式的智识界，特别是学生。但在这个时期，群众运动的社会基础并不深远。无产阶级尚未引进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抵制仇货的运动确实打击了帝国主义，但是，并没有提出扫除封建势力及一切反动分子之要求，以表露此次革命运动之民权主义的特质。——而封建势力和其他反动分子，却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实基础。

而且排货运动有他的限度。要想使排货运动达到严重打击帝国主义的程度，就不能不妨害本国贩卖洋货的商人。这种内部冲突，确实是五四运动的弱点。不过我们决不要忘记：五四运动是后来有广大社会基础的真正革命运动之发端。五四运动的确对于那些无确定阶级的知识分子给了一个有价值的革命课程，使他们的视线转移到劳苦的群众，使他们认识无产阶级是当时革命势力的后备军。

近五六年来从事工农运动的先锋，大都是由五四运动后逐渐训练出来的。这个事实，指明在反抗帝国主义

和反动势力之过程中，社会的关系将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结合在一起。现在的革命，需要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同合作，所以五四运动的先例，很值得我们回忆。城市的民权派（小企业家，小商人，技师，知识分子，雇员），在政治经济上都居于被压迫的地位。他们要求政权和经济的发展。他们因为不满意于现状，所以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但是，不求得他们的切身的阶级利益，他们是不能将反帝国主义运动发展至如何深远的程度的。然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不免有暂时阻滞商业的影响，这不仅麻烦了大资产阶级（如银行家，买办，批发外国货者），同时也妨害了些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城市的民权派作领导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因为内部的冲突，不能有深远的发展。就是政权的斗争也不能举行，因为经济的冲突不加紧，政权的斗争不能紧张。五四运动就是一个明证。此时小资产阶级中的最进步分子（阶级性不确定者），恐怕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因内部的冲突而停滞。于是中国革命不得不另找斗争的出路——这个出路就在工人阶级奋斗之中找到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只有和无产阶级联合向帝国主义及其同盟军（封建势力和军阀）同时攻击，才能达到他们经济的利益，获得民治的政权。

小资产阶级经济之所以不能开展，并非帝国主义统治之直接的结果。反之，现时中国小资产阶级经济的存在，乃是自由的繁荣的外国商业所赐与。真正能妨害小

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者，乃是国民经济的封建性，和循环的军阀战争。这两种形式和帝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这却是帝国主义统治的结果了。封建式的经济阻滞了内地商场的开展。中国封建形式的统治机关，采用多种方式(苛税和厘金等)，以阻碍自由的贸易。军阀以重税压迫商人，实际上就能破坏商业。封建军阀的专制，将中等阶级的权利完全剥夺。所有这些现象统统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至于工农更不用说了。城市民权派的反帝国主义情绪，是不自觉的，虽说他们反抗压迫，不但[但不]认识敌人的所在。如果直接反抗帝国主义呢，登时他们又觉着妨害着自己的利益；于是他们在失望之中，就将此斗争放弃了。欲保持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必须根本铲除直接压迫他们的势力(就是妨害商场，破坏贸易，并侵害知识分子，雇员之经济利益的军阀，士绅)。但是，小资产阶级的自身不能找到革命的路径以图自救。只有和无产阶级联盟，在无产阶级影响之下，小资产阶级才得到解放。五四运动最重要的建树，就是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不是自觉的)，趋向于无产阶级去了。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之“五卅”运动，证实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形成了伟大的群众运动。在此运动之前，曾有一个组织工人群众的时期。此时所提出的要求，如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国民会议，亦并非纸上谈兵，此种要求之后，的确代表广大群众的意志，而得其拥护。群众的意旨发生群众的

行动。上海无产阶级及城市民权派的革命行动，虽然陷于血泊之中，但是他的影响普遍全国，变更了帝国主义的态度。

上海工人的经济罢工，加上了革命的政治色彩之后，那些和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的大资产阶级，立刻起来消灭这个运动。结果，他们破坏了革命的战线，帮助了帝国主义。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并非帝国主义者为报答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勋劳而开的，乃是无产阶级和民权势力用革命的行动在帝国主义者手中所强夺来的。

中国革命民众的觉醒，还有其他的证明，就是以前的海员罢工和“五卅”时之粤港罢工。“五卅”时之粤港罢工是纯粹的政治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永放光明。那时无产阶级的行动，巩固了广东革命政府的社会基础，并将国民政府形成了反帝国主义及民权自由运动的中心机关。

民权的势力及广东国民政府，因有无产阶级的帮助，将英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反革命势力，打的体无完肤。买办阶级企谋推翻国民政府，无产阶级毅然拥护着他。所以，捍卫广东，反抗香港英帝国主义的攻击，并以一年余的经济封锁，削弱帝国主义的商业者，更是中国的无产阶级。

以上和其他可记忆的事件，都表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社会基础，已经扩大起来。伟大的革命运动亦已卷进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过这一运动的原动力，仍旧

是无产阶级和民权派的势力。无产阶级和民权派的势力在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亲密的同盟。然而，在这国民革命运动的组织中，阶级的冲突决不能全部泯灭。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设非和阶级斗争同时发展，决不能按革命的路程前进。国民革命的职任不仅是反抗帝国主义，并且同时便要肃清阻碍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封建宗法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冲破了资产阶级式的民权主义之限制。

国民革命运动性质的更变，不仅吓怕了帝国主义，同时惊醒了大资产阶级。在民权革命运动进展的过程中，大资产阶级发觉了与他们利益有妨害的事实。他们希望无产阶级和民权派只为他们的革命而牺牲，同时不要妨害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革命运动客观的性质，决不能因大资产阶级主观的欲望而削弱。

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的独占相冲突，所以，过去资产阶级不但参加革命，并且在初期曾经领导革命。虽然，中国民众与帝国主义间的冲突，非常之深刻。中国各阶级同时反对帝国主义，而各阶级的目标却各不相同：资产阶级想和帝国主义谋妥协，而无产阶级则需要澈底推翻帝国主义的势力。中国资产阶级之中，除买办阶级外，和帝国主义固无好感，但是他们自己却希望能够自由行使其剥削。完全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必须破坏封建式的资本主义之一切剥削，——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根基。换言之，就是完全推翻帝国主义的

革命斗争，必须加紧阶级斗争；此种前途便吓怕了资产阶级。

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不能阻滞无产阶级和民权势力所推动的国民革命运动，终竟破坏了革命的联合战线。三月二十事变后，资产阶级恢复了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并且努力缩小革命运动的路程，使合于资产阶级的利益，结果因中国的客观环境关系，势必走到和帝国主义妥协的道路，蒋介石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纲，是想用军事的胜利统一中国，然后与帝国主义谋妥协，使中国大多数民众仍被剥削。

当资产阶级反抗军阀的时候，客观上带些反帝国主义性，所以无产阶级和他们在初期建立联合战线，集合工农的力量赞助北伐，以反抗北洋军阀。设非工农的帮助北伐军，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的势力，决不是那样容易。资产阶级却要想从军事的胜利中，只保护他们一阶级的私利；然而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以客观条件的规定，不能只按照某一部分人的私利而进展。中国全体民众的利益，是要求扫除封建势力，建立民权政府，推翻帝国主义。国民革命军胜利后，适于民众运动发展的环境已经造成，反对封建势力，攻击帝国主义及建立民权政府的斗争，因而加紧。结果，北伐的胜利，一方面固然强健了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亦削弱了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组织力量，打破了蒋介石以军事独裁控制国民革命，并单独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的企

图。但是资产阶级确实强大起来了，他竟领导着一部力量脱离革命的战线了。这样一来，资产阶级虽说勉强戴着国民革命的面具，他们确实变成军阀的友军和帝国主义的工具了。

蒋介石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在未正式脱离国民革命战线之前，已经有反革命的行动了。蒋介石在江西屠杀工人领袖，就是他仇视工农运动的表现。上海无产阶级发起武装暴动帮助国民革命军，蒋介石却故意下令阻止军队不使前进。蒋介石峻拒了上海无产阶级伟大的，友谊的援助，并且坐视孙传芳屠杀工人，不为之稍动。蒋介石既到上海之后，接受帝国主义的怂恿，用暴力压迫为欢迎国民革命军而兴起的工人阶级。

蒋介石打击工人运动，极力仇视共产党，终究揭破了他的国民革命的假面具。在这个革命阶段之中，工农群众更是国民革命的发动了。唯有他们斗争，才能保证反帝国主义的胜利。所以反对劳苦群众的革命行动，破坏工农的组织者，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国民革命的敌人。蒋介石及其部下的行动，自三月以后都是反对国民革命的，他们的行动决非个人的行动，乃是代表了一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国民革命军在长江流域的胜利，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恐怖了帝国主义。中国的内河充集了外国炮舰，在上海（帝国主义的根据地）实行武装警戒，以防御国民革命军的侵袭。但是帝国主义究竟不敢以直接行动反抗革

命军。他们企图插入革命的战线，以腐化革命分子。帝国主义认清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反革命上是他们客观上的同盟军。所以他们一面表示对于革命的一般的敌意，一面却表示：如果资产阶级反对革命，他们可以保障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看到了帝国主义这种政策，于是下决心反叛革命。

资产阶级的反叛，兴奋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拟利用革命战线的破裂，决定实行武装干涉。帝国主义因对武汉革命政府采用了侵略的政策，精神上帮助了资产阶级和他们戴着国民革命假面具的南京政府。

阶级的分化和帝国主义的干涉，是现时革命阶段里的显著的特性。如果不明了阶级分化的意义和教训，那就决不容易战胜帝国主义的干涉政策。阶级的斗争更加紧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更不能和阶级斗争分开了。在过去，资产阶级能间接反抗帝国主义时，无产阶级也努力和他们保持联合战线。现在资产阶级公然放弃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回头向工人阶级宣战了。资产阶级的背后，就是封建的反动势力，军阀和帝国主义。他们这些成分已经联合了一个反革命的大同盟，来镇压国民革命。所以革命势力的职任，是反抗以至歼灭这个反革命的联盟。

中国的工人们和农民们！强健起你们的组织来，和城市市民权势力建立革命的同盟，拥护革命政府，使他永远立于不败的地位。

革命运动定要向前进行，应在各地摧毁反动势力的根株，以冲破反革命的同盟，消除军阀，推翻帝国主义。革命的基础，一定要使它深入。无产阶级，农民群众和城市民权势力，既然为革命而战斗而牺牲，革命的发展必须能保障他们的利益，扑灭他们的敌人。

帝国主义除非有中国工具的帮助，是不能向革命势力宣战的，过去的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在现在的阶段中，我们必须破坏这些工具，才能削弱帝国主义的基础。反叛的资产阶级拟集合所有在国民政府领域内的反动势力于他们的周围，至于在广东，上海，南京，广西，四川已经建立了一个反革命的坏形，逐渐向前进展，以达到禁闭国民政府的目的。反革命的势力自然借助于封建宗法的成分。革命的国民政府，欲战胜反革命的阴谋，必须要在自己领域内消灭反革命的根基。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必须拥护政府完成这个职任。在现在的革命阶段中，国民革命必须和农民革命吻合一致。

大地主的田地必须没收。民团，团防必须解除武装，绅士的政权必须消除，乡村自治政府，必须以乡村民权势力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组织农民自卫军以保障革命。“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可以建起雄伟的革命军队，并能使革命永立于不败之地。

国民政府治下的农民革命必能引起其他省份农民群众的同情与援助。这样可以扑灭军阀的势力。国民革命必为各地的农民所欢迎，如同欢迎他们的解放者；军阀

的势力，必定消灭于外部革命军的攻击和内部农民的暴动，两个烈火之间。

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封建势力的束缚贸易，以及近年来的战争，妨害了小资产阶级。所以小资产阶级必须和工农群众建立同盟，以反抗帝国主义军阀和封建势力。中国共产党定要领导无产阶级保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农民必与小地主建立同盟以消灭封建的专制和绅士的政权，小商人必须脱离苛税的压迫。

无产阶级是民权同盟的先锋。只有在保护他们自己阶级利益之下，才能完成他们的使命。生活程度的提高可以增加他们的战斗力。在领导农民进攻封建势力，保障小资产阶级利益之下，无产阶级不能削弱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改良待遇等。更进一层，我们看到帝国主义所以能操纵中国的经济生命，因为他们占有了中国的重工业银行以及铁路，无产阶级一定要求将这些生产金融机关收归国有。无产阶级保障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小资产阶级赞助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唯有在这个互助的关系之上，农工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才能建立起来。

国民党自从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脱离之后，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民权同盟。联合民权派的一切成分于国民党旗帜之下，以强健这个革命的同盟，是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阶段中主要的职任。革命的民权同盟，是国民革命的指导者。为着强健这个同盟，

无产阶级要在革命斗争中行使领导权。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政府的工作，并非是以竞争者的态度要夺得政权。所以这样，是为的巩固革命分子的结合，保障革命的发展。

欲战胜帝国主义干涉及反革命同盟阴谋之急切的危险，必须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依工农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的本性，国民革命的政体应当是民权的，可是对其他阶级必须是独裁的。凡是不和革命站在一起，并且反对我们的，都应当以无情的手段对付他，这是国民革命中唯一的原则。

现在是中国国民革命发展到了最高的决战时期，客观的环境，无论国内国际，都对于革命是有利的。实在是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环境，中国国民革命才发展到了这个阶段。

大资产阶级的脱离，使国民革命运动解脱了内部冲突和不协调的原因，使整个的运动向一个简单的目标进行。因有阶级的分化，使这运动有深入他的社会基础的必要。因此广大的群众可以吸引到在这个斗争之中，促成革命运动的伟大的发展。

国际情况也是同样的顺利。帝国主义者尝试造成共同的反中国革命的联合战线，但是世界资本主义普遍衰落时期，各国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正在日益加增。对于积极的武力干涉中国，他们不能一致。就是在一国内部的同一资产阶级对这个问题意见也不一致。有些主张采

用侵略的策略以保护已得的权利，有些主张依和平的条件以进行贸易。这个情形减轻了各国即时共同干涉中国的危险。如果反叛的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那就可以给帝国主义干涉中国一个新工具。

另外还有一种势力使武力干涉不易实现者，就是帝国主义国内无产阶级的反抗。用几只兵舰，数百水兵威吓中国的时期，已竟〔经〕过去了。现在如果实行武力干涉中国，结果就是长期的战争，帝国主义国内的无产阶级一定很决绝的反对殖民地的战争。这个方法恐不能应用了。再者，如果对中国宣战，参加战争的各帝国主义国内，一定要发生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另一方面，全世界表同情或帮助中国的革命的实在有伟大的群众。所有世界上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都和为自由而战的中国民众站在一起。

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们！

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需要更多的牺牲，更勇敢的决心的时期了。不只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世界革命的发展也全靠你们了。你们决无表示灰心的理由，革命的胜利已经在最近的将来了！

你们一定要战斗，你们一定要胜利，你们一定要歼灭军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国。

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叛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联盟！

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权同盟万岁！

中国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

一九二七年五月于汉口

根据中央档案原铅印本刊印

中国共产党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五一”节纪念 告世界无产阶级书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

工友们！同志们！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近两年来，已有蒸蒸日上的发展，其发展之猛烈使世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发生摇动；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稳定之最大障碍了。因此镇压中国革命遂成为各帝国主义国的共同企图，其镇压之方法亦从间接援助中国军阀而变为直接用武力干涉以摧残中国革命。现在英美法日意集中军舰数百只军队数万于沪汉，先既有炮击南京之事，继又对国民政府提出类似哀的美顿书之通牒，现在更有待时而发立即摧毁革命根据地之势。

中国国民革命之所以能如此发展而使帝国主义如此恐怖，就是因为他是由中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以三百万有组织的群众领导现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不妥协地向帝国主义及反动势力奋斗。因此中国的

资产阶级，受了外国帝国主义之唆使，背叛了中国的革命而与帝国主义携手共同向中国的革命及其领导者——工人阶级进攻。资产阶级用法西斯的手段在上海广东及各地屠杀工人领袖与破坏工会的组织。

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实行以武力镇压中国革命及中国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与一切反革命势力举行白色恐怖，在这种情形之下，使中国革命走入一个新的时期，使中国无产阶级采取新的战略，更使世界工人阶级了解须团结一致向帝国主义进攻，防止其破坏中国的革命。

各国工友们！要知道帝国主义此次积极用武力镇压中国革命，是因为他们知道中国革命的成功要给他们以致命伤；所以我们各国无产阶级要起来以全力援助中国的无产阶级，援助中国的革命，使世界资本主义不能稳定，如此各国工人阶级的敌人的基础就发生摇动。

所以中国共产党，正值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趁“五一”节的机会，要求各国的工人阶级更形团结一致以全力援助中国革命向帝国主义奋斗。中国革命成功后猛烈促进世界资本主义的完全崩溃，将使世界革命有更进一步的进展而底于成功。

无产阶级加紧团结起来！

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武力镇压中国革命！

反对白色恐怖！

打倒世界资本主义！

中国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出
版的《向导》第一九四期刊印

中国共产党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 “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

中国的工人和一切被压迫的民众!

一九二七年的“五一”到了! 今年的“五一”不单是中国无产阶级检阅自己的革命队伍的日子。今年的“五一”正是中国革命急剧进展的时机, 也正是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动的大资产阶级四面围攻中国革命的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历来当国民革命的急先锋, 他的目的, 是要反抗中外大资本家的剥削及一切帝国主义的统治, 是要推翻军阀地主买办的政权, 而创造革命平民的政权。他已经引导一般被压迫民众的奋斗, 而使革命的胜利扩大到了半个中国, 他的勇猛牺牲的精神是中国历史上所从没有见过前例的, 他在事实上证明自己是唯一能解放中国民族及一般民众的阶级; 非他做中国革命的领袖阶级中国革命是决不能澈底胜利的。

现时革命的进展, 正向着澈底胜利的道路上走去。今年中国工人阶级的“五一”运动——每日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 决不仅是宣传示威而已, 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要

力争自己阶级利益的保障，要用自己的力量保障革命的胜利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他要求在最短期间确定劳动法，亲自参与监督劳动法的实施，如工作时间、工厂卫生、最低工资、女工童工的保护等——设立劳工检查院。因为只有革命能如此的逐步深入，才能摧毁帝国主义军阀大资产阶级土豪劣绅等的反革命势力，而后国民革命的胜利方能巩固。

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不能不依赖帝国主义，他要剥削工人和农民，要剥削小商人及一般民众，但是工人阶级要领导着革命来解放一般民众，拥护一般民众的自由和权利，于是资产阶级看见革命的真正发展，危害他的私利，所以他宁可接受帝国主义的命令而开始屠杀工人，摧残共产党和革命的国民党，压迫一般民众——跑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蒋介石派就是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公然屠杀民众，反对国民政府，中途破坏革命，在上海、南京、广东、江西、安徽、四川等处不断的实行反革命的屠杀政策——都是大资产阶级只顾自己阶级的私利而背叛国民革命的表演。他现在和帝国主义共同进攻无产阶级，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是革命中的主力军，如果无产阶级势力不被摧残，他是无从破坏革命的。如果革命破坏而中途停止，那末，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都要受着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动资产阶级的更加严厉残暴的压迫。所以中国工人阶级现在要联合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反抗军阀和大资产阶

级。工人阶级要联合农民实行推翻土豪劣绅的政权并没收大地主土地；要联合革命军人及兵士，实行革命战争，改善革命的兵士生活；要联合一般民众参加并巩固革命政权，废除苛捐杂税，实现民主政权的独裁，镇压一切反革命。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一方面摧残军阀及反动派的根基，别方面巩固并发展革命。今年的“五一”纪念正要表示工农商学兵等一切被压迫民众的革命团结，去镇压反动，歼灭军阀。

帝国主义呢，也因为中国革命急剧的进展，除利用军阀及反动的资产阶级之外，还在实行对于革命根据地的封锁，并且开始以武力直接干涉中国革命（如南京、惠阳及汉口四三的事件）。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都应当在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去和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结合更密切的联盟，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现在成为世界革命主要的势力之一。今年世界无产阶级的“五一”纪念，可以称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示威运动了！中国工人阶级及被压迫民众，应当做世界的“五一”运动中的主要队伍。中国工人及被压迫民众和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在今年的“五一”纪念中，真正表示他的现实的意义。这一件大的革命的世界联合，终究要打破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稳定，而得到最终的胜利！

我们今年“五一”的标语是：

工农商学兵一致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

武力与民众一致动员打倒奉鲁军阀！
撤退外国军舰！
收回一切租界！
革命民众组织义勇队武装保卫革命根据地！
镇压反革命派！
颁布劳动法！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保护女工童工！
肃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建立乡村民主政权！
用革命的恐怖制止反革命的恐怖！
拥护国民政府！
救济失业工人！
反对帝国主义武力干涉！
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
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拥护中华全国总工会政纲！
反对法西斯蒂的恐怖！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万岁！
争得非资本主义的革命前途！
耕者有其田！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出
版的《向导》第一九四期刊印

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议决)

本党第五次大会所规定的普通原则足以范围国共两党的关系。我们在此革命阶段中和国民党合作的目的是健强并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向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依然加入国民党内，因为在此时期的社会成分上说，国民党代表一个革命的同盟，此政治同盟将领导德谟克拉西的革命破坏封建制度，消除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共产党根本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其政纲政策的基本原则，系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领导其阶级的斗争向最终的目标——社会主义实现方面前进。工人阶级利益的实现需要革命的发展。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同盟就是发展革命的一个条件。所以强健并造成此同盟是无产阶级的职任。

因为无产阶级在客观上是最革命的一个阶级，他就是巩固那个政治同盟并推动这个同盟遵守一个坚决的不变的革命政策向前进行。然而在此革命的阶段中，无产阶

级并非占有革命全部的指导。他只是保证左派国民党，按照环境的要求进行革命。

国共两党的关系，在此阶段中，建筑在无产阶级的斗争中的领导权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同他合作，强健左派，帮助他领导革命，可是同时不要失掉自己代表无产阶级，并为无产阶级利益而行动的政治独立的性资〔质〕。无产阶级决不在牺牲阶级独立性条件之下，加入左派的国民党。无产阶级只有借用他的政党——共产党，才能执行巩固国民党和推动国民党逐渐前进。

无产阶级因为要保证革命的前途，必定加入左派的国民党，共产党的策略一定要兼顾到同盟中非无产阶级成分的利益。第五次大会关于如何保证城市小资产阶级乡村企业者和无产阶级的协调，已经有了明白的规定。现时革命的发展，使本党对于保护小资产阶级利益上，亦有规定明确政策的必要。

遵照第五次大会决议，中央政治局提出下列的实施办法裨〔俾〕国共两党的关系（特别关于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之可能的困难，消灭下去。

（一）劳工部下设立仲裁厅解决雇主和店员间的冲突。

（二）劳工部颁布劳动法，包括工作时间，最低工资，恤金，保险，劳动条例，店员工作条例，更须注意。

（三）调和店员过分的要求，规定营业管理权，保证

店员不干预营业。由总工会代表，劳工部，商民协会，店员总会组织委员会考查店员提出的条件，并按照物价比例规定合理的限制。

(四) 现时对帝国主义的商业不禁止，不阻扰。

(五) 除发现有反革命的活动，或有反革命的嫌疑者，商民得享有政治和公民的权利。

然而影响国共两党关系的小资产阶级之不满意，并不能因此条件之实施，而和缓起来。城市小资产阶级经济的苦痛，系帝国主义与大资产阶级在国民政府领域内实行经济封锁的结果，至于连年军阀的战争，苛税（厘金等）的征收，也是造成小资产阶级痛苦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必须帮助小资产阶级去反抗此种压迫，除非打破经济的封锁，小资产阶级的情况并不能改善。欲打破经济封锁，只有革命的胜利才作得到。所以在反抗帝国主义，军阀以及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中，无产阶级同时就保障着小商人及手工业生产者的利益。

附：

工商联席会议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五月十六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全体执行委员，与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全体执行委员，在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举行联席会议，五月二十二日继续开会，所有关于工商间一切问题，决议如下。

此项决议案，已得武昌市商民协会及汉阳县商民协会之同意，并允共同努力促其实现。

第一 改良店员待遇问题

决议：

一、营业室内，夏季须设置电扇或风扇；冬季须设置火炉或火盆。

二、夏季各店店员，由店东按名备送汗衫一件，毛巾一条，惟价金不得过两元。

三、每月朔望，店家须备办较优之肴饌。

四、店中至夏季须备置经常救济药品。

第二 店员工作时间问题

决议：

店家暑季在上午七时一律开店，店员每日工作时间，原在十一小时以内者，照旧。如在十一小时以上者，一律改为十一小时。若营业有延长之必要时，可规定店员轮班工作。在工作时间内，店员不得自由离店。如有要事离店，须经店东或管事之许可，在工作时间外，店东不得限制。

第三 工商界线问题

决议：

一、凡手工业之店东，自己作工，而又雇有工人者，应一律加入商民协会。但不能因自己作工，故意裁减原有之工人，影响工人之生计。

二、在手工业中之自做自卖（如缝艺鞋艺等）而未雇用工人者，以其依赖作工维持生活，而非完全恃资本营业可比，仍属劳动性质，则加入工会。

三、凡独立贩卖之小商店，而未雇用店员之店主，则加入商民协会。以其恃资本营业，而非靠卖劳力可比。

四、商店之经理，多半为店主之代理人，应加入商民协会。

五、在非个人经营，而为股份组合之商店，其股东同时又服务于店内者，则加入商民协会。但此类店中之股东，在职务上有经理店员之分别者，其担任店员工作之股东，则加入工会。若其雇用店员甚多之大商店，有股东参杂其中工作者，则该工作之股东，仍加入商民协会。

六、半工半商性质之摊担职业者，界乎工商之间，但其经济地位，又无显明宾东之界限。因组织分裂，易于在营业上发生纠纷，现值革命紧张之时，为巩固革命力量，消灭民众组织内部冲突起见，在工会商民协会双方所属之摊担职业组合，均一律退出会籍，另组织摊担联合会，直辖于汉口特别市党部，此种决定，由汉口特别市党部，湖北全省总工会，及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共同召集各方摊担职业组合，会商执行。

第四 劳动童子团问题

决议：

一、童工在店内工作时间，规定以每日八小时为限。在工作时间之内，童工不得无故离店，须受店东之正当指挥。在工作时间之外，童工之行动，店东不得加以限制。惟童工作工时间应如何轮班支配，童工日常店外行动应如何自治，童子团总部当有极完善之规定，商民协会可提出意见，以供童子团总部之参考，童

子团总部亦当以其规定通知商民协会。童工在每星期中，得休息半日，作为教育训练时间。

二、店东担任童工之童子团服装费，每人至多不得过六元，以一次为度。

三、童工操练或其他集会致误过开膳时间，店东须预留膳食供其膳用，为养成童工坚苦卓绝之德性起见，其预留膳品，或由童工自行料理，店东不必另给零用费。

第五 用人问题

决议：

一、工会及店员，不得强迫店家加用店员。

二、店员有不正当行为或不服店家之正当管理者，店东可先通知店员工会辞退之，如发生纠纷，由商民协会与湖北全省总工会解决之。

三、平时辞减店员，依照解决工商纠纷委员会所订条例办理。

附：解决工商纠纷委员会决议案九条

1. 凡在工会现任职务者，不得辞退，但有私人过失者不在此例。

2. 凡有实据证明亏本不能支持者，得收歇，但须以营业状况证明之。

3. 因营业状况证明须得缩小范围而辞退店员者，依该店员服务时期以定辞歇（按民国十四年营业之资本结算，亏折至半数者得收歇，亏折三分之一者得缩小）。

4. 店员有重大过失者，得辞退之，但必由工会另行介

绍，得店东经理同意补充。

5. 被辞退之店员，照辞歇条例发给辞歇费，有另外条件者，得参照另外条件行之。

6. 学徒除有不端行为者，不得辞退。

7. 被辞歇之店员，若原有与店东给川资之规定者，外省及武汉外之店员，照给原定川资之半数，无川资之规定者，不得援例。

8. 论季营业者，照先年同期营业习惯办理辞歇。

9. 营业缩小范围，必须辞退店员之店家，按缩小之成分比例之。

四、店家加用店员时，由店员总工会之职业介绍所介绍之，但介绍之店员，由店家试用一星期，如不合格，可即辞退，另行介绍；介绍之店员，店家可索相当担保。但店家因营业特别发达，而不肯加人时，由商民协会与湖北全省总工会根据报告审查后酌加。

第六 营业收歇问题

决议：

一、店主收歇问题，由湖北全省总工会与商民协会审查实在情形，依照解决工商纠纷委员会所定条例，及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为停业及辞歇工人问题议决案》解决之。如工商两方不能解决时，呈请政府仲裁机关解决。但在未解决以前，店东不得有运货私逃等事。店员不得有逮捕店家及管理店产等事。

二、店东因或种关系弃店私逃时，其财产由商民协会及湖北全省总工会处理之，惟须尽先发给该店店员及工人之救济金，并呈请政府备案。

**附：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
《为停业及辞歇工人问题议决案》**

1. 凡有重大影响于生产之工业或市面之商业不许无故歇业。

2. 无故停业者，须给工人六个月工资之救济费。

3. 因折本不能支持停业者，手工业商店须给以两个月工资以上之救济金，工厂须给三个月工资以上之救济金。

4. 辞歇业或裁减工人，须照下列比例给工人救济费：

工作一年以内者一月；

工作三年以内者二月；

工作五年以内者三月；

工作十年以内者四月；

工作十年以外者六月。

第七 营业管理问题

决议：

一、店员应促进商务[务]之发展，在工作时间内，不得怠忽工作。

二、店员及支部不得干涉店家之营业管理权。

三、店员在工作上应受店家之正当指挥与管理。

第八 工商谈判问题

决议：

一、由湖北全省总工会与商民协会组织工商俱乐部，解决一切工商间之纠纷问题。工商俱乐部之性质及组织法另订之。

二、店员总工会因与商民协会关系最切，得加入工商俱乐部，共同处理各项问题。

三、支部不得单独向店家提出要求，店家亦不得单独承认店员支部之要求。其有要求条件须经店员总工会盖章。

第九 工人对店东算总帐问题

决议：

工人向店东提算总帐事，已由湖北全省总工会通告制止。其有特别情形或发生纠纷时，由工商俱乐部解决之。但店东不可私自承认其总算帐之要求。

第十 码头工人运货问题

决议：

由湖北全省总工会，商民协会，武汉码头总工会，及武汉市政府，武汉公安局各派代表开会，共同商定解决之。

第十一 救济失业工人问题

决议：

- 一、商民协会须积极宣传救济失业工人。
- 二、商民协会须设法筹措失业工人之救济金。
- 三、用工商联席会议名义呈请政府迅速办理以下之事项：
 - (甲) 京汉路货车迅即通车。
 - (乙) 沪汉汇兑迅即恢复。

- (丙) 即速结束河南战事，讨伐蒋介石，恢复长江交通。
- (丁) 肃清土匪，恢复襄河交通。
- (戊) 飭令各处军队不得驻扎民房，并恢复建筑事业。

第十二 停工参加大会问题

决议：

由工会单独通告全体工人停工参加大会者，每年以两天为限。其他纪念日得商民协会同意可全体参加；或由政府及党部命令行之。而普通纪念大会，每店店员以三分之一之人数轮流参加。

第十三 抑平物价问题

决议：

立即由商民协会筹划市面各种必需品之充分供给；并组织物价委员会，限制各种货价之过分增涨。

第十四 工商联合问题

决议：

一、湖北全省总工会与商民协会，共同发表工商联合宣言及标语，作广大之宣传；并召集工商扩大代表大会，作积极之联合。

二、所有关于起草工商联合之宣言标语及宣传大纲，以及筹备召集大会之一切事项，须组织委员会负责办理，此委员会由全省总工会与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各推三人组织之，并请武昌及汉阳商民协会参加。

三、推选结果，总工会推定向忠发刘少奇董锄平三人，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推定刘云生刘一华毛晋阳三人。

第十五 其他种种问题

决议：

一、工商联席会议每月举行一次。

二、最近尚未解决之工商间一切悬案，均照此次工商联席会议所决定之各项原则由工商俱乐部办理之。

三、由商民协会负责向店东宣传，解释并制止一切谣言，尤其是“要共产”之谣言。

四、工商联席会议已得圆满之结果，归纳其精神作如下之口号：

工商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工商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

工商联合起来肃清一切反革命派！

工商联合起来打倒土豪劣绅！

工商联合起来援助北伐胜利！

工商联合起来巩固革命基础！

工商联合起来废除苛捐杂税！

工商联合起来收回海关！

工商联合起来拥护政府集中现金政策！

工商联合起来拥护政府外交政策！

工商联合起来巩固武汉金融！

工商联合起来抑平物价！

工商联合起来救济失业工人！

工商联合起来制止一切谣言！

工商联合起来肃清土匪！

工商联合起来解决土地问题！

工商联合起来拥护国民政府！
工商联合起来拥护中国国民党！
工商联合起来完成国民革命！
工商联合起来完成世界革命！

湖北全省总工会执行委员会
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

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国共产党最近主张》刊印

中国共产党 对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

夏斗寅的叛变，是表现目下反动分子假充革命党的事实依然存在。这些反动分子虽说站在革命战线里，他们却时时想利用机会反对革命破坏革命。但是革命的运动已经强大起来，消灭革命已非易事。革命的势力是建筑在大多数工农群众之上，工农已有为革命而战斗的意志，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革命的运动未曾因蒋介石的叛变而削弱，革命的势力现已立于不败的地位。故对于夏斗寅及其同类定能以必要的手段应付之。

象夏斗寅一类的反动派，以反共产为借口，实行反革命反国民政府的阴谋。他们想联合在城乡的各种中等阶级（如中小商人，小地主，手工业的小生产者，知识分子等）于反革命旗帜之下，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他们又制造共产党将破坏中等阶级的谣言，以引起社会的恐慌。

处此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关于与中等阶级的关系上，有详细说明的必要。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如果是破

坏中等阶级的，他便不用亦不能和中国国民党合作，而且使自己的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所以实际上，共产党对中等阶级的态度，以这个事实作证明，已经没有怀疑的余地。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正式决定，工农小资产阶级之革命民权的同盟，是中国国民革命将来的发展和最后的成功的唯一保证。这三种阶级长期的攻守同盟，除非在互相保障条件之下决不能形成。无产阶级决不能一面和中等阶级互相同盟，又一面破坏这个同盟军。反动派藏在“共产党运动过火”的假招牌之下，滥造谣言；我们不用很多的申辩，就可以知道，他们实际是想破坏国民革命，分裂反帝国主义的民权的联合战线。

在宣言，决议，告民众书上，中国共产党对于中等阶级的态度，已经剖切说明。现在我们总起来叙述如下：

中国共产党反对在乡村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和士兵的土地，更主张没有土地的军官及兵士分得土地，没有反革命行为的小地主得享完全公民权利并得参加乡村自治机关。

中国共产党主张在城市减轻压迫小商人的苛税苛捐。年来军阀内争，封建式的苛捐如厘金等破坏商民的经济，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所造成的经济封锁，同时也给经济金融以很大的打击。共产党因为反抗军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于商人的利益同工农的利益一般的拥护，所以主张除反革命者外，城市商人得享有完全参

政权和公民权。

这些事实可以证明夏斗寅等类反动派的宣传，完全是谣言，帝国主义痛恨共产党，张作霖绞杀共产党，孙传芳以反共产为口实，用暴力压迫响应革命军的上海工人，蒋介石屠杀工人，捕拿共产党，李济琛残杀共产党。那些杀戮共产党者之为人及其目的，是尽人皆知的。他们是反革命者，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现在夏斗寅也拿着“反共产救中国”之“鲜明”的政纲，举兵叛乱了。但是他实际所要求的是什么？他的要求和其他反共产的英雄的要求是一样的。他不是想救中国，他是想保障帝国主义，军阀和反动的封建势力，使革命不能达到根本铲除这些东西。

夏斗寅等类的军阀，吮吸劳苦群众的膏血，当然要痛恨共产党，恐惧共产党，要共产党的头颅，作他们“拥护”国民政府的代价（国民政府当然认为这是一个可疑的反叛的拥护），但是民权的中等阶级决不要被他们所迷惑。封建军阀势力在国民政府治下的复兴，不但不能帮助商业的发展，反到要蹂躏中小商人的利益。夏斗寅是想拿口头帮助中等阶级谋利益的圈套，来昏迷中等阶级的观察，使中等阶级能帮助他叛变的军事行动。

农民的幼稚行为，特别在湖南——使军队里边发生不安。夏斗寅欲利用军队中不安的情形，以达到他的反革命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小地主的政纲已明白规定，农民幼稚的行为，决非共产党的行动。

中国共产党在一面消除这些不幸的幼稚情形之外，同时将其客观的原因述说一下。消灭这些客观的原因，可以挽救现状，消灭反动派的借口。

农民群众热烈的欢迎北伐军到来，希望能将他们从多年压迫奴役之下拯救出来。当中国国民党农民政纲颁布的时候，正是久经践踏的劳苦农民开始为新生命斗争的时候。他们见到农民的政纲，满腔燃烧着热望，于是自然表现出来一个革命运动。不过政纲实行的时期确实太延搁久了，农民焦急的等待着。在这个情景之下，急促不谨慎的行为，实行上恐不能免。如果国民党能照着自己的农民政纲，按步就班的实现农民的要求，那么，农民运动中这些不幸的事实，或者不致于发生。

革命答应过要给农民土地及自由，这些事件实现的愈快，社会的情况愈好。中国共产党严格遵照国民革命的进程，领导农民反对封建的剥削及宗法的压迫。乡村之中，农民和封建宗法的统治已经起了斗争，共产党的政策，如上边所说，不但不是反对中等阶级，反而是和他们结合联盟，推翻封建宗法的专制，建立乡村民主的政权。共产党更拟于特殊情况之下，要求政府允许小地主抽到某种规定的佃租。乡村封建宗法统治的破坏，不仅有利于农民，乡村和城市的经商阶级都能得到经济的进展。农民经济情况的改善可以促进商业。封建统治的衰灭，可以扫除商业发展上的束缚。如果小地主对于国民政府所保证的某种租率认为满意，对于革命柱石的农民运动不加

反对，农民对他们一定不加妨害。

所以想防止自由发展的农民运动，不能免之幼稚现象，唯有将中国国民党所规定的农民政纲从速施行出来。这可以巩固革命的基础，使农民群众集合于国民政府的周围；至于夏斗寅等类的叛变只要以迅速的坚决手段消灭之。

中国共产党决定向以反对共产党的过火行为保障中等阶级利益为借口的夏斗寅正式宣战，号召工农群众随于国民政府之后削平夏斗寅的反叛！城乡中等阶级为夏斗寅等反动派所蒙蔽，他们势将违背自己的利益。中等阶级的真实利益，必从国民革命的胜利（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势力）中得到，万勿受夏逆斗寅的玩弄，在反共产口实之下反叛革命。并且应当急速起来和工农携手，共同保障革命，反对反叛的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誓竭诚与国民政府协同共进，并郑重声明维持与中等阶级的联盟，保障中等阶级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确信夏斗寅的造谣，在国民革命军和中等阶级中，决得不到轻微的影响，此次的叛变指日肃清，夏逆不久定要成擒，依反革命罪案尽法惩办。无产阶级将武装起来枕戈以待，保障革命赞助国民政府实施国民党的农民政纲。

打倒反动派罪魁——夏斗寅！

打倒反国民革命的一切封建军阀！

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权的大同盟万岁！

国民革命的领袖国民党万岁！

国民政府万岁！

中国共产党

五月十八日汉口

根据《中国共产党最近主张》刊印

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鄂省委拟，
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一、武装纠察队指挥问题

A. 大队调动——如总工会调动须得卫戍司令部同意，如卫戍司令调动须得总工会同意。(理由)因武装纠查一方面为军队性，一方面是工会的纠查，故调遣时，须得双方同意。

B. 保卫工会之小队调遣——如守卫等事总工会应有调派之权，事事须得卫戍司令允许，双方都感繁困。

C. 无枪纠查完全归总工会指挥。

二、停工问题

A. 政治停工必须得总工会命令，总工会应极慎重，非十分重大政治示威，决不下停工令。

B. 五一节全国及鄂省总工会代表大会开幕日应全体停工一天。

C. 各产业工会成立改选等代表大会开会日, 该产业工会停工一天。

D. 商店停市, 非得政府命令不得行之。

E. 店员分会开成立或改选会停工半天。

三、司法权

A. 工会无政府命令不得拘捕非工人。

B. 工会得拘捕工贼及反革命条例之工人。

C. 对于工贼及违反革命纪律, 工人有审判权, 但不得审判非工人, 如因误会而拘捕非工人, 应立即送往政府相当机关。

D. 对于工贼及违反革命纪律者, 在未审判前及审判后, 判定不到一星期拘留之罪, 有拘留权, 一星期以上之徒刑, 即须交政府适当机关。

根据《中国共产党最近主张》刊印

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议决)

湖南工农运动所引起的纠纷，会形成全部政局上很严重的问题。纠纷之起因，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叛变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湘籍军官在内）的势力及宣传，动摇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农政策，一方面是由于贫农幼稚行动，如均分土地均分财产对于土豪劣绅之逮捕罚款以及关于宗教道德革命等，引起了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尤其是军人之剧烈反对。

这些纠纷已引起极严重的政治问题，我们解决此目前严重的问题之态度是：（一）城市中工运问题，应该迅速执行已决定的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决议案及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而解决。（二）乡村中农运问题，一切非本党政策所规定的幼稚行动，立须依本党的领导力量，切实矫正。已没收之军人产业一概发还（其曾愿捐助者得不在此例）。（三）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固然不能根本放弃第五次大会所决定政纲，但我们须知道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且必须先行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权问题，因此我们即须：（1）扩大土地问

题在各方面之宣传尤其在军队中；（2）着手建立乡村自治政权及县自治政权。

固然湖南农民运动之发展有些地方，其势非事实上进向没收大地主之土地不可，这种趋势，是一部分劳苦贫农要求所必然发生的，而且局部的在各省实行是可能的，可是必须在两个条件之下：（一）能使革命军官中立，（二）能与左派群众及领袖共同行动。固然如此，但是现时农民革命运动之主要点，还是巩固革命已得之胜利，即是建立乡村政权（乡民会议直至县政权），以政府形式继续深入农民反土豪劣绅之斗争。

根据《中国共产党最近主张》刊印

关于湖南事变以后的 当前策略的决议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反动的军阀分子已开始向工农运动实行公开进攻。在长沙和湖南全省对工人纠察队实行缴械、逮捕和枪毙，并且解散工会和农会，这表明了当前军事和政治形势的严重性。保卫革命的胜利成果，准备进行推翻反动分子的斗争——这是我们党的迫切任务。

五月二十〔二十一〕日的长沙事变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的政变十分相似。这两次事件的不同之点是，广州政变虽然是由一个有全国影响的人物指挥的，其规模却没有象长沙事变这样大。从三月二十日以后所犯错误中取得的教训，将帮助我们党找到正确的策略。正如在三月二十日之后一样，今天党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立即推翻敌人或者我们彻底投降，这里有一条中间道路，必须找出这条中间道路。在各种军事力量的当前这种相互关系下，冒立即同敌人发生武装冲突之险，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不可取的。我们的政策是争取时间，保存自己的力量，为不可避免的战斗作准备。

党必须同左派国民党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必须向左派领导人说明局势的危险性。必须使他们相信，这次进攻不仅是针对工人和农民，而且是针对一切革命分子。如果不打垮反动封建军阀分子的政权，连国民党本身的存在也将处于危急之中。

当前的形势将迫使国民党内部发生阶级分化。共产党必须加速这一过程，并且把小资产阶级左派争取过来。保护和加强左派国民党，是革命发展的条件。能够而且必须用“保卫革命的国民政府”的口号去准备反对军阀反动势力的公开武装斗争。在左派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旗帜下，可以把最广大的民主群众动员起来，去进行反对军阀反动势力的政权的斗争。

必须千方百计地保卫党的合法地位。我们的同志将不退出政府。

鉴于这些考虑，政治局决定：

(1) 接受唐生智在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出的电报中所提出的纲领，即：一、支持国民政府；二、联合苏联；三、支持工会和农会；四、把被收缴的武器归还给工人和农民的纠察队；五、反对蒋介石和张作霖；六、继续进行第二次北伐。

(2) 在上述条件下承认湖南的省政府。

(3) 同左派国民党的领导人，特别是同汪精卫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以便结成一个联盟去反对名义上是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党内的军阀反动势力。

(4) 争取左派国民党支持如下的要求,即:有进行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自由;把被收缴的武器归还给工人和农民的纠察队。

(5) 保卫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利用以这种策略手段争取到的时间,来为同国民政府势力范围的军阀反动势力的不可避免的战斗做准备。做到这一点的基本条件,就是彻底改变把革命的未来的宝压在所谓的左派军阀身上的老政策。当前的局势就是这一错误政策造成的,这种政策必须废除。在充分利用各个“左派军阀”领袖之间的矛盾的同时,革命必须创造自己的武装力量。把工人和农民武装起来,并且把士兵争取到革命方面来,——这是党在以上述策略手段所争取到的时间内必须完成的主要任务。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政治局决定:

(1) 建立一个党的秘密机构,并且在进行公开活动的同时加紧进行秘密活动。

(2) 把工人和农民组织所拥有的武器隐藏起来。

(3) 弄到大量的武器,并且把它们分发到各战略地点。

(4) 用派我们自己人参军的办法来扩大叶挺和陈嘉祐(Chen Cha-Yo)领导的部队,在六个月之内把他们的几个师扩大为几个军。

(5) 利用第二军、第六军同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之间的矛盾。用派遣大量工会会员和农会会

员进去的办法，把第二和第六军掌握到我们手中。

（6）为收复广东进行鼓动。一俟占领郑州，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必须转过头去收复南方，此点不容忽视。

政治局还决定派一位政治局委员去湖南重新组织党在该省的活动。

将本决议立即通知鲍罗廷和谭平山同志，让他们按此路线行事。未经政治局批准，他们不得执行在原则上不同于本决议的路线。

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
代表团档案英文稿

中国共产党 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

(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案)

第一章 党 员

第一条 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条 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党员一人之介绍，经过支部干事会之审查，支部会议之通过，市委员会或县委员会之批准，始得为本党正式党员或候补党员。

第三条 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工人，农民，手工工人，店员，兵士等）无候补期；非劳动者（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之候补期三个月；但市委员会或县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

第四条 候补党员参加支部会议时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但其义务与正式党员同，遇必要时得由市或县委员会决定允许其参加市或县党员大会；但无表决权。

第五条 凡经中央委员会或省委员会直接承认之党员，当通告该党员所在地之市或县委员会，非劳动者亦须经过候补期。

第六条 凡党员移转国外，须得中央之同意及第三国际之介绍，始得为所在国共产党党员。

第七条 凡已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经中央审查后得为本党正式党员。

第八条 党员年龄须在十八岁以上，凡年龄在二十岁以内而愿入党者，必须经过青年团；但青年军人不在此例。

第九条 凡党员由一地党部转到另一地党部，须在该地党部登记成为该地党员。凡党员在省内移转须得省委员会同意；省外的移转须得中央的同意；但遇有特别情形（如在秘密工作情形之下）得酌量通融。

第十条 党员自请出党须经过所在地之市或县委员会之决定，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反时由市或县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

第十一条 凡开除党员须经隶属之支部大会及省监察委员会决议及得省委员会之批准方能生效，并将其开除的理由刊布在党的刊物；在省委未批准以前得停止其一切权利及工作。

第二章 党的建设

第十二条 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

第十三条 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一定区域内建立这一区域内党的最高机关，管理这一区域内党的部分组织。

党部之执行机关概以党员大会或其代表大会选举，上级机关批准为原则；但特殊情形之下，上级机关得指定之。

第十四条 地方党部对于地方部分的问题有自行解决的权利。

第十五条 各级党部最高的机关为：全体党员大会及代表大会。

第十六条 全体党员大会及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各级委员会。委员会在大会闭会期间为该级党部最高权力机关，执行并指导党务及政策。

第十七条 党的组织系统为：

全国——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

省——省代表大会——省委员会

市或县——市或县代表大会——市或县委员会

区——区代表大会——区委员会

生产单位——支部党员全体大会——支部干事会

第十八条 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的报告及提议与上

级机关对下级机关有所命令及指导均须按照党的系统手续。

第十九条 为党的各种专门工作各级党部得设立各部管理之（如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等等）。各级党部之下的各部均隶属于各级党部。各级党部之下的各部组织制度均须得中央之命令或同意。

第二十条 区委员会之下的党部须得区委员会之批准与市或县委员会的追认；市或县委员会之下的党部须得市或县委员会之批准；省委员会之下的党部须得省委员会之批准；省委员会之组织须得中央委员会的批准。

各级党部之执行机关（自省委至支分部干事会或书记）之选定及撤换须得上级机关之批准。

第三章 党的中央机关

第二十一条 党的最高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委员会召集一次；中央认为必要时或有三分之一党员及三分之一省的党部之请求得召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中央已经决定或三分之一的党员及三分之一省的党部请求之临时代表大会，中央须在两个月内实现之。全国党的代表大会之召集与大会之议事日程，中央委员会须在大会前一个半月公布；全国代表大会须有代表全体党员之过半数方为合法，代表人数百分率由中央委员会规定之。

第二十二条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工作为：

1. 讨论与批准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他中央各部工作的报告。
2. 审察与修改党纲及党章。
3. 决定一切重要问题政策的方针。
4. 改选中央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及其他等等。

第二十三条 中央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数由大会规定，遇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监察委员离职时由候补委员按次递补。

第二十四条 中央委员会得代表党与其他政党及机关发生关系；得组织党的各种机关并指导其行动；得指导与监督中央机关报并指定党的中央机关报的主任；得分配党的人才及支配党的经费。

第二十五条 中央委员会经过党团指示政府及其他社会团体之工作方针。

第二十六条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须每三个月召集一次；遇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中央委员会议或扩大中央委员会议。候补中央委员得参加中央委员会议及扩大中央委员会议，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但中央委员缺席时，候补委员临时依次递补，则取得表决权。

第二十七条 中央委员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一人为总书记及中央正式委员若干人组织中央政治局，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并选正式中央执行委员若干人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政治局委员参加政治局会议时，

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正式政治局委员离职时候补政治局委员依次递补。全体中央委员会议得改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互推若干人组织中央常务委员会（Secretariat）处理党的日常事务。

第二十八条 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月须给省委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书面的报告。

第四章 省的组织

第二十九条 各省有两个市或县委员会以上，中央委员会认为有组织省委员会之必要时，即派员到该省召集省代表大会，由该代表大会选举省委员会（简称省委）。

第三十条 省委员会正式委员人数及候补委员人数由省代表大会决定；但须得中央委员会之同意。如正式委员缺席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

第三十一条 省之范围由中央委员会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

第三十二条 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委托一个市委员会暂代省委员会之职权。

第三十三条 凡不能成立省委员会之党部，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其附属于邻近之省委员会或直接隶属于中央委员会。

第三十四条 省委员会可推举省委员若干人组织常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

第三十五条 省委员会得指导省委之下各种机关，得指导与监督省委机关报及指定省委机关报主任；得分配工作人才；得分配省委经费；得经过党团指导省政府及其他社会团体之工作方针。

第三十六条 省委员会每六个月召集一次省代表大会报告省委员会工作，及改选省委员会。

第三十七条 省委员会每月须向中央委员〈会〉作省委员会及县或市委员会工作书面的报告。

第五章 市及县的组织

第三十八条 各市或县有两个区委员会以上或有五个支部以上，经省委员会之认可，并派员至该市或县召集市或县代表大会，由该代表大会选举市或县委员会（简称市委或县委）。

第三十九条 市或县委员会均隶属于省委员会。

第四十条 省委员会所在之市，该市不另组织市委员会，该市之区委员会，直接隶属于省委员会。

第四十一条 市或县委员会正式委员人数及候补委员人数由市或县代表大会决定，但须得省委员会之同意；正式委员缺席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

第四十二条 凡不能成立市或县委员会之地，该市或县之党部则由省委员会决定隶属于邻近之市或县委员会或直接隶属于省委员会。

第四十三条 市或县委员会可互推委员三人至五人组织常务会议，处决临时事务。

第四十四条 市及县委员会得指导市或县执行委员会下之各种机关；得指导与监督市或县机关报；得指定市或县委员会机关报主任；得经过党团指示市或县政府及社会团体之工作方针；得分配工作人才及支部〔配〕市或县委员会的经费。

第四十五条 市及县委员会每三个月召集市或县代表大会或全体党员大会一次，报告市或县委员会工作及改选市或县委员会。

第四十六条 市或县的划分，由省执行委员会决定之。

第六章 区的组织

第四十七条 凡在一区内有两个支部以上，市或县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派员赴该区召集党员大会，由该大会选举区委员会（简称区委）。

第四十八条 区委员会人数，由党员大会决定之；但须经市或县委员会之同意。

第四十九条 凡不能成立区委员会区域内之支部，由区委员会或市或县委员会，决定其附属邻近之区委员会，或直接隶属于市或县委员会。

第五十条 区的划分，由市或县委员会决定之。

第五十一条 区委员会每三个月改选一次。

第七章 党的支部

第五十二条 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农村，各兵营，各学校，各街道及其各机关内或附近，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支部，但须得区或市或县委员会之批准。

第五十三条 支部是党与群众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支部的任务是：

- (一) 积极在各该工厂等之内活动，领导该处群众之日常斗争，扩大党的影响；
- (二) 实行党的口号与决议于群众中；
- (三) 吸收新的党员；
- (四) 服从地方党部从事组织与宣传的工作；
- (五) 积极参加地方政治经济的斗争；
- (六) 尽可能讨论党的重要问题。

第五十四条 每个支部公推书记一人，或公推三人组织支部干事会，隶属于区委员会，无区委员会之地，则直接隶属于县或市委员会。

第五十五条 在多量党员产业生产部门中，可组织支分部，支分部亦可组织干事会，不能组织支分部之党员多的支部，得组织小组，支分部之下亦得组织小组，小组公推小组组长一人，直隶属于支部干事会，或支分

部干事会。

第五十六条 党员不满三人之处，则设一通讯员，属于最近之区委员会，或市县委员会。

第五十七条 支部干事会[议]，每两星期中，至少召集一次支部党员大会，报告支部干事会的工作，及讨论支部所在之机关或区域内的一切实际政治及经济争斗的问题。

第五十八条 支部干事会每三个月改选一次。

第五十九条 军队中支部，直归军事部管理，关于政治宣传及教育训练工作，则由宣传部及组织部经过军事部执行之。

第六十条 支部书记之撤换，须经过支部全体党员大会之通过及得区或县市委员会之同意。

第八章 监察委员会

第六十一条 为巩固党的一致及威权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

第六十二条 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

第六十三条 中央及省监察委员，得参加中央及省委员会议，但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遇必要时，得参加相当的党部之各种会议。

第六十四条 中央及省委员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

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必须得中央及省委员会之同意，方能生效与执行。遇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意见不同时，则移交至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联席会议，如联席会议再不能解决时，则移交省及全国代表大会或移交于高级监察委员会解决之。

第九章 纪 律

第六十五条 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党部机关之决议，应当敏捷的与正确的执行之，但对于党内一切争论问题，在未决定以前，得完全自由讨论之。

第六十六条 不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及其他破坏党的行为，即认为违背党的共同意志而处罚之。处罚之方式如下：

A. 对于整个的党部则加以警告，改组或举行总的重新登记（解散组织）。

B. 对党员个人，则加以警告，在党内公开的警告，临时取消其党的，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及其他的工作。留党察看，及开除党籍。

第六十七条 党的一切决议取决于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党员及下级机关对于上级机关决议不同意时，得各该党部过半数党员的同意，得对于上级机关提出抗

议，但在抗议时期内，未决解以前仍须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

第六十八条 党员不经党的许可，不得加入一切政治党派，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党派者，加入本党时，若不经党的[之]许可，应正式宣告脱离。

第六十九条 党员未得党的同意，不得任国家机关内任何的职务。

第七十条 对于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须经党的委员会，党员大会，或监察委员会，依合法手续审查之。

第十章 党 团

第七十一条 在所有一切非党群众会议，及执行的机关（国民党，国民政府，工会，农民协会等等）中，有党员三人以上，均须组织党团，党团的目的，是在各方面加紧党的影响，而实行党的政策于非党的群众中。

第七十二条 在党的执行委员会中，讨论与某个党团有关系之问题时，该党团得派代表参加讨论。但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

第七十三条 为实行党团的日常工作，当指定党团干事会或党团书记处理党团的日常事务。

第七十四条 各级党团均隶属各级党的委员会，党团对于党已有决议之各种问题，应严守与正确执行之。党的委员会得添派或撤回党团的分子，但须向党团说明

其理由。

第七十五条 党团对于其本身之日常问题得自由解决之，党团与党的委员会有不同意见时，党的委员会，应召集党团全体会议重新讨论之，并决定最后的办法，在党团方面对于最后之决定须敏捷执行之。

第七十六条 在党团所在之机关或组织中的重要位置的候补人选，党团须与所隶属之党部机关共同商定之。对于工作位置的调换，亦须用上列方法。

第七十七条 党团所讨论之事项，有关于含有政治性的问题时，党部机关须派代表参加。

第七十八条 在非党群众及组织中，遇有解决重要问题时，党团须在党团会议，或党团干事会中事先讨论与决定。

第七十九条 在非党组织中，对于每一个问题的决定，当在该非党的组织会议中付表决时，在该会议中之全体党员（即党团分子）如有违反党的决议，则按党的纪律处罚。

第十一章 经 费

第八十条 本党经费的收入如左列各项：

（一）党费 党员每月收入在三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二角。凡无收入，及月薪不满二十元者，得由市或县委斟酌情形核定减免之。在三十元以上至六十元者缴

一元；六十元以上至八十元者，缴百分之三；八十元以上者特别征收之；失业工人及在狱或在 C.Y. 的党员均免缴党费。

（二）党内义务捐，由各地党的委员会酌量地方经费及党员经济力定之。

（三）党外协助。

第八十一条 军队中党员党费，由所在地军部征收，转交党部会计科。

第八十二条 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委员会支配之。

第十二章 与青年团的关系

第八十三条 青年团中央，应派代表出席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各级党〔团〕部亦应派代表参加各级党部机关之常务委员会议，此等团部之出席代表应有表决权。

第八十四条 党的中央委员会应派中央委员任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各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应为当地党的委员会委员。

第八十五条 各级党部机关应派代表出席各级团部机关之会议。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
章程决案》单行本刊印

中央通告农字第五号

——农运策略

(一九二七年六月初)^[1]

各省省委员会及各级农民协会党团：

兹将政治局（六月一日）第△次会议通过之农民运动策略大纲通告如下，务必迅速令农民部指导各级农民协会党团，切实执行。

国民政府下农民运动之策略大纲

一、最近的时期中，贫农与地主间发生空前的急剧的冲突，革命的农民运动突然的飞展。因此澈底改革土地制度的问题，也便爆发了，这是革命的当然的现象，并非所谓“过火”，但是，更加剧烈的冲突之继续发展，则对于全国革命的形势与暂时的联合战线的关系，实在含着很大的危险。本党应当预察这种危险而给农民运〈动〉以正确的指导。

二、现时国民革命军的军官，还是革命军队中的重要核心。但是，同时他们皆是地主阶级出身，大多数自

已是小地主。贫农力争改革土地制度的斗争，打击了军官的利益，因此，军官的政治态度便要改变。如今还没有靠得住的军官，也没有阶级觉悟的军队。如果现时在军队中的军官，完全离开革命，那就足以使整个革命运动发生很大的崩裂，甚至于破灭。

三、各级党部应当迅速执行第五次大会的农民政纲——就是不没收军官家属的土地同财产。这种策略现时非常的必要。但是并不是说：这种策略便可以完全在政治上取得地主同情的军官〔2〕，使与工农结合永远的同盟。——一切私有地产者的阶级关系，是很确定的。这样的策略，仅只是延宕与革命军官剧烈冲突的时间，求得整顿工农运动的组织力量之可能。我们运用这种策略，可以得到充足的时间，来组织革命的工农群众的武装，而且我们的影响，应该深入军队之中，一方面是逐渐改良军官的成分，另一方面是提高军队的阶级觉悟，使反革命者难于利用兵士来做反工农的工具。

四、现在应当特别注意小地主之间甚至自耕农及半自耕农之间，虽可寻出界限，然而他们的经济，都建筑在私有制度之上。所以不正确的政策，真可以使自耕农的群众，都落于地主阶级的政治影响之下（如平均田地甚至于平均佃权，以及均分财产，强迫捣毁祖宗牌，没收兵士邮寄回家之款等，都是不正当的政策）。

均分田地的口号，现在尚不能提出（至于均分财产，则根本上不应当宣传）。均分田地，非先给土地国有

不可。各级党部应当对于农民协会的指导者，详细解释均分田地口号之危险。这一口号可趋使小地主甚至于富裕的佃农，都站到地主方面去。

五、农民协会的基础，应当从无地的农民移转到大多数的佃农自耕农。同时对于无地农民的迫切要求，应当有具体暂时解决的办法。至于根本政策如屯垦荒地，亦应当急速公布。“无田地者应当得到田地”这一口号是应当提出的，同时，要对于无地的农民解释：以国家财力实行屯垦政策来解决无地贫农的问题，以及实行均分田地，都要革命完成之后，方能实现。无地的贫农，实在是革命的先锋，现时他们应当加入革命的武装势力以至于直接到革命军队之中去。

六、关于土地的斗争，应当有极明显的政纲，——就是没收大地主。不论国民政府的态度怎样，没收大地主的田地，是要实行的。这一要求的实现，不能单靠国民政府的命令，还要农民自己的力量。但是，为着策略上的原因，对于大地主田地之没收，应当等到本党对于中小地主的态度完全解释，乡村自治政权，已经开始建立，然后才能实行。没收大地主田地是农民运动现时的职任，要在最近秋〈收〉期间开始执行。

六、〔3〕最近几月以来，革命的农民运动之发展过程里，发现许多无组织的行动。这些行动如自由逮捕，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均分财物，普通的罚款禁止米〈出〉境……往往殃及小地主。此等无组织〔组织〕的行动，

自然要引起军官及小地主的反动。使他们联合着农村中较为富裕的分子，实行反对革命的行动。甚至于农民协会之内也发生纷扰，一部分私有田地的农民自己与农民协会相冲〈突〉。有些地方还实行禁烟禁酒等的“道德运动”，于是亦用强迫手段，如铲除烟叶等的办法。至于一般“平产”式的没收财物，罚款式的写捐，更使农民自己相斗，使小商人亦起反感，至于怠工罢业，因而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地主豪绅之金融经济的封锁政策反而容易领导小资产阶级，同向农民协会攻击，——因为农村之中的经济日益停滞，以至于牵及国民政府领域内之一般经济商业生活。这种无组织的斗争方法，都带着中国原始的贫民暴动之性质，一概都要努力避免而与以正确的指导。

七、然而那些无组织的行动，客观上是革命初起时之风暴时期的必然现象。这些现象，表现土豪劣绅威权与政治力量堕落而动摇。实际上正需要直接建立农民政权，由风暴时期进于巩固革命胜利——农民政权的时期。国民政府对于乡村自治的政策，过于迟缓的实行，而对于肃清土豪乡绅的封建政权至今没有决心。因此我们的党应当执行下列的职任：

须以农民群众为首干，联合农村中一般被压迫的人民，澈底的推翻豪绅的封建政权之势力，而建立乡村自治，进行没收反革命及大地主的田地，满足贫农目前的要求，并使农民在各地的斗争，与国民政府反帝国主义反

军阀的总斗争相联结，替国民政府建筑更深的社会基础。总之现在主要的职任是以农民为领导〔导〕建立乡村自治的革命的农民政权，用一切可能的适当的方法，以政府的形式续继反土豪乡绅大地主之斗争。

这种新的农民运动之策略，其意义是：注重农民政权的斗争，这是实行土地革命，所最必要的，并使国民革命军之军官与中小地主中立；亦就是要推动左派国民党，使他们和我们共同赞助农民自己进行没收大地主田地的初步土地革命。

这种策略，并非降低农民运动的，而是对于农民运动，更加加以觉悟的无产阶级正确指导，引导农民作更进一步巩固革命胜利之斗争。

八、所以目前农民运动的根本任务及我们党指导农民运动的任务如下：

(1) 农民协会，不但要团结无地的农民，而且要凡是不剥削别人的各级农民都要团结，以建立革命的联盟。而且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学教师等，都应在联盟之内。

(2) 按照着农政部所颁布的条例，以及本党所决定的方针，进行乡村自治的运动，组织革命的农民政权。

(3) 解除土豪乡绅的武装，使农民夺取其武装，组织并巩固农民的武装势力(农民自卫军)，自卫军的队员，应以农民协会会员充当。当乡村自治政权稳固后农民自卫军当为唯一的乡村中政府军队(或将称为保安队)，以

征兵的制度，使个个革命农民受着武装训练。

（4）进行改革土地制度的预备工作，调查大地主的限度，搜集必需的材料。引进国民党党部及其群众参加土地制度改革运动。在农民群众及一般民众中解释宣传这个问题。

（5）指导改良贫农生活状况的斗争。更加注意减轻佃农剥削之斗争。实行减少捐税的运动，宣传并要求统一的累进农业税之实行。研究改良雇农生活的办法。实行建设消费借贷生产的合作社。

（6）引进农民中的积极分子，使他们参加指导的工作。真正农民不但要多多参加乡区农民协会的机关，而且要参加县省农民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农民协会的机关中，应多量加耕种田地的贫农，使他们成为协会之中心。

九、农民协会现时最危险的病象，便是本党在许多时机中，欠缺党的指导。

各级党部对于各地斗争的形势，农民协会组织的成份农协机关的成份，都缺乏精确的考查；对于各阶级农民的趋向，亦没有明晰的观查；对于农民协会会员的数目，武装农民的数目，亦不能够详细知道。任何地方都没有正确的整理材料。

十、农民协会内部的情形，亦是不大好，省县乡区的各级协会之间，尚未发生密切的关系。有些指导农民运动的负责人员，往往惯于虚报农民组织的数目，夸大农

民斗争的事实，——这简直难于有正确的实际的指导，而且妨碍政治方针之确定。农民运动之指导机关里，缺少真正农民和非同志的参加，这是很大的缺点。省县农民协会指导员的成份里往往只有不知乡村情形之知识分子。

十一、因此我们党对于农民运动之组织上的责任是：

(1) 必须检查农民协会机关之成份，而且要开设非党员的及真正农民的训练班，以求一般农民积极参加农民协会的工作，使党的指导深入乡村群众，各省农民协会应当积极注意实行这件事。

(2) 引进革命的国民党员参加农民运动的工作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如果国民党不参加农民协会的运动，那么非但国民党脱离了农民协会，而且城市中小资产阶级也会跟着脱离农民运动的同盟。因此，同时必须发展国民党组织于农民之中，扩大并强固国民党左派在农村中之基础。

(3) 必须努力整顿共产党党团的工作，农民协会中之党团与团〔党〕部机关(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达到密切的关系。各级党部机关应时常注意讨论农民运动，尤其是省县党部之农民部与各级农民协会中的党团。如此，方能准备正确的指导。尤其主要的，是要努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于农民之中，并且必须强固党的支部工作。党对于群众的指导必须切实建立，——要征取向来在旧式秘

密结社（如哥老会，青红帮等）指导之下的群众。

各级党部尤其是湘鄂赣，接到这一个大纲，必须加以详细的研究，迅速规定具体办法，来执行这一新的策略，并且将运用此策略于各该地的具体的情形的计划，即报告中央，至要至要。

中央常务委员会 安中原〔4〕

中央农民部 宗容民〔5〕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注 释

〔1〕 原件未标明时间。本文内容是转发六月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国民政府下农民运动之策略大纲》，《中央通告农字第六号》时间是六月四日。据此判定本文时间当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至四日之间。

〔2〕 似应为“同情地主的军官”。

〔3〕 “六”与上段序号重复，疑误。

〔4〕 安中原，中共中央的代号。

〔5〕 宗容民，中共中央农民部的代号。

中国共产党告全国农民群众

(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

农友们：

国民革命是要使你们从长期剥削中获得解放，是要去掉你们所难忍受的痛苦，是要使耕者能有其田。

全中国的农民是反对非人的生活。你们要结果帝国主义的优越势力，你们要推翻吸吮人血的军阀。你们要从那不自耕种而坐收田租以供其浪费的大地主手中夺回土地。你们要破坏压逼乡民的豪绅的政权。

国民革命的急速发展促进农民反抗豪绅的潮流。湖南农民已经做了农民运动的先锋。从贫苦农民身上榨取利益的反动阶级已经被农民运动吓得不得了。广东农民协会已经在李济琛恐怖之下，做了牺牲者，但是他们尚在英勇的奋斗。现在反动派又在湖南抬起头来。

反动的军阀，又在湖南握有凶横不法的政权，已经把赞助农民运动的省党部及省政府解散。在长沙以至全省有许多农人与工人都被惨杀，这些反动派是要消灭湖南农民运动。现在农会是向这个反动势力抵抗。他们这样做不单只保存全国农民的利益，还是保存国民革命的

真意义。所以现在湖南农民是应当受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扶助。

湖南农民是整个农民运动的先锋，应当反对大地主豪绅及反动的军阀。你们应当在乡村中建设民权自治政府及土地委员会。你们应当把大地主资本家公司与基督教会的土地收归公有。你们应当破坏豪绅的政权。你们应当将豪绅所霸占的所谓公有田地，以及庙宇祠堂的田地拿回来，交与乡村自治政府中的土地委员会。你们应当武装起来与反动势力奋斗，而保持革命中所得之胜利。长沙的反动军阀应当推翻。

当进行这样争斗时，湖南农民应当知道怎样结合友军。大地主与豪绅是农民的敌人，他们也压逼小地主。所以农民（佃农，自耕农，无土地的雇农等）应当与小地主结成同盟，共同参加反抗大地主与豪绅的争斗。因为要巩固同盟军，对于小地主无论如何是不能加以扰害的。革命军人正在向帝国主义与军阀作战，也是农民的友军。对于他们的土地也不能没收，对于他们的家属更不能波及。革命兵士大部分是无土地的贫农出身。对于他们家属有侵害，对于他们有夺取财物的行为，都是有害于农民运动。这些幼稚行动给反动派的军阀官僚有很好机会去鼓动兵士来反对农民运动。禁止这些幼稚行动是农民协会的重大责任。

农友们！湖南农民是应当努力去推翻在长沙的反动军阀。他们起来推翻反动派，大家是应当帮助的。如果

他们消灭下去，不仅全中国农民运动是被摧残，即国民革命也要动摇而破灭。反动派的地位将重新建立，而帝国主义的死亡亦将迟延。反动派军阀所要的不仅是压逼农民运动，而主要的是要消灭国民政府。

农民不要把兵士看做敌人。农民与兵士之间要建立很亲密的关系。兵士都应当为农会会员。兵士原来也是农民，完全为经济所逼不得已投身军队。他们是无土地的。无土地者是盈千盈万在中国。他们应当有土地。对于这些盈千盈万无土地的人，应当设法实行屯垦的政策而安置他们。兵士应当加入农民运动，去实现这个要求。所以兵士们应为本身利益而加入农民运动，去反抗反革命派与反动派。

湖南的农民，要屈服长沙的反革命派^[1]，要大家积极准备武装起来去推翻他们，帮助国民政府重新在长沙建立政权，拥护国民党反抗反革命的军阀。

打倒长沙凶横的军阀许克祥等！

打倒大地主及土豪劣绅！

恢复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在湖南的政权！

建设乡村自治政府！

田地给农民与兵士！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六月四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六月八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九七期刊印

注 释

- [1] 本文在《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登载时，此处为“湖南农民运动中的同志，要求长沙反革命派屈服”。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关于政局的公开信

(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鉴：

亲爱的同志！

中国革命正在经过一个危急的阶段，在这阶段中，革命必定遇到许多难关，并且要克服许多困难问题。目前根本的问题是怎样实施某种限度的土地改革，以满足已醒觉的农民群众之正当要求，而达到革命根基深入之目的。国民党革命的农民政策已经促起农民群众之奋起，实施这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因为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革命党，他的历史上的职任，就是实行他的土地政策——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中国革命的将来，中国人民的命运，全靠贵党在此时期之坚决的行动。

土地改革刚才开始，就促进了反动分子之反革命行动。代表不劳而获的大地主阶级之封建军阀，已经起来

实行用武力反抗农民。他们威吓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欲加以破坏，——如果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依然忠实于他们革命的主义，依然领导农民从事历史上的反封建势力之斗争。

军队中有些分子反对土地改革确是事实。不过整个的国民革命军并非——亦不能——反对农民的解放。兵士们大都是无地或贫苦的农民，他们不会很自觉的反对农民运动。如果兵士们对土地改革表示敌意，就是他们还没有觉悟他们仍在受军队中反动分子的剥削。以兵士论，革命军在客观上应当是一个土地革命的军队。大多数的下级军官也是从中等阶级招募来的，他们也是被剥削者，被压迫者；国民革命并不妨害不着他们的财产，他们必不以行动来保护豪绅大地主的政权和利益。现在把持一切政权和特殊权利的是豪绅和大地主。他们消灭之后，经济的关系和政治的权利一定要民权化。所以土地改革，不但不妨害城乡的中等阶级，并且可以解除他们的经济的停滞，给他们以政权。如果将这一点给他们说明白，革命军中之下级军官一定很忠实的赞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民权的土地改革政策。再者国民革命军的将领都是相信民主自由的革命领袖，对于土地改革定能拥护。

国民革命军的组织如此，整个的革命军决不能敌视土地改革。其绝大部分（兵士，下级军官，上级首领）定能拥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那么，最少数的反动分子

处于孤立的地位，如果有反革命的行动，不难一鼓荡平之。

在选择道路上国民党已无丝毫犹豫的余地。土地的改革是到革命之道路。反动军阀所取者是反革命的路。革命的国民党不可站在一个分歧的路口。反动的军阀已经公开的反叛革命（夏斗寅的叛变，长沙的政变可十足的表明这一点）。他们已经向工农运动宣战了。他们的屠杀工农群众，和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蒋介石，李济深一模一样。他们要挟国民党放弃土地改革政策，以赚得大地主和劣绅的爱戴。他们侮蔑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威权。长沙政变发生后，湖南省党部即被解散，并未得国民党中央的批准，擅自成立省党部（及所谓救党委员会）。打毁党校，劫夺前方购买军米之款项，国民政府所派遣之特别委员团中途被阻不得到长沙，并且自由派军队到各县屠杀农民工人学生妇女。

这是明白的反革命行动。少数反动军阀，背叛了国民党国民政府以及高级军事长官，而在湖南篡夺了政权。国民党的责任到此情形之下，非常明显，宜立即下令讨灭此少数叛徒，以维系其最高权威，还是和他们妥协？国民党如果采用第二种办法，国民党的历史，国民党的主义，国民党的政纲，都将推翻，将在国民党政治的生命发生非常严重的影响。湖南的反革命必须讨灭，迅速的行动已经十二分必要了。犹豫不决，必遗后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采用以下的行动，削平湖南的反革命：

一、国民政府明令宣布长沙叛徒许克祥等所组织之委员会系反革命，并令军队联合革命的民众共同推翻之。

二、解散叛徒的委员会另委合法的省政府。

三、火速派兵讨伐叛乱，与唐总指挥以派兵之权削平之。

四、取消叛徒窃据之省党部，另由国民党中央下令改选新省党部行使职权。

五、国民政府明令宣布工农组织及共产党在湖南得享完全的自由。

六、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乱之发生。

以此行动处置反革命，不仅湖南一省工农群众对国民党发生坚强的信仰，全国各地的工农，定要遥瞻国民革命的旗帜，认识国民党的党徽，为他们自由之标志。他们必定自己起来向国民政府之敌作战！

当大资产阶级封建反动势力和他们的军阀代表向国民革命反抗时，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一定要和民权主义的群众结成更密切的关系，促醒他们革命的觉悟，并领导着他们大胆的向反革命进攻。当反动分子以公开的反叛行动集合他们的力量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倘不果决的领导劳苦群众向反革命势力作殊死的革命战斗，则一切反革命势力得有更多机会放胆集合发展其势力向

革命进攻，革命前途将陷于危险！谨致
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陈独秀

六月四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六月八日出
版的《向导》第一九七期刊印

中央通告农字第七号

——纠正农民无组织行动

(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

各省省委鉴：

六月一日政治局通过的国民政府下农民运动之策略大纲，已由农字第五号通告，通告各省省委员会及各级农民协会党团切实执行。此种策略关系农民运动前途，亦即整个革命运动之前途，异常重大，尤其对于湘鄂赣各省农民部必须指导各级农民协会党团，切实执行无得怠忽！此策略大纲所指出之最主要者为农民政策建立之运动，然分析要点有三：（一）土地革命之开始，如没收大地主及土豪劣绅之田产等，并非过火，仅为现时革命阶段之策略起见，指明不没抄小地主及革命军官之重大意义。（二）指明均分田地甚至财产，则确为对于现在之不正当的正〔政〕策。（三）指明其他政策，虽有本系正当的，然因本党指导力之弱及农协执委成份之缺少农民，致令永久以无组织的行动出之，——此等无组织行动固为革命初期所难免或且必需，然长此以往未能及时加以组织指导，使已得之革命胜利得以巩固，而进展于新的

时期，则其流弊甚大，此等无组织之行动，如下列各事，目前尤当绝对迅速纠正！

（一）自由逮捕，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吃排家饭等行动，往往殃及小地主，引起军官及小地主的反动，使他们联合农村中较为富裕的分子，都在大地主政治影响之下，实行反对革命运动。现时农协本身必须使此种行动不殃及小地主及革命军官。至于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现时不但不能停止，而且正在他们反攻时期，必须更加坚决的进行。但是，在现在政局之下，必须在每次斗争中设法尽量的搜集此等土豪劣绅之罪状及证据，不能再用原始的方法；此等真凭实据即可交给政府机关办理的工具，宜切实注意。

（二）禁米出境，勒写捐款，铲除烟草，禁止酿酒等事，足以使商业停滞，妨碍城市与乡村之交通，引起中小商人之反动，更可以使政府借阻止军米妨碍税收的口实，实行压迫农民运动，以后亦当绝对停止。关于阻谷问题，农协需精密计算乡村之需要，使有余的谷米尽量流通，或多量供给军用。农协捐款，除巨绅土豪之罚款外，其他均须指定用途，例如合作社之建设，本应与捐主以某种权利，似此方能收充裕经费联合小商之实效。否则农协在本乡的写捐，往往使小商人恐惧怨恨，而实际并未收得此款。此等行动宜立即纠正，反正收不着的，宜立即公布取消。至于农协向外来采办货物之商人捐款，则亦非办法，——农协应有组织的规定适当的物

价，勿使奸商垄断而剥削农民，却决不可过于恐骇外来商人，使农村经济与城市商业断绝关系。关于不必禁止谷米出境，亦是同样的情形和理由。

（三）反对旧礼教，拜祖教及一切迷信菩萨等束缚农民的恶俗，改革男女关系的运动等，自然都有进行的必要，但是这些都是文化运动，只能用宣传而不能用鼓动方法，更不能用强迫方法。农协并非共产党，实际上是农民政权之雏形，对于宗教尚且必须以信仰自由为原则，而由国共两党党部去耐心解释宣传。——可以没收庙产，而不可以强迫捣毁其神像祖宗牌等。至于宗法迷信尚深的农村中，甚至于反对这些陈腐东西，都必须以仅〔谨〕慎出之。

关于组织问题。各级农民协会，均须尽可能的即日召集代表大会尽可能的实行改选，一方更须使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尽量参加各级农协之执行委员会。整个农民协会必须以耕田的佃雇自耕农等贫苦农民为中心，而团结不剥削别人的各级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小学教师等，建立革命联盟。此种改选运动（代表大会）应以巩固农协实行新政策为号召；一方面可以略举无组织行动之各该地的具体事实加以匡正（通过相当的议决案），别方面关于乡村自治运动之要求应极热烈的宣传，由各区各乡农协向政府请愿。再则对于没收大地主反革命派亦须对一般人宣传，各级农协应标明不没收小地主，使农民群众及其他阶级皆能了然。最后，此种改选运动

中尤须注意揭露豪绅反攻之凶恶于全社会，议定抵御镇压之具体实行方法。此种各级区乡县以至省的农协代表大会，如因剧烈之武装斗争而难于开会时，则现有农协委员会必须举行上书□事，组织确不健全者，必须改组。

各级农民协会，对全国农民协会必须发生亲密的关系。全国农民协会已发布之临字第一号训令〔1〕，及将发布的临字第二号训令〔2〕，各级农民协会尤其是湘鄂赣三省农民协会，必须通电拥护，一方面表示各级农民协会已有实行新策略之决心，他方面亦可以提高全国农民协会之政治地位。

各级农民部，须知农民运动已至极严重的时期，我们如果不能切实执行党的政策，以改正过去的错误，万难挽救目前的危机。换言之，即将使整个农民运动，受致命的打击，亦即使整个革命运动受极大的创伤。所以，各级农民部，务须指导各级农民协会党团，严厉执行，至要！至要！

安中原

宗容明〔3〕

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注 释

- [1] 即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中华全国农协发表的《对湘鄂赣三省农协重要训令》。训令认为中国革命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农民运动必须采用新政策，才能对付敌人的挑拨，巩固统一战线发展农民运动。新政策的重要内容为继续发展农协组织；建立区乡县民主自治政府；严厉对付一切反革命派；切实保护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家属；武装农民群众；改良贫农生计；尽量供给军米；保障佃农雇农之生活；整肃农民运动的步骤，使地方的农民运动与全国革命过程合而为一。
- [2] 即本书《全国农民协会之重要训令——农运新规划五项》。
- [3] 宗容明，中共中央农民部的代号。

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

——农运策略的说明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四日)

各省委特委临委鉴：

现在中国革命已发展到了以农村革命为中心的新阶段。我们同志尤其是农运负责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的各方面必须有深切的了解与明确的认识，并须根据第五次大会之土地问题议决案，而且[具]体的运用，然后可以使党切实领导农民运动，以推进革命势力的进展。因此各同志对于这个通告，务须特别注意，并且切实执行。上次农字第五号通告，是关〈于〉国民政府治下农运之新策略的政治局议决案，然而各地都应注意参考，这是湘鄂农运的经验，本次通告则为一般全国农运策略之说明，仍是根据那议决案的原则。

(一)政权问题

农民运动的中心问题，固然是土地革命，但是土地

革命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现在阶段主要特点是农民政权之斗争。（一）自耕贫农众多而尚受新旧军阀压迫的地方，非有建立农民之革命民权的目标，不能使此等贫农形成斗争中的领导者，而联合一般人民去开始反对军阀豪绅的运动，亦不能使他们真正明了革命战争（北伐东伐或西伐）的目的和意义。此种政权的斗争方能促起土地问题的暴发，而且给他以解决的权力机关。（二）新旧军阀之下佃农及失业民众多的地方（尤其是广东）亦须立此目标以指挥暴动，虽则此处的主要特点仿佛已经是没收大地主，其实没有争政权的目标，单纯解决土地问题是不够的，此等地方的主要口号是为土地而争政权。（三）国民政府之下，农民事实上取得政权的县份及区乡，曾经有许多地方（至今还保存着几县呢），可是以前国民政府的政策，是任令农会孤军独战，现在的亲〔新〕政策是事实上帮助农军反攻。如今豪绅的反攻在湖南湖北江西都演成剧烈的危机，民已得之胜利（事实上的民权）几乎全被摧残，此时农民政权之斗争所以更加要加紧，要对于豪绅的进攻，组织极坚决猛烈的反攻。在这斗争过程中便要开始没收大地主，就是要以行动去领导小资产阶级左派，一面对他们让步（见上两次通告），别方面就挟持他们去共同反对劣绅土豪，自然必须以建立民权为目标。第一，农民群众有势力的地方，立即成立自治筹备处，吸引小资产阶级参加，标明除劣绅大地主反革命（已被没收者）外，一切小地主享有公民

权选举权；农民群众势力尚小的地方，亦宜以此政权斗争为目标。而实行武装斗争时便是为乡村自治而战，为镇压乡村反自治者而没收其土地。各级农协，应群起要求政府颁布自治。第三〔1〕，农政部与农协发生亲密关系，双方互相响应，农政部从上而下的帮助农协之政权斗争，农协自下而上的拥护农政部之政策，通电控诉豪绅请愿派代表等运动都可以增加这农政部的威信。

附录：第五次大会前中央农委对于政权问题之决议案

我们知道农民运动中贫农最革命的，中农也来参加革命了，其结果引起其他一般被压迫的民众都积极起来根本上推翻封建政权。农民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为确定农民政权而斗争的时期，农民政权应当由贫农与中农掌握，但贫农应当是这个政权中的领导者，否则农民政权不能巩固。贫农领导政权应当指导吸引一般反抗土豪劣绅大地主封建势力的分子，代表农民及其他乡村一般被压迫的民众的利益特别是贫农利益的向土豪劣绅地主封建势力给以严厉的镇压〔镇压〕。同时乡村农民运动及农民政权，必须在市城〔城市〕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赞助并巩固革命的国民政府。

封建地主阶级乃几千年来压迫剥削农民最利害的一个阶级。不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的政权，则农民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从做起。所以农民运动的初期，必须领导农民用种种革命手段实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权力，标明为民权的政治而斗争的目标，必造成很紧张的革命空气，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是十分必要的。一般人对于农民运动认

为过火的批评实际就是占〔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上面企图消灭农村的斗争。我们必须严厉的加以纠正。非如此不能根本摇动乡村封建政治，使一切斗争得到胜利，农民政权确实的建设起来。

农民在乡村中打击封建地主的时候，农民协会应成为乡村中惟一的权力机关，完全指挥这斗争，使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的一切政治组织（如民团，团□，团防局等）完全消灭。在这个过程中应即建设民主的区乡自治制度，以保障农民战胜封建地主阶级的胜利。

农民不特要取得乡村政权，而且要参加县政治省政治全国政治，参加县政治的方法是：一面使县政问题皆由县长与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的民众的团体开会议解决，一面促县政府改民选委员制。

农民协会，是创造农民政权的机关。他们要求国政府省政府赞助农民争政权之争斗，这个斗争的过程中农民协会的政治地位应当尽量提高。

（二）经济斗争

经济斗争之进行，在阶级分化没有明显的地方，减税运动可与富农小地主等共同作战；在阶级已有明显分化的地方，减税运动以及实行统一的农业累进税之要求，仍是各种农民作战的共同目标，就是反对高利贷，也不特为佃农之问题，应即竭力领导他们努力斗争。至于减租运动，则尤为重要，这实是没收大地主运动之第一

步。在经济斗争中，更当注意青年农民的利益，但不能与整个经济斗争脱离。对于雇农手工业者，在目前情况之下，不宜另有独立的组织，惟农协对于他们的利益，应该切实拥护。如雇农人数太多，农民经济斗争扩大则农协内可以组织雇农部（手工业部亦是如此），但对于农村的联合战线，亦须注意巩固。因此一方面要使雇农要求得到满足，他方面为防止会内的冲突计，应使雇主及一般群众了解雇农改良生活的必要，有必要时农民协会应为小农雇主及雇农冲突时之仲裁机关（青年雇农牧童亦在此例）。经济斗争之进行，各地的宣传亦有不同，张作霖治下则减租减税没收大地主，三种斗争宜看各省农民经济状况而定。注意之点主要是要引导这种经济斗争，收得到最广大的群众，而且能立刻转变到政治斗争以至军事行动。蒋介石治下亦是一样的，但是广东应当特别注意更须明确的以农民政权及没收大地主为暴动之标帜。在湘鄂赣三省则除〈根据〉情形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尤须注意的有两件事：（一）是经济斗争在程度剧烈的地方，必须转入农民协会自己开始经济的建设事业，如借钱的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贩卖合作社等。（二）至于减至〔少〕苛捐杂税的运动必须各地方调查实情向政府提出具体的要求，田税的问题与土地问题应联合在一块进行，并须指出非没收大地主土地不能解决农民问题之趋势，至没收后之土地则须征收农业累进税。

土地问题确为不能不解决之重要问题，要求解决土

地问题的不但是佃农贫农，即失地之农民及短期之雇农亦有迫切的要求，就是苛捐杂税等等压迫之下的自耕农也大多数感觉土地之缺乏，并且农民运动的根本目的，即为改变现在的土地制度，使耕地农有实现而进于国有。我们即使在阶级分化未明的地方亦须宣传第五次大会之政纲，使农民及一般人民了解解决土地问题之必要与策略。土地问题应与经济斗争之发展合而为一，应使农民了解减税减租并不能澈底求得解放，必须[必须]进到没收大地主土地的阶段方能开始解放农民的土地革命。

对于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则必须使之中立，使农民得和国民党左派及一般被压迫民众结合进攻土豪劣绅大地主。我们的党在目前必须用很大的力量进行这个工作。实际上小地主与富农不一定是土豪劣绅，不可使他们落于土豪劣绅大地主领导之下因而巩固反动的政权。不过在这种情形之下小地主及中等阶级一方面虽然可以反对土豪劣绅，他方面客观上也是农民的剥削者，所以对于他们要求减租是不没收其土地财产之交换条件。全国的减租运动都须注意这一点；并须宣传国民政府之佃农保护法，国民政府治下，则须要求此法之严格的实行。

分地运动是贫农要求解决生计问题的迫切表现，其起原则在减租减税的运动，但我们党不能放任他们自由做去。分地[分地]虽然是必不可免的阶段，但在将来革命已有新的发展，已与小资产阶级建立了巩固的联合战线时，可由没收而均分，然后再走上土地国有的道路，

然后国家开办屯垦方能解决失地农民及兵士之土地问题。至于现时的联合战线，还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真正联合战线，国民政府及其军官之中还包含有中等地主，甚而至于大地主的少数分子也在内。现在减租减税的运动和解决一部分贫农的生计问题（利用合作社，加入军队，兴办立〔工〕程等方法）都是将来解决土地问题之准备而已。所以客观上如果有紧迫的必要，一方面固然可以由农民协会，最好是乡村自治政府设土地委员会，设法分配若干土地与此等贫农，但只是将没收之公产庙产大地主荒地官地来分配，而不是均分，别方面必不可过早的提出均分土地的口号，尤其是均分财产的口号。

阻卖问题是乡村中荒歉或因剧烈斗争而经济破坏的时候所必然发生的。农民协会以及将来自治机关，必须注意这种斗争，不使过于延长，随时筹算本地所需米粮，如已有多余，即需竭力流通，这不但对于保持与国民党左派及城市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是必要的（如供给军米问题），而且为农村经济本身的利益，亦是必要的。

（三）武装问题

农民政权的斗争与土地的斗争，直接要求本党十二分注意农民武装的问题，农民协会应当集中乡村武装夺取地主阶级的武装，并应在每个反军阀的战争中利用各

种时机号召农民参加战斗，夺取敌军的武装，使农民自卫军成为乡村中革命〈武装〉，而此种夺取武装的进行更应与本党军事策〈略〉相适应。农民运动，往往一开始便急转直下进于武装的冲突的，各省军部须派有军事工作能力及经验的同志训练农民自卫军，使其有野战与迅速集中的能力。在北方各省，则须取得红枪会的实力与群众，使之脱离土豪乡绅的影响而置于〈我们的〉指导下。成〈立〉乡村自治机关的保安队，并须实行民兵制，使每个农民都能获得军事训练，并使有一批复一批的武装训练与补充，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各省军部及农民部，均须积极切实准备，同时必须号召农民加入军队。

附录：第五次大会前中央农委对于武装问题之决议案

1. 各省应一致努力建设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
2. 武器种类除枪外，应使每一个农民协会会员都置备鸟枪梭标大刀木棍等武器一件。
3. 对付旧有地主阶级的武装如团防民团保卫团等分为三种办法：（一）使政府下令各省均限于组织农民自卫。旧有之地主阶级武装团体须一律解散，将其武装交与农民自卫军。（二）只要为政治环境所许，能以农民力量强夺其武装的即行强夺。（三）不能实行〈上〉两种办〈法〉的地方，则用改选其办事人方法，使在土豪劣绅手中的武器，移转与农民协会接近的绅士及其他进步分子手中。我们必须在此种移转的过程中参加活动，在团丁中设法施行政治宣传，使之减

少为地主阶级利用敌对农民的思想并表同情于农民协会，渐次归到农民协会手中。

4. 全国农协会提出[提出]农民自卫军组织法，请国民政府颁布。

5. 应使国民政府照各省农民自卫军状况领取或廉价购买枪弹。

6. 各级农民协会，应一律设置健全的农民自卫军部。

7. 中央及各省的军委（未组织军部的应即组织），应充分注意农民自卫军问题，军委讨论农民自卫军问题时应与农委开联席会。

8. 应有计划的经常的宣传[2]装之残暴无理，农民应即建设自己的武装，以保障农村革命的胜利。

(四) 组织问题

农民协会之组织，一开始便含有与乡村中旧政权对抗之第二政权的性质——这一层[层]意思，应当十二分的注意。农民协会在运动始起的时候，不论是减租减税或减息，不论是武装的争斗，总之都是反对豪绅大地主的斗争——亦就是反对军阀的斗争。固然阶级分化不胜清楚的地方，小的豪绅会联合在协会或红枪会之内，共同反抗军阀及当地巨绅。但斗争稍稍发生，小的豪绅便要反动，便要转到一般农民联合乡村中小商人小学教师等而反抗豪绅大地主的阵势。一般农民之中自然是贫农，和地少的自耕农，无地的佃农雇农，以及游民群

众，占中坚的地位。所以农协的组织，应当以贫农为中心。但是又不可以游民为唯一的基础。而应以佃农等耕种田地的贫农为其基础。经济落后的地方，小工业及小商业并非与农业有明显的分化，那就同时要吸收这种分子到农协之中，至于中农富农也不用排拒——斗争的过程往往使他们自愿加入农协——只须农协机关（执委会）里巩固贫农的领导地位。应竭力引导本地真正农民参加农协机关，愈多愈好。农协会在自治政府未成立之前他是乡村中的第二政权，亦就是乡村中革命分子的团结。乡村政府建立之过程中他居于领导地位。乡村自治政府既成立之后他是政府的中坚。事实上等于指导政府的组织。共产党因国民党之党团经过农民协会而指导乡村政府——农民协会便成了更扩大的国民党，他在中国之政治的民权化的过程中占着非常之重要的地位。

（五）联合战线问题

乡村中之联合战线，当以贫农为中心，领导□□□□富农并吸收小商人手工业者，小学教师进步的知识分子，同时，对小地主革命军官让步。农民协会对这些同盟者的利益亦须尽量拥护，领导他们向大地主土豪劣绅斗争。在北方的工作，须特别注意于领导富农及知识分子（小学教师等）一同努力作反军阀的运动。在蒋介石统治之下，小商人及知识分子均有暂时被蒋介石诱惑的

可能，宜尽量提高他们的政治经济斗争以暴露蒋介石欺骗民众的罪恶，以强固农民斗争的联合战线。在湘鄂赣三省亦须联合小商人及知识分子，使其坚决的占〔站〕在农民方面。再须宣传土地问题之解决，不但对贫农有利而且有利于乡村中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也只有他们和贫农联合攻击豪绅大地主，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保障他们的利益。

当富农小地主对农村革命尚持怀疑，甚至恐惧的时候，农村革命之中心势力的贫农，固不可不去推动他们，以实行的行动去领导他们，使他们一同尽力于农村革命，但要注意他们的利益，决不可以使他们占〔站〕在反革〈命〉的方面去。北方各省的初期运动尤宜注意于此。

农民必须与城市工人结合密切联合战线，具体的发生密切关系，在革命斗争中互相帮助，如经常的互派代表，遇事互相报告，互相以实相助，指明工人的敌人与农民的敌人是互相勾结的。他们双方常常各造谣言，离间工农，实则他们是共同剥削压迫农工的。

(六)会党问题

会党（哥老会等类组织）原来是被压迫阶级起来反抗压迫的组织，他们有很严格的组织，勇敢的精神，很有对于共同奋斗的义气。但是他们的工作方法（机械的

纪律)及其游民的性质使他们往往为豪绅所利用,他们的组织在农民之中往往很有发展,他们久受压迫,他们因农协起来在政治上也得到了自由,故他们对农民协会的组织感情很好。农协应取得他们的群众,这是非常必要的,假若农协排拒他们,则他们在旧式的首领指导之下是有被地主利用成为法西斯蒂的可能。我们对他们应该有积极的很好的宣传与训练,同时须有具体的部分解决乡村游民目前迫切要求的方法,以及国民革命对于他们的政纲,使他们能明了本党能代表贫苦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农协中不应用任何方法,任何形式排拒会党。可介绍会党分子加入国民党,会党中有阶级觉悟的应介绍加入本党。凡会党的行动与农协冲突时,应设法调和,纵使证实其为受人利用而反动,也应只惩处其首领,不要傍及群众,以防逼此被压迫之贫穷群众都无路可走更形反动。就是攻击其首领,也不宜操之过激,只宜以具体事实暴露其首领不能澈底为农民谋利益的罪恶。不能放任他们使永久留在封建式的领袖之下,更不能放任他们游民式的思想和政策,反而来指导农协的运动。对红枪会问题亦是如是。

(七)国民党问题

从前农民对于国民党往往不愿意加入,土豪乡绅又

往往利用国民党党部的组织，以打击农民。以后对于国民党由乡村直到城市的党部，都应领导农民群众加入。我们党经过国民党乡村党部之党团作用去指挥农协及自治机关的工作。乡村农民的国民党党部应成为国民党左派的基础，在政治主张及策略上，都应当从下而上的给上级党部的左派以建议而督促之实行。至于国民党的农民部，第一，应占〔站〕在党的地位给予农民运动物质经济的帮助；第二，在形式上予农民运动以指导，在农村中宣传国民党之革命的农民政纲。国民党农民部对于农协并非统属的关系，须使农民协会的整个系统，俱置于全国农协之下。但如国民党，欲以上级机关的态度命令农民协会则亦不宜加以直接反对，而应辨别其政策之革命与否，加以纠正或敦促。农民加入国民党后应注意向其宣传国民党政策及左右派之分别，使农民的政治观念进步，这样，才不致如现在有许多地方农民反对国民党，又有许多地的农民以为凡有国民党的名号便都是革命的。

(八) 共产党的发展问题

第一，应在贫农中间努力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第二，要用党团指挥各种农民团体，对于农运工作尤须有精密的计划。例如每级农民部，对于该县农运工作至少应有每半月的计划，而省委农民部则至少应有

每一月的计划。——应根据第五次大会决议案及中央之政策，加紧努力地为土地革命农民政权而奋斗，自然应当有系统有组织的逐步筹划。

（九）青年工作

C.Y.中央最近已有具体的决定，曾经C.P.中央农委的审核，兹从略。

（十）协 作 社

合作社对于中国农民运动，现时已是非常之重要。所谓合作社，不必一定照着“西洋学院”的组织而要实现其主要的意义，帮助贫农脱离重利益剥削及奸商之垄断居奇等种剥削。所以各地可以就原有的组织，或农民自己的习惯为改良之形式，不必尽同。必须造成合作社的人材，研究各地农民自己的经济，从速创办合作社以补助农民的经济斗争。——尤其是信用合作社。

附录：第五次大会前中央农委关于合作社之决议草案

1. 在一国城市中任何生产权力均在工人阶级手中时，那合作社的组织可容易达到社会主义的社会。
2. 在一国城市中任何生产权力，均在资产阶级手中时，那末合作社在经济方面可以说完全为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了。

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可以利用他来作改良派的宣传，以愚弄小资产阶级，他们用合作社的机关为借口说凡此便可消灭资本主义，以取消工人阶级的奋斗政策及其阶级斗争。

3. 国民革命的发展，使目前中国的近状到了介乎一、二之间的一种情形了。假使中国的革命结果胜利，并且能成为一个真正民权方式的，那末中国农民的合作社在经济方面须与革命的政府与城市发生密切的关系，在政治方面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如此方法，才〈能〉帮助农民消灭在农业中所发生的资本主义的倾向，同时，可以使农民于乡村阶级分化时减少压迫。

在目前中国民主革命尚未完全得着胜利保障之时，合作社之工作应该采如下之方式：（一）利用合作社为强有力的经济武器以反抗奸商重利盘剥者的压迫，此种经济的武器可以成为改良贫农一部分生活的工具。（二）合作社应当形成一种引导农民加入农协使其参加乡村斗争的组织形式。（三）合作社应用全力以帮助农协的发展，合作社成为一组织各种农民的形式，乡村有许多手工业者，他们本身的利益自觉农协尚不能把他代表出来，但利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则可引导之参加农协。

4. 在组织许多大规模合作社之前，应向农民宣传合作社的意义与其重要，同时并须作提高农村文化的宣传，所以合作社可起首组织的地方必须在那有强有力的农协组织的地方，因该地之群众有合作社之要求。换句话说，合作社是要跟着农协的发展而发展，同时须受农协之领导。

5. 在阶级的地位上我们收集合作社的会员应采取与农协收集会员的相同标准，如此才能抵制和操纵合作社乡村的

资产阶级及压迫者之影响，同时合作社社员虽应采用农协收集会员的标准，但并非只有农协会员方可入合作社，反而言之，合作社必需成为引导中农，贫农加入农协之一工具。

6. 当北伐军继续向北方军阀进攻，帝国主义者向华侵略（如英国集中实力于上海等）时，合作社只能得着政府很少的帮助。因此，合作社的经济，需自己独立，只有向乡村募集的方法，所以在乡村各公款内，农协应当拨一部分作为合作社的基金。在目前情形之下，我们所要组织的合作社当一方面要费少许的经费，另一方面又要成效很快，这种的合作社即为消费合作社。在那个有农产品输出的乡区（棉花丝茶等）我们可以组织交易合作社。在目前最困难组织的为农民生产合作社，因为生产合作社，需要多数的金钱，机器与较高的文化。在乡村所有的修地筑堤的旧式社会，农协应当使之根据合作社的意义改良。在乡村手工业区，应当组织为他们组织购买原料，分卖出品的合作社；此最后的两种合作社的程式可说为达到生产合作社一种最近的组织。

7. 组织合作社的方法，应当在城市或省会之地建立中心的合作社，以便在较便宜的市场，购买生产品以帮助农民。所以应在有二、三十小合作社组织的乡区组织一中心，成为较大的合作社，省会亦然。

安中原

安〔宗〕容明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注 释

〔1〕 此段序号有误，少“第二”。

〔2〕 “宣传”后原件缺十余字。

中国共产党致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亲爱的同志们：

自“二七”以来，中国工人阶级和本党携手奋斗，已经四年多了，这四年当中，中国工人阶级和本党同志为革命奋斗而为帝国主义军阀及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所屠杀者，遍于全中国南北各省，积尸可以成山，尤其是最近封建资产阶级的代表新军阀蒋介石及其党徒白崇禧李济琛夏斗寅许克祥等在南方之屠杀，旧军阀张作霖张宗昌在北方之屠杀，更为残酷。本党李大钊等同志们在北京之死难，汪寿华等同志们在上海之死难，邓培李森刘尔松〔崧〕等同志们在广州之死难，杨昭植等同志们在湖南之死难，其惨烈当为中国工人阶级及本党永远不忘之事。

中国革命青年愈向前进展〔1〕，帝国主义愈惊恐发狂地救〔教〕唆其走狗向中国革命的工人阶级及本党横施屠杀；帝国主义愈惊恐发狂，教唆其走狗之范围愈扩大，不独旧军阀受其教唆，即曾经投机混入革命之新军阀及一切游疑中立分子，亦〔亦〕受其教唆，转过头来，戴着革

命的假面具，向工人阶级及本党毫无顾忌的摧残。

工友同志们！现在和革命势力不相容的，不只是帝国主义及其老走狗张作霖，也不只是帝国主义的新走狗蒋介石，凡是被革命高潮所吓退而接受帝国主义教唆的人，都会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走到反革命那边去；所以中国革命成功的担保，即中国民族脱离帝国主义之压迫剥削而解放的担保，乃是工人阶级及本党同志的血。

现当革命的高潮中，反革命的恶潮亦日益增涨，造成中国革命运动之一大危机，革命的工人阶级正在此危机中召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是有非常严重意义的。

工友同志们！我们在第四次大会时的力量固然比前几次大会时的力量增加了，但是敌人的力量也同时增加了；因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不但是老军阀，现在又加上了大资产阶级及大地主的代表新军阀。我们今后向他们作战的力量，不但要集中工人阶级自己的势力，而且要领导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结成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向共同的敌人作战；因为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同样是受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及大资产阶级之压迫者，这三个阶级都是中国革命的势力。所以此次大会之中心口号应该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工友同志们！今后革命的争斗将愈加艰难困苦，我们须愈加努力。本党庆祝大会之成功，同是预祝大会后全国工友们和本党携着手奋斗到底，以获得我们的最后

胜利！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万岁！

全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万岁！

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万岁！

中国国民革命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出

版的《向导》第二〇〇期刊印

注 释

〔1〕原文如此，疑有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对政局宣言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

全国的工人农民及一般革命平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革命之危急存亡的时候，对于你们发表宣言，意思是要解释明白国民政府在反动阴谋之下的政局，以及本党为保持民众之革命胜利而奋斗的政策。

一年以前，国民党的政权还不过在广东一省，而在此之前，甚至广东省内还有许多区域，和中国其他各地一样，都在反动军阀的掌握之中。——这些反动军阀，继续不断的自相攻战，极其残酷的压迫平民，将我们中国零星分割而出卖于外国帝国主义，维持着垂死的封建制度；这种特殊的封建制度，使几万万民众永久的处于奴隶地位，永久的穷困饥饿。然而从国民党改组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指导之下，造成了广东的革命基础；从广东向北发展，得着全国各地革命平民的响应，居然将许多巨大的军阀逐一的打倒，——这些大军阀的武装力量其实比国民革命军要利害得

多呢。吴佩孚的势力被歼灭于两湖，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也被打败，最近张作霖又在河南败绩。中国之大部分，已经脱离旧时军阀的统治，民众应当可以自由的组织起来，以求自己及中国之最后解放。革命运动的力量，已经有伟大的表演，甚至于列强帝国主义也不得不向群众的猛进让步；例如英国在汉口九江的租界竟不能不交还中国，并且始终不敢公开的实行其久已准备的武装干涉。这种革命胜利的原因何在呢？何以军阀帝国主义不能不对于革命民众的进攻而退却呢？

革命胜利的原因，当然不在某某总司令某某军长的善战，亦不在某某领袖的善于外交，而在于革命得着中国人民之极大多数的赞助，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努力，并且有各种被压迫阶级因反抗一切剥削而团结的坚固的革命联盟。中国革命之伟大领袖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根据革命的三民主义而明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革命之进行当在此三大政策领导之下的时候，国民革命日见其巩固发展，而成为革命敌人所震惊失措的伟大力量。中国受帝国主义国内军阀的压迫，已经几十百年，如今走上了自由解放独立的道路，眼见得可以得着经济发展的前途；所以中国的农民，本是一百千年受豪绅地主的压迫；中国的工人，本是在囚徒牛马似的条件之下工作；中国的贫苦市民，手工工人以及小商人，本是异常的贫困，日趋于破产；——他们这些极大多数的中国平民，在这一时期之中都奋起斗争，力求自己的解

放。民众在三大政策之下得以勇猛前进，捶碎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制度之锁链，而锻炼解放中国的武器，以力争极大多数人民之民权，以解除中国之束缚，以消灭中国经济发展之障碍。

然而一方面固然逐步的得着胜利，中国劳动民众固然警醒起来努力于自己的组织和斗争，而别方面，平民之明的暗的仇敌，也就觉察得到自己的危险，寻找种种方法来阻遏革命进展的潮流。他们的手段和方法有许多种。外国帝国主义者派遣军舰军队到中国，驱使他们的爪牙北方军阀作战，并且挑拨离间国民革命军的长官。以前军阀是公开的反对国民党的，后来看见不能够反对革命的伟大旗帜，于是假意归顺革命，戴起国民党的假面具，想在国民党内部来从事破坏革命。至于豪绅地主，贪官污吏，买办阶级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更是用尽方法压迫工农运动，或是公开的用武力来摧残，或是秘密的用挑拨离间造谣诬告的手段来破坏。资产阶级呢，他以前是和群众运动同路的，随后看见群众运动的发展而吓退了，于是宁可跑到革命的敌人方面去，只要能够镇压工农运动，——可见中国资产阶级，宁可心甘情愿的替帝国主义者当奴才，婢膝奴颜的求他们谅解，却不肯牺牲一个大钱来改善工农的生活！

再则，国民革命军中本来有许多长官，冒着国民党的招牌而自己扩充武力，搜括金钱；到后来，他们看见民众的胜利将近实现，各种各式的军阀制度都要完全灭

亡，——就公开的背叛革命，同着资产阶级共同积聚力量，以攫取国民革命的指挥权，压迫工农，而与人民的仇敌妥协。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的叛变，便是这种阴谋的第一步，然而没有完全成功。这是因为北伐的胜利解放了中部中国，民众运动积极的自动的发展，表现伟大的新的力量，足以打击军事独裁的暴力。然而蒋介石的野心不死，他到今年三月间，便公开的叛离国民政府，夺取东南诸省，自江西至上海沿途屠杀工农，而把持国民党于自己掌握之中。

这就是对于国民革命的第一次严重的打击。

当时国民党的领袖对于蒋介石的叛变，对于这种阶级分化的现象，持甚么样的态度呢？那时国民党指导机关的革命性还没有用尽，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级也还有些前进的勇气。今年三月间武汉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就足以表示国民党的指导机关，还能够依据于有组织的工农群众，以抵抗反动。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完全赞助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使他易于团结大多数人民而与封建资产阶级及反动潮流相奋斗，并且中国共产党决定自己的党员应加入国民政府，以分负武汉国民党在此艰巨时期的重任。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许多议决案，形成我们联盟的政纲。这些决议是：巩固党权推翻军事独裁；镇压一切反革命；实行乡村自治召集省民会议以实现国家政权之民主化；为赞助工农经济状况

之改善而设立农政部劳工部，以便制定改良社会之法，而实行之；坚决的赞助工农群众运动，以及其他。

所以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足以悉显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决心抵抗反动进攻，而且愿意广大的发展工农运动以保障国民革命之向前进展。

国民党既然有这种决心，共产党自然更加要与国民党巩固的联合，而为双方共同的任务奋斗。共产党派遣自己的党员加入国民政府，同时当然认定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将要很诚意的履行自己第三次全体会议所规定的责任，当能和本党党员之参加政府者共同努力于革命斗争之进展。

然而最近几月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人民大大的失望。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及国民政府，并不实行那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及责任。国民党中央自己将人民的希望打消了，——中国人民原本是相信国民党的中央及其许多领袖是革命的！

正因为人民相信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是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正因为这个绿〔缘〕故，所以那国民政府领域之内反抗封建余孽列强侵略的工农运动，乃有如此迅速和广大的规模。两湖农民有好几百万都奋起斗争，反抗封建阶级的统治，反对豪绅地主贪官污吏及军阀，要求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标语之实现，要求平民政权之建立。城市中的工人，也努力的起来推翻残酷的牛马似的劳动条件。如果国民党中央真能依据民众

运动，那么千余万有组织的农民，二百八十余万有组织的工人，必定要成为国民革命之极巩固的基础。那时，中国的封建制度，必定要受着致命的打击，而不能复活。然而国民党的指导机关不愿意如此！国民党中央与垂死的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的关系，却比他与中国新兴的革命力量的关系更加密切些；因此，国民党的许多领袖消极动摇犹豫得不堪言状，其结果，领导权又落在反动军人之手。

今年四月间，国民党中央已经拒绝公布土地委员会关于土地制度改良的决议草案^[1]，当然更不说实行了。而劳动法的制定与公布更遇到许多阻碍。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照理应当注意中国平民之被压迫阶级，工人农民手工工人的呼声，但是他却不是如此，他专听豪绅地主出身的反动军官，——这些反动的军官是时时反对农民运动的。今年四五月间，正是应当实行社会改良以扫除城乡封建关系之根株，而与反动派以致命的打击的时候，正是应当武装工农以抵抗反革命的时候，——在这种时候，国民党领袖及国民政府反而发出许多训令宣言，专以限制工农运动，更使动摇犹豫的分子转移于反动派方面去，并放任反动派使能自由的准备进攻革命。反动军官利用这些犹豫动摇的政策，而公开的反攻民众运动。反动的恶浪陆续继起：蒋介石走狗的杨森进攻鄂西，子学忠张联升等叛变于湖北西北，夏斗寅进窥武昌，许克祥实行政变于湖南，以及最近冯玉祥表明反对

工农群众运动及共产党。工农的血流遍中原，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革命的胜利全被消灭！

现在早已到了国民党中央应当选择正道的最后时机：究竟是同着革命前进还是同着反动后退！直到最近，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仍旧是不肯决然的同着革命前进，仍旧继续限制群众运动的政策，任令一切反革命行动不受任何惩罚。对于湖南的反革命政变，没有任何的处置；国民政府反而默认这些政变而加以掩护，与以合法的根据，使反动派得以完全摧残工农运动。湖北夏斗寅的反动势力并未歼灭，其实很有充足的军力足以办到。而湖北各县的反动派，却摧灭了许多的农民协会。国民政府不但绝无肃清反动的办法，反而事实上帮助反动派的进攻，——因为政府的政策是解散或改组工农团体，这些工农团体的罪状，就是努力牺牲以反抗封建制度而已！

这种情形是国民党中央多数领袖公开的赞助反革命军官，一般都是动摇妥协的政策，其结果，使反革命在武汉首都，也筑下巩固的基础。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

本党的观察，认为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多数领袖的这种政策，——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渐灭。这种政策使武汉同化于南京，变成新式军阀的结合与纷争。可使宰割中国的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及其他军阀的旧统

治，仍旧一变而为瓜分中国的蒋介石冯玉祥许克祥等新式军阀伪国民党之统治。中国仍将继续受着残酷的剥削，革命将受普遍的摧残，民众将更受无限痛苦，封建的无政府状态将要高奏凯旋，帝国主义的统治更加可以稳定。中国共产党永久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民众利益而奋斗，决不能对于国民党中央现时这种政策负责。中国共产党反对这种政策，因为对于他，民众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几千共产党员，在革命军进攻武昌南昌的时候，在攻打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的时候，在广东的田间上海广州的街市反抗蒋介石派叛徒的时候，在湖南湖北反抗反动军官的时候，——战死的战死，被残杀的被残杀，凡此一切已足证明共产党永久与工农民众共同奋斗，不顾任何巨大的牺牲，——就在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抛弃劳动民众的时候，亦是如此。

因此一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一切工人农民兵士及一般革命平民，不论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都可以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与你们共同奋斗到底的，必定能够引导民众经过革命的一切艰苦时期，去达到最后的胜利，国民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必将努力奋斗，反抗反动军官封建豪绅的〔及〕资产阶级完全攫政〔取〕国民革命运动的阴谋，反抗他们屠杀工农剥削民众的政策；他们这种阴谋和暴行是使革命破产，实在就是和帝国主义妥协，——因为抛弃土地革命，就

是抛弃消灭封建制度的革命运动，而封建制度不消威〔灭〕，帝国主义的压迫是决不能推翻的。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绝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力争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实行关税自主，解放中国。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反对军阀的斗争，力争国家的统一，建立地方及中央的民权主义的政治。

中国共产党将要反对一切封建余孽，力求革命之完全胜利，以求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之发展。

中国共产党将要更加努力，以实现并巩固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及苏联之真正联盟。

中国共产党更将继续进增工人利益的斗争：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的严格确定，改良劳动条件，救济失业工人，保护女工童工，力争工人罢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及工人之武装自卫。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解放农民之斗争：地主的田地无代价的交与耕种的农民，保护小田主的田地享有权，不没收的田地当实行极大限度的减租，废除苛捐杂税陋规苛约，改良雇农之待遇增加其工资，解除豪绅地主贪官污吏之武装，推翻其政权，力争农民武装自卫之权，建立乡村自治，限制高利盘剥，设立农民合作社，要求国家以充分的经济辅助农业，并实行拨款借贷于农民。

中国共产党亦将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废除一切直接间接的苛捐杂税，制定统一的稳定的货弊

〔币〕，反对新旧军阀阻碍商业交通，保护本国工商业以反抗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反对买办高利盘剥者之剥削小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更将为兵士的利益而斗争，要求兵饷按时发给，反对克扣兵饷，要求改良兵士的待遇及生活条件，反对新旧军阀牺牲兵士的生命而从事于争权夺利的私战，主张兵士退伍后应由国家发给土地或与以工作，使得从事于和平的生产事业，对于归入革命营垒的所谓土匪游民亦应当如此。

凡此一切革命工作，中国共产党都要和国民党党员群众一切真正革命分子，共同去实行——因此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如果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及国民政府真能实行这种革命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制度及反动派的阴谋，那么，中国共产党必以全力赞助这种真正革命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永久认为革命的利益民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较之保存某种政治联盟领袖结合高出十倍。中国共产党不能放任背叛革命的军人以及犹豫骑墙的政治家，冒充国民党假借孙中山先生的旗号以自文饰。中国共产党决意与一切革命分子合作，只要他们能够诚实的坚决的根据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而奋斗——民族解放民权政治民生改善的三民主义，联俄联共赞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是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之遗训。所以中国共产党，必定严厉的揭发一切假借孙中山先生旗号的伪国民

党之出卖革命。

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之光荣的旗帜永久是在革命的民众，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群众方面，决非反动的妥协的伪国民党所能盗窃的。中国几万万的民众始终要认得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始终知道中国共产党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民众的力量始终要战胜一切反动叛徒的野心，而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出
版的《向导》第二〇一期刊印

注 释

- 〔1〕 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旬到五月初，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开会讨论土地问题，最后提出了《关于土地制度改良的决议》草案，确定没收反革命分子和大地主土地，而目前还只实行减租减息。这个草案送交国民党中央以后，汪精卫拒绝批准，国民党中央决定不公布。

国民革命的 目前行动政纲草案

(载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出版的
《向导》第二〇一期)

(中国共产党提出此草案，愿与全国一切
革命分子共同商榷而实行之。)

一、反帝国主义

A. 反对列强武力干涉中国，全国民众应一致要求立即撤退驻华之外国海陆军。

B. 收回租界，由租界居民组织市民议会管理之。外人之居住租界者，均须受中国法律之约束，并负担同等之纳税义务。

C. 取消在华外国银行之一切特权，禁止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发行纸幣〔币〕，凡中国资本之银行，具有充分之担保金与合法之地位者，其纸币得通用于全国。

D. 无条件交还海关，建立减轻出口税增加人口税之保护税则。

E. 取消外国商轮自由航行中国内河及滨海各埠之特权，严禁私运军火及鸦片吗啡等类毒物。为发达本国航业计，应将招商局收归国有并加以扩充，得政府许可之私人航业，亦予以保护。

F. 外人投资于大企业如铁路矿山之类，因而获得之管理权及政治权利，应一律取消，并从新厘定其经济权利。外人在中国境内开设之工厂，须从新登记，受政府之完全管理。不得国民政府之允许，外人不得在中国境内自由开设工厂。

G. 外人在中国境内开设之教会、学校、医院、报馆及其他以慈善为名之机关，均须受中国法律之管理，不得国民政府之许可，不得借口此等名义购置地产。

二、经 济

A. 立即恢复铁路与轮船之交通，禁止军人扣留车辆船只和阻碍其通行之举动，如有不服禁止者，应由政府严惩之。

B. 商品应自由流通，特别是日用品，如米煤茶盐等类贸易，应逐渐由政府管理，以免奸商操纵居奇。

C. 废除厘金及农产附加税，停止预征钱粮，并减轻一般日用品之税收，增加奢侈税，并规定统一税则及每年一次的农业税。

D. 统一财政，取消苛捐杂税，禁止一切摊派及勒

索。

E. 由政府颁布工厂法、劳动保护法及商店法规，务使被雇于工商业之劳动人民的生活，得以改善。

F. 合并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为一国家银行，发行一种全国通行之纸币，私立银行概无发行纸币之权。

三、政 治

A. 巩固革命势力的联合，以促进中国的统一，反对任何分裂革命势力之企图。

B. 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组织乡民会议、市民会议、县民会议，以实现县市乡之完全自治，并组织省民会议，为省政府之监督机关。

C. 筹备召集国民会议，各省代表应由各省省民会议及人民团体选出。国民会议之目的，应解决免除外力侵略统一中国解除人民痛苦诸大端，反对蒋介石等利用国民会议为称孤道寡之御用机关。

D. 实行澄清吏治，剔除财政积弊，建立廉洁政府，使人民得安居乐业。

E.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组织革命团体之一切自由。

四、工 人

A. 规定产业工人的八小时工作制，手工工厂作场〔坊〕工人及店员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十一小时。童工女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

B. 规定最低〔最〕低限度工资，并应随时物价增加工资（在现在经济状况紊乱时期，应每季调查一次为增加工资之标准）。

C. 扫除封建式的劳资关系，建立契约式的劳资关系。

D. 切实救济失业工人（由政府拨款或收集慈善机关的款项，制定失业保险法等）。

E. 禁止虐待童工女工和使用童工女工作危险的工作。

F. 工厂须遵守政府的工厂法，改良工人卫生状况，同样的工作，须给以同样的工资。

G. 女工产前产后，应有六星期休息，照给工资。

H. 开除工会职员，须得工会同意，雇用工人应以工会会员为限。

I. 发展工人处〔补〕习育〔教〕育。

J. 工人有组织工会与罢工的自由及武装自卫权。

五、农 民

A. 农民有组织农会之自由及武装自卫权。

B. 一律减租百分之二十五，佃农交旬〔田〕租 额最高不得超过收获量百分之三十。

C. 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由原佃 耕种，纳租于政府。

D. 非地主收回自耕及农民自愿让佃，地主不得自由换佃。

E. 废止包田制及押金制。

F. 取消租额以外之各种苛例，如田鸡小粿等。

G. 禁止高利借贷，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

H. 由政府设立农民银行，以低利贷款于农民，并由政府扶互〔助〕农民，设立消费、生产、贩卖、信用等合作社。

1. 取消旧有民团团防局等机关，禁止任何方面式〔武〕装袭击农民。

六、军 人

为减轻革命军人痛苦起见，应由政府设法改良兵士生活，至少军饷不得拖欠。政府并应没收一致〔切〕反革命派之财产，以之建立设备较周之军人医院，优恤残废军

人，并教养其子女。退伍兵士，由政府给予土地。

七、教 育

确定教育经费，提倡平民教育及补习教育，增加小学教师薪金，减轻学生学费。

八、妇 女

禁止缠足、童养媳及买卖妇女等恶习，男女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一律平等。

根据《向导》第二〇一期刊印

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

——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

(一) 近年农民运动的进展，已表明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土地革命只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进展，需要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和工农武装，这一革命在中国目前已经受了一个挫折，其原因：(1)无产阶级的领导尚不强健，换言之，即无产阶级主观上的组织力尚不能领导工农小资产阶级这一革命联盟，(2)工农武装没有建设，(3)我们党动摇不定政策的错误，(4)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以及所谓革命军的阶级性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不能担任一新的历史的使命——土地革命，他们由限制工农运动而进到反对，屠杀工农的整个的反革命，这种叛变是历史的必然，证明了革命的深入，丝毫不足惊奇。我们党的责任只有坚决的与这种新的反革命奋斗，积聚一切革命势力，开展这一革命的新阶段——土地革命。

这是目前革命的客观情势，要求我们一个新的策路上的答复。

(二) 现在全国农民，整个的在新旧军阀之下喘嘘的活着，十几年新旧军阀战争的负担和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最大部分架在穷苦农民身上。在北方，苛捐苛税的繁重已经迫使大多数的农民抛弃土地，得不着生活；南方各省，农民的痛苦与北方无异，屡经奋斗所得的些许自由，又重新完全被剥削。无论南北大多数遭受过度的压迫的穷苦农民（佃农，半自耕农，雇农，失业农民以及大部分自耕农），他们已经觉悟起来，到处和他们的敌人奋斗，尤其在南方自李济琛唐生智之屠杀以来，农民之反抗奋斗更加英勇而坚决。同时新旧军阀因为他们彼此间的冲突和内部矛盾，不仅不能建设一个统一的反动政权，反而一个一个很迅速的正在继续崩溃下去。因此全国的革命潮流，表面上虽似一时的低落，实际却是继续往上涨。目前的反[反]动局面只是革命转到解决土地问题这一阶段时阶级冲突的反应。我们的党只有坚决的站在这个土地革命的立场，才能领导这一革命潮流前进。怎样开发土地革命的潮流呢？只有敏捷的认清客观情势，抓住每一个机会，提出适当的口号，领导广大的群众继续不断的争斗才能达到此目的。此时，“不缴苛捐苛税”，“不缴预征钱粮”，“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取消高利贷”，“没收大地主土豪劣绅及反革命的土地”，“没收祠堂庙宇等及一切公共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打倒贪官污吏”，

“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新旧军阀”，“实现革命民权”，“实现乡村农会政权”，“民选县政府”，“解除反革命的武装”，“恢复农民协会”，“实行农民武装”，“农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抗租抗税之自由”等口号，应当是开发土地革命的总的动力。

（三）在北方各省如直鲁晋豫等，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多数，他们苦于繁重的税捐日益破产，流为土匪或逃亡他省。在这里，我们要以自耕农、贫农、佃农、雇农为中心，联合一切农村穷苦民众及小地主结成斗争的联盟，反抗一切苛捐苛税，及预征钱粮，反抗一切战时的征发，实行减租“二五”，同时从这种斗争的发展进行夺取乡村政权，夺取武装以至于没收〔收〕豪绅大地主反革命及一切祠堂宇庙等土地无代价分给农民及地主〔1〕。

在南方湘鄂赣粤等省则佃农占多数，次之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受地主重租的剥削，同时自耕农小地主则受军阀税捐的剥削极为繁重。我们应立即于实行“二五”减租，反抗苛捐苛税预征钱粮的口号之下实行罢租罢税，一面借以揭破武汉南京政府减租减税的伪善面具，一面以佃农自耕农贫农为中心团结一切农村穷苦民众以至于小地主，进行严重的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夺取乡村政权武装于农民协会之下，以至于没收豪绅大地主反革命及一切祠堂庙宇的土地，以开展土地革命。这是我们现在应用全力宣传聚集农民群众力量而实现之的口号。

无论在什么地方反对超过年利百分之廿的高利贷的争斗应澈底进行，因为这是一般被压迫民众的共同要求。

(四) 土地革命只是一个过程，政权争斗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点。必有夺取政权的争斗，才能推翻封建地主的乡村统治，才能促进土地问题的爆发而且给他以解决的权力机关。在南方各省如广东湖南，虽则农民运动的主要特点已经进到没收大地主，其实农民如果没有取得政权，单纯的解决土地问题是不可能的。依湘粤的经验，这个分析是丝毫没有错的。

所谓政权的争斗，就是要建设农民的革命民权，换言之即农会政权之建设。在中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农民协会已经不是一种职业组织，而是以穷苦农民为主干的乡村的政治联盟，因为农民协会事实上不仅团结了一般农民(耕地的或失业的)，包括了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和小商人，就是一部分脱离大地主影响而对农会表同情之小地主也经联合在农民协会之内。所以农民协会在现时就是乡村中穷苦农民联合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政治联盟，——农会政权。这是乡村政权的一个正确的形式，要开始在各地实现起来。

(五) 根据两湖农民运动的经验，应当指出在农民协会组织上要特别注意的几点：

(1) 每一省农民运动要把我们的人力财力集中在政治军事或交通占重要的区域，以树立领导全省运动的巾

心基础，宁可为求这些区域的深入而暂缓扩大，万不可只求扩大而忘记了中心基础工作。

(2) 农民协会既团结了一般农民群众，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小商人，并且在一定条件之下，小地主也包括在内，则农协各级领导机关的成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大概小地主一般的不吸取在领导机关内，此外在区分执委内佃农，自耕贫农，失业农民至少各占五分之一，在区分执委内小学教师的当选是有必要的。

(3) 各级农协设立妇女部及青年部，乡村儿童运动及儿童团体完全受农协青年部之指挥，农妇概加入农协，不另组织女界团体。

(六) 农会政权的斗争和土地革命必需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但是现在所谓革命军实际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反动军官领导之下，到处屠杀农民，武装冲突已成为农民运动中极普通的现象，因此在现时阶段中农民运动确是最严重而紧迫的问题，每一个农民运动者如果没有十二分注意这个问题而谋给予正确的答复，便等于没有准备农民革命得到胜利。各地党部应当用种种方法使农民接受军事训练，获得武装，今指出几项大要的办法如左：

(1) 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阶级和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武装农民。

(2) 勇敢的有训练的农协会员有组织的投到军队中接受军事训练，并用种种方法时时进行破坏其组织夺取

其武装的工作。

(3) 对团防局保卫团等地主阶级的武装，在不能即刻夺取其武装时亦采用上项的办法。

(4) 农民武装现时没有以“农民自卫军”“农军”这类名义公开存在的可能，只能在下面三种形式之下存在：A. 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保卫团”“联庄会”之类，B. 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C. 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

(5) 在北方红枪会大刀会等武装团体，党要派适当同志打入其下层群众，领导他们为他们的利益而争斗以取得他们的信仰，让他们渐次脱离反动领袖成为革命的武装，万不可一开始便去攻击其反动领袖或提议改变其组织形式，破除迷信，这种机械的性急的手段是不能取得群众拥护的。同时如过去只知联络其领袖或借军事领袖的招牌去号召也是不能收效的。

在南方一般以“劫富济贫”为标语的会匪，在农民革命的高潮中又输入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同时他们的行动也能与农民协会接近甚至团结了在农协之下。本来他们多半是失业农民或将近破产的农民，他们的经济口号如“劫富济贫”就和“没收大地主土地”接近，他们自然是地主阶级的仇人，是城市反动军队的对敌者（在没有被他们的反动领袖拍卖以前），假使能领导他们上正确的革命的轨道，一定可以成为土地革命之有力的帮助者。但是他们的生活和环境是

异常之恶劣的，他们的领袖多半是带有候补军阀的性质。因此他们得不到正确的政治的领导，不上革命正轨为一定的目标而奋斗，而以“打家劫舍”为惯常生活，其行动与思想完全随其领袖为转移。因此我们要懂得会匪在农民革命中的积极作用，一面又要明白他们走向反动的可能性，我们的目的便是要增进他们革命性和革命训练，使之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之下而成为土地革命的有力的帮助者，其方法与上项大体相同。

（七）党在农民中的组织，过去是没有能够相当的尽其领导责任的，许多地虽然能有十万几十万的农民群众的争斗，但每每只是几个同志在那里活动，而〈不是〉党的组织在那里尽其领导职任，有些地方虽然有党的组织，但没有深入群〈众〉（都只在区协没有到了乡协），或者虽有组织而不起作用，或者便是农运负责同〈志忽〉视党的集体的领导而习于个人的活动，因此，我们党在农村中的一切工作〈每每〉感觉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2〕之概。党在平时既不能尽其组织上积极的责任，△△时，自然更不能希望其成为唯一的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如果本党的领导能△△确的在农民中建立起来，那末，第一，要使党的支部能够深入到乡农协，并△△正成为群众争斗的核心。第二，党对农民的指导必须经过党团（改正过去△△领袖的错误），党团要绝对服从党的指导。第三，各省党部的农民部要△△的建立起来，对一省的农民运动每次定出一月或两月的计划，督促并△△各级党部切实执

行。〔3〕

安 中 原

宗 容 明

一九二七·七·二〇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注 释

〔1〕原文如此，疑有误。

〔2〕典故出自《中庸》，原句是：“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3〕此段〈 〉内的补正，均据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出版的《陕西省委通讯》第六期。

中 央 对 于 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国民党领导机关，因为湖南农民运动，实际表现国民革命是要实现土地革命，而把一切封建势力的基础摧毁，于是发生恐慌与摇动，又因为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封锁武汉，唐生智军队的反动与二六军右倾，及冯玉祥的公开背叛武汉，于是完全屈服于反动势力——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军阀豪绅地主等。国民党的政策，始而动摇，对于许克祥不加惩罚，对于夏斗寅不加扑灭，既而嘉奖许克祥及夏斗寅所领导之豪绅土匪屠杀工农摧残党部及人民团体，并且政府自己亦下令解散党部及人民团体。最近受反动军队之要挟，国民党中央居然于七月十五日开常务委员会（C.P.未到）决定：（1）一月内召集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解决C.P.问题；（2）在未开会以前对于有违反国民党主义及政策，加以严励〔厉〕处罚；（3）派代表到莫京商议合作办法；（4）对于工农团体及共产党员之自由，用训令加以保护。但在国民党中央除孙夫人及于右任彭泽民陈友仁邓演达等数人外，余均实行

反动，宁愿做军阀的秘书，不愿做革命的群众领袖。汪精卫派之虚伪主义现已完全揭破。汪将国际向他提议国民党应组织两万 C.P.，三〔五〕万工农分子军队之电报〔1〕做一种煽动分家之材料及投降蒋介石唐生智之掩饰。国民政府一面下令保护工农及 C.P.，但反动军队一面摧残党部民众。中央对于此已发表宣言〔2〕，攻击武汉政府之反动，声明共产党参加政权之条件已消灭，命令谭苏〔3〕退出政府，但仍留在国民党内与一切革命分子团结奋斗。谭苏二同志已示威的退出国民政府。民众对此更形愤怒〔4〕，即将国际电报公布在中央日报上每日登载。我们已发表对此电报之答复。孙夫人发表宣言〔5〕不满于现中央之政策而避住上海，邓演达因不满汪等亦早已离汉他去，左派下层领袖除一部分受买外，现拟择一地点集会以求团结左派在党内反抗反动的与虚伪的领袖。中央对于现时武汉反动之策略如下：

1. 认武汉中央政府已完全反动，武汉不再为革命中心而为反革命中心。故我们应攻击其反动行为，披露其虚伪，不可再事拥护其罪恶。对国民政府固然不应再说拥护，对汪精卫亦须历数其改变三大政策曲解三民主义之罪恶。

2. 与国民政府合作之条件基础既已消灭，当然应立即召回国府内之党员。惟仍须留在国民党内工作，因为谁是真正信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者即国民党员，所以我们与其他革命分子是真正党员，汪精卫等已不是真正

信徒。我们要团结下层左派分子在〈国〉民党内组织在野反对派，反对中央的反动政策。

3. 我们现在要积极宣传反对武汉中央的反动政策，号召一切革命分子团结起来拥护孙夫人及邓演达的宣言。

4. 要根据答复《容共政策经过》之一文，宣传汪精卫等借该电报以文饰其反动。

5. 要根据现武汉中央之虚伪欺骗政策，指出武汉政府一方面颁布保护工农及“二五”减租，一方面任由军人摧残屠杀工农占据捣毁工会农会。在两湖应积极领导工农要求工农会的自由，立即惩办摧残工农占领工农会的武人，如此以揭破武汉政府之假面具而使工农认识其真面目。当政府不能接受民众要求时，总罢工与抗税是必要的。

6. 要积极领导两湖工人，反抗资本家之进攻及毁约，并应要求增加工资补偿因票价低落及物价增高之损失。武汉的失业工人在十万以上，我们要领导他们向政府要求工作及救济，并向资本家要求失业救济金，如此我们一方面能使他们成为反抗反动政府的一支有力军队，一方面可以使他们成〈为〉工会的拥护〈者〉，以反抗反动派之分裂工会政策。

7. 在国民政府领土内今年秋收时，积极做广大的减租抗租运动以鼓励农民悉起夺取乡村政权，实行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向土豪劣绅反攻，残忍〔忍〕〔的〕地推翻

其乡村政权而建立农会政权。

8. 领导城市贫苦居民做要求平低物价，纸票兑现，收回国库券之运动。

9. 我党要准备全国秘密工作，办法另详组织部通告。

安 中 原

七·二四

根据中央档案原稿刊印

注 释

- [1] 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卷《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文中所引“第二个文件”。
- [2] 指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
- [3] 谭平山、苏兆征。
- [4] 原文如此，疑有误。
- [5] 指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宋庆龄《为抗议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

中国共产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 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1]

国民党革命同志鉴：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你们这封信，是在国民党最严重的生死存亡的危急时期，革命同志领袖对于革命的主义政策实行叛变，居然压迫工农运动与共产党分裂，这种叛变可以使国民党变成反动派工具，和反革命军人的傀儡。四个月以前国民党的中央指导机关，还有勇气力量和蒋介石破裂，不使其反动的军事独裁得以摧残党权，那时，国民党中央还想和革命的工农共同前进。现在呢，背叛国民党的领袖，已经对于摧残工农运动，压迫共产党，投降封建势力，取消民众革命胜利等类行动，公开的颂扬和赞助了。

武汉政府本来是反对蒋介石之反动的革命斗争的中心，如今却是在反动军人及其政治领袖的淫威之下，变成军阀政府；中国之内，这种军阀结合的地域本有许多，现在的武汉也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武汉政府现和

蒋介石等类革命之公敌，实际上毫无差异，每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首先便是工农兵士以及一般忠实党员，凡愿努力继续孙中山先生四十年来伟大的奋斗事业，立志为国家民族谋解放，而牺牲的战士，都应当详细的明白：几千几万的中国同胞已经在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革命之中，英勇的牺牲了，他们誓死而争斗的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却发生如此现象？为什么领袖之中发生叛变的行动？以后革命的党员对于国民党的新任务是什么？

现在的领袖对于国民党的革命政策，实行怪异的篡改，却想借口于六月间发现的所谓“共产党阴谋破坏国民党”之秘密文件，来解释他们自己篡改孙中山先生政策的理由。但是谁亦不能欺骗的，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可以知道这是企图懦怯无耻的巧自文饰，国民党指导机关对于国民党主义政策之叛变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是很远的，决不是单单因为那所谓秘密文件而发生的，国民党现时领袖之叛变，实际是因为他们甘心代表封建资产阶级，以及市侩的小资产阶级，这些市侩豪绅的代表，遇见革命的决死争斗，正是开始的时候，革命的劳动民众，正在奋起与封建势力搏战——他们却怕丧失了自己的政权，对于民众运动的广大发展异常惊惶，因此宁可背叛革命而与封建势力妥协，这和四个月前蒋介石之背叛革命是一样的；如今武汉的领袖实际上是投降了蒋介石！

国民党现时领袖的叛变，断非是偶然的，和出人意料的事变。这种叛变实在反映中国革命中间有许多种资

产阶级成分的骑墙派，而实际上终究是反动的态度——这些资产阶级经过买办阶级而与帝国主义连络，经过地产制度而与封建势力勾结，经过军官领袖而与军阀制度相勾连。因为他们剥削工农，所以必须反对工农运动，因此种种，他们不能执行真正的民众革命，此等社会阶级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伪国民党领袖和民众是相隔离的。所以只想用民众运动以满足国内几部分资产阶级的私利，而使各种劳动阶级仍旧处于无权利穷困不堪的地位，他们只想利用群众做自己的工具，想踏着革命的民众兵士和党员的尸骨，去造成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们不愿意劳动民众得有真正的解放，和真正的民权，他们宁可重新和世界帝国主义妥协，和封建豪绅结合，只要能镇压中国被压迫的各阶级之争斗，而使之俯首帖耳的服从自己，他们甚至于已经不能够继续单纯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因为要有反帝国主义的战争，非有广大的群众不可，而他们——例如蒋介石、唐生智，宁可去请日本顾问，却不肯依工农运动的力量，以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些情形，就足以解释国民党领袖以前动摇犹豫及现在决然叛变。

三月二十日事变是国民运动中封建资产阶级派第一次攫取国民党党权的尝试，那时伪左派的领袖就不能组织革命分子及一切力量以抗御此种反动，却任令反动势力笼罩广东，这种左派遁逃国外，不战而走。其意若曰：“民众自己将会对付新军阀，我辈但须坐待成功，归

来即可高居领袖地位”。三月二十日之后八个月到今年一月间，蒋介石又想用迁都南昌的手段实行政变，那时的伪左派领袖又不能立刻勇敢地决定号召民众起来和他奋斗，他们动摇犹豫迟徊不决者整整的两个月，蒋介石却正好利用这两个月的工夫，组织团结反动的势力，一直弄到屠杀上海工人而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伪左派的领袖，不肯决然的根据工农群众运动的力量和蒋介石奋斗，他们是在研究军事投机的方法，直到看见可以依赖唐生智、谭延闿等新军阀的偶然结合之势力，方才与蒋介石破裂，同时这种依赖唐生智、谭延闿的计划对于伪左派是可以预藏着一种反对工农民众的武器，以备工农民众真正的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积极奋斗之时，他们可以有恃而无恐，可以转过来便压迫民众。因汪精卫等之动摇犹疑，而蒋介石得以镇压东南各省的工农运动，与李济琛等相勾结，以实行白色恐怖政策。汪精卫等类的伪左派领袖到现在已经暴露自己的正面目了，然他们时常以空口应承，说要民众，说为民众而奋斗以及其他种种革命的空谈，巧自文饰，以掩藏其骑墙政策及其与蒋介石奋斗之不澈底。今年三月间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面上的决议案是很革命的，但是伪左派的革命领袖不肯实行这些决议案，明明规定要实行土地改革，劳动立法，平民自治等等，然而等到群众真正起来跟着第三次全体会议所提出来的口号而勇敢奋斗的时候，这些所谓左派领袖却不仅不肯起来为民众运动之领袖，连同自己所有

的政治法律的权力，以助工农运动，铲除封建余孽，反而仇视并破坏这些民众运动。今年四月间国民党中央已经拒绝实行土地革命，等到湖南被压迫的农民与封建势力决死抗争之时，伪左派领袖便动辄以“过火”咒骂农民运动，说农民协会尽属流氓土匪，不但不协助农民之艰苦的争斗，并且奖励反动军官压迫农民。城市中工人店员斗争，也遇到他们的仇视。他们不但不惩罚阴谋破坏金融经济实行反革命的买办奸商以及蒋介石的奸细，反而在工人店员努力赞助革命而与这些反动买办奋斗的时候，迭次的对于工友店员施以抑制，放纵反革命的买办豪绅。劳动法的命运，也和乡村自治条例及土地法令一样，始终不得公布；即许有所谓保护工农的命令，也始终不能见诸实行。任令贪官污吏军事长官摧残民众，买办奸商进攻工人。总之国民党中央第三次会议虽有许多革命的决议案，而事实上国民党领袖并未施行分毫政治法律的权力而解决工农小商人的痛苦，一面反而只以国民政府的政治法律的权力压迫工农。当这个时候，有些所谓左派领袖如顾孟余等，已经和反动的领袖（刘佐龙）阴谋举行反革命的暴乱，准备驱杀共产党员及国民党的革命分子，密藏军火于汉口日租界，并在军官中实行反革命的宣传。后来杨森叛乱，于学忠等扰乱湖北的西北境，夏斗寅进逼武昌城，许克祥屠杀湖南工农，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阴谋推翻国民政府，朱培德驱逐共产党员及国民党革命同志出江西——此等反革命举动，陆

续继起，不可胜数，而国民党中央不但不征调一切力量以裁制反革命军人，却迭发反对工农运动的训令，命令，宣言，文告以助长新军阀的反动，文饰他们的反革命。这种政策一直继续到现在——七月中旬。实际上这些伪左派领袖，放任夏斗寅的叛军，使能巩固其势力而摧残十余县的工农团体，他们承认朱培德“停止”江西的工农运动，他们自己默认许克祥的长沙政变，便能畅心如意的屠杀湖南人民，摧残工农运动，他们自己下令解散湖北好多县的农民协会。这些伪左派领袖不但不要民众，并且不要一切革命党部及党员，不论其为共产党与否？反动军人当然不但反对工农，并且反对民权主义的国民党的各级党部，江西各县党部曾被迫而停止工作，湖南省党部县党部都被解散。国民党中央对于这种事件，不但不反对，而且自己也帮着实行（如解散黄冈等县党部），这些领袖既摧残工农，又摧残自己的党部及党员群众岂非背叛国民党及孙中山先生。六月间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徐州会议的时候，冯玉祥公开的站到蒋介石方面去了，等到这个时候，国民党领袖必须决定选择一条道路！或者同着革命的民众前进，或者同着反革命的军人反动。这时候，冯玉祥对国民政府提出反动要求，唐生智赴湘后，亦来两电，要求“改组”工农运动，实际上便是要求镇压工农运动，并且要求排斥共产党（如何健对于军队的排共令）。这些领袖，在群众运动有力量时候，放纵反动军人去压迫他，到了群众运动已受历次的摧残削弱之后，当然更加要站到反

动军人方面去，因此，这些国民党的领袖，完全接受反动军人之排斥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等新要求。

这些情形本是最近六月底至七月半武汉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篡改国民党的革命政策的真相，而决非借口于所谓共产党的秘密决议案所能掩饰的。最近国民党领袖在冯玉祥、唐生智系的反动军官淫威之下最后的决定压迫工农运动，本此目的而与共产党破裂。现在他们要掩饰这种反动政策，反而归罪于共产党对国民党之不忠实。然而，譬如孙科，他在五月间对美国新闻记者谈话，就说：国民党要共产党员当国民政府的部长完全是为着容易对付工农运动起见，汪精卫等亦是如此见解。这算是对于共产党的忠实态度吗？这实在是要利用共产党做压迫工农运动的工具，共产党决不肯被人如此利用，国民党的这些领袖，都正因为共产党不肯帮助他们压迫工农运动，而宁可与共产党员破裂，共产党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工农运动政策是不肯背叛的。国民党领袖既得政权，实际上早已有了实行这种政策的可能，应当尽力进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标语及其他革命的口号。事实上，弄成了国民党领袖不肯自上而下进行这些政策和口号，却任令民众是孙中山先生主义之最好的实行家，比实际上背叛孙中山先生政策之领袖高明万倍，国民党领袖既有政权，他们早有实行改组军队的可能，使军队真能拥护民众利益。然而他们不但不进行这种“使军队成为民众武力”的政策，不但不遵循孙中山先生向来认

为军阀并非革命可靠的同盟之遗训；反而痛骂共产党要增加工农分子于军队之中，并肃清背叛革命的军官，为一种罪恶。国民党的这些领袖们，既然不能了解这种革命的根本职任，既然不能代表国民群众的这种迫切的希望和要求，他们就不配僭称国民党的领袖。他们是篡窃权位，是镇压国民党革命意志的政客吧了。现在的时候，既然国民党的领袖将国民党拱手让之于反动将领专恣的掌握之中，那末要求国民党组织的民权化，使其多数党员推举革命的领袖，——实在是最近理最切要的要求。

国民党指导机关之现状是如此，国民党中央已成反动军官掌股上之玩物。犹豫徘徊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政策，其结果必然使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变成反动的实行者，参与反动的行为。武汉领域之内，如今也和蒋介石的领域一样，工农运动都受很大的压迫。无论国民党中央发表许多虚假的欺人的空论，决不能掩盖许多铁一般的事实，武汉已有二十五个工会被封，湖北许多县的农民协会已经捣毁，湖南的工农运动已经被摧残，江西也曾被暂时“停止”，国民党中央已经允许唐生智及其他将领任意驱逐共产党，国民党中央现时的政策显然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进行工农政策而实行压迫工农运动，不联合共产党而与共产党破裂，不联俄而在机关报上宣传反俄，汪精卫所领导的一切领袖也放弃了污秽了国民党的旗帜，背叛中山先生的遗训。

即使现在为满足唐生智蒋介石的私战，对于民众这

种战争丝毫都没有益处，武汉的国民党中央现在已经变成了政客的俱乐部。他们实际上已经没有自称国民党领袖的资格，他们已是革命的国民党的叛徒，如果国民党不能脱离这种指导机关，这是国民党的亡党。国民党的一切同志都应当和孙夫人、邓演达及其他革命领袖一样的明白！

如今只有决然的完全和背叛革命与党的少数领袖决裂，而团结广大国民党员群众于革命的政纲之下才能救党，使国民党的旗帜不要变成反动的旗帜。革命的国民党的政纲是什么呢？

（一）首先便要进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政纲，以其三大政策为方法，反对所谓一民主义二民主义的叛徒，反对实际上抛弃三大政策而空言三民主义的政客，实行扶助工农，联共，联俄政策。

（二）反对背叛革命的汪精卫一派的人——他们是甘心做反动将领的工具了。努力建立国民党的新中心，便能担当得起国民党的光荣的旗帜——孙中山先生的旗帜。

（三）决然的推翻封建制度的壁垒及其一切余孽。最主要的封建壁垒就是现在的土地制度——地主豪绅军阀贪官污吏重利盘剥者对于农民的剥削掠夺制度，只有实行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才能肃清封建制度的关系，要实行这种口号只有农民自己起来力争土地，从豪绅手中夺回政权。

(四) 消灭城市工人,手工(工)人,店员的牛马奴隶们的劳动条件。只有满足他们要求方能造成解放劳动民众的前提,要工农组织之完全自由,对于工农运动予以切实赞助。

(五) 力争真正民主政权的建立,便能代表中国广大的群众及劳动群众。推翻压迫剥削民众背叛革命之官僚军阀的政权。

(六) 取消一切军阀性的军队,造成真正人民的军队,由革命的将校指挥而不用封建性的军阀。实行武装工农。

(七) 无妥协的实行反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与苏联亲密的联盟,与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及工人阶级结合巩固的联合战线。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力争中国的解放与统一,反对买办阶级的影响及与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

(八) 改良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力争八小时工作制的实行及工资的增加,实行救济失业工人,要恢复一切工农组织及工会的权利——这是几年来革命运动胜利的成绩。

(九) 力争一般革命群众工农团体的一切政治自由,拥护真正革命的民权的国民党,反对背叛革命的篡窃国民党旗帜的假国民党。

国民革命的胜利,真正民众的胜利,推翻军阀统治,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制度,都只有站在这种纯

粹的遵照中山先生学说的政纲之上方有可能，只有实行这种政纲方能辟开发展革命的道路，使大多数中国人民得到利益而不仅为各种封建资产阶级中少数高等华人博取权利。孙中山先生的真正信徒，真正革命的党人，应当团结起来开始为这个政纲而奋斗。

我们共产党员决心和这种中山先生的真正忠实的信徒，共同工作，同生同死决一死战。我们决不服从现在这种伪国民党中央之开除共产党分子的决议，因为他们已经无权僭称国民党的指导机关，他们已经违背国民党的主义政纲及中山先生的遗训。

一切国民党的革命同盟，都应当团结起来，努力救党，自然不要放弃任何公开的可能，但是要准备着这些伪国民党领袖会竭力追逐国民党的革命同志使丧失一切自由，而处于秘密地位。所以要准备着在无论何等环境无论何等条件之下，我们大家都应当继续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伟业，努力为解放中国广大的劳动民众而奋斗，而牺牲，力求革命之最后胜利，毋使国党竟亡于封建资产阶级反动联盟之手！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根据《武汉政府反动后中国
共产党之政治主张》刊印

注 释

[1] 原件未标明时间。据中共八七紧急会议文件《小引》，本文时间是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中央致前委信*

——关于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及特别委员会问题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1〕}

前委^{〔2〕}：

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斗争。因此这一暴动，应当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在此原则之下，中央曾训令湘粤赣鄂四省立即进行，响应南昌暴动：一方索〔牵〕制破坏压迫“南昌”之敌，一方开始秋收斗争。同时决定由前敌分兵一团或二团交由郭亮处，希率领到湘南占据郴宜汝一带，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受前方革命委员会的指挥，并供给相当的弹药。党内由泽东郭亮夏希〔曦〕卓宣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以泽东为书记，在湘省委指导之下主持之，同时与前委发生关系。除派泽东克日动身往湘南工作。望兄处即遵照此信抽调兵力，交郭亮即日率领前往目的地为要。

中 原

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注 释

- 〔1〕原件日期字迹不清（既象“一日”，又象“八日”）。本文署名中原，系一九二七年六月至八月四日以前中共中央代号。据此判定，本文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
- 〔2〕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根据中央决定，中共前敌委员会在南昌成立，成员为：周恩来（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

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 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¹⁾

(一) 根据中央最近农民斗争之议决案, 决定这个行动大纲, 准备在湘粤鄂赣四省实现。

(二) 中国革民[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 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在这里党的政策需要新的变更, 革命的社会势力需要新的聚集和训练。现时反动的统治始终没有稳定, 农民群众满心期望秋收胜利, 因为新遭了挫折, 正在寻找他们新的奋斗的方略, “秋收暴动” 是对于这个客观情势的适当的答案⁽²⁾。这次抗租抗税的暴动是土地革命急剧发展之新阶段, 他至少要动摇反动的新旧军阀的政权, 在湘粤则有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的可能的前途。

(三) 党过去对农民革命有一错误政策, 就是抑制农民保护小地主利益的政策; 具体的表现便是强农民建设与小地主联盟的乡村自治, 及五次大会后对于国民党种

种限制农民革命的训令不加反抗，反在实际上指令下级党部执行国民党之反动训令。这个错误是由[是]党对小资产阶级的整个政策来的，现在国际第八次扩大会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联合小资产阶级，这一个新的指示证明过去湖南农民实行农会专政反对乡村自治是对的，对小地主不可避免的打击所谓“幼稚”“过火”的现象不足害怕而应当积极的去领导的。明白了这个才能不自陷于矛盾的狭巷中，而可以勇往直前的领导秋收的暴动。

（四）暴动的战略：

（1）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等）于其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

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于可能的范围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贫民（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对各地的暴动及革命的政权尽可能的联络，向反革命势力进攻。

（2）由农会通告，对祠堂，庙宇，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之大地主一律抗租不缴，对五十亩以下之地主实行减租，其租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以佃七东三为大致标准。

（3）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歼灭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并没收其财产。

（4）实行对反动政府拒绝交纳任何税捐，并实行对

于反革命势力的经济封锁如阻禁拒卖军米等。

(5) 自耕农土地不没收，自耕农及已取得大地主田地之佃农应对其革命政权（农会）交纳田税，税额由农民协会决定之。

(6) 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定土地之分配。

兹将四省农民秋收暴动的每省具体工作抄一份于下：

鄂：湖北暴动大纲〔3〕政治上给现统治者一个扰乱，使其不能稳定，牵制其对江西压迫；经济上实行四抗（租，税，捐，粮）。

其他可根据大纲拟一具体的计画。

湘：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画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权〉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

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东）。

赣：1.马上夺取乡县政权；2.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3.尽量杀戮土豪劣绅与反革命派；4.积极参加革命军对反革命派的军事战争。

粤：革命军所占地方，原则与江西相同，军力暂未达到地方即起来暴动响应，夺取乡村政权，建设农会威力并实行土地革命政纲；如有可能立即夺取县政权，因

此引导革命政权夺取全省。

安 中 原

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稿刊印

注 释

- 〔1〕 本文原件未标明年月，此年月是编者判定的。
- 〔2〕 有的党史资料书中收入的本文，此后还有：“这次暴动的意义虽然不能认为就是土地革命之成功，但至少是土地革命的发动。暴动在经济上难有很大的胜利，但必然的可以使农村革命的势力得到新的聚集和训练，可以促进农民夺取武装和政权的决心，发达其根本消灭土地私有制的意识，同时党内对于土地革命的认识亦将得到进一步的明确，这是今年秋收暴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这段话原件已经删掉。
- 〔3〕 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的《总同盟政治罢工后湖北党的策略》，这个文件是由罗亦农提出的。其中关于农民秋收暴动的内容为：“至于乡村中的工作，党为领导农民响应武汉的工人及革命的南昌的军事暴动，必须派大批同志至乡村中工作，执行下列各项任务，同时即是土地革命的开始：一、抗捐抗税；二、断绝武汉政府粮食的接济；三、极端破坏乡村经济；四、杀戮土豪劣绅，消灭他们的政权，发展广大的农民运动；五、武装农民并集中农民武装于某几区域，即开始流寇式的革命；六、破坏湘鄂赣交通；七、联络会匪；八、提倡农民协会政权。为执行上列

责任，暂以鄂南、鄂东、鄂西北襄东一带武汉近郊为最重要区。”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小 引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

自七月初旬武汉国民政府公开的反动以来，本党中央政治局已转入秘密状态而组织上有所改变，即派定五人为常务委员会，代表中央政治局职权，并决定派独秀同志赴莫斯科商定此后之总政策。当时即先接受国际电令，宣言本党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号召国民党党员群众及一般民众起来反对背叛革命的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即七月十三日的中国共产党对政局宣言。这一关键已是本党改变政策之开始。不久，国际方面又有电令来召集全党紧急的正式会议，以审查旧政策及旧指导机关，而决定新的政策。但是，那时正是七月底的时候，时局紧急，因此，先由常委发出七月廿九日的中国共产党告国民党同志书，同时设法召集附近各省代表准备开会。可是也因为时局紧张，交通异常不便，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召集，也不能到会；等到八月七日，到会的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之新书记中夏同志。不得已只能尽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青年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

同志开会。这一会议，到者有中央委员十二人，候补委员三人，青年团中央委员五人，地方代表二人。国际新代表出席报告召集这次会议的意义。——虽因人数不足不能作全党正式的中央委员全体紧急会议，但是这八七会议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议事日程如下：

- 一、国际代表报告，
- 二、紧急会议告全党同志书，
- 三、党的新任务报告——分四项：
 - A. 追认告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中的左派 国民党政纲，
 - B. 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
 - C. 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
 - D. 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
- 四、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

会议结果，通过上述各议案，兹印布如下，并选举临时政治局正式委员九人，候补七人〔1〕。

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八月十一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出版的
《中央通讯》第一期刊印

注 释

〔1〕正式委员九人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七人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

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鉴：

（一）绪 言

同志们！

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现在致书于全体同志的时候，正是很困难危险的时期——伟大的中国革命遇见了极艰巨的折磨。今年四月间蒋介石在上海发端的反革命政策，如今在武汉政府领域之内继续发展而完成。三个月以前，武汉政府曾经宣布蒋介石是革命叛徒，现在呢！他自己也学了蒋介石的榜样。反革命如今冒国民党之名，甚至于冒“左派”国民党之名，来摧残工农运动。在武汉领域之内如蒋介石之治下是一样的，他们所用的方法也是差不多的，农民协会被解散被禁止，几百几千的农民运动的指导同志被武汉政府的将领所残杀。农民运动所及的区域，无不受反革命的清乡所蹂躏。工人亦是到处受摧残，他们的武装被解除，他们的工会日益受

着压迫或占领，他们的指导者亦被残杀，工会机关之中到处只见军阀豪绅指派来的走狗，压迫受得尤其严重的便是我们的党。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从反革命的军阀一直到被革命吓慌了的小资产阶级。然而他们现在不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蒋介石所领导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为人民之公敌，却称共产党为人民之公敌。国民党现在的领袖汪精卫等，卑劣无耻的叛背了国民党的主义及其习性，接受军阀的命令而与共产党破裂。国民党中央驱逐军队中的共产党党员，我们的党不得不秘密起来，因为反革命派要想完全消灭我们，反革命暂时的得着了胜利，正拿着武装来对付劳动阶级。如果现在所有的工会还没有捣毁净尽，如果工〈农〉运动的革命的指导者还没有完全被杀，如果政府还在宣言保护工农团体，那末，这不过是因为反革命的军阀和国民党的领袖还没有完全集中团聚自己的力量。

我们要知道，如果群众运动不能够起来坚决的反抗，那末，最近期间白色恐怖决不会灭〔减〕弱，只有越发厉害。我们对于国民政府的“尊重”工农，没有丝毫的幻想！这所谓国民政府是什么？他从革命的政权机关变成了资产阶级之反动的执行机关，变成了军阀的工具。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如汪精卫之类，见着革命发展便吓慌了，宁可背叛国民党的主义，完全走进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对于资产阶级的反动派，现时还有些用处，因为革命运动的力量没有完全

镇压下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利用国民党的这些叛徒，好暂时冒充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的招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其实已经背叛了出卖了革命的国民党之光荣的旗帜。

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汪精卫，孙科等大多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既已走到反动方面去，自然不是国民党的代表和领袖，所以一切工人农民都应当知道，最近期间白色恐怖要在汪精卫等叛徒的旗帜之下而实行，而且要一天天的厉害起来，只有广大的劳动群众积极起来反抗，实行革命的斗争，才能夺去篡窃国民党旗帜以实行白色恐怖的叛徒之武器，而扑灭反革命。

现在的情势是反革命派屠杀工农群众，压迫群众运动，捣乱工农团体，所以中央委员会首先要告诉你们的，便是你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中国共产党从群众运动里发展成了伟大的力量，在革命斗争的时期，他的作用是绝对的伟大的，现在我们党的作用是更加要大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历次决议，都说党的政策及党的指导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过去中国革命的进程，大半与本党政策有关系的。将来革命的命运在形势变更之后，更加要靠我们党的政策正确，要看我们党对于形势变更之后的职任之履行如何而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最近决议，指出我们党的指导做了极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

全党积极的自己批评这些错误而纠正他们。这些错误并不是指各个的偶然的错误而说的，而是说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抛弃这一机会主义的方针，纠正过去的错误，那就不能正确的规定将来的工作，自然更不能进行革命的斗争，以适应当前的艰巨职任。要纠正错误的方针，必须指明是怎样错误的。应当要使各个党员都得着过去的教训。我们党如果不能纠正指导机关的错误，那就一步也不能向革命的道路前进。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怕公开的承认自己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深信本党的生命与力量决不致于怕披露和批评我们的疏忽和缺点，甚至于披露之于我们阶级仇敌之前也无所怕。等共产党的敌人幸灾乐祸好了！让他们去乱叫共产党崩坏好了！这种攻击，是吓不了我们的，我们胜过敌人的地方，正在于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的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

我们党有这种伟大的力量，不但因为我们党的阶级性使然，而且因为有群众之奋斗，无产阶级及贫苦农民

群众之奋斗作保证——这些群众是我们党的基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上说：“中国共产党英勇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广大的党员群众，艰苦牺牲的在社会下层工农城市贫民之中，实行真正革命的斗争。”我们党的指导机关，却有机会主义的错误，经常的摇动和犹豫，在紧急关头总是没有坚决行动的决心，假的非共产主义的不革命的理论，还有更加不革命的行为，这些情形，不但绝对的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相矛盾，并且和我们党员群众工作相反。

譬如说：上海，广东，湖南本党普通党员群众都有过伟大的奋斗，屡次光荣的总同盟罢工，上海三次工人暴动——最后今年三月的一次得着了胜利。这些都是光荣的历史，不但在中国史上有无上的光荣，而且在世界革命运动史上也是如此。这一页光荣的历史，是上海共产党，——无产阶级所写的。

上海无产阶级在共产党员指导之下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性，革命性，阶级意识的坚决和政治意识的高度，甚至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所不能超越的——那些国里的工人革命运动，差不多都有了几十百年的历史呢。中国共产党可以以上海的共产党群众自豪了，上海工人在蒋介石屠杀之后，虽然受着闻所未闻的压迫，许多最好的指导者（如陈延年，赵世炎及其他同志）被杀，一切运动都压迫到非常秘密的地位，然而仍旧继续着斗争，表现不可摧折的伟大力量。广东的共产党员，领导了铁路工人

的暴动以反抗李济琛，领导农民群众的武装暴动，能在五县地方继续抗争至两月之久，真正象勇敢坚决牺牲的革命党人，奋斗到最后一点一滴的可能，——这些共产党员真可以做革命形势中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榜样。湖南同志领导农民运动的斗争，亦是这样光荣的中国历史的一页。农民协会实际上的政权，是共产党员领导而农民协会所创造的，自动没收大地主，分配土地于乡村贫民，解除豪绅团防的武装，创立武装的农民军，严厉的镇压封建的反动分子，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规模，而且会和国民党下层群众结合革命的联盟——而不是机会主义的联盟——最后，组织农民暴动以反抗长沙的反动政权，（这次暴动如果不是中央党部机关在紧急的关头采取可耻的退让政策，无疑的是胜利的。）——这都是湖南共产党员的努力成绩。这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其他各省的共产党员群众，亦是如此。党员群众的行动真正是英勇澈底的革命斗争。这种斗争要忍受很大的牺牲，但是我们党的群众没有怕牺牲的。中国革命之中，他们的奋斗，使我们的党取得伟大的光荣和作用。党的群众是我们的力量之源泉，有他们的帮助，党的指导机关之错误无论如何大，都是很容易纠正的。固然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摇动犹豫，没有坚决行动的能力，这对于中国民众的革命斗争和共产主义的运动大有损失，然而本党有上海，广东，湖南的经验，决不会因指导机关的错误而陷于败亡。本党一定有这

个力量，保证今后有正确的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指导。

（二）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党的指导有机会主义的错误，其基础在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不了解各阶级在每一革命阶段里的作用，以及共产党的作用，正确些说，是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布尔塞维克的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党的指导每当解决这些革命之根本问题的时候，时常在理论上实践上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根本原则及列宁对中国革命的估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在〕这些根本问题上陷于最庸俗的机会主义。

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而有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趋势。中国革命尚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时，他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封建制度之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的遗毒。现时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是工人阶级要求解除闻所未闻的压迫制度与奴隶制度之争斗，这种奴隶制度正是帝国主义依据中国封建关系以建立其统治之基础。

如果以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及社会革命相对立，那么，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简直不是布尔塞维克的。共产国际向来反对这一类的观点，认为是最坏的一种机会主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案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的反对以国民革命的职任与阶级斗争的职任相对立的观点，这一类的观点，在西欧各国的极左派及社会民主派之中都有的，其实这是抛弃中国民权革命中之无产阶级领导权，抛弃领导权而争所谓‘劳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实际上要使无产阶级变成‘民生〔主〕营垒’的尾巴”。中国革命中各种社会阶级的作用是怎样呢？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极大部分是依据于中国经济的落后，依据于农村中的封建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及政治制度中的封建制度遗毒，是外国资本无限的剥削中国民众之最好的依据。帝国主义维持着地主豪绅及封建式的行政机关，封建阶级又在维持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所以非常之明显的是：反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同时就在以全力反对地主豪绅的政权。封建制度破坏，就是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加以严重的致命的打击；而要破坏这一封建制度，又只有用剧烈的土地革命的方法。农民反对地主豪绅及强盗式的政府机关之阶级斗争，是民族的解放运〔动〕之必要条件和不可分离的成份。土地革命愈坚决愈剧烈，农民群众加入斗争的愈多，歼灭地主豪绅的统治愈严厉——则国民运动的规模愈广大，国民运动的胜利愈巩固。

从别一方而观查，外国资本在经济上勾结一部分城市资产阶级（买办）。这一部分资产阶级利于帝国主义

对中国的压迫之保存与扩大。

至于所谓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呢？那么，他们是受外国资本的竞争而为其所排挤的一部分中国资本，因此，他〈们〉被逼对于帝国主义实行经济斗争。

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曾经参加中国的革命，甚至于有一时期曾经做这一运动的领袖。然而迅速发展的工人阶级及农民群众运动，提出革命的阶级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又大大的发展，这些情形，使民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的战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政策上的变改，以蒋介石在上海的屠杀而著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今年四月间既受革命运动伟大的规模之恐吓，就要去和帝国主义妥协，他如今和买办阶级，封建大地主相象，将要成为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统治之支柱。正因为这种情形，更使无产阶级的斗争——力争自己真正的阶级要求的斗争，变成民族解放革命所必须的条件。

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免的使他与帝国主义接触而引起最坚决的冲突，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足以掘断帝国主义经济力量之根源。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程度之低，真是闻所未闻，这种情形保证了外国资本在中国取得非常之高的利润。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可以掘断帝国主义压迫所依据的支柱。中国工人阶级，则因客观状况的关系，是力争中国民族解决〔放〕之最澈底最坚决最不妥协的阶级。此种情形使

中国无产阶级应得民族解放运动中之领导权。可是中国无产阶级要履行自己解放中国民族的使命，只有随着力争自己的阶级要求之争斗的发展，就是对外国资本及中国资产阶级斗争的开展而日益实现这个使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议决案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承认中国的民族解放革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已经‘完了’，仿佛在上海屠杀之后已经开始了别一种工农的阶级革命——这是不对的”。中国革命现时的危机及各种社会阶级力量离合的现势，表明并且证明：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斗争之中；澈底的民族解放斗争，不但不会和工农群众〈斗争〉的开展，或土地革命的要求相冲突，而且能直接发展广大的下层民众的群众运动。

谁要民族解放革命得到胜利，谁要中国完全脱离外国的压迫，他便应当促进并扩大激厉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他便应当赞助社会斗争，使之进于全体平民革命之新方式。

至于小资产阶级，则除去少数的反动成份，与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相勾结的成份，其余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亦因自己客观状况的关系都利于革命的阶级运动之胜利，利于城市工人乡村农民之胜利，自然更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然而小资产阶级必然

是动摇犹豫，徘徊于互相斗争的阶级及革命与反革命之间。这种犹豫与动摇，往往对于革命斗争的出路有举足轻重的力量。

但是小资产阶级动摇犹豫的程度，大部分由于革命阶级运动的力量而决定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愈坚决愈剧烈，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愈革命，则小资产阶级愈能转而左倾，愈能站到革命战线上来，反之，如果革命的阶级及共产党自己也表现动摇不澈底不坚定，则小资产阶级愈加倾向于有产阶级的营垒，反革命的营垒。无产阶级的先锋，除自己的坚定与果决外，没有更真实的领导小资产阶级的方法。

列宁屡次的说过：“谁要帮助摇动犹豫的人，他自己便应当开始就不摇动不犹豫”。我们应当记着：社会之中既然发生了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小资产阶级便无论如何不能有自己的独立的政策；他或者和资产阶级同道，或者和无产阶级同道。无产阶级应当明了小资产阶级的摇动是不可免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自己应有坚决的政策，去以革命的方法解决当前的问题。

凡此一切，都是对于中国革命中各种动力的估量，足以确定共产党的革命的策略的。然而我们党的指导，在理论上，尤其是实际上，刚刚对于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力量之估量，有一个相反的观点。这就预定了党的指导之机会主义的动摇犹豫政策。中央完全象孟塞维克派

似的，将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相对立，彷彿认为阶级斗争的开展，足以破坏国民革命，而要想叫全党及工人阶级农民都自己来限制阶级的要求，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地主不用革命的斗争方法。中央在六月十九日的发给上海的信，对于上海斗争的指令说：“中国革命主要特性之一，是反帝国主义。……现在几月忽略反帝工作”。彷彿专注意于进攻封建制度，而得不到好的结果。中央骂共产党员走得太远了，要叫本党所领导的革命的农民往后退。这一指令里又说：“一方面反帝国主义运动消沉下去，别方面工农运动发展到最高限度，至少小资产阶级看来是如此。单调的去武装工农没收土地，高叫非资本主义前途等等口号，使小资产阶级怀疑 C.P. 快要革国民党的命，要进行阶级革命，而不是国民革命”。这样，中央那时认为阶级斗争是一事，国民革命又是一事。这一通信里还说：“小资产阶级看不见没收土地是国民革命的必要前提，以为只有共产党要没收土地，实行十月革命似的革命，以增加工农的力量。因此，小资产阶级不能不提出这种问题，不能不要求限制工农运动，甚至于与共产党破裂。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能不能完全接受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呢？如果这样，那就是取消我们的力量，抛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投降蒋介石。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前途。然而能否硬要没收土地，武装工农呢？这个结果，就要立刻破裂而消灭革命的根据地。如果我们不能用相当的方法渡过这种困难，那就

是资产阶级胜利。我们应不应当抛弃没收土地武装工农的政策呢？这当然不好。譬如湖南反许的问题，我们已经决定领导农民自动的没收土地，武装起来。这是独立的政策。但是这种政策太危险了。假使我们完全独立的干起来，那么，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就要破裂。固然这是光荣的失败，但是破裂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应当找新的道路。经过新的道路来渡过现在所遇的危机与困难，使革命深入广出，而得到最后的胜利”。这一指令的结论是：中央叫上海的党部“不要看着国民党运动完全是工人问题”，而要到各阶级中去宣传反对帝国主义；这是说去宣传上海资产阶级，就是实行蒋介石四月十二屠杀的资产阶级，转向帝国主义求妥协的资产阶级。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不革命的非共产主义的方针，足见中央指导机关对于革命的根本问题，对于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性质问题的见解都是错误的。

中央在这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是共产主义者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反映。整个儿的革命策略，都是本末倒置。中央的这种方针，完全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决议不符，完全和党员群众工人阶级及革命的农民之斗争不符。

谁要替这种机会主义辩护，或者主张继续这种机会主义，他便永久和共产主义离别了！

(三) 中国共产党与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就是无产阶级中最先进，最革命，阶级觉悟最高的一部分。共产党的工作，应当永久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发出，要求以革命的方法变更全社会的组织。共产党既然以工人阶级利益为最重要的前提，同时，亦要提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时期中客观上可能解决的要求，在这一革命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改革的轨道上去的时期中，都是如此。共产党主要任务之一，便是组织工人群众而指导他们的斗争，坚决的力争增高生活程度，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争得绝无束缚的工人组织及阶级的工会之完全自由，争得无所限制的罢工权，努力反抗以至消灭工人无权无利的奴隶状况。

这种要求工人阶级都可以在民权革命之中提出，但是必须用无产阶级群众的独立斗争。共产党应当发展扩大并激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应当每次领导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共产国际屡次命令中国共产党，要我们力争增进工人群众的物质生活，坚决的要求改良工厂生活，提高工人的社会生活，激急的取消一切压迫工人的法律，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认识自己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同时共产国际指出必须迅速勇敢坚决的实行武装工人农民，首先是其中最觉悟最有组织

的成份。这一政策国际是认为万分必要的。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和各地工业区工人群众自己的斗争是相应的，和本党党员群众的斗争亦是相符合的。然而本党指导机关却是走的别条路。他只在阻止缓和阶级斗争及工人的革命行动。中央不去开展推动罢工运动，却同着国民党领袖规定强制的仲裁办法，而且最终决定之权属于政府。在各阶级联盟的政府之下，起先一时期，这一政府而且正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却定出如此的策略，这在客观上不是为工人的利益，实是为资本家的利益，实在大大的阻碍了工人运动。那时国民党中央有禁止不得政府同意之外国企业中之罢工之决议，又有要工会不为工人要求而斗争，却要守劳动纪律的决议，我们中央并没有反对。中央那时以为限制些工人运动，可以保存和资产阶级的联盟，而没有懂得我们不坚决的拥护工人利益，只有使小资产阶级更加右倾。中央想尽方法限制工人的经济斗争，限制他们直接的为自己阶级利益而斗争，其实这种要求不能实现，便永世也说不到工农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中央那时规定这种策略，实是因为对于与小资产阶级联盟的观念是错误的，对于国民革命之利益的观念也是错误的。自然爆发而发展的工人运动，自下而上建立了强大的工会，完全在共产党员影响之下，并且发生了武装工人纠察队，及广大的劳动童子团等等。工人阶级自己觉得有些力量，便直接起来反抗资本家，而资本家早已反革命，对于生产则怠工，故意造成

工业的危机金融的紊乱。只要工会逮捕几个厂主店东，一般资产阶级便大叫其“过火”，于是不但小资产阶级的智识份子跟着乱叫，而且那时本党中央也跟着这样承认。中央有些文件之中，坚决说“过火”怎样不好。中央竭力的解说给工人听，不应当占领工厂，即使工厂主的故意闭厂，也不应当；说不可以封店，即使店东故意抬高物价，也不可以；又说决不该自由逮捕，即使那些人显然是反革命党，也是不该。

潮流似的，工人阶级向着真正工农民权独裁制进行，中央都〔却〕尽力阻止工人运动走上这条革命的路。

中央不但没有设法武装工人，他反而一遇见资产阶级方面的小不满意，立刻便自动的解除武装，解散汉口工人纠察队。为保存与小资产阶级联盟起见，中央便下命令解散劳动童子团。

国民党下命令叫工人严守革命纪律，还要工会去执行，违法者交政府管理。工会只准处罚工人。我们中央对于这个命令，一句话也没有提出抗议，湖北省总工会接受这个命令，中央亦加以默认。中央对于工人阶级表现的独立性，每次都说是“过火”或“幼稚”，没有注意自己所说的话实在是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的话。

党的指导机关的错误策略，不但是在工人的经济斗争上是如此，而且关于工人的政治行动，亦是如此。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是有很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但是，这不但不是经过党的指导机关而实行的，并且中央在事后

还说这是不对的。最近中央曾经倾向于自动取消上海秘密工会，而使他们加入蒋介石的黄色工会。对于群众的惧怕，不信任群众的力量，——在党内问题里也是如此。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智识份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经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的要求之后，方才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许多工会之中，指导者的党员也不是工人，而是学生，智识阶级。当要办党校的时候，中央非常坚决的要使工人份子减少些，说中国工人文化太低，政治意识不发达不觉悟。然而事实上譬如上海工人，其政治意识比党的指导机关高得多。我们党和这种非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透澈的机会主义，必须断绝关系永不沾染。

（四）中国共产党与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共产国际特别说明这一问题不止一次了，这许多时候，共产国际曾经给我们中国党明显清楚的指示，指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亦就是继续以前的指示，这一决议说：“要引进群众来斗争，只有在农村中依据土地革命，城市中依据工人阶级需要之满足及其政治权利的保障，坚决取消富豪的田租，分配土地，没收地主官僚寺院等一切土地，禁止苛约，取消贫农所欠重利盘剥者的债务，[减]

坚〈决〉的要求减税，而使富人多负税捐的责任；这些要求应当实行之于全中国，首先是武汉政府领域之内。这些要求应当可以引起群众反对地主及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并及于北方军阀。”“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没收土地及土地国有，——这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的内容。现时主要的是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几千百万农民自己自下而上的解决土地问题，而共产党则应做这一运动的领袖，而指导这一运动，并且共产党应当在政府之中实行一种政策，使政府自己赞助土地革命之发展的政策。只有如此，方能将现时政府变成工农运动的组织上政治上的中心，变成工农独裁的机关。”

然而党的指导机关的工作，恰好和这种革命方针绝对相反，湖南农民运动发展成了强有力的土地革命，其他各省亦有极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反对豪绅地主。然而这都不能算是中央所提示指令的，乃是违背中央的指示指令而做出来的。总之，只有自下而上的运动，各地农民运动只有下级党部和党员群众领导着，中央只是时时刻刻阻滞革命的农民运动，甚至于拉他向后转。党的指导机关，一直没有注意中国革命中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第五次大会之前，党的指导机关对于土地问题只有绝少的注意，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汉口开中央特别会议，提都没有提及本党对于土地问题的态度，虽然这一会议是北伐胜利后决定党的任务的重要会议。各省历次的农民

协会代表大会时，本党亦没有规定自己对于土地的政策（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及一九二七年一〔二〕月江西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直到今年三月湖北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1〕方才提出这一问题。

当第五次大会时，虽然土地问题的议决案通过了，但是党的领袖陈独秀，谭平山同志，却说现在只要扩大而暂时不能深入革命，所以没收土地还要等一等。

国民党中央的土地委员会开了三个礼拜，以谭平山为领袖的共产党员在这委员会里改变了自己的主张四次，都是看着国民党代表是否接受而改变的。最后拟出了一个草案，只在原则上定出解决土地问题而不求力〔立〕即实行解决，等到国民党中央决定不公布这一议决案，共产党员之中没有一个人抗议的。

共产党湖南省（第六次）省委扩大会议，甚至于决定：凡田租超过收入百分之五十者始行要求减租，——这个时候，正时〔是〕湖南农民开始积极的斗争，甚至于已经实行分地的时候！我党指导机关口头上承认某几种错误，然而始终继续阻滞土地革命的方针到底。我们党实际上是跟着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领袖，尽力的在那里反对农民运动中的“过火”。

党的指导机关的方针，客观上是反对土地革命的方针，六月一日中央宣传部通告说：“我们应当记着，我们党对于农民的政策是坚决的实行制止反对小地主革命军人小资产阶级的过火行动”。六月十四日的通告又说：“放

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甚至于有一种论调，说武汉境内的过火行为，是蒋介石奸细所做的，——这简直是跟着武汉军阀说话，因为他们也说这些过火行为是蒋介石的奸细做的，共产党指导者也居然这样替压迫农民运动的人辩护。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说：“蒋介石及土豪劣绅利用少数农民侵犯军人家属的事，专事挑拨离间。他们故为左倾之宣传，而后再从而压迫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负责指导者之一曾经说：“有些过火行动，亦许是反革命派故意挑拨出来的”。他还说：“自由逮捕使小资产阶级发颤不安，他们觉得仿佛国民政府做了共产党的俘虏了，他们这种感想，必须使之消灭”。

如此说来，伟大的湖南农民暴动不但惊吓了资产阶级地主军阀，甚至于惊吓了共产党的指导者。那时正是各地共产党群众力争这个运动的发展，勇敢牺牲的精神非常之可贵。然而中央受着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对于农民政权问题，中央的政策也是非常之机会主义的，不去考察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引出相当的结论来，却想只靠着死板的组织乡村自治的系统表——既不合实际生活，又有害于革命。其实自然的潮流已经将革命政权交付了农民协会，发动了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及减租的运动，解除民团豪绅的武装，惩治乡村中的反革命派。

党的中央不去赞助并发展这一革命政权的方式，反

而同着国民党中央提出死板的组织乡村自治。这乡村自治的总识是怎样呢？只要看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是怎样就可以知道了，——这一训令上说：“建立乡村自治以巩固农民之胜利而消灭乡村中之无政府状态”。

中央坚决反对分地，反对均分财产，自由罚款及逮捕土豪。五月廿五日中央便说：“贫农的幼稚行为，使小资产阶级离开我们……”，中央虽不敢公开反对没收土地，然而实行上却是取消这一口号。五月廿五日的决议上说：“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固然不能根本放弃第五次大会所决定的政纲，但我们须知道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的宣传时期，并且必须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权问题，因此，我们即须：（一）扩大土地问题在各方面之宣传，尤其是在军队中；（二）着手建立乡村自治政权及县自治政权，……”如果将这一决议和中央没有提出没收土地的口号并且坚决反对分地之事实并在一块儿看，那么，中央反对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方针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一种策略对于湖南政变中本党的行动，有异常之恶劣的影响。长沙事变之后，因湖南共产党员的建议，征调农军进攻长沙的反革命。如果农民的武装进攻，不受党的指导机关之懦弱犹豫的阻滞，那么，一个长沙城被十万农军所包围，并不是不容易打下来的。最后的几分钟，正当进攻长沙的前夜，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湖南党部的指导者，下了一个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说武

装进攻长沙可以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应当等一等中央的训令。隔了一天中央的信到了，也说应当等一等再进攻，先团结些力量，等国民政府来解决。停止进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农军。大多数农军因此而退却，只有二大队偶然没有接到这一命令，居然扑城攻打反革命派，经过坚决的奋斗，方始因为众寡不敌而退却。这一总败退的结果，就是反革命大奏凯歌，后来弄到几日全省的大反动。中央在农民暴动的关头，表现这样没有争斗的决心，简直是等于出卖革命，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辩护的，的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中央何以决定停止暴动呢？只要看五月二十六日的决议案：“现时本党的职任既不是推翻他们（仇敌），也不是我们完全投降。还有中间的路，要找这中间的路，现时不宜于直接和他们武装冲突。我们的职任是等候时机，保存自己的力量以准备不可免之进攻”。中央表现如此可耻的无决心，实际上不是帮助农民运动等候时机，乃是帮助反革命的长沙叛徒等候时机。长沙事变时，中央的投降政策到了如何的地方，只要看当时决定赞助唐生智来电的主张。中央总说唐生智的好话，引起许多幻想，仿佛长沙事变是违反唐生智的志愿的。中央虽然有时在口头上提出对于长沙摧残工农团体的抗议，并要求惩办反革命的叛徒，然而中央在实行上的动摇犹豫，完全帮了湖南政变的反革命派巩固政权。

这种败亡的失策，应当给我们以严重的教训。中央

对于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竟如此之深远，甚至于弄到所有紧急关头的指导与指示，都带着有背叛群众运动的性质。

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的代表谭平山的行为，亦是如此之可耻，农政部坚决的拒绝赞助土地革命，想使农民运动就范，走上资产阶级式改良主义的道路。农政部五月里出了一个布告说：“必须纠正农民之幼稚行为，尤其不能不惩办伏出轨范而侵害多数农民之份子……至于与反革命奋斗，惩办上豪劣绅，则须以合法的手续进行，遵照党及政府之训令规章，即须交付正式官厅，不得自由行动”。——这一布告及一切农政部的行为，最足以表现本党当时对于土地问题之不革命的妥协方针。如果全党都照着这种方针的精神去行动，那么，我们的党既不是共产主义的，也不是革命的了。幸而党员群众下级党部的实际工作，完全和中央这种方针相反，所以虽然上面竭力在那里阻滞这些工作，我们党始终能保证对于农民群众有正确的指导。

（五）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指导政策亦是遭了同样妥协主义错误铁束〔链〕的束缚。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此问题的理论与实际决不如共产国际之指示及党的下层机关之活动相似。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应取的态度，在国际

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上有详细的规定，但在此决议中的那些指令早已在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以前给过中国共产党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之观点，曾经向中国共产党有过完善的通知，但我们中央在实际上的动作恰与国际的方针相背，这是证明党的指导如何深远的在那里执行自己的妥协路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有底下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要能担负起他的任务，只有他自己能做工人阶级的先锋，保有自己的政治面貌，就与最左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的政治面貌都要有区别。

共产党在任何政治环境中不能与其他任何政治组织相混同。他应是独立的力量，他是一国之内的特别阶级，即无产阶级最澈底最革命的阶级组织。因此，共产党对于宣传自己的观点，在自己旗帜下动员群众的工作，决不能自己束缚起来；他不应当放弃批评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民权派的动摇不定的权利。只有这种批评才能推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左倾，并巩固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之领导权。

在现在的局面中，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不在国民党之内取得领导权，而打算达到无产阶级在中国之内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

共产国际执委认为，由勇敢的坚决的发展群众运动

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应当勇敢的坚决的去变国民党为真正包含城市与农村劳动群众的组织。

共产国际中央认为，国民党当前的任务，须要有适合他们的组织形式。必须更向多与群众接近的路线上去，尽可能的赶快改组，使广大的工农与手工业者到国民党的队伍中来，工农兵士与手工业者的组织，实行团体的加入（工会，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手工业者的储蓄组织〔2〕，兵士的组织，农军，红枪会——除去反革命成份——工人纠察队等），国民党地方与中央机关应完全实行选举制等等。

只有此等坚决的去发展国民党，使他成为真正广大的，真正选举的，真正群众的，真正德漠克拉西的组织，才能创造发展中国民权革命之巩固与胜利的前途。

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对抗国民党左派一部动摇分子之不可避免的可能的退出（譬如广东的事情），才能最大限度反对那些背叛的军官。共产党应即时暴露与蒋介石或帝国主义妥协的种种动摇政策，并即定出适当的宣传煽动及组织的具体办法。

中国共产党应保持与发展自己党的组织，增加对于国民党工作的影响。他要能担负起此等任务，则必须完全认识自己无产阶级的立场，自己政治思想之固定，自己组织之努力与巩固，并吸收工人党员参加党的指导，提高党在广大的工农群众中的影响，并发展党在群众中的威权”。

在这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中央所有的活动，简直和国际议决案上明明白白指出来的路线相反。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对于那些革命的主要问题，如工人问题，土地革命问题，对资产阶级关系问题及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问题，所取的立场，实际上说既如国民党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一样，则他当然不能保障共产党自己独立的面貌之任务。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亦与国民党的指导犯了同样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以致于不是共产党指导国民党，而是国民党的上层分子完全在政治上俘虏了共产党的指导者。假使说共产党还没有完全失掉自己独立的无产阶级的面貌，则是因为他自己的下层组织与党的群众的功劳。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方面，可算尽可能的做了与国民党“左派”指导完全同化的工作。

在大多数省分中的共产党员，他们的革命工作真正在国民党中达到领导的影响，而中央却反对这些组织。在中央五月通过的关于国民党联席会议的议决案（国民党工作大纲）〔3〕上说：“共产党员在联席会议，应讨论各种主要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但是这些具体的建议，不应根据我党的最大要求，而应注意到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的利益，与团结国民党的左派”。从这个中央的决议中，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一、“共产党的最大要求”，与民族运动发展的利益是不一样的，这是两不相容，互相冲突的两方面。二、共产党的“具体建议”不应当建筑在他的“最大要求”，就是说在革命的现阶段上不适用共

产党的政纲，策略与一般的政治路线。三、民族革命运动与国民党左派，只有在共产党放弃自己的“最大要求”的条件下，才能发展。共产党对于国民党运动的正确策略之篡改，恐莫此为甚罢！

再此议决案上又说：“在国民党报馆服务的党员，不应当使此等报纸变为共产党的报纸，而应照国民党决议的精神去工作”。这岂不是放弃共产党独立政策与政治路线之表示，岂不是完全服从国民党的指导！

共产党的这种“服从作用”甚至于他的领袖正式承认，还以为这是很正确很适合革命利益的呢。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党团作用（如联席会议之上）实际上已经被国民党的指导者所完全取消。在某一次国共中央联席会议上，汪精卫说：只有国民党中央有认可与公布通过的议决案之权，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的答复，竟同意于这种办法。共产党领袖亦有这样说的：一方面固然共产党员不应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但在别方面则又不能保持百分之百的独立，因为我们现在还须与国民党联合。有了这种根本修改革命的多数主义策略基础的妥协办法，还要装出庄然的样子说，这是实际的“共产主义”的政策。共产党的领袖简直没有想过政治上的独立，那么，对于国民党的动摇不澈底半途而废的骑墙政策，实际上当然不会有什么批评。共产国际所要求的澈底激烈的公开的批评，当然更不用说了。对此最明显的，就是中央在党整个公开的时期中，都没有打算出版一份党的日报

(虽国际之多次的督促)。中央关心的不是这些事，而是怎样使共产党员不在国民党报上发表共产主义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中央不看见国民党群众，永远没有打算过与他们接近，而只看见领袖。

对于领袖作用的估计过分而估计群众作用太不足的流弊，可以从党对于许多主要问题的估量看得出来。总是想着应当看某某领袖对此的态度如何，应当使其中立，但不是说工人农民群众，对此的态度如何。譬如为要使李济琛在广东中立，所以把改选国民党市党部的口号取消；为要使汪精卫中立，所以把国民党中央的土地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四月）对于土地问题的建议取消；为要使唐生智中立，所以也不坚决的去反对湖南的叛徒；为要使朱培德中立，所以当他驱逐共产党的时候，亦不提出免他的职的口号。所有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由“左派”领袖之愿欲来确定的，而“左派”领袖之愿欲，就是武汉军阀的要求。因为“左派”要求共产党人到东部去工作，而中央要停开第五次大会，或如中央一向赞成北伐，但当“左派”决定东征，则中央也马上通过那样的议决，虽然以前中央坚决的反对国际代表不主张向北去的建议。在其他许多的重要问题，都是如此。

这个空前的妥协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是系于一个总的理论。最近几月来中央行动的总出发点（特别在夏斗寅叛变起）就是所谓现时必须退让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者确信，并且还要使全党及受我党指导的群众也

确信下列的理论：共产党及跟他革命的工人与农民，已经走得“太远”了；在现〔现在〕必须让步来挽救与国民党的联合。当土地革命刚刚开始发展，当工农的群众运动刚刚走入大道，并且群众自己想到武装自卫的组织，正须要共产党的积极参加，使革命前进并巩固与〔与〕国民党群众之实际联合，筑下坚固的革命基础的时期，而共产党的指导只是说要退步，要退步，以为这样就可以营救自己在国民党的状况，创造了整个退让的理论。但可惜这不仅是一个理论，而且还要步步实现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日常工作；拒绝土地革命，为着所谓“过火”，赞成成批的解散工农的组织，以同样的口实去解散劳动童子团。在湖南问题的胆怯政策与最后好听的自动解除武汉的纠察队，所有这些都是最近几日〔月〕内中央所指导的整个的退让投降政策之一部分。

这条退让投降的道路进〔集〕大成于七月卅号〔4〕中央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十一条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5〕，现在抽几条出来看看：

四、中国国民党既然是反帝国主义之工农及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

五、国民党中的C.P.分子虽然参加政府（中央及地方）工作，而只以国民党员资格参加，不是以C.P.党员资格参加，两党联席会议，只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而不是两党会议公开执行形式，这件事多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现时参加政府工作之C.P.分子，为图减少

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

六、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等民众运动之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及中央会议之决议案及国民政府公布之法令，但国民党员亦应该依据党的议决案及政府之法令保护工农群众之组织自由及利益。

七、依照国民党党义得武装工农，但工农武装队均须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之武装纠察队，如因避免政局之纠纷与误会可减少或编入军队。

八、工会及工人纠察队不得党部或政府之许可不得执行司法行政权(如)捕人审判及巡逻市街等事。

九、店员工会应即由党部会同省总工会派员改组，店员的经济要求不得超过店东的经济能力以上，工会不得干涉店东的用人权，管理权，更不能侮辱店东如逮捕罚款戴高帽子等事。

十、童子团执行警察职务如捕人干涉行人等事，应严行禁止。

这已不仅是机会主义与妥协了，这简直客观上是十足的取消派，不仅完全放弃共产党的独立，并且取消了一般革命群众运动之存在！把所有的群众运动完全交给国民党资产阶级领袖去监督，并且是自动的交出来，还要说这是“照例”。——这不是客观上对于群众运动出卖，对于革命变节是甚么呢？

共产党领袖所认识的与国民党联合的方法是这样

的！这种认识是毫无半点共产主义政策的意味，列宁认为共产党员可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联合，协商，但只在保持共产党的宣传，煽动与政治活动之完全自由的必要条件之下才可以的。列宁说：没有这种条件自然不能与之联合，否则便是变叛。客观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于国民党的策略是对革命与共产主义变节的，列宁对于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时常说：“要注意‘友军’如同注意敌人一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则认为应当把中国革命的命运交给工农运动很明显的敌人！

党应当在过去指导的错误中学习。党应当明了，他的力量与他的将来，建筑在工农群众的身上，在他们的力量与他们的组织上面。党应当明白以后还是要与国民党联合，但是要与国民党的左派联合，与他的下层群众，与他的劳动群众的党员，与他的下层的组织联合，那种与武汉国民党中央领袖联合的路，已经走不通。谁能公开的反对此中央是国民党的叛徒，这些叛徒之中谁配称国民党的左派！最后，与我们联盟的左派国民党及其领袖之执行革命政策的程度如何，要看我们党依据于武装工农组织等的实现力量如何，并且要我们自己党的政策停止动摇，而领导群众去督促其领袖，方能确定。所谓与左派联盟，实是与革命小资产阶级联盟，我们党应当首先注目于下层群众，如智识阶级，手工工人，店员等，赞助他们的政治经济要求，而时时记着一切和小资产阶级上层领袖的联络，大都是靠不住的，只有这

样，才能真正实现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

(六) 共产党员之参加国民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于国民党政策之不正确，与违背共产主义，在其参加政府委员的同志行动上与党对于参加政府的整个方针中，充分的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此问题的立场，亦如其他许多革命的主要问题一样的，和国际的方针及初步的共产主义政策，都发生冲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共产党员参加武汉政府的决议是这样说的：“共产国际中央认为，共产党应当很坚决的在中央与地方政府机关中工作，同时要批评自己的同盟者之不坚决，就是最接近的同盟者，也要批评；并且要保证政府政策之正确。

共产国际执委特别叫中国共产党注意：现时革命政府与民众之密切的连系是十二分必要，只有在这种密切连系的基础上，才能经过国民党而实行这一政策，只有建筑在群众上的方针，才能渐渐的巩固革命政府的政权，及其为革命之组织中心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巩固武汉政府的这种影响。不能实现这种任务，不能发展群众运动，没有土地革命及坚决改善工人阶级的要求，没有使国民党变为真正劳动群众的广大组织，没有继续的巩固工会与发展共产党，武汉政府没有与群众发生密切的关系，那就不能使中国

革命得到胜利的实现。

共产国际中央认为只有这种政策才能证实共产党员之参加政府。若无此条件而参加，则就带有上层的勾结，与政客的结交性质，而他们必须为实际的生活与伟大的阶级斗争之进展所摈弃。要时常的使政府工作与群众中的工作相连系，实是中国共产党必要的任务”。

这就是共产国际对于政府问题向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但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党员的总长做了些什么？看事实：

共产党员在得到委命后两月才开始组织自己的部务。农政部长谭平山（共产党员）就职典礼时的演说，除批评他是可耻的外，没有别的话说；他对于土地革命，没收土地，消灭豪绅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政权，都默然无一言；他却说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改良农村状况”，反对“过火”的话。谭平山就职后，马上就发表对农民的训令，禁止农民反对豪绅的“妄动”，违反之则“严罚”。

农政部及劳工部与其他官僚机关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此数月[月]内，他们并没有公布一个减轻工农痛苦状况的法律。没有一个改变城市与乡村中剥削的法律及改良经济关系的法案是公布的（劳动法草案，减租草案，农村自治法等），有些并且没有预备向政府提出。这些总长的共产党员的工作，照国际的决议案应是聚集自己的力量来与群众连系，来维持群众运动，但实际上则成

了最滥的资产阶级官僚的统治，只是在群众面前消失共产党的面貌。我们没有一个革命的建议，对于武汉政府包藏反革命之种〈种〉错误也没有一点批评。特别是农政部长的政策，除了说他是反对农民的政策孟塞维克的政策，简直没有别的合适的名称。土地问题应是农政部顶主要的问题，但是完全把他忘却，甚至农政部发到各省的调查表，竟无一关于土地关系的问题。谭平山同志上任后，第一件事情，就要打算“镇压”湖南的农民运动。对此，中央是赞成的，并且还要他到湖南去做出征的领袖，实行恢复“秩序”的任务。这次出征已经成行，但尚未至目的地，而长沙已发生反革命的叛变，这些叛变很敏捷的很澈底的实现了谭平山同志所领袖的出征之任务。

当谭平山同志结束他那不光荣的总长任务时，还来个长期请假的退出，重新又丢党的脸一次。当反革命渐渐在武汉国民政府境域内巩固，当国民党内正在酝酿了不要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趋向，如此才可自由的完全压迫工农运动而与蒋介石及反革命军官妥协；谭平山同志却很愿意去迎合反动军官与胆怯的国民党领袖之希望。他脱身的办法是借口于理想的病症，来实行他的长假。并且他的请假是事先与汪精卫商量，然后再与中央讨论，但中央不仅不反对这种行动，而反完全同意这种计划。因为在七月三号中央会议上通过的十一条中有说：为“避免纠纷”，同意于临时退出，这是所谓革命的政策！

谭平山既因“病”而请了长假，但还不够，还要说“因政局困难，不能纳农运于正轨”。共产党总长在最负责任的时期中，由战场上逃脱还不够，而且重新还要向农民进攻一次。每人都应当问一问，从这几句话里得到些什么结论：一、农民运动是走上不正的路了；二、只有武力能纠正他，因为共产党员的总长有了共产党的群众组织的完全威权，尚还不能“纳入正轨”呢！这是直接承认许克祥之在湖南，夏斗寅之在湖北的动作；这简直是直接号召反革命！他的代表毫不受处罚的在政府内做了这些顽意，莫非这还不是共产党的耻辱？但是中央对于谭平山的声明，没有发表过一句话。本来他亦无从反对起，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政策。

共产国际主张中国共产党参加武汉政府，是为要更左的去推动此政府到革命的路上去，是为要消灭所有的反革命成份，并经过坚决的实际的革命斗争去得到广大群众的赞助，变武汉政府为工农民权独裁。中央对此问题的革命提案，完全不了解，他变共产党参加政府为资产阶级改良的总长主义。这与多数派主张共产党员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一九〇五年）的见解，相去不知多远！在一九〇五年，当时俄国亦是同样的民权革命的任务，亦有无产阶级政党参加革命政府之要求——亦是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的问题。列宁对此，在其《两个策略》的小册子中说：

“我们应当指出此政府的行动政纲，适合过渡的历史

时期之客观条件与无产阶级之德谟克拉西的任务。这个政纲就是本党的最低限度的全部党纲，是在现有的社会经济的关系之基础上，最近尽可实行的政治经济改造的政纲，这是一方面；别方面就为往下的进行到实现社会主义……。

可以有人反对说：临时政府，因为他是临时的，所以他不能执行尚未得到全体人民同意的积极政纲；可是这种论调，只有反动的诡辩派及帝制党才会提出来反对我们。因为如果不执行什么政纲，那就是让腐败的封建专制的农奴制度继续存在。对于这种制度，只有背叛革命事业的叛徒政府才能容忍。无论如何我们应当由下的去影响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为要求由下的来实行督促政府，就应武装起来……。武装督促的目的——是为保持巩固并发展革命的‘胜利’，这些胜利，从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上看来，是在实现我们最低限度党纲之内的。

临时革命政府是为革命赶快得到胜〈利〉的斗争机关，是为赶快的揭发反革命的企图，而并不是实现一般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之机关……。

这种胜利就将是专政，就是他必须要依靠武力武装的群众暴动，而不是那些由和平方法得来的‘公开’机关。因为要实现无产阶级及农民所赶快急须的改革，必定引起地主与大资产阶级之残酷的抵抗，所以只有用专政来对付……没有专政便不能破坏此抵抗与击破反革命

之企图”。

武汉政府现在亦变为专政的机关，但不是工农的专政，而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者之机会主义政策，却正是客观上帮助这种专政实现的！

（七）武装问题与对于军队之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于武汉政府军队及武装工农的问题之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些错误足以证明我们党对于革命之中这种非常重要的问题，亦有在原则上极不正确的趋向。

人人都知道武汉政府之中极大多数（除少数共产党员率领的部队及党所号召进去的工农），都是雇佣军队，和中国其他军阀的军队是一样的。人人都知道这些军队的将领极大多数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只能暂时和革命相伴，都希望借此升官发财。对付这种军队的方针自然应当是：完全注重兵士的群众，而不是要注重那些反革命的将领，要在兵士及下级士官中实行广大的工作，使军队之中亦有反抗反革命的支柱。

然而党的指导机关的观念及行动，恰恰如此相反。一切政策及工作都只是和将领办外交，只注重种种方式的军事结合。实际上在兵士之中没有任何工作，并且也并没有丝毫尝试。虽然军事问题很重要，然而第五次大会没有特别去讨论，而中央军委讨论了四个月军队中工

作的问题，仍旧是没有决定。

可是和将领谈话办外交，却有很多的时间。对于唐生智，朱培德类的反动派，中央那时的政策亦是非常之可耻的。湖南政变及其后大规模的屠杀工农，都是唐生智的部下干的，唐生智当然是与谋的——他到后来正式与以合法的承认。然而中央所决定的湘赣事件宣传大纲上说：“湖南政变是背叛唐生智的，因唐赞助湖南民权运动，并表示好意于被压迫的农民”。（六月十四日）那时湖南的情形是很明显的了。

湖南每个工人每个农民每个共产党员，听见了这种宣传，岂不要冷笑？然而中央还不限于这种口头上的话，甚至于组织总示威反抗长沙事件的时候，同时还去欢迎北伐凯旋的北伐将领。这种奇怪的事，居然是事实，居然在武汉实现——难怪汪精卫说共产党勾结军人。

关于朱培德的事也是如此。朱培德驱逐共产党员及左派国民党员出江西，我们自然要反对这种政策和他的主谋。然而中央始则等待犹豫，继则决定：开始总的反对江西之反动，不提朱培德的姓名，仿佛是说，朱培德总算是比人好些，如果他也离开我们，反动更要厉害。这样说来，朱培德还不是江西反革命的领袖，而是我们的保镖的，所以应当对他要包容些。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竟陷落到如此之深。

这种对于军队的态度，就使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

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中央军委对此完全没有工作，没有提及一般共产党员的军事训练，这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责任；没有提及有系统的聚集那零星散乱的工农武装队，使成为一有组织的坚固力量，以便做发展革命的真实的拥护者；没有想尽方法的去得武器，以武装工农。中央那时认为武装工农是难以实现的，甚至于以为是有害于与国民党军队领袖联络的。经过如此之久的时间，中央忽然“积极”起来，不过恰好是相反的积极，决定叫汉口工人纠察队“为避免挑拨离间及冲突起见”自动的解除武装。这不是公开的取消主义是什么！

（八）党内问题与对国际的关系

中央所以陷于机会主义如此之深，而能绝不受警戒的去执行这些机会主义的政策，其原因之一，便是党内情形的不好。中央以前受不着群众的监督，不向群众报告，不提出党的政策交一般党员讨论。党里面完全是宗法社会制度，一切问题只有党的上层领袖决定，而“首领”的意见不但总应当认为是必须服从的，而且总以为无条件的每次都是对的。这种条件之下，党内的民权主义完全变成空话。甚至于党有极大公开工作的地方，所谓党内民权主义完全是形式上的；没有党内的生活，没有党内的舆论，没有对于指导者的监督，没有党员群众对于指导者的督促。自然在这种党内情况之下，中央得

以放开手去实行自己的机会主义，所以他自己也不求真正实行党内的民权主义。

党对于共产国际的关系也是非常之奇异，共产国际的历史上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形：在如此危机严重的时候，居然坚决拒绝共产国际最高指导机关的命令和决议。这已经不算是简单的破坏纪律问题，而是直接对于中国的及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罪恶。要知道中国革命不但有全国的意义，而且是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中国革命的命运，大部分足以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呢。中中[国]共产党不但执行极不正确的政策，使革命陷于失败的政策，自动的取消革命而投降，并且很坚决的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服从国际的指导。不但如此，还要故意破坏国际的责任与纪律，甚至认为可以不把国际议决案通知全党，使党员得以研究而说出自己的意见。

因此，共产国际最近不得不公开的批评我们中央的政策，而且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以及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

(九) 结 论

共产国际严厉的批评我们党的中央客观上出卖革命的机会主义政策。我们承认这一批评完全是应该的，并且承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政策是对的。我们认为共产国际最近的指示，给我们以发现这种

过去指导的错误之可能，救了我们的党，这是非常之好的。我们很坚决的承认过去中央的指导有机会主义的不革命的政策，必须根据这种过去的教训根本改变方针。在这封信里，我们已经在正确的共产主义观点上，分析过去的错误，我们坚决的站在列宁主义及共产国际的理论上来分析的。应当要使全党及每个党员，极注意的研究这些问题。应当使全党党员详细的讨论过去的政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一九二七年七月△日的）以及这封信，便是讨论的根据。党若不能受着过去的教训，便不能向前进，不能正确的指导中国革命。

讨论之中当求得相当的结论。应当不但批评过去党的指导，而除去指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成份，而且必须将全党工作，都依照共产主义的革命性查一过；应当事实上转移群众工作的方向；应当在事实上证明中国共产党真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能够做他们的领袖，而引导他们取得胜利。

必须与工会农会建立密切的关系，指导他们，使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这方而去。应当与青年团建立密切的关系，加多的帮助他的工作。青年团以其中央委员会为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比党的中央还高些。青年团这次完全赞成共产国际的决议，而向党的中央要求实行。但是党的中央指导者，真是觉得这是有害于那种机会主义政策的，所以想闭住青年团的口，

否认青年团有提出政治问题决议案之权。但是这并没有成功——青年团始终站在共产国际政策之上。党应当承认青年团的工作有政治上的重要，应当和他有密切的关系。最后，虽然政治压迫非常之严重，也必须实际上实现党的民权主义，使党的政策在党员群众之中讨论，在下级党部讨论。建立各级党部集体的工作，以促成集体的指导。并且，必须尽量设法保持党的组织，勿使为反动势力所破获。要建立壁垒深严的秘密组织，但是，同时要是能斗争的秘密的党的机关。

在严重的环境之下，又是革命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但是我们深信我们的党必定有充分的力量以坚决的革命性渡过这个变革的关键。我们号召全体党员，积极的来帮助党做这件事；我们深信同志们奋斗的坚决性及对于革命的忠实，必能使你〔我〕们战胜一切困难，而坚决的使党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的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必定得到最后的胜利。

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出版的
《中央通讯》第一期刊印

注 释

〔1〕指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至二十二日在武汉召开的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总结了省农民协会成立

一年来的工作，通过了乡政权问题，没收逆产问题，地租问题等三十五项决议案，提出，农民协会是农民求解放的唯一道路，农民运动首先是要推翻乡村土豪劣绅的统治，进行乡村民主自治，并且提出了没收逆产，减轻租课，废除苛例等要求。会议最后选出了新的省农民协会领导机构。

〔2〕俄文为“страхов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емесленников”，本书选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此处译为：“手工业者行会”。

〔3〕这个文件的中文稿未能保存下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存有一份英文稿，题为《关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关系的决议》（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中央政治局通过），译文如下：

“1. 两党所有机关，从最高级机关到最下级机关，都应举行联席会议。为了在这些联席会议上就每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取得实际的成果，共产党人要提出具体建议，并且以群众行动来支持这些建议。这些建议将不是以工农最高要求为基础，而是依开展国民革命和加强国民党左派之需要而定。

2. 共同参与对工农运动的指导。共产党人将引导工农群众加入国民党，以便使国民党更加接近群众，增加它在党员中的威信。

3. 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共产党员，要遵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各项政策。他们要服从国民党的纪律，执行国民党的政策。他们要在行动中注意提高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他们要同狭隘地方主义进行斗争。

4. 在国民党各机关刊物工作的共产党员不要谋求把它们变成共产党的刊物。他们将根据国民党的革命原则和政

策来办这些刊物。

5. 共产党员要辞去那些在革命现阶段没有必要由他们担任的国民党党内职务，而让国民党员去担任。”

〔4〕 似为七月三号之误。

〔5〕 这个文件的中文稿未能保存下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存有一份德文稿，题为《对国民党关系方面的退却纲领》（一九二七年七月三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于武昌），译文如下：

“（1）同共产党人建立联盟是孙中山的政策，这一政策为国民党各次代表大会所承认。如果现在由于军事力量的原因有人企图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开除出去，那么，这将会大大损害国民党的力量和革命性，这只能暴露它的弱点。我们不希望国民党遭受这种不幸。

（2）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国民党内，帮助国民党在三项原则的基础上重新组织革命。目前主要任务是进行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共产党人将集中一切力量进行这一斗争。

（3）共产党人必须尽一切力量支持国民党。但是，国民党中央必须在它的地区采取措施，制止对共产党的一切迫害。

（4）国民党是一个反帝的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政党。这种反帝斗争必须是国民政府的宗旨。

（5）共产党参加政府（中央和地方）不是以共产党的名义，而是以国民党的名义。两党联席会议只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但是，它不是执行机关。这两件事（参加政府和共同协商）并不含有联合政权、分割政权的意义。

为了减少冲突，共产党的部长可以暂时离开政府。

(6) 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他们的要求必须符合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政府的法令。同时，国民党必须根据它的决议保证这些组织的自由和工人、农民的利益。

(7) 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工农纠察队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武汉现有的纠察队，为了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可以减少或者编入军队。

(8) 没有政府和国民党的允许，工会和纠察队不得行使行政权，如逮捕、审判、巡逻。

(9) 店员工会必须由国民党和总工会进行改组。他们的经济要求不得超越店主的经济能力。工会不得干涉店员的雇用或解雇，不得干预店铺的管理。工会不得惩罚店主。

(10) 禁止童子团行使警察职权，如逮捕、干涉行人等等。

(11) 兵工厂、水电厂以及政府机关的工人的工会不得干预管理事务。如果他们有什么要求或者不满，必须通过总工会向国民政府提出，以便解决问题。”

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

农民的革命运动在国民政府的境域内有了广大的发展(主要的在湖南)现在却遇见暂时的失败。地主，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成份依据军队的武力与国民政府的机关联合着进攻，给农民运动以很大的打击。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应当认为是共产党方面对于农民的群众暴动没有坚决的革命指导，这是由于党的指导对于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带有机会主义的犹豫及摇动政策。

共产党对于农民运动指导的摇动不定(由地方机关直至党的中央)是反映小资产阶级之动摇，客观上弄到破坏农民暴动。共产党应当转变过去的方向，坚决的发展与提高农民革命。如果对此问题还要继续的动摇，就有使共产党由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变为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危险。

虽农民革命运动有暂时的失败与紊乱，但在最近期间不仅客观上有新的提高的可能，而且这种重新高涨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组织之捣毁，农村中的白色恐怖之盛行，随之而经济压迫之增加等等，都只是加紧农村中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必然准备着新的革命

爆发，比前次的规模和力量更要超越。

农民运动不得无产阶级政党有统系的革命指导，很容易无组织的，凌乱的，自然的爆发，反动军阀可以不费力量把他镇压下去，因之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

在最近的期间，农民暴动的口号应当是：

一、乡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

二、肃清土豪乡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没收他们的财产。

三、没收重利盘剥者财产，用以改良农村中贫民的生活。

四、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

五、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

六、对于小田主则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之。

七、由农民协会取消重利剥盘〔盘剥〕者的债务苛刻的租约与苛约。

八、解除民团团防等类的武装与其他地主的军队，

而武装农民。

九、改良雇农生活及其劳动条件（工资待遇等等）。

十、对于乡村一般失业贫民，革命政权当尽可能的筹措基金救济之，并与以工作（如协作社等类办法）。

十一、对于一切新旧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抗纳，并实行抗租。

国民政府所下的减租二五的命令，很明显的是现在国民党领袖之一种欺骗手段，因之，我们党对于国民政府之决议，应揭破他的阴谋虚伪。因为这种减租不能实现，所以必须提出实行完全抗租的口号以答复国民党中央和政府这一骗人的决议案和命令。对于武汉国民政府，现在已和对于新旧军阀的政府一样，本党必须引导农民反对他。对于每次摧残农民都要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尤其要经常的反对一切豪绅军阀御用的假农民协会。

最近开始暴动的口号之中，本党不提出没收小田主土地的口号，是为着要使城乡间广大的小私有财产者之分子中立，但是，并不是说是农民运动不免要起而反对出租田地的小田主的时候，共产党可以认为这种事情是过火的是反革命的。共产党应当力求农民运动之中能有最大的组织性，但是共产党决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咒骂“无政府行为”所吓退——不论自然爆发的农民运动走的如何远，都应当如此。因为本党之农民革命问题上的行动政纲，在这一整个的时期中本是“耕者有其田”这一

极通俗的口号，足以引起农民革命运动，一直发展到土地国有及完全重新分配土地。

再则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应当是农民协会的中心，农民暴动之中应当以贫农为主力，联合一般失业的贫民会党等势力——应当明显的定出收取富豪财产以救济贫民之政策。

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出版的《中央通信》第二期刊印

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

我们革命已经到了最严重而向新的方向进展的时期，必须有新的策略去领导劳动群众起来，发展伟大的组织，猛往直前的奋斗，方能使无产阶级真正获得领导权，而求达工农独裁之实现，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联合并领导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完成民权革命，而进于社会革命。

此种总的任务之下，职工运动目前的重要点，就是真工会与假工会之战，现在南京武汉政府，已经都是代表封建资产阶级的政权，成为反革命的工具。可是他们仍旧打着国民党是革命的假招牌，还要说保护工农，维持工农等的欺人的空话。因此，他们尽着想法把持伪工会机关——其实这种骗术，多已暴露无遗。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决的领导工农群众反对这些政府，反对北方军阀的政府，对于他们摧残工会或所谓改组工会，都应当立刻坚决的号召群众起来反对。

职工运动中之现时所应特别注意的便是：

(一) 工会应当是真正工人阶级的组织，群众的组织，从一般工会机关直到全国总工会，都是在本党指导

之下，由群众所选举出来。现在各地如上海、南京、广东、福建、浙江、安徽等省，以及最近湖北省总工会机关都被反革命派所占领或改组，全国总工会也遭同样的摧残。蒋介石、李济琛、唐生智、汪精卫、陈公博等，派出御用走狗，把各地工会机关占领，这种冒牌的假工会、工贼工会，我们要尽力去反对他，各工会都要发宣言、示威、罢工及经常的广大宣传，否认这些假工会，使个个工人都了解真假，并来拥护共产党所领导的原有的真正工会。

（二）工会须由工人做领袖，反对一切反革命御用走狗侵入我们真正工会。因为这些走狗受了帝国主义资本家直接间接的指使，正在用各种方法来欺骗压迫工人：法西斯蒂改良主义同时并进。我们应当派少数得力同志参加假工会之中，做破坏的工作，拆散他们的团体，打倒他们的一切信用，遇有伪工会到群众之中活动的时候，便对他们提出工人的要求，以揭露其真相。

（三）本党应当领导群众力争真正工会之公开，实行工人结社、集会、言论、罢工的自由之政治斗争，再则工人阶级目前最急切的要求，便是经济问题，因为不但工人受着一般的经济金融恐慌及资本家的加紧剥削，而且反动潮流之下资本家必定向工人店员进攻，悔弃旧约，取消工人已得之胜利。本党应当领导工人努力于反抗这种反攻及一切剥削的经济斗争。这种经济斗争，不但以改良工人生活为目的，而且可以增进工人的革命

化，并强固其战斗力，决用不着怕工人只顾经济斗争而忘却政治，将来成为经济主义。现在中国情况之下，每次经济斗争，只要有共产党的指导，必然增进政治斗争的剧烈，经济斗争是政治胜利的必要条件。

(四) 经济斗争之目前要求是：

一、八小时工作制，手工业及店员至多不得超过十小时，童工女工至多不得超过八小时，并不做夜工。

二、失业的救济，应由国家及资产阶级担负（须将失业工人组织为有力量的团体）。

三、妇女产前产后应有八个星期（五十六天）的休息照发工资。

四、同样工作，须有同样工资。

五、劳动保险及工厂工人住宅之卫生设备。

六、增加工资，并按照物质高涨照加工资。

七、工资须发现金，不得以信用低落的钞票或国库券等代替。

(五) 现在职工运动在严重的压迫之中，各工会应有秘密的组织，以防反革命的摧残，而保存我们的实力；各地工运同志，党团支部，更须加以严密的防护，并绝对服从党的指挥，不能有丝毫疏忽。

(六) 现时的严重压迫之下，工人更应当有自卫的秘密组织，然不要重视个人的暗杀政策，当注意组织群众的斗争。

(七) 注意于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

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而推翻反革命的政权。

（八）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如果反革命的资本家闭厂怠工实行经济封锁，则工会应领导工人实行占领某工厂交于当地革命政府管理。

（九）应选有觉悟的工人到农村间去做农民运动，并可轮流派工人到乡间工作，使工农关系在实际上密切起来。

（十）职工运动中手工工人店员的斗争占极重要的位置——中国大多数小城市中，甚至只有手工工人及店员。本党必须坚决的领导他们斗争，组织他们的职业工会，力争改良他们的生活及政治社会地位。

（十一）职工运动中以后要更加多注意产业工人，特别是：铁路、海员、电报、水电、电话、邮政、运输、兵工厂等工人……他们不仅是我们的主要基础，并且在土地革命的阶段中他们是打破封建势力及在城市中的大本营之伟大力量。

（十二）职工运动是本党的基本工作，应改正以前把他看做部分工作之错误，应以整个的党来指导他，所以各级党部之工人部应即取消，另设职工运动委员会，经过党部委员会直接指导职工运动中的党团。

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出版的《中央通信》第二期刊印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

(一) 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之临时政治局以正式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组织之。

(二) 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之一切职权。

(三) 中央所在地最近数月内仍在武汉。同时须组织南方局于广东，至少须有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三人加入。

(四) 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按期出版秘密的党的政治机关报，而传播之于全国。机关报之党报委员会，由政治局委任之。政治局之下应设一特别的出版委员会，专掌传播党的机关报及中央一切宣传品的责任。北方顺直省委（或北方局），南方局，以至上海省委之下，亦应设立出版机关及传播秘密宣传品传单等工作。

(五) 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与出版委员会的散布宣传品的工作相联络，担任传达通告指令输送宣传品等等的职任；并兼办探听反革命线索及其他各种消息各地环境的特务工作。各省亦应

有此等机关之组织，务使本党有一全国的交通网。

（六）现时主要之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各级党部委员会，省委，市委，县委，区委都应当在最近期间改造成下列的方式：每一党部委员会之中，分出三人至八人之常务委员会——为指导机关，由其上级党部机关批准；此等常务委员会即应执行各该党部委员会之一切职权。每一党部都应严格的与其上级及下级党部建立极密切的极秘密的联系。极严格的秘密规律，是秘密状态中党的工作之基本条件。虽极小的破坏秘密规律，都应予以严厉的处分（一直到开除）〔1〕。各级党部都应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以扩大党的影响（如组织各式各样的学生团体，小商人团体，妇女团体，俱乐部等类之组织，利用尚未被封之工会等等，在这些组织之中组织党团，受党的严密的指导，各种伪国民党的下级党部之下，也是如此）。但是即使在最公开的条件之下亦应有秘密组织及工作，这是现时环境中最主要的职任。

（七）秘密状态之中，保存工会的组织亦是最重要的职任之一。一切工会中应当速建立起党团来，人数不要超过五人至七人，须完全服从相当的党的委员会之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工会机关的指导，应由各级党部从速审查，换有经验的工人（农民）同志担任这种指导。

（八）严守党的纪律尤其为秘密党之必要条件。党部机关之一切决议及决定，调遣等等，应当绝对的服从，

一切党员，不论其地位如何都应如此。凡破坏纪律者，都应从严惩办（停止职务，开除党籍等等）。

（九）一切支部应当立刻进行秘密工作，并即按照此种目的而改造。每一支部都应当分成五人至八人的若干小组，每组有一组长（并应有候补者），以与支部干事会联络（如支部之下尚有按生产部门的“分部”，则与“分部”干事会或书记联络）。各十〔小〕组尽可能的每星期集会一次，进行一切党的基本工作，经过这些小组进行各该企业中（工厂等）的工作。

（十）每一支部之中，须挑出最可靠的同志——负责同志；支部干事会与负责同志应有特别的联络——应按期召集负责同志开会，或全部的集会，或代表的集会。

（十一）每一区的党部亦是如此，在小城市或村镇，则可由全体党部之中挑选负责同志，直接与市委或县委联络，经过这些负责同志，党部委员会即易指导该地全体的党部。

（十二）每一党部委员会之下，现时须即组织审查委员会（各省委就是监查委员会），以审查各该党部之党员有否不可靠的分子。这种审查不应带有清党的性质，而只是去掉对于党部不可靠的分子，以及可疑的分子。我们党应当在此过渡于秘密状态之际，极力保存多量的党员，要使每个党员都不与党部脱离关系。

（十三）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武汉党部转入秘密状态的关键，因为此处有好几千党员而大半都是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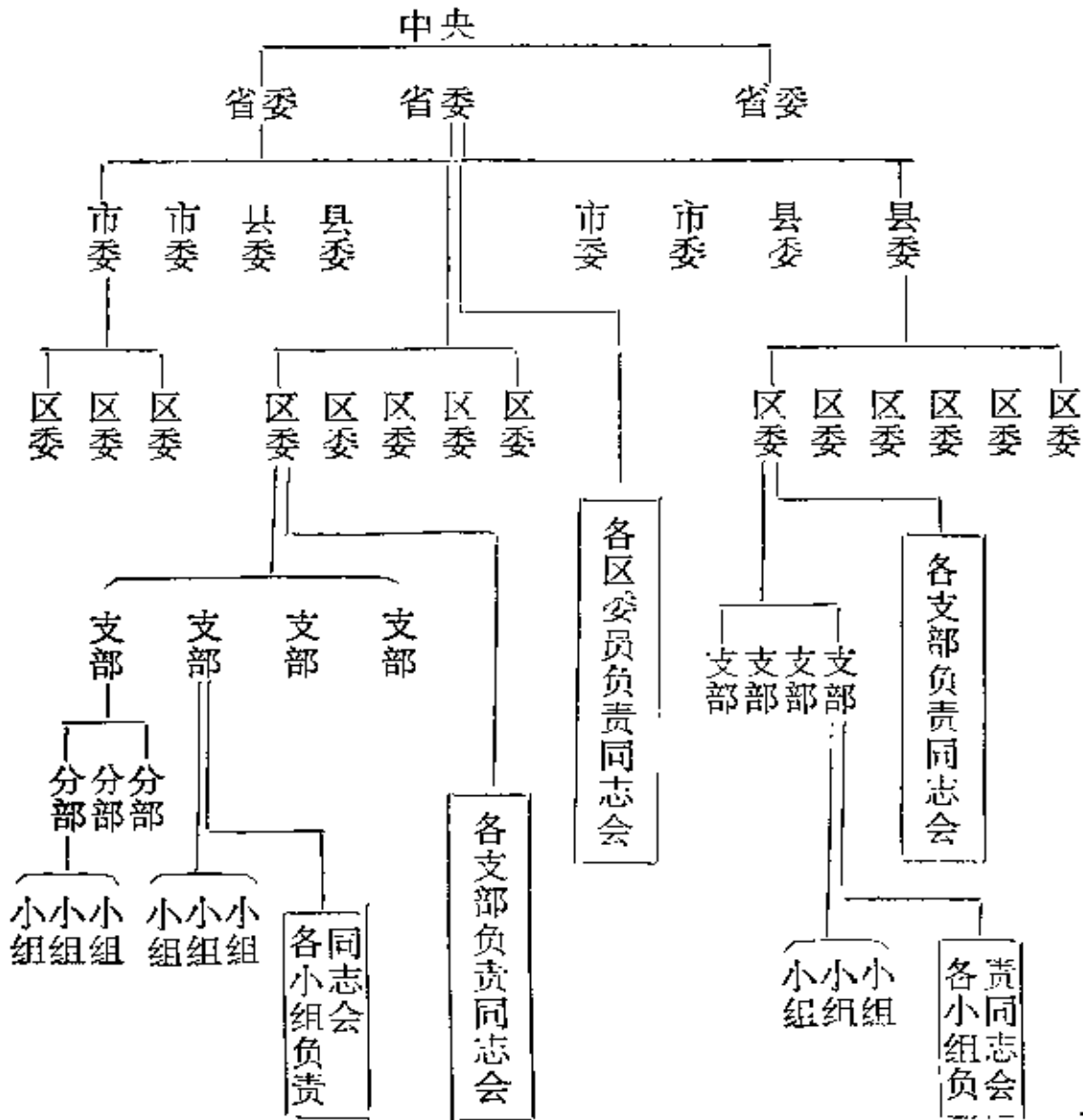
经过秘密状态的，中央应当帮助湖北省委进行这种改组的工作而直接的督促他。

（十四）自省委以下各级党部委员会之成份，都应经过上级机关重新审查，使能更新而巩固。应当注意提拔工人同志到党部委员会里负重大责任，而肃清其中曾经在最近几日〔月〕表现机会主义的分子。

（十五）现时秘密状态之中，需要最大限度的集权。但是集权制度不应当变成消灭党内的民权主义。最近党所做的机会主义的错误，需要澈底的讨论，付在群众之中加以审查，并根据之以审查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因此，不论如何严重的压迫，必须在本次会议后，设法极慎密的进行党内的讨论：先由支部讨论，然后在各省之区、县、市、省开秘密会议，详细讨论党的政策问题，而根据这种讨论，改造各级党部的机关。

（十六）党对于青年团的关系，须有极严格的变更。须切实实现各级党部与团互派代表的原则，——团部代表有表决权，并引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参加党的政策问题之讨论。

附表



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出版的《中央通信》第二期刊印

注 释

〔1〕 以上三十九字原件文字排印时错误较多，按《八七中央紧急会议决议案》（油印本）补正。

中央致湖南省委信*

——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

(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

湖南省委：

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1〕对于湘省工作有以下的决议，请查照执行：

中央前次决定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计划，其意义是要我们党坚决的去领导四省农民革命高潮，发动土地革命的暴动，推翻四省反动统治，建设工农德谟克拉西专政的革命政权（在乡村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农会政权；在城市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在暴动前是指导暴动的机关，由我党指派同志及少数真正民左分子组织之。暴动成功后即是临时革命政府的性质。至于口号上则为“民选革命政府”，“真正平民的民权政治”，故宣传上可说：“革命委员会胜利后当召集工农会代表及革命的小商人代表选举会议，成立正式民权政府。”而实际上何时可以组织这种民权政府，则应看当地革命委员会权力巩固后再定）。南昌事变是中央预定的计划，其目的在以军事力量帮助四省暴动的实现和成

功。不然则失掉暴动的意义。同时如把四省暴动当作响应南昌暴动的军事势力，那便是本末倒置，与中央决定相违反的。

根据马也尔及你们的报告，对于南昌暴动有两个意向：一个是南昌军事由闽转粤；一个是由湘南编军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前一个意见是要南昌军力避免斗争离开四省暴动，后一个意见是重回粤军事看轻湘省暴动，不免本末倒置。中央认为都是错误的。实际湘省如真正集全力发动本省暴动便是给南昌暴动以根本上的有力的响应。总之，你们要明白南昌事变要与四省秋收暴动联为一贯，在这一个原则之下去决定实际工作计划。

中央又决定从南昌暴动的军事力量中抽调一团或二团交湘南特别委员会指挥，集合湘南现有的工农军等，夺取郴宜汝一带，设立革命委员会，帮助全省农民暴动规复全省政权。湘南特别〔委〕以毛泽东，任卓宣，郭亮及当地工农同志若干人组织之，泽东为书记，受湘省委指挥。但这里必要明白湘南计划只是全省暴动计划中之一部分，只有在全省暴动之下湘南计划才能实现才有意义。万不可本末倒置。

湘南工农会中在马变以来旧的领袖最大部分被压迫去了或被枪毙，此刻只有赶紧的坚决的提取在这几月斗争中表现的积极的“暴徒分子”到各工会领导机关做领袖，同时我们党便也要坚决的赶紧的大批吸收这些“暴徒分子”入党，以建立党与工农群众的关系，就是会匪

之富于革命性的也要多多介绍加入。必如此党在国际指导之下新的路线方能实现，秋收暴动才能胜利，要毫不犹豫的执行。

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础，十五万到廿万的左派党员及其组织曾在我们指导之下奋斗到现在，我们党更要坚决的从组织上取得这些组织，从政治上去领导他们，使他们成为秋收暴动的重要力量。不要单靠凌炳谢觉斋〔2〕的秘密委员会去领导，因这种委员会只能号召而不能实际去领导的。现在全靠我们下级党部去拿住相当的左派党部共同争斗，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尽可介绍入党。

湘省委组织没有工农分子参加，中央认为应当改组，兹决改组的办法如下：

1. 由泽东公达负责与湘省委商选新省委名单报告中央。
2. 新省委以九人组织之，九人不限定都在长沙。九人中至少要有三个工农分子，三个工农运动的负责同志。
3. 中央指定胡〔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特此通知。

吴世荣〔3〕（安中原改）

八月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稿刊印

注 释

- [1] 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举行，苏兆征、瞿秋白、李维汉、罗亦农、王荷波、张太雷、毛泽东、蔡和森、彭公达、任弼时、顾顺章及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分工，中央常委的组成，北方局南方局的组成，湖南省的工作以及政权问题。
- [2] 谢觉斋，谢觉哉的别号。
- [3] 吴世荣，中共中央的代号。

中央通告第一号

——八七会议的意义及组织党员讨论该会决议问题*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

(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后，中央通告重新编号，且以后各部通告，统由中央常委发出，特此附白)

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是国际代表根据国际电令所召集的，这次会议并且改选了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纠正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倾向，给全党以新的精神，并且定出新的政策。各地党部务必要将这次会议的决议（告全党同志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的议决案，以及组织问题的议决案）给一般党员详细讨论，使得切实的了解并切实的去实行。八七会议的意义之大要如下：

(一) 过去党的指导机关（自中央以及地方）确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第五次大会以前由于不能了解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已经做了些错误，第五次大会以后，又因为不能了解对付小资产阶级的策略，而更加错误。总以为既要联合国民党，便必须要一种让·步·政·策。如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不免混灭了。其实布尔塞维克的

革命策略，在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中，是要领导无产阶级（级）勇猛的进攻封建势力军阀及帝国主义，以至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必须有这种独立的革命斗争，然后方能取得革命之领导权，然后方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及农民。固然让步退却有时是必须的，但是以前中央的政策客观上不仅是让步，却是放弃领导权——因为客观上是处处等待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去“独立”斗争，于是他们摇动犹豫之时，中央自己也不免摇动而犹豫了。过去党的指导机关，还有一种倾向，便是注重于领袖的接洽，——民党，军队，甚至于红枪会土匪等工作，都是如此。而对于群众的斗争，不能加以充分的领导，客观上往往反而加以阻滞。没有“平民式的”精神，而偏于上层领袖的结合联络。这种不依据群众斗争的力量方法及精神，而注目于上层领袖的政策——自然处处要迁就那些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领袖，而专采用让步政策，自己认错承认幼稚等等。各省党部的政策亦多采用这条路线，最显明的例子如陕西河南，当冯玉祥反动时极力退缩以图换得冯之中立。顺直省委^[1]迭次政治报告都主张向武汉“左派”让步，以免促其右倾，并主张有决心实行保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发布对中等阶级的政纲等。

（二）客观上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经到以土地革命为中枢的时期，土地革命就是土地所有制度的剧烈的改革，澈底的铲除封建制度，这是最澈底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的表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决不能领导这种革命，他

已掉过枪来了反对这一革命，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与买办豪绅相联系的反动成份，也决不能和这土地革命的发展同道。何况当时武汉政府及军队中尚有直接代表地主豪绅的分子。如果土地革命已经由群众剧烈的发展，则组织这些群众的力量而独立领导工农城市贫民的联盟进攻，便是当然的结论。但是，当时中央机关及指导的同志对于土地革命问题有许多歧见，结果，是一个总退却的指示。工会（店员等）的斗争之中亦是如此。这样，客观上便是党与正在奋斗的群众脱离了。

（三）再则，以前对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职任，始终没有明了的观念。无〈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之中是唯一能引导民权革命到底的阶级。现在农民的土地革命及农会的政权革命，既是民权革命最高形式的表演，无产阶级自然应当和农民群众建立真正的斗争同盟，领导他们去打倒土地革命之一切障碍：新旧军阀，豪绅地主，反动的资产阶级以及虚伪的“左派”。“谁不赞成土地革命及真正的民权革命（农会政权）谁便是假左派，谁便不是左派”。因此，早应有建立纯左派政府的决心，亦即建立共产党所领导的真左派的国民政府的决心。——否则永无所谓工农民权独裁制。但是事实上当时对于武汉政府的观察，确有偏重于承认他已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独裁的意思，因为当时并没有力求刷除其中豪绅资产阶级的分子，却在保存这一联盟政府。

因此种种，当时中央政策之客观上的理论是：缓和些

阶级斗争，以保存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第五次大会的政策和方针并没有实行，却是抛弃了。如今中央紧急会议接受国际的批评，必须使党员群众完全了解这种批评的意义，造成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指导，因此，必须将这些紧急会议的决议，极普遍的发到各支部之中，使党员群众都能够研究而实行；使党员群众的意见得以督促各级党部机关。党的政策问题，都要使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参加讨论，以实现真正革命意义的党内民权主义，党的群众正在努力斗争，依据他们的力量，是纠正机会主义错误最主要的方法。

各地党部接此通告及八七紧急会议议决案后，务必从速翻印传递下级党部，开始讨论，并立即遵照这些议案改正或实行党的组织，工会运动，农民运动，国民党运动之新方针。附上八七紧急会议议案一册，项目如下：一、告全党党员书；二、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三、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四、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五、告国民党革命同志书。

吴世荣

八月十二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出版的
《中央通讯》第一期刊印

注 释

〔1〕顺天，北京的旧称；直隶，河北省的旧称。中共顺直省委成立于一九二七年春。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以后改为河北省委。

中国共产党为汉宁妥协 告民众书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四日)

全国工人农民兵士及一般革命平民!

现在武汉的所谓国民政府及所谓国民党中央，已经公开的和南京、上海的反革命党以至于蒋介石妥协了，这并不是什么奇事，这本是在意料之中的必然的结果。最初今年三四月间，武汉国民党的中央，热烈的进行党权运动，那时他还不失为国民革命的中心。但是，不久他便反动起来。武汉与沪宁之争，本来客观上是革命平民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与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力量之间的斗争。然而武汉方面的国民党领袖和军官，大多数始终甘心代表豪绅资产阶级，只想利用民众的赞助，以取得自己的权利和禄位。所以等到民众真正起来要求三民主义和平民权利的实现，他们便立刻把工农群众的利益抛弃，把国民党的革命的主义和政策抛弃，他们早已接受了蒋介石等的反革命政策。

蒋介石的反革命政策是甚么？就是：

- (一) 与帝国主义妥协以求巩固反动的统治；
- (二) 为〔如〕军阀同样的把持并抢夺地盘；

(三) 屠杀民众，摧残人民的自由；

(四) 利用工贼以摧残工人，利用农贼以摧残农民；

(五) 帮助买办大资产阶级，剥削一般民众兵士；

(六) 实行所谓清党运动，其实便是排斥革命党员以至屠杀共产党。

试看，自从夏斗寅、许克祥背叛革命以来，武汉的所谓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是不是步步实行这些反革命政策，尤其是武汉的所谓国民党中央七月十五日会议公开破坏容共政策以后；本党已经两次宣言，详述武汉反动的罪状，并号召革命的民众和一般国民党员起来声讨，和声讨蒋介石一样。

武汉方面既然自己实行这些反革命政策，那么他们的所谓东征所谓讨蒋，自然不过是地盘权利的抢夺。为此，他们可以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者，秘密出卖湖北、湖南的矿山等等，蒋介石也在派代表到美国去，秘密协商所谓互惠税则。他们都是同样的新式卖国贼，只要看：蒋介石空口排日，空口的反帝国主义，然而对上海租界的加税，却始终不肯澈底反对，而且还要压迫抗税运动，现在始终令大资本家虞洽卿等与租界当局妥协了。武汉的领袖，如果到沪宁，其结果也和孙传芳、蒋介石一样，始终不能澈底力争甚么关税自主等等的，他们只想地盘和金钱！他们对于民众的赞助一概已经拒绝，他们在武汉，早已压迫民众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了。

武汉方面的所谓国民党中央，既然抛弃革命政策，自然只成了新军阀唐生智、何健、朱培德等的招牌和工具。汪精卫专和唐生智、何健等勾结，利用许克祥等屠杀工农，甚至为之文饰，比蒋介石与张作霖妥协，有过之无不及！所以他们尽量帮助这些军阀抢夺地盘，企图消灭革命的铁军，解散北伐中百战百胜勇敢牺牲的叶挺的军队，以致贺龙、叶挺等不得不决然以对付反革命的方法对付他们，毅然本着国民革命的工农政策及三民主义而起义。

武汉方面的军阀，当他们还带着国民党的假面具，而且没有敢公开的反对三大政策的时候，已经亲自动手屠杀工农群众以至学生妇女——许克祥的长沙政变，是铁一样的事实。至于所谓国民党中央，放纵豪绅贪污鱼肉平民屠杀工农，那就更不必多说了——湖南政变后成万的工农被屠杀，死状之惨酷，为亘古所未有；湖北省农民协会六月间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时，统计有四千七百余农民被杀；江西驱逐共产党员及革命的国民党之前后，工农群众被杀者也不在少数。这些人是谁杀的，严格的说来，亦是汪精卫等之政府及中央所杀的！这所谓中央和政府，除空口保护工农的欺人命令之外，何尝有半点办法去替工农严惩这些反革命的军官和豪绅；不但如此，他们反而承认唐生智等摧残民众团体的方法，自己帮助他们来解散农民协会及土豪劣绅审判委员会等革命机关。共产党与革命的国民党合作之方针至今未变，对于

国民党总理的联共政策至今竭诚执行。然而国民党领袖汪精卫、顾孟余等，既然背叛国民党及国民革命，既然甘心做豪绅军阀的刽子手，既然甘心做屠杀千万民众的杀人犯，那么，共产党当然不能和他们分负这种责任，所以宣言退出国民政府，而与革命的国民党领袖孙夫人、邓演达同起号召国民党员和民众，来推翻这些叛徒及蒋介石、张作霖的反动统治。他们这些叛徒却还敢冒充国民党中央，还有脸尽说自己同蒋介石等沪宁叛徒不同！事实终归是事实：七月三十日他们在汉口已经公开的屠杀车夫，激起武汉工人的总同盟罢工的抗议；他们接着便是大施逮捕和杀戮——如今被捕的工人民众几百，被杀者已在五十以上，其中共产党员死者二十余人。最近汉口的消息：卫戍司令部已下密令捕杀共产党，有“宁可格[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之语！有这样铁一般的事实在此，武汉叛徒即使在所谓讨蒋宣传之下再说得花言巧语些，事实不能欺骗民众的。

武汉方面已经实行所谓改组民众团体，将一切群众所选的工农学生妇女团体完全解散，其手段是先密令军队强占工农团体的房屋，表面上下令军队退出，实则自己派遣工贼农贼实行改组。就是以前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武汉市党部，最近也和湖南政变后的各级国民党党部一样，也和四月十二上海屠杀之后，东南各省的党部一样，遭了解散和改组。他们并且学蒋介石一样用法西斯蒂的办法来摧残工农群众！他们的讨蒋宣言上说蒋介石“利

用工贼以摧残工人，利用农贼以摧残农民”，一面骂蒋，一面同时学蒋——解散全国及湖北的总工会及农民协会，停止一切民众团体的活动，还组织所谓工人武装队，这种所谓工人武装队，就是七月三十日汉口洋车夫罢工时，殴打车夫工会委员长几至死命的地痞光棍（卫戍司令部用一千元收买来的）。此后的武汉，已经和上海同在这种反动的豪绅资产阶级之白色恐怖之下了！

武汉方面早已和上海、南京一样，政府的财政政策，不外是剥削平民的苛捐杂税，滥发纸币、国库券、金库券（湖南）等。对于买办奸商的封锁及其扰乱金融的阴谋，不但不严重惩办，没收他们的财产以救济贫民，反而时时庇护他们的反动行为，如故意停厂使工人失业，和〔私〕运现款出境以扰乱金融（汉口美孚洋行每天收进现款五六万元）。当初工人群众起而裁制这种反动行为时，这些所谓国民党领袖便大骂“过火”，下令禁止。蒋介石、白崇禧收虞洽卿等贿赂一千五百万元而屠杀上海工人，汪精卫、陈公博等亦就会同汉口的买办奸商（把持总商会的商阀）解散店员工会。蒋介石等在东南抽苛捐杂税，汪精卫等便在武汉滥发国库券。他们借口集中现金筹备兑现之政策，而实际上将汉口四五百万现金任令各新军阀（唐生智等）分配。其结果，上海对武汉的封锁固然使长江上下游的经济都起极大的恐慌，而军阀的朋分现金，更使一般民众——贫苦的小商人、工人、兵士困苦到万倍。小商人本是破产到不堪，简直没有生意做，

十家有九家关门，米盐油等都没有了。工人每月得十几元国库券，实际只得二三元钱，连一顿饱饭都没有吃。农民拿一担米只换几张没有用的纸。兵士更欠饷到三四个月，衣履不周，天天挨饿。钱到甚么地方去了？原来军阀和贪官污吏买办奸商，正趁着这钞票低折的时候，大做买卖，从中操纵呢！而唐生智说：“国库券让他倒好了，——张敬尧在湖南发几千万纸币，倒了亦没有死人！”哼！这些军阀滥发库券，等于抢劫现金盐米，还想再发四千万中央银行钞票，陷人民于万死之地！

武汉方面在值此反革命政策之下，还敢说他们的反共和蒋介石的反共不同，真是无耻之尤！武汉现在也在“清党”了。他们的一切政策既然和蒋介石丝毫不异，他们的清党反共，自然也是排斥一切革命党员，以求获得反动之“自由”。他们说清党是同时肃清腐化分子。请问，在上述那些反动政策之下，还有什么腐化不腐化——执行那种反动政策的人，他们自己就是腐化的分子。

蒋介石、李济琛以至冯玉祥、阎锡山等，现在都是一致实行这些反动政策。豪绅资产阶级及一切国民党中代表这些阶级的军阀官僚政客，便一步步的走向反革命，甚至以前国民党的领袖从戴季陶、胡汉民一直到汪精卫，也都在工农平民与豪绅资产阶级两相争持的过程中，到头来始终完全站到反革命方面去，甘心背叛国民党之主义及政策。从今年四月十二日的上海屠杀直到七月二十〔三十〕日汉口屠杀，只不过是这些反动过程的最

露骨的表演而已。如今武汉与沪宁的妥协，自然是当然的结局。

武汉的所谓中央与政府，现在却说蒋介石的离宁是他“屈服于党的纪律”。这是何等无耻的话。我们知道：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李济琛、白崇禧等，在一致压迫民众的时候，互相之间有许多冲突，蒋冯唐白李等的部下又有许多互相冲突的利益。这在〔些〕是封建式的豪绅阶级以及薄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天性使然，他们没有全国的利益，而只有同系的同乡的地方的行业的利益，他们之间不会没有互相的斗争——以民众为牺牲，以兵士为炮灰的私战。他们早已背叛革命，所以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已经绝无革命的意义。这次白崇禧、李宗仁、何应钦等反对蒋介石，也不过是这种军阀私斗的第一幕。表面上武汉、南京的政府仿佛可以统一起来，实际上立刻又要发现唐生智与李宗仁、白崇禧，或者冯玉祥与阎锡山、唐生智之间的斗争。全国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大危机，并不因这次宁汉妥协而缓和，而且还有继续长增高的趋势。奉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黄绍雄、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等等大小新军阀，在英美日列强帝国主义勾结玩弄操纵之下，纵横掉〔摔〕阖，朝三暮四的明争暗斗，立刻便要发生全中国之极大纷扰，战争，苛税，屠杀……这是宁汉妥协的“意义”了！

蒋介石的离宁，决不是甚么“屈服于党的纪律”，甚么“消除分裂危机”。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徐

州会议时，既没有人下野，亦没有人承认武汉，那时他们是和冯玉祥联合起来压迫武汉。如今他们被奉鲁军阀打败了，然后“服从武汉”——请问，这是什么“屈服于党的纪律”！——蒋介石离宁的代价是甚么？就是上文所说的武汉政府与军阀帝国主义妥协，屠杀工农民众，排斥革命党员，剥削平民兵士之政策。武汉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勾结，甚至于与张作霖企图妥协（汪精卫自己说的），武汉中央及政府拥护了屠杀两湖工农的许克祥等豪绅资产阶级，解散了真正工农的全国及两湖的总工会农民协会，以及其他工农民众团体，杀了不少共产党员及“枉死的”一般人民——武汉政府及中央这样十足的实行了反革命，然后再博得屠杀上海工人的白崇禧等的夸奖——白崇禧、李宗仁的文（八月十二日）电说：“诸公毅然清党讨共，是护党救国之忠诚，已与宁方一致！”所以蒋介石在私利冲突而失败的时候，还能着着实实的教训武汉“诸公”一顿，——白崇禧等的寒（十四日）电说：“总司令（蒋）驱共目的已达……现双方所争持者皆不成问题。”蒋介石的下野宣言说〔1〕，他“要求湘鄂赣诸省澈底清党……昔时曾受共产党迷惑者，迄今亦觉悟其非……然如何能不要一切实的保障，俾一误不复再误；所谓切实之保障者无他，即相率会议于南京，用符驱共产党之名实。”这明明是说：汪精卫等的屠杀民众和共产党，还太不惨酷，——“你们不到南京向我投降，始终算不得真正反共产党——始终算不得十足反革命党！”

蒋介石离宁，而汪精卫等能与沪宁豪绅资产阶级的刽子手白崇禧等妥协，这个代价就是中国几千百万人民的鲜血和痛苦！汪精卫等现在也就无耻的公开的对蒋介石的政策投降——武汉中央在白崇禧等文电以前，先就有一个求和的通电，这一“通告全国党员”的电报上说：“至于武汉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如个人服务有所不善，当受第四次全体会议之处分，如认为有改组机关之必要，亦不妨提出会议，听候解决。”这里所谓“有所不善”，大概就是恐怕南京方面的反动军阀还嫌他们杀人杀得太少了，排斥共产党太不出力了！

总之，武汉的所谓政府及中央，虽然因勾结屠杀上海工人之新军阀白崇禧等，而能够去蒋，而实际上是更进一步与新军阀主义同化，对蒋介石的种种反革命政策投降。现在宁汉的妥协或“统一”，不过是豪绅资产阶级代表之政客军阀互相之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罢了！汪精卫等的反动，到此已完全揭露，丝毫假面具也不用戴了！

中国政局这样的变化，从今年四月十二日至八月十二日，是中国的反动豪绅资产阶级一步步的完成他们篡窃国民党旗号，以实行其反革命的过程，中国国民革命因为这种反动危机的完成，的确是遭着了部分的失败。但是，中国工农已经起来，中国的一般革命平民与兵士，都不能容忍这些革命叛徒，新旧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奉鲁余孽，一致的压迫和剥削，使全国陷于空前的政治经济的危机——东南各省在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周凤

歧〔岐〕之下，两湖、江西在唐生智、朱培德、张发奎之下，河南、陕西在冯玉祥之下，山西在阎锡山之下，奉直鲁在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之下，都是普遍的遭着屠杀压迫，以及不兑换的纸币库券苛捐杂税！这些新旧大小军阀还在互相排挤私斗，延长战祸，分割中国。中国的工农民众兵士决不能忍受的。我们自己要拿起枪来，推翻这些大小军阀！我们决不能迷信甚么东征北伐，这反正不过是以暴易暴。我们决不能迷信甚么国民政府“统一”，国民政府早已消灭！如果还认这种屠杀民众摧残工农的新旧军阀政府为民国〔国民〕政府，承认他们所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那么，这不仅是国民党的耻辱，而且是一般民众的耻辱！我们革命民众和国民党一般革命的党员，应当自己起来恢复革命的国民党，夺回我们大多数人民的权利。要“工人有饭吃”，“耕者有其田”，要一般平民得着解放，要全中国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必须要工农及一般革命平民自己拿到政权！

中国的工人农民要取得真正的政权，中国一般革命平民〈要〉取得政治自由。中国的工人，要求切实的改良生活，要求八小时工作制，要求增加工资，要求工资发现金，要求劳动法的保障。中国农民要求土地，要没收大地主土地，要求农民协会组织的自由，要求农民协会的真正民权制的乡村政权。中国的兵士要求改良待遇和增加兵饷，要求土地和工作。中国的一般平民反对买办奸商

操纵金融经济，反对不兑现的纸币。中国的平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的特权，及收回帝国主义霸占的海关租界，没收他们的工厂企业。中国的工农群众，你们的这些要求实现，然后真正是三民主义的实行，但是国民党的叛徒，自蒋介石直到汪精卫，都一致的反对这些要求的实现，反对三民主义了。你们只有自己起来，拿起武装来，达到这些要求！

南昌起义的贺龙、叶挺的军队，正本着这些要求，力争革命的继续发展，力争没收大地主，歼灭一切豪绅军阀，力争耕者有其田，工人有饭吃，力争真正民权的实现，——力争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建立，以推翻一切新旧军阀的残暴僭窃的叛徒政府。——贺龙、叶挺他们的军队，已经本着这种目的而起义了。这种军队才能成为民众的武力，才是真正力争三民主义的实现。全国的民众兵士们！赶快拿起武器来，创造并扩大自己的军队，夺取自己的政权，国民革命的胜利方才能够达到！

现在武汉的所谓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已经公开的与南京反革命派妥协，最终的暴露自己的反动了。如果这种新旧大小军阀的反动政府不推翻，那么，他们之间的妥协冲突并吞分裂，必定使中国更陷于实际上瓜分亡国的惨祸！只有真正的革命的国民党，如孙夫人、邓演达的主张，还是信任“亿万民众的力量，仍然要继续奋斗，以达到最后的目的”。全国的民众兵士们！赶快起来，在共产党与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推翻这些互相勾结的叛徒和一

切新旧军阀！只有武装工农民众，创造民众的革命军队，力争真正民权政治的实现，工农兵士民众真正自己取得政权，推翻这些大小新旧的军阀统治，然后国民革命才能成功，然后工农解放的道路才能开辟出来。中国工农兵士及一般革命的民众！团结起来！歼灭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新旧军队〔阀〕，及背叛国民党的一切种种叛徒，创造我们的自由世界——工农平民的独立的中华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四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日出
版的《前锋周刊》第二期刊印

注 释

- 〔1〕 一九二七年八月上旬，蒋介石在津浦路前线和孙传芳、张宗昌作战失利，国民党营垒内各种矛盾加深。八月十三日，蒋介石在上海通电宣布下野，提出实现宁汉合作，并力北伐和彻底肃清共产党的三项愿望。九月底从奉化赴日本，回国后在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支持下，积极筹备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这次会议，蒋介石重新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进一步加强了对党政军权的控制。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 与策略的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常委通过) (1)

(一)

中国革命，现时正在自己发展之中，经过极危急极剧烈的转变关键。这一转变关键，即是各种阶级力量剧烈的变更其结合之形势；各阶级力量之变更其结合形势，实在早已开始，而以四月十二的上海屠杀至七月十五的武汉政变为其结局。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之初期，即已完结了他们的革命作用。现在呢，这一阶级的各种成份，甚至其中最急进的分子，都已完全走入了反革命的营垒，而成为反革命之最积极的动力之一。革命营垒中，阶级分化，已经表演完结。民众〔族〕资产阶级开始与国际帝国主义勾结，并已与反动的封建军阀联盟。蒋介石的四月十二屠杀以前，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营垒之中，有两个倾向并存着：一是民族改良主义的倾向，一是急进的革命主义的倾向，这两个

倾向一直互斗到现在。现在呢，已经是两个完全独立互相仇视而不可调和的营垒〔垒〕相抗衡：一是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营垒；一是工农的革命营垒。完成中国的民族解放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任务，现在已经完全放到工农运动身上，只有工农的民权独裁，才能履行这一任务；只有工农的民权独裁与国际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以及一切资产阶级直接斗争，——“民族”资产阶级亦在其中——如此，方能履行这一任务。

民族资产阶级与工农运动之间的联盟随着工农运动的发展，固然日益趋于不可避免的破裂，然而并不一定要象现在这样的破裂形势。工农民权独裁的胜利，亦是各种阶级力量之急剧的变更其结合形式；可是这种胜利，只能在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去达到。各阶级力量之急剧的变更其结合形式，如果要达到工农运动方面的胜利，那就必须是民权革命的急剧的前进与高涨。然而实际上现在是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得着了胜利，这当然是中国革命的极大的严重的失败。这一失败的责任，大部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指导之机会主义政策，阻碍了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放任资产阶级的行动。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居然能吸引几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到自己方面去（尤其是知识分子及与地主大资产阶级勾结的一部分反动分子）。这种反动的胜利，其规模很大；如果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前，尤其是四月以后，不执行那种屈服的取消群众运动的方针，而能切切实实实行

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策略，那么反动的胜利，不能如此之大的规模。现在中国革命经过极厉害的危机，其原因便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之失败——以前中国共产党指导群众运动的方向，完全是错误的、不革命的。战胜这一危机的基本条件之一，便是中国共产党之正确的革命的策略，要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出发，而力解决革命斗争中每一阶段中客观上可以解决的一切任务。

（二）

中国革命还没有能解决其许多任务之中的任何一个任务，而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先变成了反动的力量。中国革命在现时这一阶段之中，还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不但反对封建制度的余孽，并且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而且革命已经造成一种力量，足以来解决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在这两年来，已经发展得非常之伟大。然而正因为这种力量之发展，便把民族资产阶级推到反动的营垒〔垒〕之中，而革命却还没有能使中国之国际地位，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得有任何重要的变更呢。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得着了暂时的胜利，这种情形使中国革命之两个前途的问题变成目前紧迫的问题——已经是中国平民的一般斗争的中心问题了。

如果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和国际帝国主义妥协成功（而民族资产阶级正在力求这种协定的成立），如果他竟

能在全中国范围的实现与封建势力的反动联盟，如果封建资产阶级的联盟能够完全镇压工农的群众运动，最后，如果国际资本政治上经济上确有充分的力量，足以帮助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巩固起来，——那么在这些条件之下，中国的发展就会走上长期的迁延的使几千万工农受着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灾祸的道路，——以资本主义来排斥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社会经济关系。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如果得有巩固的胜利，并有外国的赞助，则中国将要进于“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之发展，不过比较前一世纪的普鲁士更加要受阻碍，更加要多受痛苦，因为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及中国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与野蛮性，实在是一切进步中之巨大阻碍。即使对于向着资本主义前途之进展，亦是极大的阻碍，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与世界帝国主义加重其对于中国之殖民地政策的剥削互相联结。

至于别一种的发展道路，则必须革命能够战胜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而建立工农的民权独裁制，方才得有保证。革命在这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阶段上，其客观的内容是：一、完全解放中国于外国资本压迫之下（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帝国主义的特权，取消外债，关税自主〔自主〕，外国人所占有的生产资料交通机关收归国有等等）；二、建立全国的国外市场，——没有在政治上统一中国，没有消灭军阀的割据，没有集权的中央政府，这是不可能的；三、肃清一切阻碍中国发展的封建

遗毒（取消地主豪绅的私有田地，土地国有，重新分配土地，自上而下坚决的推〔摧〕毁一切国家机关，而代之以革命的民权的新政府，歼灭土豪乡绅官僚军阀等）；四、急剧的改良工人阶级之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地位，坚决的取消工人之无权无利穷困不堪的现状——这是外国资本在中国之经济力量之主要根源之一。

这些任务，只有工农的革命民权独裁制，才能够实行。然而中国现状的特性，更在于这种自无产阶级农民来实行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反抗中外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能够而且应当直接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无产阶级及农民，为着完成民权主义的革命反〔及〕中国之民族解放，也不能不进而没收一切外国工业及一般反革命党财产，这就要超过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如果无产阶级及农民，怕超过资本主义式的关系，怕进于社会主义式的道路，那么，就是民权革命也不能得到胜利的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将以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与力量之程度如何而定，并且要靠革命的国际无产阶级方面的帮助。然而这一转变始终将要是个无间断的过程。中国革命的这种特性，以及无产阶级独裁胜利之存在，就是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之客观的保证，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认清的主要的目的。

至于这两种前途中，究竟那一种前途得以实现，那就只有斗争可以决定。为要有正确的指导起见，必须要很

清楚的分析一般的客观形势的〔以〕及每一时期各种力量之相对关系。

(三)

据一般的客观形势看来，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其胜利是极不巩固的，而革命之重新高涨，不但在最近期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免的。张发奎军队之中共产党员在南昌起义，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就可以算得这种革命的重新高涨之先声。如果革命之重新高涨客观上的前提不具备，则南昌起义的暴动也就不可能的了。这些主要的客观前提是：

(一)中国现在任何稳定都不能有——因为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政变，其社会经济政治的基础本是如此。中国的革命，本来是由于这封建制度的半殖民地的国家内，因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集聚了许多的国际国内的矛盾，日益增长激烈所致。革命还没有能解决其中任何一个矛盾，反而使这些矛盾格外剧烈起来，弄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就可见，为什么现在发展全国的大危机，这种危机的急遽，正在资产阶级军阀反动之后。极紧迫的经济危机(财政、商业、工业都是如此)，和政治军事的危机互相联结着(国民革命军的崩壞〔坏〕，军阀的分裂和互斗，蒋介石下野，武汉政府内不可免的纠纷分裂割据的大扰乱，表面上虽然南京和武汉政府要统

一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最后，国民党也在崩坏），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不能够继续力争中国的民族利益，不能够保障中国几〔国〕家的统一，不能够解决工人问题土地问题，不能够预防经济的大崩坏，资产阶级军阀自己的营垒里，土崩瓦解的倾向非常害利〔利害〕。这种全国的大危机的出路，只有民权革命澈底的胜利，否则，便要使民众受着无限的痛苦，中国的政治经济经过极大的崩坏，中国因此而大大的退步，由此而准备“普鲁士”式的发展道路。

（二）工农之革命的群众运动，虽然受着失败，然而还〔没〕有大破坏，还没有因为受了镇压简直不能够重新高涨。共产党员的积极，工人区域中秘密工会的奋斗，就足以证明，虽然白色恐怖非常利害，然而群众的积极仍在日益增长。广东、湖南、湖北、陕西、河南等省，虽然有极残酷的反革命的压迫，然而农民运动的革命基础仍旧存在，革命已经引进极广大的工农群众，他们的生活状况，在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简直是日益恶化而没有出路。所以这种群众独立的自然暴发的斗争，不能为任何恐怖政策所完全镇服。

（三）中国的国际状况没有经过任何的变更，使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得以巩固，民族资产阶级力求与外国资本妥协，然而同时，他至少在口头上不得不代表中国的民族利益而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而〔两〕面政策，自然又使企图完全统治中国的外国资本离开他，使外国

资本和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发生困难。别方面呢？帝国主义列强自己之间有冲突，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联盟之内，亦有冲突，——互相争权夺利的抢地盘主义是他们的天性。这种情形，也是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的阻碍。最后苏联及国际的革命运动，不〔又〕是加强中国群众革命斗争的绝有力的动力。

有了这些客观条件之后，无产阶级的先锋——共产党之组织和正确的政策，便是革命的重新高涨之坚〔决〕定胜负的动力。中国共产党保存了自己的战斗队伍，不怕反动的缉捕压迫，而且能够改正过去指导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凡此一切，总合起来，便使中国共产党负着极大的任务，就要在一切客观上有可能的地方，都立刻准备组织革命的暴动，认清自己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军阀的政权，而建立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权制裁〔独裁制〕。

（四）

因为中国各省的情形大不相同，因为没有集权的政府，所以中国共产党不能预定一个时期举行全国的暴动，以推翻中央政府来决定暴动的胜负。现在本党总方针应当是：准备并组织那些已成农民运动中心的各省之武装暴动，现时便趁秋收时期而实行抗租抗税，在这样一样的时期之中，各省暴动的时日，只能看当地情形及→

般情形去决定。中国共产党应当认真的明了并且应用马克思、昂格斯、列宁的暴动学说，——暴动是一种艺术，不是可以耍着玩的，要极精细的在技术上组织上政治上准备好，既然决定暴动，便决不可以中途抛弃这一种计划，一定要引导暴动到底，应当坚决的绝不回头的勇猛的行动，永久要由自己方面发动，而立刻采取进攻的形势。应当记着：在紧急关头采取防御的战略和动摇犹豫的态度，必然陷暴动于败亡等等，尤其重要的，是要破坏动摇我们阶级之武装力量。因此，本党应当极快的征调最大限度的力量，到新旧军阀的军队中去工作，组织并发展我们的支部。这一任务，是现时非常紧迫刻不容缓的任务，本党以前差不多完全没有注意到。

民众工农暴动的胜利，势必引起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及一切反动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残酷的反攻，从经济怠工，直到军事行动。中国共产党应当坚决的准备镇压一切反革命的企图，实行猛烈的革命战争。必须准备没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财产企业工厂，采用极严厉的镇压政策，——实行革命的独裁。

（五）暴动之方式

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这有以下的几个理由：

（一）国民党是各种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之特殊的形

式，这种形式是中国历史上所集垒生长出来的，国民党的领袖已经被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所利用，以为反动政策之工具，不但背叛了国民党党纲主义中的一切革命的进步的成份，而且葬送了国民党，使他要丧失政党的资格。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不能使国民党形成资产阶级的领导政党，这种政党必定要在与现时国民党不同的社会政治基础上方能发生。要恢复国民党，便只能恢复革命的国民党，或是简直不能恢复。汪精卫唐生智的所谓党权三民主义等等，完全是冒充国民党的假招牌，以掩饰其反动的政变，——这次政变其实是国民党亡党的政变。

(二)国民党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而且一直形成了国民党内左派的中心。本党过去指导的机会主义，固然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变成了无产阶级对于小资产阶级投降的政策。但是在下级党部之中，党员群众的行动，是以纠正这一机会主义的方针。共产党下级党部群众的行动与宣传，使中国国民党在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至一部分工业群众之中，已经很有革命的威信。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应当让出这个旗帜，使一般叛徒篡窃国民党的名号，而做军阀及反动资产阶级掌握里的玩物。

(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组织暴动，还有一个目的，便是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这些分子，本是左派国民党的主要群众。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的胜利，使小资产阶级更加动摇分崩。一部分小资

产阶级被反革命派所吸引去了，他们的群众政治上是崩坏了，无所适从了，中有一小部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还留在革命的道路上。本党现在和他们合作而组织秘密的革命的国民党。但是革命斗争之不可免的重新高涨，又要吸引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到工农的群众运动方面来。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本党应当做恢复左派革命的国民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不但应当加入秘密的国民党党部，而且要保证自己的指导作用[用]。同时共产党应当极谨慎的避免过去指导之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保障本党的自己的完全的政治独立，保持本党批评小资产阶级的同盟者之摇动犹豫之无限制自由（参看中央紧急会议告全党同志书）。

尤其重要的：是使革命的国民党民权主义化，凡是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举行暴动而胜利的地方，工农群众团体，应当用团体加入的方法，加入这种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群众团体联合的党，使反动分子不能假借国民党党部名义，来实际上做阻滞革命的工作。革命的国民党的这种结构，可以使将来革命发展到更高涨的阶段时，政权形式将要进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那时过渡更容易些，更没有流弊些。

（六）政 权

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即是保

证工农民权独裁制直接进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独裁制；这种形式之下，最容易完成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且是保证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方式。本党认为照现在的形势，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线，而且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完全只要看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之程度如何而定，所以我们现在就应当在党的机关报与劳动群众之中开始宣传苏维埃的意义，以便到了必要的时期，立刻可以开始组织苏维埃。

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的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不〔在〕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现时，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然而这种宣传现在就应当开始，而且要做得非常得当，非常广泛。如果组织革命的国民党的计划能够成功（如果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还来不及完全消灭国民党），那末，本党就应当在革命超越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范围时，使苏维埃制度得以从新的革命政权之中生长出来，——这种新的革命政权，现在就要着手组织，依照最广泛的各种革命阶级选举的最民权主义的代表制度。

（七）政 权〔2〕

为指导各地暴动起见，应当在各地建立革命委员会。暴动成功之后，这些革命委员会之中加入左派国民党人（但必须保持共产党在革命委员会之中的指导权），革命委员会就变成临时的革命政府之性质，全省范围之内，应当称为某省临时革命政府。乡村中之暴动成功之后，革命委员会立刻应当组织农民协会而以一切政权交给他，农民协会秘密存在的地方，必须在准备暴动的时候就使农民协会的指导者加入革命委员会。

城市之中的革命委员会或则某省的临时革命政府在暴动胜利之后，就要着手组织新的政权，应用下列的形式：平民代表会议，由各工厂工人，各职业工会的手工业工人或店员，学生会学生，小商人团体的小商人，军队的兵士等以职业选举团体选举的方法（不以区域为选举原则），以人数为标准，公选代表组织之。由选举平民代表会议，选出某县某市的革命执行委员会，城市之中的政权便完全交给他。全省的政权应当由各县平民代表大会选出。各县革命委员会及各省临时革命政府，应当定出召集这种城市平民代表会议或全省平民代表大会的日期，这种日期依暴动之后的形势如何而定，如果组织新政权尚须很大的政治上的准备，则召集代表会议的日期，可以略为迁延。

资产阶级及封建军阀等类的阶级，不应当叫他们参加革命的政治机关。

本党现在提出下列口号——乡村之中是“政权归农民协会”，城市之中是“革命的民选的政权万岁”！（民选革命政府）。

（八）军 队

除去澈底的反对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之阶级斗争以外，民权革命是决不能胜利的。这种革命战争，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雇佣军队决不是革命的靠得住的工具。军阀如今很容易的利用雇佣军队来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这就是证据。因此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不要有雇佣的性质，而要开始于志愿兵的征调，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农的革命军。这种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坚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这是现时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本这个目的，本党应当努力的改组现时参加革命的雇佣军队。同时应当想种种方法武装工农（如某市工军，某县农军的地方性质的武装，不用旧的纠察自卫的名称），无论如何不能解散他们。从这些工农武装，是造成新的革命军队之中心势力。

（九）对帝国主义的策略

民众暴动胜利的地方，如果可以遇见与资本主义列强直接的接触（例如广东以及其他有海口的地方），那么，本党应当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应付的策略，使与帝国主义的武装冲突不至于过早的发动。本党应当继续不断的增加反帝国主义的政治宣传，有必要的时候，可以领导经济的斗争（如抵制外货等），同时如果与帝国主义的直接冲突可以根本牺牲新兴的尚未巩固的革命政权，——当这种工农阶级民权独裁制还只有很小的地盘的时候，——那末本党应当暂时避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夺回租界，没收外国工业使为国有等等）。应当记着，——帝国主义在中国各种反动势力的赞助之下（从张作霖一直到汪精卫），必定时时刻刻来挑衅，想借口来屠杀，来镇压真正革命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平民政权。本党应当预先看见这种危险，在不利于新的革命政权之时机，不要接受帝国主义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革命的无产阶级赞助之下，等到对于革命最有利的时机，然后要领导中国工农民众去直接的与帝国主义斗争。

（十）

最近期间本党对于农民运动，工会运动，以及组织

问题上的任务，已经有八七紧急会议各个议决案，并且有中央紧急会议的告全国同志书，这里不再复述。

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出版的《中央通信》第二期刊印

注 释

[1] 原件未标明时间。据会议记录，本文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的。

[2] 六、七两项标题重复，疑有误。

中央通告第五号

——最近妇女运动的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常委通过)

自处反动环境以来，本党妇女运动，似乎停顿了一样，这是表现我们的落后，表现我们的极大的错误，现在我们应该立刻纠正这些落后和错误，并且各级妇女部应在各地恢复积极工作！其职任首先便是：

(一)恢复各级各地妇女部工作（尤其在反动最压迫的地方，许多女同志都在无形中离开了。如现在湖北，即是如此），妇女部负责人，应集合最少数活动分子专去找寻已离开的女同志，继续要她们恢复党的生活，尤其是女工方面要督促她们切实的执行。

(二)吸收女工农妇同志，并训练她们的秘密工作的智识(行动技术态度及活动的方法)，指导她们的斗争，领导她们（尤其是女同志）参加日常的政治经济斗争(在工农团体指导之下)，一直到参加暴动中的各种工作。

(三)在工农群众中必须根据党最近对政治上的策略，派人去秘密宣传，务使这种宣传深入群众，以巩固

我们的下层基础。

(四) 现在反动派极力想拉拢工农群众，而且公开的把工农团体来改组，可是我们无论遇到甚么困难的时候，不能放弃工农群众的。要领导群众起来反对这些官办的假民众团体，所以要在秘密中恢复她们本来的组织，巩固她们与秘密工会的关系，同时可派女同志（可靠的）到反动组织中去活动。

(五) 我们对于妇女运动，必以女工和农妇为中心，所以要集中力量去对付。

(六) 一般妇女运动的团体，必以女学生及其他知识分子为中心，所以也要多注意知识分子方面去努力的（参看第八项）。

(七) 反动派的妇女团体中，本党亦可派少数得力同志去工作，她们应受党的严格的指挥与监督。

(八) 与左派的革命的国民党共同组织各种独立的智识妇女的小团体，如研究社，俱乐部，进化社，慈善团体以及同学会等。经过这些团体，宣传并赞助党的政策。要使她们对于农工运动实力的赞助，秘密与工会中的女工发生关系，并可公开的组织妇女劳动之调查，救济罢工失业等之募捐，宣传农民革命之意义等。

(九) 对于这些知识分子，在她们的营垒中必须根据我们的政策和理论，建筑一种革命舆论的中心！这样才能使她们的力量巩固，可以对抗反革命者的进攻。

(十) 本党妇女部应指导这种智识妇女的革命团体中

之党团工作，并参加女工农妇的组织工作。

（十一）革命妇女的小团体中的分子，可以加入公开妇女协会，在她们之中发生左派党团作用，拆散反动妇女领导的群众（如遇有会场中，右派提出反动主张的时候，领导群众反对她；而且不使其通过，或简直使她们不能开会），揭发她们的虚伪及反动之真面目（如反动的假革命者，对于女工所提出的要求等等，我们应领导群众逼其非实现不可，即此可以证明她们是欺骗工农妇女的，使群众不信任她们，而且认识她们不是为真正工农妇女谋利益的）。

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日出
版的《中央通信》第三期刊印

中央通告第六号

——今后学生运动方针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常委通过)

(一) 今后学生运动原则

学生群众是各种社会阶级青年的集合，当此社会阶级如此剧烈分化的时候，学生群众的分化及其组织之分裂是自然的趋势；今后学运的原则，应当抛弃以前笼统的“统一学生运动”的口号，在学生本身利益一直到实现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致力于团结左派学生的运动，以推动学生群众的分化，使左派学生群众在无产阶级的影响之下参加民权革命土地革命中的各种紧急斗争，同时应分化右派影响下的学生群众以削减敌人的力量。

(二) 学生群众斗争的方式

学生境遇日益痛苦，革命运动日渐紧张，我们应切实领导学生群众参加政治的本身的和思想上的各种斗争。

A. 政治斗争。除领导学生继续进行反帝国主义军阀

斗争外，应毫不妥协的反对反动派的国民党中央和所谓国民政府，进行争得学生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一切政治自由，务使左派学生实际参加土地革命的実施——在学生之中宣传本党最近的政策，及南昌起义的革命委员会。凡我们指导和影响的公开和秘密的学生会学联会，对于一切政治问题，必须跟着党的政策照学生的口吻发表宣言和主张，绝不能因为组织问题和其他关系而对于政治主张有何让步。要组织革命学生青年，准备他们积极参加各地暴动工作。

B. 本身利益的斗争。因为武汉与南京北京情形同样的反动，我们应打消以前“在革命政府之下减低学生本身利益要求”的观念，而尽量提出学生应有尽有的要求。领导学生群众起来反对政府，将摧残教育的罪名加之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除“参加校务”，“择师自由”，“经济公开”等要求外，应提出“反对军队占据学校”，“反对停办和合并学校”，“确定教育经费及其来源”，“减少学生读书负担”等口号，总之，须注意从本身利益的斗争，去引上政治斗争的道路。

C. 思想斗争。现在一切反动思想——反阶级斗争的理论乘反动势力进攻而发展，我们应从反面打破这种思想与理论，从事实上解释阶级斗争的需要，说明中国革命应有的前途，和苏维埃政权的内容和形式，尤须注意解释土地革命是扩大中国革命力量完成革命的必要条件。总之，在学生群众中应从思想上去结合左派学生群众，攻

击一切危害革命及阶级斗争的理论。为此目的，应注意党与团的刊物在学生中的推销，同时注意学生自己刊物的整顿与纠正。《中国学生》应仍出版，使之成为左派思想的领袖刊物。

(三) 学生运动中的组织形式

当此反动派进攻，革命学生会及学联合会不能公开存在，公开学生组织被反动派包办的时候，学生运动中组织原则，应一方能适合于号召群众，同时须求其便于斗争。

A. 须保存学生会的秘密系统组织。在学生会或学联合会被反动派占领或封闭(如北方)而不能存在时，我们应使秘密学联合会能存在，以便号召学生群众，并进行政治宣传(通电，宣言……)且须使各级学生会间发生系统上的组织关系，在秘密的全国学生总会指导之下进行活动。各地学生运动委员会应负事实上主持秘密学联的工作。

B. 发展左派学生青年团体的组织。因为秘密学生组织不便领导组织学生群众，今后应改变以前“在革命政府范围以内应集中学生于学联合会之下，不必另组织青年团体”的政策，而加紧发展青年团体的工作，以结合左派学生群众于我们的影响之下，同时又是我们公开活动领导学生群众斗争的工具。今后应按学校与地域发展此种组织，但不必设立任何全国性之统一组织。

C. 注意破坏敌人的学生组织。在我们领导下的学生会或学联会，不应加入反动派包办之学校和全国或全省学联会，因此而提高了他们的地位。应设法使一部分学生组织中立，但我们应派一部分得力的灰色同志参加反动派之各级学联会之组织，其目的是破坏他们的组织与工作，而进行内部左倾群众的结合和整批退出其组织的运动。

（四）全国学总工作

A. 缩小机关，并完全使其秘密存在。党团书记最近期内尽量督促湘鄂赣豫等省秘密学生组织之成立，设法与各地秘密学联建立良好之关系，对于一切政治问题应极敏捷的根据党的政策发表主张。力求《中国学生》能按期出版，并想法推销到各地学生群众中去。

B. 学总应注意武汉工作，可以与武汉市及湖北省学联建立极亲密之工作关系，协同准备开学时学生中各种活动。

C. 学总负责同志应多与党或团中央接洽，全国学生运动应由党与团共同负责指导，纠正以前团应多负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有〔由〕党负责的错误观念。各级学运委员会应认真加紧工作。

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日出
版的《中央通信》第三期刊印

中央复湖南省委函

——对暴动计划、政权形式及土地问题的答复·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1〕携报告来，中央常委即开一会〔2〕专门讨论湘〔湖〕南工作问题，××作了一个口头报告，兹将结果答复于次：

一、你们决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在原则上是对的，但你们在此计划中都有两个错误：

（一）从你们的书面报告及××的口头报告，可见对于长沙附近各重要县份农民暴动的准备非常薄弱，而要靠外面军事力量夺取长沙，这样偏重于军力，好象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其结果亦只是一种军事冒险。

（二）专注意长沙工作，忽略了各地的秋暴工作（如放弃湘南计划并没有积极的有组织的去准备长、潭、浏、醴、乡、宁等处暴动）。事实上××两团已经不能为我们用。中央认为湖南暴动应以农民军事力量最大的地方，并且是战争地势最便利的地方为发动点；可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长沙之发动，须先从长平浏一常〔带〕及潭醴衡一带有充分的准备（民众的和军事

的），同时在长沙城应有充分的政治宣传，与群众的组织的准备。在宝庆^[3]一带如有可能，亦可做一暴动点。湘中发动，集中军力，扑城取长沙；湘南发动与湘中联合来攻唐许，并夺取唐许的武装，然后向长沙发展，会合湘中湘南的力量，取得政权，湘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的同时发动，免陷一地于孤立。整个的湖南暴动要能与湖北互相呼应，尤其是湘北鄂南应发生直接的联络。在暴动之前，要有适当的政治口号，调动广大的工农穷苦民众，就是说要使你〔他〕们在暴动时知道为什么要暴动而来积极奋斗，这一点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我们要有组织的全党动员到工农群众中去准备，省委中委员亦可以一部分出发到重要的地点工作。湘西工作也要有相当的准备，如政治上的宣传，军事上的联络和组织土匪农军等，以备如果鄂省那一部队^[4]能到湘西时之大暴动。“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名义现在就可以使用起来，以此名义为中心去号召民众。至于我们力量薄弱的地方，也应当普遍的宣传抗税抗租（用国共名义来号召），次有力的地方应以武力拒绝一切官吏地主的租税，进而实行杀豪绅官吏。此外你们还应注意下列数点：

（一）暴动的口号应为“暴动打倒武汉政府”，“暴动杀尽豪绅反动的大地主”，“暴动没收地主的土地”，“暴动实行耕者有其田”，“暴动抗租、抗税、抗捐、抗粮”，“暴动打倒叛党叛国的汪精卫”，“暴动组织农民革命军”，“暴动打倒叛国叛党的省政府”，“暴动实行民选的革命的省

政府”，“农民革命胜利万岁”，“革命委员会万岁”。

(二) 在指定暴动的区域，未发难之先即应正式成立若干农军，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数量，施以真正的军事政治训练，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

(三) 特别注意破坏全省交通的工作，如铁路、轮船、邮电等，应即派出得力的人准备，于暴动时即破坏全省交通。

(四) 在暴动中心的城市中尤其是长沙，在政治宣传方面应将上列口号引用具体的事实煽动全体革命民众，其方法可用：发短少〔小〕传单、日刊、宣传〈品〉、壁报、壁画、歌谣……等；在群众组织方面，应拿住各厂各职业工人的中心，现时即须准备暴动时如何罢工，罢工后如何分配群众参加各处巷战，同时即须开始分区指挥各区的民众以便暴动时之指挥，现时指挥的形式，即为暴动时指挥的形式。

(五) 对于各县的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应有经常的实际的宣传，最好办一小小日报，虽油印亦可。

(六) 对于兵士的工作，须特别分出一部分积极力量去做，宣传他们组织革命的兵士参加暴动的工作。

(七) 你们派人到县的方法（即每县派去一两人）不妥，应将我们的力量集中到几个重要县去，甚至有些县不派人去亦可。

(八) 湘南方面，仍须立即派得力同志前去，湘潭、

醴陵及平江、浏阳应各有一得力人派去。

二、政权形式，已在政治决议案中说明，中国现在仍然没有完成民权革命，仍然还在民权革命第二阶段。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但不是照以前那样的工农赞助国民党。到了第三阶段才是国民党消灭苏维埃实现的时候，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了，这是不对的。中央从各方面来证明政治决议案是正确的，你们务须依此决议执行。据××报告看来，亦应依照议决执行，而国际电令也是如此的。

三、土地问题，这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没收小地主土地”的口号不提出，但我们不要害怕没收小地主土地，革命发展到没收小地主时，我们要积极去组织领导，其结果仍是没收一切土地，不马上提出这一口号只是对小地主的一种策略。在没收地主土地的过程中，对于自耕农的土地不免有打击，我们也不避免这种打击，但我们更不要提出“没收自耕农土地”的口号。我们目前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之下进行革命，一旦地主阶级消灭的过程中土地国有只是一种法令问题而已。对地主家属则以能耕者给田，不能耕者则没收为原则，土地没收后由革命政府宣布简单的田税税率法（累进的田税，至多不超过收入百分之三十），每乡区提出救济贫民的基金（包含地

主的老弱家属) …… (下略)

八月廿三日

附:

湖南致中央函^[5]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日)

(上略) …… (三) 某同志^[6]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 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 闻之距跃三百, 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 但从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〇五年, 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 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 此政权既建设, 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之胜利。望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 并且在湖南上实行。

因国际这个新训令, 影响到我对国民党的意见, 即在农工兵苏维埃时候, 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 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 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 到湖南来这几天, 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 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 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 再打则必会再失败。从前我们没有积极的取得国民党领导权而让汪蒋唐等领导去, 现在即应把这面旗子让给他们, 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 至于小资产阶级, 让他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 客观上也必定完全在红旗领导之

下。

（四）土地问题

我这回从长沙清泰乡（亲到）湘潭韶山（有农民五人来省）两处乡村的农民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般解决。昨日与乡下来几位农民同志会商，征询他们意见的结果，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大要是：

（一）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与“消费量”（即依每家人口长幼多寡定每家实际消费量之多寡）两个标准公平分配于愿得地之一切乡村人民。

（二）土地分配时由区协命令乡协按户造册，造好交于区协，由区协按册分配土地。

（三）土地分配以区为单位不以乡为单位，人口多于土地之乡，可以移于人口少于土地之乡。必如此而后分配略得其平，至于甲区移住乙区暂不可能。

（四）土地没收之后对于地主（无论大地主）家属之安置必须有一办法，方能安定人心，办法分为……（中略）四等：一等收百分之四，二等收百分之三，三等收百分之二，四等收百分之一。

此草案昨日虽在省委会讨论〈一〉次，尚待多征询农民同志意见然后再请兄处作最后之决定，兹先将草案录上借供讨论资料……（下略）〔7〕

八月二十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日出
版的《中央通信》第三期刊印

注 释

- 〔1〕 本文原稿删节的几个人名均为何资深。
- 〔2〕 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第七次会议。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及何资深、王一飞参加了这次会议。
- 〔3〕 宝庆，今邵阳市。
- 〔4〕 指张兆丰为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师。
- 〔5〕 周恩来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泽东插话：“我在长沙发了一封信向中央提议：国民党旗帜不要了，要共产党；不要国民革命军，要工农革命军；不要国民党政府，要工农革命委员会。”从内容看，本文即毛泽东写给中央的信。
- 〔6〕 某同志，指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
- 〔7〕 正文及附件中的“下略”“上略”“中略”和删节号，均是《中央通信》原有的。

中央通告第八号

——关于职工运动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本党系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特别注意工人运动，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力量，对于“五卅”“粤港罢工”“上海三次暴动”与两湖工人群众有广大的革命力量表现〔表现〕，每次都有数十万工人参加去斗争，故此更加要十二分注意。从前本党及各地对于工人运动，看作一部分工作，甚至于许多负责的同志，有毫不相关之意，这就是从前之放弃错误，现在中国工人到了经济最苦痛的时期，我们应加切实注意指导，使工人阶级一致起来，作广大的斗争。这次本党对革命有新的策略，才能应付全国恶劣环境，对于职工运动议决案（另录），各地各区接到之日，须即日开始讨论及不迟疑的根据议决案去执行方可使劳苦工人起来，本党庶可基础稳固。对于议决案要说明的，有以下各点：

（一）中国革命受了帝国主义影响，一班反动分子，都走到大资产阶级队里去。旧军阀张作霖孙传芳等不消说，现在新军阀及无耻官僚如蒋介石，汪精卫，唐

生智，朱培德，陈公博，顾孟余，李济琛等都在资产阶级反革命战线上背叛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拿国民党招牌来屠杀工农与民众，封闭，改组，占领工农会及人民团体，这种手段，可说残忍毒计，破坏中国整个革命的罪人，屠杀民众的刽子手。我们对付方法，一方面向工人群众宣传，口头或印刷品及用种种[长]方式尽量把他们的罪恶指出，使工人明白，反抗他们欺骗工人之冒牌假工会，认识他们是无耻官僚新军阀及工贼之面目，不信任甚么军阀东征北伐，只有工农团体^[1]创立工农革命军，建设苏维埃政府。

(二) 资产阶级勾结新军阀，向工人进攻比从前尤为厉害，推翻工商互订条件及无故关闭工厂，任意开除工人，无信用低价纸币库券来发工资，借端抬高物价等手段对付工人，使工人失业发生极大的恐慌。我们积极领导工人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作有系统的斗争，尤要积极引工人奋斗，取得经济要求条件之胜利，及要求救济失业工人，或失业工人介绍，时时注意罢工斗争的策略；同时须在日常生活宣传中，准备工人武装暴动的情绪及组织，有时可以扰乱秩序。总之，要使资产阶级经济动摇，反革命政权不能稳定，领导工人众群[群众]，使他〈们〉了解必须工农民众自己起来暴动，夺取城市政权，建设平民政府。现在中国国民革命，主要的土地革命农民暴动，如遇当地农民土地革命的时候，对反动军阀政府应有破坏的行动，城市工人应即起来罢工

或破坏交通扰乱敌人后方，以响应农民革命。

（三）工会须由工人做领袖，反对一切反革命御用走狗，侵入我们真正工会，因为反动派系代表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行使其法西斯蒂，及改良主义来欺骗压迫工人。我们极力反对他们侵入工会，及占领，改组工人工会等把戏，如有反动派成立伪工会，我们派可靠同志参加他们工会，在内部侦探其消息，及指导工人尽量做经济政治斗争，如不得工人满意要求，就借此宣传他们欺骗工人，卖工人阶级之事实指出，使工人不信任，把他们打倒。我们过去做职工运动同志，多数知识分子，高居领袖地位，不懂得工会由工人做领袖的意义，并有些养成官僚资产化习气，以后要纠正从前错点，须要造出工人同志当工会领袖，为工会基础，然后工会可能巩固，因为知识分子，在工会当领袖易招物议，及工人多不大信仰，某一个时期或变迁，他在工会地位必然动摇，甚至倒台。最近湖北这次白色恐怖，知识分子因无地位不能站稳，工人同志找不出，几乎就要塌台，这点教训，都要马上改正。我们在工会尽可做指导及技术秘书顾问等工作，不必要领袖自居，只要革命力量发展。当然工人领袖智识简浅，我们惟有用十二分精神训练他们，使工人同志了解及加增其智识，成为工会领袖材干，这是我们加倍注意的一件工作。

（四）各地工会多被封闭或占领，我们要把工会秘密组织起来，作指导中心，无论在公开时期，亦应有预

备秘密的组织，提防反革命摧残以得退步避免惨杀。现在各地工部都取消，改为工委，应由各省委，区、县各地成立工委会，参加多数工人同志，及职工运动有经验者加入工委，仍由当地党部负责指导，不至视职工运动系一部分工作，甚至不闻不问，以补从前之缺憾。尤其是要注意下层组织及训练，只靠几个领袖拉拢是靠不住的。每一个地方及工厂都要成立党团，使我们政策深入群众致能推动革命运动而底于成。

(五) 纠察队训练更加要注意，因为中国军阀，那个都靠不住的，只有我们自己的军队，工农革命军，才能说我们的劲旅，切不可学武汉之机会主义，与资产阶级妥协，把纠察队解散之毛病。现在积极的训练工人武装，不仅单为自卫计，要预备工人革命军之组织，与反动军阀反攻，夺取政权。现在上海工人，天天望武汉政府派兵东下的幻梦，北京天津的民众还有等待北伐的期想，可说太于迷信，我们应想得到最后胜利，只有靠自己武装工农起来，这个革命才能保障，才可成功。

(六) 反帝运动应该要顾到工人经济问题，因为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是一样的，比如英美烟公司，与南洋烟公司，两个都是剥削工人的，我们如赞成南洋反对英美，使工人的阶级意识糊涂，其结果英美工人失业，南洋未必收受，劳动条件亦许更苦，这样，岂非我们指示工人空做中国资本家的傀儡。总之，我们反对外国资本家，帝国主义者，是必然的，但是同时，应当更加注意

于反对中国资本家的工作（以前甚至上海华商工厂里我们的工作都非常薄弱），我们的经济斗争要求应当是对中外资本家是一律的，我们工会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在政治上固然要做一般民众的先锋，在经济上尤其要认清反对中外资产阶级的阶级的职任。

（七）各地职工运动至少每月报告一次，从前各地都忘记了，以后至少每月一次，把当地工人运动情形，分别详细列表报告：

- 一、斗争经过，
- 二、组织问题，
- 三、人数统计，
- 四、业职〔职业〕产业，
- 五、成立日期，
- 六、筹备之中，
- 七、工人生活状况，
- 八、对第四次劳动大会决议案有何意见？
- 九、负责领袖姓名，
- 十、经费之收入与支出。

从速报告，以便随时指导。

八月二十五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日出
版的《中央通信》第三期刊印

注 释

[1] 本文在《陕西省委通讯》第四期登载时，此处为“只有工农团结”。

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1]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常委通过)

一、目前两湖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形，纯是一个暴动的局面，本党当前唯一重要责任，就是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领导两湖的工农群众实行暴动，推翻武汉政府与唐生智的政权，建立真正的平民革命政权，如此才能保障革命猛烈的继续进展。

二、两湖的暴动尚未开始，在时间上已经是失败，这是犹豫不决与不相信农民的群众力量的结果，如此便要丧失革命。

三、土地革命必须依靠真正的农民的群众力量，军队与土匪不过是农民革命的一种副力，坐待军队与土匪的行动，或许纯全依靠军队的行动而忽略农民之本身之组织力量与行动，这也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的表现。这样领导暴动，暴动无疑的要归于失败。这不是暴动，这是一种军事的冒险，或者军事投机。

四、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九月十号，因为两湖的环境不同，两湖应各有其中心区域，应各创成一种独立的暴动局面以发展暴动，但总的政治目标口号与行

动须一致。

五、湖南暴动可分为三大区：〔一为湘南各县，郴州、宜章、汝城、永兴及衡阳、耒阳、衡山两路，准备须于九月六号开始暴动，夺取衡阳，暴动成功后，会合潭醴之师合取长沙。第二区为湘中、湘东各县，为安源、醴陵、湘潭、湘乡一路，浏阳、平江一路，宁乡、益阳、安化一路，湘东〔阴〕、岳阳、长沙与其近郊一路，各路以长沙为中心作准备，于九月十日开始总的暴动。各区暴动成功之后，除留一部分力量维持本区之秩序外，即应迅速调遣大部力量攻长沙。长沙于九月十二、三号，应有一暴动，实行取得政权，推翻湖南省政府。湘西分临澧、安乡一路及常桃汉一路，常德为中心，准备于九月十号开始爆发，夺取常德为长沙声援。此外湘中之宝庆一带，及湘西之澧县一带，亦须有准备于九月十日左右发动，以为各路主力之声援。〕如此全省范围的暴动，应普遍的以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名义为号召的中心，此革命委员会于暴动成功之后组织湖南省临时革命政府。

六、南〔湖〕北暴动应划成下列各区：

〔1. 鄂南区即武长铁路区，为通城、崇阳、通山、蒲圻、嘉鱼、咸宁、武昌（近郊不在内）七县。

2. 鄂中区为沔阳、潜江、汉川、天门、京山、应城、监利七县。

3. 鄂西区为江陵、公安、石首、荆门、当阳、宜

昌、宜都、松滋七〔八〕县。

4. 襄枣区为襄阳、枣阳、宜城、光化、谷城等县。

5. 京汉路区为黄陂、孝感、应城、应山等县。

6. 鄂东区为黄冈、鄂城、大冶、蕲春、黄梅、广济、阳新等县。

7. 武汉区为武汉三镇与四郊。这许多暴动区域，应从鄂南开始（九月十号），鄂南开始之日，鄂中、鄂西即须大暴动，与鄂南联络创成一独立局面，威吓武汉，或从鄂南攻岳州威吓长沙。襄枣的暴动如主客观有可能，张兆丰的军队又到，九月十号之前即开始，至迟十号与十号后一、二日即行动。如鄂中、鄂西暴动胜利，张兆丰军队须速调至暴动的区域，完成暴动直攻武汉。武汉此时须有一大暴动，至少亦应有一大的骚扰（如主观力量暴动不可能时）。鄂西、鄂中暴动如不能成功，则张兆丰的军队；须用各种方法，调往湖南或留在襄枣。鄂南、鄂中、鄂西、襄枣暴动开始之后，鄂东区、京汉路区须尽量响应。〕

七、暴动组织在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湖北分会之下，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某农民暴动区域军事的指导用某区农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工农军的数量在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成为正式的革命军队，同时仍保存地方军队性质的工军与农军，执

行各境当地警卫，以之为革命的新警察的基础。在暴动尚未发动之前，应将工人纠察队改称工人革命军，农民自卫军即应改称农民革命军。

八、对于土匪的政策应当以我们的口号去宣传他们组织他们于农民协会之下，或革命委员会之下，使他们在暴动时成为一部分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动成功之后予以改编。

对于反唐的杂色军队（许克祥除外），如能对于暴动取中立的态度，则可利用其中立以便迅速发展暴动，并须设法与其兵士接近宣传他们。暴动成功后，对于此种部队酌量予以解散或改编。但这决不是说要牺牲我们的根本主张以换取他们的中立。在暴动中对于有反暴动倾向的杂色军队和土匪，虽然他们是反唐的，也要立刻解决他们。

九、暴动为实行澈底的土地革命，即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事实的结果是全部），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与没收其财产，实行乡村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城市市民选革命政府，消灭一切非农民非工人革命的武装。

十、暴动之前须极端注意兵士中的宣传，鼓动他们起来杀戮反革命的军官；一有可能，便应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这种组织应是广泛的群众的。暴动之中要吸引兵士参加。这种革命兵士的组织可以做改编新革命军的成分。

十一、暴动的口号：暴动打倒武汉政府，暴动杀尽

土豪劣绅反革命的大地主及一切反动派，暴动为死难民众复仇，暴动没收地主的土地，暴动实行耕者有其田，暴动抗租抗税抗粮抗捐，暴动恢复一切革命民众团体，暴动实行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暴动实行民选革命政府，暴动打倒叛国叛党的汪精卫，暴动打倒残杀两湖人民的新军阀唐生智，暴动组织革命军，农民革命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平民和兵士的革命联合万岁，农民革命胜利万岁，革命委员会万岁！

十二、各区的暴动在未发动之先，在离城较远一点的乡村即应杀戮土豪劣绅反动的大地主，提高农民革命的热情，举行各区农民群众大会，多作群众的政治宣传（按照上列的口号加上实际的事实），如发传单、讲演、壁报、告示等。在暴动方开始，首先即须征集所有的力量攻打某乡区的中心城市，屠杀政府的官吏，宣布革命委员会政权，然后才能发展普遍的暴动。

十三、暴动方开始即须掘断铁路，破坏水陆交通，占领破坏邮政机关，割断所有的电线，造成敌人的绝端恐慌的状态，然后才可便于暴动的发展。但因交通机关的破坏，同时影响于我们自己的联络，各暴动区域应当想出特别传递息消〔消息〕的方法，切不可因此而迟延等待某区的暴动，即令暴动发生后各方关系断绝，亦应按照预定的未成功与已成〈功〉的地点猛烈的进攻，绝不可犹豫，犹豫便是破坏暴动的胜利。

十四、暴动胜利的地方，应无情的镇压肃清反革

命。对于买办及反动的资本家，如果他们经济怠工或封闭工厂，则工会应当占领工厂，以之交给革命政权管理。至于反革命的豪绅则应坚决的没收其财产。但必须注意应用正式革命政权机关实行这种收没，严禁私人的抢掠侵吞。

十五、长沙、武汉两湖省委，应有一特别的暴动计划。

十六、各区的暴动内部的指挥为各区的特别委员会，直接归省委指挥。〔2〕

根据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日出
版的《中央通信》第四期刊印

注 释

- 〔1〕原件未标明作者和时间，五、六两项作了删节。据会议记录，本文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的。原删节部分，按《湖北秋收暴动的简单报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的引述补全，并以〔 〕标明。
- 〔2〕据《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载《中央通讯》一九二七年第十一期）的引述，此后还有：“武长铁路如发生指挥上的不方便时，两湖省委的特别委员会即应联合组织，归中央直接指挥，同时受两省指挥”。

关于“左派国民党”及 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最近几月的经验（包括南昌军队中的暴动与两湖广东革命的农民暴动的爆发）指示出中央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已经很快的把国民党变成政治的尸首，形式上国民党现在正经过分化堕落的过程。由其腐烂的尸体中产生出赤裸裸的军阀专政。所有共产党员的努力，打算创造秘密的革命国民党的组织，或稍为团结左派分子，一直到现在尚无成绩之可言。在别一方面呢，以前国民党在群众中的革命威信，已因资产阶级军阀之到处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实行流血屠杀，恐怖与压迫而消灭了。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可见土地革命的急剧的发展，已经使一切动摇犹豫的上层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的战线。澈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中央

根据此点，所以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假设在国民党中有这些单独的，革命的，“对抗派”的成份发现时，我们应当赞助他，推动他到继续革命斗争的道路，使他完全与国民党的反革命上层分子断绝关系；但同时应当知道，这种工作比起党的主要任务（组织暴动）是占次要的意义。以后关于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当然无论如何说不上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即使以后在自然的群众运动基础上，或许另有发现国民党组织之可能（现在还不是这种现象），则我们应当知道这种力量不是主要的决定成败的力量，而是革命之临时的，不可靠的，不坚决的同道者罢了。总之，此后我们对于国民党的政策，主要的原则有两点：一、对于宁汉各派的国民党领袖机关及政府，积极的反对，定出明显的推翻他们的目标，因为他们都已成革命的叛徒，民众的仇敌；二、对于零星散乱的国民党左派分子，只认为是革命的暂时的同道者，可以在每次斗争中，使他们来赞助我们及革命的民众。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左派问题既有不同，则对于八月中央决议案中的苏维埃的问题自然亦有异点。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但中央同时又预先防止那种急忙的与真正革命高潮不相连贯的成立苏维埃。苏维埃的组织，首先应当在那些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

当我们有决定的巩固的胜利的时候；当这些中心地点正〔还〕没有被革命暴动占据以前，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的拒绝组织苏维埃，这是为着不要失掉苏维埃政权的真意。换句话说，在小城市里的政权仍旧必须照中央原来的决议去组织（除去对国民党的左派问题），在农村中最近期间“一切政权属于农民协会”仍完全有效。

根据一九二七年九月三十日出
版的《中央通讯》第六期刊印

中央致广东省委函

——对《暴动后各縣市工作大纲》、
《工农军作战方法》的意见*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

你们的《暴动后各縣市工作大纲》《〈工〉农军作战方法》及《告广东闽南民众书》都已收到。中央对你们有以下的意见，请你们查照：——

一、关于《暴动后各縣市工作大纲》，中央认为有几点很重要的可以防〔妨〕碍革命发展的：第一是你们保留一部分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中央前信已经告诉你们对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至于没收土地之后对于老幼废疾的救济，是革命政府之下的另一工作，不能因为这个便保留一部分地主制度。第二是你们肯定小商人的选举权利，并且规定县革命政府选举代表小商等要占百分之二十〔1〕。其实，以两湖暴动的经验，大小城市的小商人，大部分〔是〕自己是地主或与地主有深厚的关系，至于大城市的小商人则更有与买办阶级有密切关系的。这些分子在土地革命激剧的

发展中，必然走到反革命的方面，所以我们不能肯定他们有一定的选举权，完全要看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而定。况且在大城市中暴动胜利后，应组织苏维埃，更不容有百分之十至廿的小商人代表（见国民党工作及苏维埃决议）。第三是你们肯定“不没法[收]工厂作坊”。这也是不正确的，在中央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中，已指出对于反革命的工厂作坊是有没收的必要的。我们固然不决定没收工厂作坊，但是对于反革命的工厂作坊必一定要没收。不然便不能巩固革命的政权，保障革命的发展。总之，我们对于社会各阶级的态度，要以不妨碍革命的发展及工农的利益为原则，不可事先作法以自限。这是要你们特别注意的。第四是关于国民党的工作。中央对此另有新的决议，随信寄上，请你们查照执行为是。

二、关于《工农军作战方法》的。第一，在整个的计划中，你们有胆小，怕牺牲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弱点。例如你们肯定：“工农军与有训练和有组织的军队作战，要想取得胜利是很难能的”，因此你们便断定工农军作战必须要“避免正面战斗”，要在战前“示意各级指导人员以败后收容地点及方法。”你们在计划上这样胆怯的暗示，必然会影响到群众不能坚决的作战。并且处处避免正面的战斗，势必只能在乡村中迂回作战，而不能去夺取城市。实际，如果我们真正把暴动的主力建立在农民群众的身上，而不是靠单纯的工农军的军事行动，则我们枪支虽少，不难扑灭有数倍枪支的敌军（这是两湖的经

验)。这里，所需要的是我们的指导者和群众的坚决的勇气。我们何可在事先自己就怀着一种恐惧的心理？！第二，你们肯定“城市要实行暴动，必须要有得力农军的帮助”，这无异说没有农军的帮助，城市中即不要暴动，更具体的说，即是城市的暴动要等待农民的军事行动。你们的理由是说“现在城市的工人大多数没有枪支”。这样的决定，实在太书生了。假设在乡村中农民暴动很激烈，城市已经很恐慌，而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又很高涨的时候，我们无论有多少枪支，都应立即举行暴动，不能等待“得力农军的帮助”，换言之，便是不要等待直接的军事力量，否则便是军事投机。总而言之，农民暴动，要以农民为主，军力副之。要鼓动广大农民革命情绪和革命行动（大批杀土豪劣绅政府官吏及一切反革命派，抗租抗税，分配土地）。如此发展广大农民的坚决斗争，暴动才能胜利。断不能有等待军事的心理。

三、叶贺军队不知已达到什么地方？此时广东全省应不等待叶贺之达到，即行发展普遍的暴动，对于这点前已有两次信给你们，现在执行的程度如何，你们应随时作详细的报告来。

中 央

九月廿三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九月三十日出
版的《中央通讯》第六期刊印

注 释

[1] 《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原文为：“百分之十小商人及贫苦知识分子”。

中央对于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

(一) 广东的胜利，革命运动之猛烈发展，使中央不能不迁居于革命的中心区域，指挥〔挥〕这一革命运动。在事实上中央将与长江各省隔绝关系，故有长江局之设。

(二) 长江局所辖范围为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七省。

(三) 长江局不是中央在上列七省的通讯机关而是代行中央执〔职〕权，指挥〔挥〕上列七省的革命运动与党务，上列七省的党务须纯全受长江局的指挥〔挥〕，但长江局须随时将所处理之工作与决定报告中央，受中央的指导。

(四) 两湖与广东为中国土地革命的中心区域，长江局的第一个最大任务便是坚决的发展土地革命。两湖的土地革命如一时不能发展到最大的限度——消灭唐生智统治，取得两湖政权，则须普遍的发展游击战争与没收地主的土地及杀戮土豪劣绅等工作。依两湖农民暴动的形势，某几县的农民可握得某几县的政权，以发展各地的农民暴动。长江局必须领导所属党部坚决的执行这次

工作，同时，并须特别努力建立与发展这次工作。河南也为农民运动比较发展的区域，长江局须同样注意河南农民运动之发展。至于安徽四川江西陕西的农民运动亦不可忽略。

（五）长江局第二个大的任务便是发展所属范围内之职工运动（特别是武汉三镇）。目前主要的工作为：发展经济斗争，建立秘密工会与工农革命夺取政权之宣传。

（六）长江局第三个最大任务便是改造所属各级党部。因现有各级党部多不能领导各地的革命运动，长江局负责同志须不断的巡行各地，实际指导各地工作。在党的内部工作须特别注意党内干部之培养与从党员群众中提拔负责同志工作。

（七）为增加各级党部的指导与党中干部之培养，长江局须不断的刊发政治通讯，至于对外的宣传，最好由各省党部独立的出一种政治刊物，如技术上不能铅印至少须用油印办法。

沈保和〔1〕

一九二七。十。一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注 释

〔1〕沈保和，中共中央的代号。

中国共产党为 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

今年的辛亥革命纪念——双十节又到了。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那里去了！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看见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在于国民党没有民众的基础，而只有军队，所以在十三年决心改组国民党。国民党改组之后，接受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解放工农阶级的政纲，方才得着新的生命和新的革命力量；中国的革命方才经过五卅运动而重新大大的发展，方才能有去年北伐的胜利。但是，革命的发展把豪绅资产阶级吓坏了——他们赶紧要阻止革命，以保障自己阶级的权利，因此，他们竭力想把国民党变成豪绅资产阶级新式军阀的党。今年四月蒋介石白崇禧李济琛等开始屠杀工农民众于沪宁广东，八月唐生智汪精卫张发奎完成这种屠杀于两湖江西。直到宁汉妥协，国民党之最反动的分子西山会议派完成这种反动事业——将国民党改组一笔勾消。重新兴起的革命，就在这一年内被沪宁武汉各派革命叛徒的反动所摧残。现在的所谓国民党，把阎锡

山王宠惠等都算做所谓忠实同志；把冯玉祥唐生智白崇禧李宗仁李济琛张发奎等军阀各自霸占地盘剥削民众大施屠杀的局面，称为党权胜利，——这种国民党完全又是军阀官僚的党。辛亥革命的事业岂能希望他们来继续！所以今年的双十节纪念的意义，就在指示民众：中国革命已经到了新的阶段，要开辟新的道路——国民党既然与共产党分裂，既然自绝于工农民众，既然自绝于他过去的革命历史，自绝于辛亥革命的事业，既然背叛革命，那么，民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自己武装起来夺取政权，完成辛亥所开始的革命！

辛亥革命后十七年中国的现状是怎样？十六年以前还可以说，差不多是全中国都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但是，去年十月十日的时候，武汉便由国民党的军队占领了，随后国民党军队陆续占领许多省，如今山陕河南江浙直到广东都算是在所谓国民党旗帜之下。这一年总算是国民党军事上的大胜利，地盘的大扩张。但是今年十月十日的时候，中国的现状又是怎么样呢？

在一年之中，工农群众奋起斗争，引导革命到胜利的道路上去：汉口九江的租界，是工人群众夺回来的，上海工人的暴动推翻孙传芳毕庶澄的统治，两湖及各地的农民实行民众政权的真正民权政治，铲除豪绅资产阶级的势力，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开始实行耕者有其田……，革命是已经开始向真正解放工农民众的道路上发展。但是国民党的领袖不要民众的胜利，宁可当豪绅

资产阶级的走狗。他们从四月起直到八月初，先是蒋介石等在东南各省，后是汪精卫唐生智等在两湖江西，开始屠杀压迫民众及共产党，把工农民众反抗豪绅资产阶级贪官污吏新旧军阀的革命行动，都认为是共产党的阴谋。沪宁武汉先后反共，都是号称保护所谓纯粹的国民党，其实，显然是转入反革命，压迫革命的发展，将国民党的旗帜来做军阀官僚豪绅资产阶级反动的文饰。国民党反共而背叛革命压迫民众的结果，便造成现时的局面。

现在的局面是：（一）所谓国民党的政府，不论是南京的所谓中央特别委员会，是武汉的所谓政治分会，是广东的所谓政治分会，都已经与工农民众立于仇敌的地位，他们天天屠杀工农；——这种政府完全是反革命政府，与北京张作霖的政府完全一样，不但不能得着民众的赞助，而且是民众所要推翻的。国民党及其政府既然与工农民众宣战，他便是与中国反帝国主义力量断绝关系，自身要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帝国主义看见中国革命的这种挫败，自然是非常高兴。因此，关税自主不能实行，沪杭铁路被英国军队掘断而中国方面甘心屈服，汉口英租界最近事实上已等于重受英国领事管辖的状况，汉口九江英日水兵杀戮中国人民及兵士，而所谓国民党的党部及政府不敢反抗，反而宣传应当和平了结勿为过甚；日本撤退山东的驻兵，上海的国民党党部便立即命令取消对日大同盟。这种外交上的屈辱，对于帝

国主义力求妥协，摇尾乞怜的丑态，表明今后的国民党及其各派政府，已经不成其为一种反帝国主义的力量，而是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附庸，延长其对中国统治的工具了。

二、所谓国民党治下的各省，一概和以前军阀统治丝毫无二，不过多些国民党党部及其御用的假民众团体，摇旗呐喊欺骗民众罢了。他们对于真正实行平民政权(如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政府，两湖各县的农民协会政府)，实行压迫屠杀，对于要求经济生活改善的工人，也是压迫屠杀，还要派他们御用的工贼工会(如上海的工会统一委员会)专门破坏罢工，遇有罢工，他们就说先复工再谈条件，结果，工人次次受骗。

三、宁汉合作一致北伐的呼声唱得非常之高；国民党真正统一提高党权肃清恶化腐化的呼声也非常之时髦，而事实上呢，南京九月十五日的会议开都开不成，立刻唐生智便在武汉组织武汉分会，宣传反对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立刻冯玉祥和唐生智开始冲突，武汉方面宣传反冯；立刻何应钦(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互抢上海，和周凤歧抢夺浙江，张发奎和李济琛互抢广东；还有唐生智抢刮安徽，又进而要抢夺江西。这是甚么统一，甚么党权！最近一月来——南京财政部军需处等发表财政报告，公然的供出各将领在海关税务机关等处搜括几万几十万，各方收支虚报，互不相符——军费每月到一千七八百万以上；浙江邵元冲等侵吞公款；武汉

财政部的官员作弊投机被人揭发，广东财政厅的官员也是如此。这种情弊岂非明明白白表显出：这些所谓国民党的军官及官吏，纯粹是军阀和贪官污吏，他们互相争夺搜括民脂民膏！这和张作霖等政府有甚么两样！

四、最近，阎锡山和奉张开战了，冯玉祥也动兵打徐州了。国民党的领袖叛徒又要高叫一致北伐，实现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了。请问照上述的许多事实，这些国民党军阀，即使打到了北京，算甚么革命，实行甚么三民主义！他们在现有的地盘上，件件事是反对三民主义背叛三民主义的，他们得着了新地盘，仍旧是压制工农剥削民众大施屠杀的军阀统治。这算是甚么打倒军阀！而且即使他们这些国民党军阀相互之间偶然可以私利关系，结合起来去打奉鲁军阀，不久，他们自己之间的裂痕仍旧要破裂，他们之间互相争城夺地搜括金钱卖国殃民，必是要重演一部辛亥革命的失败史！

总之，今年双十节的政局告诉我们：国民党已经不能反帝国主义，因为他们帮着帝国主义屠杀工农已经好久了，他们已经不能反对军阀，因为他们自己便是军阀，便是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他们之间——张作霖张宗昌等与国民党诸军阀之间的战争，所谓北伐，不过是军阀战争，不过是浪费民众的膏血，使兵士去做他们争权夺利的炮灰，并且更加加重对于工农的剥削和压迫罢了！

工农贫民兵士的群众，应当起来反对这种战争，应

当自己拿起枪来打倒这些新旧军阀，要这样才能完成辛亥所开始的革命。我们的口号是：

“变军阀的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

民众的战争已经开始了！工农民众的革命正在急剧的进展，而国民党与非国民党的军阀，却要阻止他，民众如何不要拿起武装来扫除他们！帝国主义现在假手于国民党的军阀来压迫民众；中国资产阶级也已宁可和帝国主义妥协，霸占国民党，以国民党的名义，和外国资本家共同剥削工人；中国的豪绅更是经过国民党的军阀屠杀农民，霸住土地，维持封建式的剥削。这些新旧军阀豪绅资产阶级互相勾结压迫民众，又在互相争权夺利以兵士做炮灰，克扣兵饷。工农贫民兵士如何能不起来反对他们？如今工农贫民兵士反对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战争，间接的亦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已经开始了。今年双十节纪念的意义，应当是民众起来反对军阀的战争，实行民众的战争之新纪元！

南昌起义的叶挺贺龙军队已经一次打进了汕头。广东各县农民，尤其是海陆丰梅县兴宁的农民，已经起来实行这种战争。湖南醴陵平江浏阳的农民也已经起来暴动，湘〔湖〕北通山通城崇阳公安不〔石〕首等县的农民亦已起而暴动。他们杀土豪乡绅，没收地主的土地，他们实行耕者有其田，他们自己分配土地。农民暴动的潮流已经波及各地，河南江西安徽零碎的农民暴动也时常发见，其他各省，如直隶三河县的联庄会等，无处没有自然爆

发的农民武装斗争。工人群众，尤其上海武汉等地的工人，被国民党军阀或北方军阀的压迫到极点，资本家趁着反动政权的暴力屠杀共产党，便着着进攻，工人的经济生活困苦到极点，——例如京奉京汉铁路欠薪至十一个月之久。工人武装的打击反动分子，各城市中时常发见。工农群众武装暴动以反对一切新旧军阀统治的民众战争，确实已经开始了。叶贺军队中的革命兵士不过是开始参加这种民众战争的一部分；革命兵士倒戈打倒自己的反革命军官的运动正要发展起来。这是辛亥革命的真正继续，只有这暴动的胜利，才是革命的真正胜利！

工人们，你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努力起来奋斗，做今后民众的革命战争的先锋。你们现在的痛苦，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除，只有：努力组织自己的真正工会，实行猛烈的反对资本家工贼国民党御用工会的斗争，一直到武装暴动，组织工农贫民的政府，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

农民们，所受的剥削已是无以复加了，田是你们耕的，享用的都是豪绅地主。赶紧起来奋斗，拿起武器来，自己组织农军，推翻你们的压迫者。乡村之中的政权，你们自己拿起来！杀土豪乡绅，实行耕者有其田——谁能耕几亩就分配几亩田给他；不耕田而坐着吃田租的地主，都不准有田。这样，农民才得解放。广东湖北湖南的农民已经部分的暴动起来了，你们赶快继续大

家起来！

一般贫民兵士们，你们的痛苦也只有团结在工农暴动的旗帜之下，才能得到解放。尤其兵士，你们都是穷苦不过的工农，没饭吃再当兵，替军阀做炮灰。从前还说国民革命军是革命的，如今所谓国民革命军，已经完全反动！你们只有掉过枪来打杀这些新旧军阀，派出代表来参加政府，和工农共同实行民众的战争，编成真正的革命军队，把一切反动政府都推翻，然后你们能耕田的可以分着田耕，能做工的可以找着工做！

辛亥革命十七周年纪念的意义，只有实行民众兵士反军阀的战争，以继续完成中国革命，真正建立工农平民的民权，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之下。如今广东两湖的工农暴动已经起来，虽然部分的有失败，但是国民党军阀的屠杀，并没有能征服我们，我们只有继续努力奋斗，达到民众的最后胜利！

推翻南京北京武汉广州等一切反动的政府！

反对南北新旧的一切军阀！

反对背叛革命屠杀民众的国民党！

反对国民党走狗包办的假工会假农民协会！

对于一切反动政府拒绝交纳税捐！

对于豪绅地主拒绝交纳田租！

工农贫民兵士暴动继续辛亥革命！

工农贫民兵士暴动建立平民代表会议的政府！

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

没收大资本家的财产实行劳动保护法!

一九二七.十.十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出

版的《前锋周刊》第五期刊印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反对军阀战争宣言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中国的工农兵士及一切劳动平民！

南京政府和唐生智开战了。又是贫苦的兵士流血，贫苦的人民受痛苦了。他们已经攻城夺地，调兵遣将，拉夫派饷了。这些军阀互相勾结，互相冲突，不论是南京、武汉，冯玉祥、阎锡山、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都是祸国殃民，剥削和压迫工农贫民的。冯阎和张作霖早已开战，今南京和武汉又打仗了。不久，孙传芳、张宗昌又要打南京和上海。全国大混乱的军阀战争——奸淫掳掠的屠杀战争开始了！就是广东，也在酝酿着李济琛、黄绍雄和张发奎的战争。全中国都是万恶的新旧军阀争权夺地的战争。

工农兵士及一切贫民，以至于小商人，都尝够了军阀战争的痛苦。农民被剥削到一粒米也不剩，被军阀拉夫、派捐、封船、扣车、派粮、派草……兵灾所到，田亩荒芜，整个的村庄〈遭〉到烧杀蹂躏，奸淫掳掠，无所不至。这些新旧军阀拼命压榨贫民的膏血，苛捐杂税无

奇不有，——农民一年劳动所得，差不多有四分之三要拿出来付租税。如果农民反抗这种强盗似的禽兽似的蛮横压榨，那么，他们便大施屠杀，几十个村庄一批一批的烧毁，老弱妇女也不能免。这些军阀还要拉夫，——强逼工人苦力到战场上去送死，强迫他们搬运几百斤的重担，牛马似的鞭打他们。被拉去的伕子，不但一个钱也得不着，而且常要打死、饿死、做死。伕子做不动了，军阀便不顾他们死活，把他们丢了，甚至于还要把他们枪毙。军阀封农民的船，抢农民的车，船夫车夫都得替他们当差。战争一起，纸币更加要滥发了，甚么国库券、金库券、二五库券又要大批的发出了。工农小商须得使用这种不值钱的纸币。还要强迫人民担负公债。上海方面已经榨取了四千万元的公债；现在为着战争——又要发行二千四百万元。因战争的关系，米盐油等日用必需品，运输都日益停顿，价钱一天天的飞涨。因战争的关系，交通断绝，商业停滞，棉丝等等原料不能运到市场上来，工厂要关门，工人的失业更加一天天的增多。资本家只顾要自己不亏本，成批的开除工人，或者简直关厂，帝国主义遇见中国这种混战，更加可以乘机取利。这些万恶的禽兽似的新旧军阀互相吞噬的时候，帝国主义便可以更加来进攻中国——满蒙协定呀，中日商约展期半年呀，汉口英租界交还英国呀。于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又枪夺几条新的铁路去，又霸占了几个满蒙矿山去，他们还想更多占领中国的领土，侵入内蒙古。英国

帝国主义已经利用军阀的互斗和国民党的妥协屈服，又将汉口租界抢去。汉口英租界是工人贫民群众夺回来的呵！如今卖国的国民党却将他让还英国。今年一月间工人贫民赤手空拳将这租界夺了回来。而现在——十月间，还不满一年，国民党的军阀，有着全副武装的军队，却拱手交还英国！

中国一般劳动民众，穷苦得饭也没有吃，受着非常之大的痛苦、压迫、抢掠、奸淫，而这些军阀还要打仗！

谁在这里破坏长江流域，谁在这里延长战祸茶〔荼〕毒民生？

就是国民党。唐生智是国民党。他这个军阀、地主、银行家、荒淫骄奢的重利盘剥者，他在湖北、湖南、安徽成千成万的屠杀工人和农民，屠杀共产党员，摧残两湖的农民运动，残暴到极点的镇压两湖的农民暴动。唐生智说，他不满意南京政府的政策，不承认南京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这完全是鬼话。他自己的政策和南京政府的完全一样。他为什么打仗？不过为着争地盘，他抢着了安徽，还想抢南京上海，占领整个的长江流域，他要他来杀江苏、浙江的工人农民，——南京派的国民党杀了还不算！他是张作霖、张宗昌的同盟者，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现在已经受日本帝国主义军械子弹以及汉阳兵工厂材料的供给。他是杀工人农民的刽子手。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以及一切工农的责任，就

是要反对唐生智，推翻唐生智！

现在南京政府打唐生智。难道南京政府比唐生智好些么？南京政府之下的将军也是国民党的军阀，也和唐生智一样，是清党反共的所谓忠实同志。这些军阀和唐生智是一样的，——一样的刽子手！南京派的将军李宗仁、白崇禧、程潜、何应钦，也是地主豪绅重利益剥者大资产阶级以及买办的代表，和武汉的唐生智、何健、刘兴一样，和冯玉祥、阎锡山一样，和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一样，和汪精卫、张发奎、李济琛也是一样。

何应钦在福建、浙江，到处屠杀工农共产党。他现在明的暗的听英国帝国主义的驱策。他是蒋介石的走狗。白崇禧就是四月间屠杀上海工人的刽子手，他最近还在天天杀共产党，天天杀无产阶级勇敢的战士，他逮捕了几千几百的革命党员，关在龙华。李宗仁、程潜等类的东西，也是军阀，也是工农贫民的敌人，革命的敌人。他们打什么仗，为什么打唐生智？他们的目的，也和唐生智一样。他们是想抢地盘，争权利，抢夺剥削工农的权位。这次战争的“意义”，就是——究竟哪一个能够有全权搜括长江流域剥削劳动民众：是唐生智呢，还是南京派的一班狗强盗？

张发奎、汪精卫、陈公博等等，现在正想利用长江流域的混战，从容霸占广东的政权。但是李济琛、黄绍雄又要同他们战争。这些革命叛徒，这些无耻的地主豪

绅资本家的走狗，他们帮着杀了成千成万的工农，还在那里说工农政策，实行减租等等……人民被他们欺骗得很久了，他们自己的屠杀政策早已揭穿他们的假面具，现在再骗不了人的了。他们是劳动民众最可恶的仇敌，因为他们用那些欺人的“革命”口号，掩饰他们的真面目，还想用国民党的臭招牌骗人呢。他们和李济琛、黄绍雄的战争，也是军阀的战争，和南京武汉的战争是一样的。

工友们，农友们，城乡的贫民！在这种全国大混战的军阀战争之中，我们拥谁呢？我们应当使这种战争得甚么样的结局呢？

我们应当反对一切军阀的战争！我们应当推翻一切军阀：北方的，南方的，武汉的，南京的，山西的，河南的，广东的或广西的。我们对于现今互相搏噬的军阀，都要打倒。我们知道：无论那方面战胜，对于劳动民众都是非常之大的祸害。所以我们现在，和欧战时候欧洲俄国的革命工人一样，应当积极的行动，使各派各系的军阀统统都失败。我们应当使这种军阀战争变成劳动民众反对一切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战争，变成反对一切压迫剥削以及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要一下子消灭一切军阀的战争。然而要肃清这些新旧军阀，消灭一切战争，只有推翻军阀政权之一法。要消灭军阀的政权，就必须工农兵士起来反对军阀。应当使军阀的战争变成一切劳动民众反对压迫剥削及帝国主义的伟大的

战争。只有这样，我们将地主阶级的土地夺回来给农民，没收一切大工厂、大银行、大企业，消灭重利盘剥，推翻军阀及帝国主义，澈底的改良工人及一般劳动者生活，统一中国，造成新中国——工农兵劳动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中国。国民党的欺人口号，革命叛徒的反动政策，决不能救中国；只有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反对压迫者剥削者的伟大的武装暴动，才能开始新中国将来的光明之路，肃清中国之内的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几万万工农民众不再受残暴的剥削和压迫。

中国共产党知道：这种反对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要经过极大的阶级战斗，要忍受很大的牺牲。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是一切劳动民众的领袖，我们知道：必须在斗争之中组织群众，走向这个伟大的革命战争。

革命战争是实行着：一年以来光荣的上海工人的暴动，广东农民的暴动，两湖农民的暴动，叶挺、贺龙军队的战斗，都只是这一极大的斗争之中的片段。我们应当利用这几次英勇的战斗之中的经验和教训，准备更大更新的爆发。我们应当将工人阶级的先锋——共产党，组织得更好，扩大到工农群众之中去，吸收一切优秀的革命分子。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应当更加和工农群众密切联系，努力的反对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反对这些民众的和革命的叛贼。我们更加努力的反对一切军阀战争，反对一切军阀及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一

切工农兵士贫民实行伟大的武装暴动。

工友农友兵士贫民同志们！准备着作战，经过日常斗争，一直到推翻劳动民众的一切仇敌！

前进！前进！

反对军阀战争——反对一切租税，反对无价值的纸币库券，反对强逼公债！

反对南京的军阀，反对唐生智，反对张作霖，反对冯玉祥、阎锡山，反对张发奎，反对汪精卫……！

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豪绅、地主、资产阶级！

力争中国的统一解放！

推翻一切寄生虫压迫者的政权！

一切政权归劳动平民！

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的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二期刊印

中央通告第十三号

——为叶贺失败事件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一) 南昌暴动与南征的意义

南昌暴动的“八一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从国民党改组以来，国民党的所谓革命，始终是扩大些在所谓“青天白日”之下的军事势力，全然不肯发动民众，使民众自己起来取得政权，取得土地，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私有土地的制度。恰恰相反，当农民群众自己起来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时候，工人贫民自己起来民众的革命民权独裁的时候，这些国民党旗帜之下的“革命军官”立刻便攻击农民工人，大施屠杀，蒋介石四月中的上海屠杀，广东屠杀，……是如此；湖南唐生智等的马夜政变⁽¹⁾及清乡，以及冯玉祥在陕豫的屠杀政策，也是如此。就此证明国民党的一切新军阀都是代表豪绅资产阶级而反对工农压迫工农的⁽²⁾。所以中央在宣布与国民党的武汉政府破裂之后，立刻决定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规定湘鄂粤赣的四省

秋收暴动的计划，而叶挺军队的南昌暴动，便是这一民众暴动，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权之总政策中的一个计划。

叶贺南昌暴动，在一般的民众武装时期之中，占有何等重大的地位，这是非常明显的。民众自己的发动，以及真正革命军队的暴动，以推翻新旧军阀政权，建立民众的工农政权为目的，以实行土地革命为目的。——这历史的事实，是中国革命中空前的事件。所以现在叶贺虽然是失败，而南昌暴动在湘鄂粤各省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之中，始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不但如此，我党以前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其错误的主要点，便是无产阶级政党抛弃独立的政治行动，侧重小资产阶级领袖妥协让步。只有决定四省民众武装暴动，以及率领叶贺军队暴动反抗武汉反动政府之政策，是算党抛弃机会主义而走上布尔塞维克道路的新纪元。

因此，凡在南昌暴动之中，有倾向于犹豫摇动，如等待张发奎态度之表现等等的，显然是机会主义的遗毒；南昌暴动之后，只抱着军事投机的心理，而不信任群众，不认识发动群众，创造群众的工农政权之倾向，甚至于暴动开始之后，仍旧抛弃土地革命之旗帜，那就更是机会主义的遗毒。叶贺军事上的失败，不是我党真正的失败；只有南昌暴动中之指导不能完全脱离机会主义的遗毒，所使南昌暴动减少其历史上应有之意义——这可是我党政治上的失败。

(二) 叶贺南征的经过及其失败

南昌暴动后，叶贺军队从南昌经过抚州，瑞金，会昌，遇见钱大钧的及一部分黄绍雄的军队，与他们大战，结果，南昌暴动军虽然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也打了很大的胜仗。会昌之后叶贺便未照预定计划直下寻邬，到梅县，竟改变途程折回汀州，上杭一带，再经大埔一直往潮汕去。但是等到叶贺军队到潮汕〔汕〕，敌人方面陈济堂〔棠〕，王俊〔3〕，黄绍雄已从四面合围来攻击。

叶贺军队虽然在九月二十四日先锋即刻到汕头，汕头工农军也起来暴动，然而到九月三十日即被反动军队所逼，不得不抛弃汕头，而竭尽全力到汤坑去御战。这最后一次战斗，敌人方面有一万五千，我军只有五千，巷战〔4〕一昼夜而我军竟完全解体。现在的情形是：二十五师一千余兵因到汕头时尚留驻三河坝，不久即被敌军隔断，现在退向闽边。汤坑之战败后，叶挺只余七八百人退甲子港而溃散。尚有贺龙二十军之第一二师二三千人奔往海陆丰，这部分的军官政治意识本甚模糊，离开大队之后，更是绝无目标的情形，竟要求李济琛收编。

(三) 叶贺暴动失败后之政策

南昌暴动军的失败，诚然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失

败——工农武装暴动的开始时期，革命方面所有的这一些正式编制训练过的军队，不但不能征取广东发展土地革命，而竟溃散了一大部分，这诚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是武府反动后，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更新的时期——工农民众暴动的时期，叶贺军队的革命战争，不过是全国民众暴动中的一个强大的副力。这新时期中，我们的主要政策是组织民众暴动，赞助民众暴动，叶贺的南征，不过是这总政策之中的部分问题。我党这个新的武装暴动政策，完全是合于革命发展到新阶段时客观上所要求的。只要看看九月初直到现在，湖北的通城，通山，崇阳，咸宁，蒲圻，公安，石首，松店〔滋〕，江陵〔陵〕等县，农民甚至于徒手的暴动起来，组织工农革命军，占领县城，革命民众自己选出县政府，乡村之中实行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没收地主，杀戮豪绅……湖南，安源的工军和农军暴动进攻醴陵，株州〔洲〕的农军以一支枪夺取株州〔洲〕，平江，浏阳的农军曾同时暴动占领县城，长沙四郊的农民也起来暴动，广州则自四月十四李济琛反动后，四处暴动起来。但要看这种情形，但知道客观上革命的发展，的确已经到了一般工农暴动的时期；我党的责任，便是组织和准备以及赞助指导这民众武装暴动，在各地率领民众起来推翻新旧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在这种总暴动之下，叶贺军队自然有很重大的意义，但是，革命的基础力量始终并不是叶贺的部队，而是工农群众，现在叶贺军队固然失败了，工农民众的力

量还却正开展，对于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之认识，正在与新旧军阀国民党的剧烈的斗争之中，日益广泛而深入于工农群众——不但在两湖广东是如此，现在江浙北方豫陕……差不多各省都有如此的现象。这种情形之下，难道叶贺军队一败，革命便了结了么，当然不是的。叶贺的失败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叶贺的军队可以给敌人打散，工农民众的力量并没有打散。我党准备组织发展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仍旧应当积极的进行。

因此，现在广东虽然已经没有立刻以大军攻取广州夺得全省政权的可能，然而广东各地的农民暴动仍旧在发动，叶贺所剩余的势力应走“到农民中去”帮助当地农民摧毁豪绅的政权，建设农民群众的政权，引起农民群众自动的起来没收土地……武装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叶贺所余军队自身要改组变成工农革命军。

(四) 叶贺南征中我们主观的错误

叶贺军队的南征，何以竟至失败呢？固然，客观上敌人的军力比我军强大，全中国的报纸交通整个儿的权力都在敌人手中。然而失败的缘因之中属于我们主观上的错误的亦是很大：

一、前敌委员会政纲的错误——主持叶贺南征的我党指挥机关，前敌委员会决定政纲之中，关于土地问题提

出“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土地”的主张。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这证明没有土地革命之决心，这种政纲可以使叶贺暴动根本上丧失其意义。广东一个农民听见这一主张便说道：“这叫做耕者无其田”！这句批评是再正确也没有。

二、策略上的错误——叶贺南征军所到的地方，对于豪绅资产阶级所采取的策略，并不是猛力摧毁他们的组织和政权，都〔却〕大半偏于犹豫妥协的策略。并未猛力歼灭土豪乡绅，并未完全解除他们的武装，摧毁他们的金融机关，摧毁他们的交通联络。不敢坚决的实行没收征发的政策，却用军阀筹饷的老办法，和他们和平磋商。对于豪绅是如此，然而一到汕头，对于乘机稍稍抢掠的贫民，都〔却〕立刻枪毙了三个人，“为的是维持秩序”——那是〔时〕还是维持的豪绅资产阶级的秩序！广东有一个工人说：“这是蒋介石第三的军队”。这就是说：这次来的军队还非工农贫民的军队，并没有大大杀灭豪绅资产阶级的权势与势力（叶贺军队之中“不扰民”的口号几乎高于一切）。

三、政权认识上错误——“耕者无其田”的“蒋介石第三的军队”到广东做甚么呢？要创造甚么样的政权呢？当然，带着这种政纲和策略的军队，对于政权不会有明了的认识。没有预备去建立工农贫民的政权，没有深切觉着自己应当代表工农贫民去行使权力，却只要“继承国民党的正统”。没有信仰群众的力量——群众的革命

独裁的力量。没有在群众之中去创造真正自己的军队和政权的力量，而是想象着自己是一种军队的力量，类似于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力量。因此：（一）可以乱发委任状，联络杂色军队土匪首领；（二）可以派人与张发奎谈判，弄些纵横捭阖之术……。

四、宣传工作上的错误——叶贺军队行军的时候，兵士之中并没有做充分的宣传及政治工作，所过地方的民众之中也没有宣传。同时，敌人的宣传都[却]非常之利害，军队行过抚州之南，差不多十几天不见一个人，这是因为朱培德等反宣传的恐吓当地居民的缘故，我军却没有先行派遣宣传〈员〉，说明“八一革命”南昌暴动及南征的意义。

五、军事上的错误——军事上的错误，更是很多，不能详细叙述，简单些说：南昌暴动没有采取直下赣州，吉安，一则可以打散朱培德钱大钧隔绝张发奎，使他们不能与李济琛黄绍雄连成一片，而如现在之从容布置，围攻我们；二则这条是大路，沿途农民运动有些基础，可以随处摧毁豪绅政权，引起农民群众建立农民的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逐步交农民防守。南征的路线是取得抚州，会昌，寻邬等闽赣边境荒微之地，农民简直尚未起来的地方，这已经是一个失着。然而这还可以说，仅仅是一种可能，最明显的是：一开始便有与张发奎妥协之等待犹豫的倾向；对于不稳的部

队，如蔡廷楷部，采取非常软弱的摇动的政策，致使蔡廷楷得以诈术损坏我军很多很好的部队。再则，现在瑞金，会昌打了胜仗之后，又不追踪南下，直到梅县，汇合当地已经奋起的农军，发动当地农民暴动，击散黄绍雄等敌军，直取兴宁，五华，占领全东江区域却又折回走上杭，汀州，与敌人避道而行，使敌人得以腾出十多天的工夫从容布置。

总之——前敌的指导，在政治上及策略上并未能真正代表工农，既没有明显的土地革命及工农贫民政权的政纲，又没有坚决摧毁豪绅政权的策略，——工农说是“耕者无其田”“蒋介石第三的军队”。这种机会主义的指导之下的军队，如何能责备农民群众不起来援助，农民对于这种军队自然是不会出力赞助。事实是叶贺军队根本不去发动农民群众——前敌指导，只知道军队是主力，“革命委员会”是政权，基本上不信任群众的力量，不去发动农民创立真正的民众政权，因此将富有历史和伟大的意义之“八一革命”，变成仅仅是投机的行动。这是一切错误的总错误。总之，此次失败，并非农民未赞助军队而失败，而是军队未发动工农群众，甚至反而阻滞民众革命斗争而失败的（例如普宁农民群众数万围城攻豪绅的巢穴，军队去帮助，打进了城竟反而不准农民进城，不准农民大杀土豪乡绅，说是维持秩序）。

六、南方局⁽⁵⁾指导广东农民暴动的错误——南方局指导广东农民暴动的政纲战术上的错误，中央早有信去

指正（见《中央通讯》第六期）。叶贺军队与广东农民接触之后，尤其见得出：（一）政纲和口号上拘泥规定五十亩以下不没收，另提减租至百分之三十的口号；（二）战术上农军只取侧面攻击——仅仅作帮助叶贺，牵制敌人之计，而没有号召农民群众自己起来夺取政权和土地，因而没有猛力搏击的战术；（三）根本上没有发动农民群众，所谓暴动，大半是，或是完全靠已经组织好的农军势力行动——或为纯粹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农民群众的暴动；（四）地域上海南及高雷〔6〕虽起，而无关大局，西江方面简直只拮据有枪的零星部队（农军或土匪），没有到群众中去号召，因此这地方始终没有暴动，黄绍雄部队遂得安然渡过；（五）既没有把广东农民运动做主力，又根本没发动群众，所以使群众之中发生等待叶贺的心理。自然，一般工农自己没有深切知道自己起来夺取政权——这是政治宣传之大错误，就是我各地党部也没有详细考察反动势力，作种种夺取政权的准备，——这是技术工作上的缺点。

（五）叶贺失败所得的教训

前敌委员会及南方局的政治上的错误，虽然最后改正了些，——例如土地问题政权问题等等，但是已经太迟了，那时军事上已经近于失败了。叶贺南征中我们所得的教训是非常之大的；

一、政权问题——今后革命的任务，应当明显的确定是要创工农贫民的革命独裁的政权——苏维埃的政权。国民党已经死灭，他的旗帜最多不过是“蒋介石第三”的旗帜。必须是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必须是群众选举的剥夺反革命的豪绅资产阶级选举权的政权。

二、土地问题——今后应当切切实实明了“农民群众下层自动手没收土地”之意义。土地问题决非某一政权（自蒋介石第一到蒋介石第三的一切政权）所能出一布告法令，限制几亩以上不准没收的，农民暴动即是实现“耕者有其田”“分配田地”；农民自动手的干，我党应当竭尽全力以赞助，并且要领导他们去干。耕者有其田及分配土地普遍群众斗争，客观上是土地国有的实行，因为只有群众如此行动起来才能创造出工农民众的国家，只有工农民众的国家才能实行土地国有——宣布耕者有其田是全国人民的^[7]，宣布一切人不得买卖土地。

三、劳动问题——我党在武装暴动创立工农贫民政权的要总政策之下，自然有最澈底的：（一）“八小时工作制……等”的工人问题政纲；（二）工农政权要没收中外大企业及银行，要实行国有银行大工业及一切交通事业；对小企业手工工场等厉行澈底的劳动法，对于不遵劳动法的店东厂主严厉的处置，一直到没收。

四、策略问题——对于买办豪绅资产阶级，必须极严厉的实行歼灭政策，不能稍有犹豫动摇的态度，并须剪

敢的摧毁他们一切权力机关，武装的，金融的，交通的，一切种种反革命工具。对于小资产阶级不可以存着怕他们反动而迁就他们的心理；我们猛烈的摧毁现在有的豪绅资产阶级的秩序，小资产阶级是要动摇甚至反动的。但是工农政权的确立，实际上也是解放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他们客观上只有赞助工农是他们的出路。

五、军事问题——辛亥革命直到现在，都只有“将变”——冯玉祥，郭松龄，唐生智，周凤歧等等的倒戈，“民军”“游击队”等等土匪首领的受编。现时我党的军事行动，必须是“兵变”——兵士群众，土匪群众在我们政治口号之下移转他们的武器来反抗长官，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权。总之，既名为民众武装暴动，那就必须是民众的。工农群众奋起抢夺敌人的武装，兵士土匪群众举起武器来干，——打倒一切“上等人”的权力。如此之军事行动，才是民众的武装暴动，这种暴动里才能产生真正的工农革命军。这种主力的创造和发动之中，才能偶尔利用“杂色军队”和“土匪首领”“中立”；否则便是国民党（“上等人”的党）老方法——纯粹利用军官及土匪首领，结果，是无穷的造成豪绅资产阶级的武装势力而已，他们始终是要杀工农的。

六、党的问题——在这总的武装暴动工农革命政策之下，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必须有党的指导，政策上，如这次委任杂色军队，及与张发奎接洽等，都是前敌各个人的任意行动。政治指导集中于党是非常之重要。再

则工农革命军中，必须有党代表的制度。三则各地党部必须深深建筑于群众的基础上，在日常斗争中一步不放松的宣传夺取政权的必要。四则各地党部必须详密的探乘〔察〕敌人武力上，财政上……的情形，总之，党要在政治上技术上真真实实的做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好准备。

叶贺失败之中，如上述之许多错误，显然机会主义的遗毒，我党必须深切的认明：下极大的决心，重造我们的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澈底肃清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造成真正群众的，革命的，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党，然后才能担负起现时所负的重大使命。

十月二十四日

附一：

李立三报告

——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

（一）南昌暴动

七月十九日我和中夏同志奉中央命令到九江，谭平山同志亦到。当时在军事上四军十一军已向南昌移动，驻扎于马回岭、涂家埠一带，二十军已渐次集中九江。朱培德之三军移驻彰〔樟〕

树，九军移驻临川。程潜之六军经江西之△△萍乡分道向南昌集中，有包围我军之形势。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运动。汪精卫已完全投降于唐。张发奎态度虽仍表示反唐，却已深受汪之影响，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们不满，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C.P.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C.P.”之表示。军事上已到了极严重之时期，而张尚徘徊于武汉，则张之不可靠，更可证明。同时湘鄂农民运动虽受严酷之摧残，仍继续不断的在各地武装斗争，城市之工人亦在继续斗争。当时党的政策，正准备在秋收时期号召广大农民暴动，在武汉亦正准备作反政府的大示威。所以就当时形势，“南昌暴动”已经是我党必然应采取的政策。不过我们动身时中央并未给我们准备此项工作之任务。因此我们到后，第一次会议觉到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三、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逼迫张朱与我们一致（当然当时这种观念还没有脱离机会主义）。因此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在这次会议中没有不同的意见，遂将这项意见报告中央。我与中夏即赴庐山和秋白商议，秋白亦完全赞同这项意见。当时闻中央有召集紧急会议之讯，请秋白代表在浔负责同志之意见，并请中央即速可决。越二日形势益紧张，张发奎尚未到浔，态度更右倾，并闻将有庐山会议，来实行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中之C.P.，同时平

山已将在南昌举行暴动之计划，探贺龙之意见，贺表示甚为热烈。因此更有进一步之决定，军队于二十八日以前集中南昌，二十八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当时我尚在庐山，得中、平、代英等电召即返浔，参加会议。此次会议对暴动计划完全一致。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没收大地主土地（次项决定在此次会议上有很大的争论，至第二日恩来同志始完全决定），实行劳动保护法为暴动之目的。在这项纲领之下发表宣言（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第二日恩来自汉赶到，报告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于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遂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并由中夏同志将详细计划回汉报告中央。我们遂于二十七日齐赴南昌，正式照中央命令成立前敌委员会，当时因军事的准备来不及，遂改定于三十日晚举行暴动。二十九日早午，连接特立^[8]同志自浔发之两密电，谓“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当时前委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三十日早特立同志到南昌，当开前委会，特立报告中央意见宜慎重，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当时，恩、代、立、湃、平都一致反对此项意见，谓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争论数小时因特立系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故未解决。到三十一日晨，再开会议，又辩论数小时之多，特立最后表示服从多数，始决定于是晚二时举行暴动。是晚因二十军某营长泄漏秘密，增加行动时许多困难，至翌晨六时始将三、六、九军在南昌之部队完全缴

械。

(二) 军事计划与回粤之经过

暴动之第二日即成立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委员会之下组织参谋团主持军事计划。关于军事方面自南昌至汕有多次之讨论，其经过大略如下：（我没有参加参谋团和党内的军委故仅知大略。）

一、关于回粤路线的讨论

关于回粤路线的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由樟树、赣州，取道绍〔韶〕关，沿粤汉路直取广州。另一意见主张由赣东经寻鄡直取东江，以为是此路线可以避免敌人之攻击。并且可以很快的与东江农民暴动联络。当是俄顾问、恩来及参谋团同志都主张后者意见，只有很少军事工作同志及一部分非军事工作同志主张第一种意见，所以结果遂决定取道赣东取东江。

二、由南昌至瑞金

五号从南昌出发，经三日赶到临川，天气极热，沿途多系山路，每日行六十里，实际多至百里。兵士负担极重，每人背二百五十发至三百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因无夫子）。沿途全无农民运动，加以反动派的宣传（杨如轩事先通电各县，说我们是北军实行公妻共产），所以沿途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兵士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军队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的组织，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兵士全不明此次暴动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二十军最坏，军队纪律亦

极坏，放枪拉夫等事随时都有）。

第十军〔师〕亦于到达进贤时，将我们在该师之主力范进〔蔡〕同志团（三十团）解决，开到浙江去找南京政府收编去了。原来参谋团决定第十师走极左翼，与中路相距近百里，因此无法监视。

在临川驻了三天，对外及军队的宣传工作方才开始（前委才决定许多宣传工作的计划），在军队的党的组织，和军队本身都有相当的整理，所以从临川到瑞金二十日中情形比较好，行军亦较缓（每日平均约五十里），兵士可少休息，天气亦较凉快。但是沿途农民因受 AB 团的宣传，对我们更加仇视，数日不见一人。譬如宜黄县城原有近二万人口，等我们到时，全城仅留有四十八个六十岁左右的男女（在我们未到前曾经土匪骚扰）。因病落伍兵士常被农民惨杀。过石城后才比较好些。

到临川时因为二十军十一军的参谋都逃跑了，原定军事计划，有完全泄漏的危险，所以决定到瑞金后，改道经汀杭取东江。

将到瑞金时得探报，已有敌人，遂决定攻击瑞金的计划，在离瑞金三十里之王田市与敌人接触，仅三小时击破敌人三团，我军亦伤亡六百余人，遂取得瑞金。

在瑞金得到敌人许多文件，方知敌人攻击我之计划，并有优势之敌人在会昌，钱大钧、黄绍雄两部约计十八团。遂改变计划先攻破会昌之敌，然后折回瑞金，再转道汀杭取潮汕，因恐会昌之敌不破，敌人可以随时袭击我之后方。同时过会昌经寻邬取东江山路很多，给养极为困难（据以后调查并不如是），故不得不先攻会昌再折闽南而取东江。

会昌之战极激烈，将钱大钧之主力完全摧破（钱军力约一万人，败后仅收集二千余人），我军亦伤亡八百人，黄绍雄的损失极

少。

因战事及军队迂回往返的关系，在瑞金停留约一星期之久（前委在这星期中开过几次会议，一切政策都有很大的改变），始到汀州。

三、由汀州至汕头

在汀州时关于取东江的计划有详细的讨论。当时有两方面的意见：一主张以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军力（至多两团）趋潮汕。盖料敌人恐慌已极，潮汕空虚，可以不战而取。并且经潮汕再取兴宁、五华攻惠州，过于迂缓，敌人有集中兵力攻击我之可能。一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盖恐敌人死守，潮汕不得，便难取得外面的接济。恩来、希夷均主前说，俄顾问与贺龙、伯承等均主后说。同时一般军官长期行军之后，均欲得地休息，多赞成后说，遂照后说意见决定。自上杭至潮汕，沿途毫无战事，到汕头时敌人已退二日。

四、汤坑之战与潮汕失守

原定到潮汕的第二日即向揭阳出发，但因筹取开拔费的关系，在潮汕停留三日始出发。当时二十五师留在三河，二十军第三师留守潮汕，因此出发前方者仅二十四师及二十军之第一第二两师，共计不够六千战斗兵。

当时敌人已到达汤坑，总计兵力五师以上，约一万五千人，三倍于我。在分水、汤坑之间激战三昼夜，我军伤亡过多（二十四师之下级干部伤亡殆尽，二十军亦死团长二人）无兵补充，遂不得不下令退却。同时敌人以一部兵力攻潮州，以海军攻汕头，汕头之敌虽被击退，潮州竟失守。于是不得不并汕头放弃。

九月三十日晚二时，遂决定放弃潮汕退海陆丰。革命委员会到普宁之流沙两日始与军队会合，但是在流沙之西十里便有敌人截击，遂溃败不可收拾，当时二十军之两师已过前方，仅二十四师在后面，退至甲子港时收集仅九百余人，现尚驻在陆丰一带。二十军将到陆丰时，遂被陈景〔济〕棠军缴械。留在三河坝之二十五师，曾大败敌人，亦已伤亡过甚，向和平〔平和〕方面退却。现在尚余二千余人，枪枝约千余支。

（三）政权的组织

一、革命委员会的组织

在暴动之前，决定在原则上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实际上便是组织一以C.P.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名义上使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继承国民党正统”来号召，反对宁汉政府。暴动之翌日即由中国国民党各省党部及特别市、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的名义，产生革命委员会。

关于革命委员会的人选，经过一次的讨论，主要的争点，便是关于张发奎的问题。在暴动之初，对张发奎的态度已有不同的意见，就是暴动的决定不必问张的态度，和必须拉拢张始能暴动。最后的决定虽然是不管张的态度如何，由我们直接来干。但是在许多事实上，还是表现许多妥协敷衍张的政策。如暴动的第二日还由贺叶分电告张，并表示欢迎他来南昌，同是并用民众团体名义电张欢迎，在宣传上还不大尽“拥护张总指挥的口号”（这些都未经前委会正式的决定，在当时也没有同志正式提出反对的意见）。到讨论革命委员会人选时特立、平山同志极力主张须加入张，恩来、立三主张张不应加入，但没有力争，代辨无甚可否。

所以结果张竟为主席团之一，而黄琪祥〔翔〕、朱晖日亦列名革命委员会之中。

到瑞金后得到上海报纸，方知不但张发奎等已经鲜明旗帜反共，即所谓各省左派分子，亦完全投降于武汉政府，而武汉政府又实际上投降了蒋介石。同时各省军阀都用国民党名义封闭工会农会，残杀工农群众，因此国民党名义已为工农群众所唾弃，所以联合国民党左派，继承国民党正统已从事实上证明是当时机会主义的幻梦。因此前委会议决定，对于政权的性质，须根本改变，应该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政权。不过在工农政权之下须有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实际上便是工农分子占多数和C. P. 占多数的政府。同时决定乡村政权应完全归于农民，并须以贫民为中心，城市政权，工人须占绝对的多数，县政权，工农分子应占绝对的多数。

到汀州后，又决定名义上仍沿用国民政府，方可以应付外交，免帝国主义过分的干涉（这是表现当时对于帝国主义过分的恐惧）。同时并决定以平山同志为委员长，而把陈友仁等都加入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之中。虽然加入了许多工农分子，如顺章、荷波、兆征……同志等，然实际上几成对原定的政策的敷衍办法，因为除兆征外都仅是空衔的政府委员。

（四）土地革命的政纲

在九江会议时，对土地革命的政纲已有不同的意见，立三、代英主张须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为暴动的目的，因为南昌暴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继续没收土地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中夏、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谓恐因此惹起反动势力更加联合的攻击，和军队内部分化。争论极烈，当日会议无从

决定（两方人数一样），只决定报告中央征可否？翌日恩来到浔，始传中央的意见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方得最后的决定。

关于土地政纲的第二次讨论，是在南昌暴动以后，农工委员会提出农民解放条例中，有“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土地”一条，当时会议上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或以为二百亩的限制，限制还是大低，主张没收三百亩到五百亩以上的土地。或主张实行武汉议决后搁置之土地政纲，“肥田五十亩，瘠田一百亩”。甚至还有主张全不提出者。最后代英同志说：“我们这次八一革命就是要实现土地革命，所以我们决定了土地政纲，在沿途就要开始实行。只要真能实行，就是没收两百亩以上的大地主都是好的”。因此遂照原案通过了。

此项政纲决定后许多同志都很怀疑，沿途找到在军队中的广东农民讨论，有一个农民很痛快的答复说：“如果是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便是耕者无其田”，因为在广东两百亩以上的大地主便是很少，除掉许多公田以外。这一句话把许多同志的脑筋都惊醒了，因此，到瑞金后前委会议遂决定改“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为“没收土地”不加亩数的限制。废弃原有农民解放条例，另提出一修正条例。

第三次的讨论系在上杭讨论国民政府的政纲时，当时多数同志的意见都是主张全部没收，因为觉到农民暴动起来了，不但二百亩以上地主的土地会实行没收，就是二十亩以内的自耕农都会没收，甚至平均佃权，湖南许多地方的农民对土地的处置便是前例，我们政府当然不能因为他超过了土地政纲限制和侵犯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便压抑他们。所以应根本提出“没收土地”，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至于拉拢小地主的方法，可用其他的政策，

如小地主的土地没收后由国家发给一种有息不还本的积〔债〕券等。特立的意见，对小地主仍当有相当的保障，所以主张改为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因为多数的意见都是主张全部没收，所以当时的决定还是“没收土地，耕者有其田”。到第二日，广东省委来了一份详细的政纲，对土地问题，是“没收三十亩至五十亩以上的土地”，对于依靠田租为生活者不没收，并已经在各地宣传。因此，特立再召集会议，遂照特立的意见“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通过了。

（五）劳动保护政策

在暴动之前后，很少注意到工人问题，直到瑞金以后，前委会才讨论一次关于劳动保护的政纲，结果，由农工委员会提出一劳动保护暂行条例，仅十九条：内面规定产业工人八小时工作制，手工业工人每日十小时工作，因公伤亡之赔偿，和疾病死亡的抚恤，失业保险及童工女工的保护，产前产后的八星期休息等，条文很简略，也未经过严重的讨论便通过了。

（六）财政政策

自南昌暴动后，革命委员会成立日曾讨论到财政政策的问题。当时意见在原则上几乎一致，就是要根本改变以前军阀的财政政策，将财政的负担从贫苦的工农身上转移到富有阶级，并决定即时废除厘金，及其他苛捐杂税（这一点当时已有反对的意见）。到了临川以后，军饷一天天困难起来（因纸币不能用），急须设法筹办现金。因此想起关于财政政策的大的讨论，总括起来有两种意见：一主张沿用旧的政策，就是每到一城，即行提款、派款、借款等，实际上就是利用一般劣绅土豪来筹款。这种政

策的结果，自然是剥削到一般贫苦的工农小商人身上，大商劣绅反可从中渔利；一主张应完全抛弃旧的方法，目前的政策，应该以征发（如征发地主的粮食）没收（没收劣绅反动派等的财产），和对土豪劣绅的罚款等。平山、伯渠等都主张前一个意见，立三、特立、代英、恩来等都主张后一个意见。这两个意见当然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采用前一个财政政策，不单如军阀筹餉无异，并且要动摇我们的根本政策（如建立工农政权，镇压土豪劣绅等）。所以在会议上虽然有争论，因前一说的理由不充足，自然是决定采用新的财政政策。但是到了实行的时候，却又发生问题了。因为在赣东一带全无农民运动，谁是大地主和土豪劣绅很难于调查，而旧的方法确可以筹到少数的现金。因此从临川至瑞金筹款方法极为混乱。如是平山同志得出一个原则，“只要有钱，不问政策。”到汀州时因为商会承认筹款，所以对于惩办土豪劣绅都主张放弃了（平山曾两次写信给我，要我缓提土劣）。但是结果上了一个很大的当，原来汀州商会承认三天内缴款六万元，遂让商会在城乡大派款，连十亩以内的自耕农及很小的杂货店都派他们十元八元不等，到是十万元以上家产的仅出三五百元。这样搜索的结果，三日仅得二万余元，并且闹得满城风雨。因此革命委员会只讨论一次，立三、特立等极力批评这种政策的不当，遂又决定完全取消旧的方法，采用新的政策。遂在汀州大捉豪绅，实行没收与罚款，并发还许多贫苦工农的已出的派款，仅二日，即得四万余元。如是决定到广东后全用新的政策，并组织一战时经济委员会来管理一切。但是到了潮汕，竟又完全放弃了。当时平山同志提出两个理由：第一、大规模的征发没收恐惹起帝国主义的借口干涉；第二、潮汕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大规模的征发没收的结果，将是商业全停，秩序

混乱，使反动派得以扩大宣传。特立同志为第一种理由所摇动，恩来为第二种理由所动摇，如是财政政策一仍旧贯，战时经济委员会便从此夭折了。

(七) 镇压反动派

在革命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保卫处，专为镇压反动的机关，并决定对于土豪劣绅等反动派采用严厉镇压的政策。开始在赣东一带因无农民运动，几乎无法进行。仅在驿前、广昌、平〔屏〕山市、瑞金、会昌等处杀了三十几个土豪劣绅，和几个AB团的分子。到汀州杀了四个劣绅。在当时准备到广东后大规模的屠杀反动派，但是结果仅在潮州杀了三人，大埔〔埔〕四人，汕头十二人。原定的政策竟未能实现，有几个主要的原因：第一、重要的反动分子已闻风先逃无法搜捕；第二、潮汕以东农民运动极弱，主持同志的观念极为糊涂。如在大埔要当地同志开一反动派的名单，以便按名拘捕，他们却在名单上注记：“某人应处以徒刑五月、三月，或无期徒刑等”，其他如三河坝等地完全没有农协的组织，更无法拘捕；第三、我们主观上放弃镇压反动派的政策，如在汀州、潮、汕时，平山几次和我说要缓办反动派，徐光英同志就汕头公安局时，反动派还没有开始惩办，反先捉乘乱抢劫的人三名枪毙了。有一个海员工友看见了，马上说“这是蒋介石第三的军队。”到潮汕失守时，牢内还关有几十个反动派（多半是工会送来的），竟无法杀他（晚上不能放枪，又没有刀子）。反动军队到，自然马上出来，更利害的反动了。汕头工会也极弱，有这个工会捉来，那个工会强迫要保，后来要总工会审查一张名单来，弄了五天还无结果。

（八）宣传工作

在革委之下，设立一宣传委员会，专管宣传工作，同时又设立了总政治部，管军队内部的宣传工作。然而此次的宣传工作，却做得坏，宣传的口号，政策的错误，这是由于总的政策的错误，当然不能归究于宣传工作，但是连八一革命的意义，不但是没有深入群众，就是两军的兵士亦不明白。二十军的兵士沿途骚扰农民拉夫、拿物，甚至奸淫的事都发生过。就是十一军的兵士直到失败后还说：“四军十一军本是合一的，就是叶挺弄坏的。”这都是因为宣传工作没有深入兵士的原故。

（九）赣粤工农运动和暴动

江西党的组织极弱，工农运动当然不好，赣东除临川、宁都有特支组织外，其余所经各地毫无组织，完全没有农民运动。反动的 AB 团的势力却很大，所以在赣东一带不单是不能得到农民的帮助，并且受了很多的阻障。

沿途向兵士宣传广东农民运动极好，只要到了广东，各县的农民，一定可以马上暴动起来，至于夫子粮食等当然毫无困难。不但是一般兵士都很相信，所有的同志都是这样想。但是一进广东界，却使人大失所望，农民对军队的情形还不如福建。到了大埔，已经有工农讨逆军的组织，并且准备暴动已经两三月之久，但是只有很弱的极幼稚的军事技术的布置，全未注意煽起群众的工作，更未注意群众的组织。以至我们军队到了，连拘捕反动派的工作都不敢做。军队开拔时要他们召集一百农民组织农民军，保卫县政权，结果仅得五十余人。

三河坝在军事上极为重要，但是当地全无农会的组织，松

口为工农讨逆军第八团团部所在地，仅有七十几个农军，农民群众亦未起来。我们交了一百五十枝枪给他，结果找不着农民来拿。

我们想象中的汕头，一定工人运动很发展，工人的斗争一定很利害，因为在省港罢工时经过很长期的斗争。但是到了汕头，表现得非常之弱。我们预备将以前的警察完全取消，因为完全是压迫阶级的工具，组织五百工人义勇队来代替他。经过三天的号召仅得七十余人，并且都不甚愿意，因为餉项睡食等等都不如意。可见群众的阶级觉悟非常之弱。

在汕头也经过数月的暴动准备，但是也因为只是注意军事技术的准备，不知道对群众政治的煽动，所以结果群众不能起来。

潮汕以东一带农民运动较好，农民群众经过长期的斗争，暴动军事的准备亦较完善（仍是缺乏对群众政治的煽动和组织），群众亦自动起来参加。所以在我们的军队未到以前，农军已将海陆丰两城占领了。我们到时，朝〔潮〕阳、揭阳的农军也占了县城，普兴〔宁〕四乡的农民都起来暴动将县城围住了。反动派死守县城，有枪八百余枝，机关枪大炮都有。农民围攻不下，派人要军队援助，当时派了十一军一营人去助攻，只数小时便攻破。本可将普宁所有土豪，聚而诛尽，但是这一营长（同志）在攻破城时，不让农军进城（因恐农军杀戮太多），同时并宣布“革命军是不扰民的军队，决不会随便屠杀的。”到军队撤退时，农军也不敢杀了。因负责同志这样想，“军队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他不于破城时大杀反动派，或者是团体预定的政策。”

只有朝〔潮〕阳方同志带的农军于破城之后曾大杀反动派，农民异常欢迎他。浮阳〔洋〕农民与地主激战数日，后经军队的帮助将民团缴械后，农民将地主大烧杀了一次。但这些地方的反动

派尚未完全肃清，而军事上已完全失败了。于是各地的农军都只好仍旧上山去。

（十）党的组织

八一革命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实际上不过是许多C.P.分子的个人指导，最后几乎变成平山同志的个人指导。

中央的八七紧急会议，虽然是党的政策与组织脱离机会主义进入波尔失威克〔9〕化的一大关键，但是对于八一革命以后的政策未能充分注意。为〔如〕国民党问题、政权问题、财政与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均未有明确的决定。至于指导的技术上，更是疏忽。我们在前敌的同志，直到了汕头后，才知道有八七紧急会议的这回事。行军两月，简直成了野人，不单是不知道党的情形，并且连全国大的政治状况都不知道。蒋介石下野，我们到汀州看见上海的《申报》才知道。

前委的组织原照中央命令，没有平山同志，但是当时平山在政治负了很大的责任，中央并未将他撤换，所以前委商量的结果，只好要平山参加前委会议。到南昌时前委组织比较完善，后来革委成立，都加入到革委去了。并且都是担负很繁重的工作，各项技术工作人〈员〉也取消了，于是前委变成了革命委员会的党团。同时负责的几个人，都是前后左右分途而走，很难集合一块开会。因此除掉几个重大根本政策以外，许多重要的问题都由负责同志随意办理，甚至违反已定的政策，也不能纠正或制裁。可以说前委本身组织非常之弱，在政治上，几乎完全失掉了指导。譬如在汕头再与张发奎联络，和滥委陈炯明部为师旅长等事，有几个参加前委的同志当时全不知道，直到香港才听见说。

在革命〔委〕内工作的约二百六十余人，内有一百八十余同志，但是到汀州才组织起来，开过两次大会和几次支部会。至于他们的工作，前委全未能加以管理和指导。

军部方面的组织比较好，各种会议也比较的多，不过与前委的关系很坏，因为军部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就是一切政治的指导都须完全经过军部，同时军委亦很弱，所以党的政治的方针很难深入到军队中的同志去。这是党的组织上一个很大的弱点。

经过各地党部的组织，都异常幼稚，并且充分表现机会主义。在赣东一带不必说简直全无党的组织，就是在粤东一带所有各地的党部，不过是一些共产分子的集团，全不是群众的斗争的组织。有些地方曾极力做暴动的准备，但只注意军事技术，全不深入到群众中去。这种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实在是党的根本的危险。

(十一) 结 论

八一革命在客观上是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工农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开始，同时就是国民革命最后一个阶段，土地革命的客观〔10〕。但是因为党的政策深中机会主义之毒，不但是得到一个最后的失败，并且把本来客观上付与的意义都完全失掉而成为一种简单的军事投机。第一、国民党在武汉反动屠杀工农以后，已成为群众所唾弃已臭的死尸，所以八一革命应该是工农政权的开始，但是还死恋着已臭的死尸，好象要靠总理在天之灵来保佑一样。革命委员会之中几乎全数是C.P.，但是每次开会时还是要宣读总理遗嘱，想起来真好笑！到瑞金以后已经在原则上决定要建立工农政权了，便是还舍不得一块国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头失守，才决定取消国民党的名义和“白色恐

怖”的旗子，这就是机会主义在这里作祟。第二、明知道八一革命的意义，主要的是土地革命，但是却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这种“耕者无其田”的土地政纲，就是党在第五次会以后所谓联合小资产阶级的结果。第三、可从对汪精卫的幻想中得着很大的教训，但是却又恋恋于张发奎，到了潮汕张完全反动了，看见他到广州挂了一块反南京的假招牌，却又对他悬着很大的幻想。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依附强力的心理。第四、不敢屠杀土豪劣绅，反对征发没收的政策，却维持旧的秩序来装璜国民政府的招牌，充分的表现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汕头工人说“这是蒋介石第三的军队”，真是一点不错！第五、暴动是群众创造的艺术，没有群众便无所谓暴动，但是我们在各地暴动，只有军事的准备，完全没有发动群众，并且到准备暴动时，注全力于军事组织，把原来的群众组织都放弃了。所谓工农军的暴动，不过是变像的军事投机。第六、不去极力发展群众，却认与陈炯明的余孽接洽及联络土匪等是重要工作。第七、军事行动不图与敌人作决死争，却极力避免敌人的攻击，这都是军事上的机会主义。

这次八一革命的政治上的错误，可以说党的历史上的机会主义的结晶，伟大的八一革命，完全被机会主义断送了。当然军事上虽然失败了，革命还在继续高涨中，革命的主力工农群众还在继续奋斗中。不过我们不深深领会这些教训，我们还会继续做断送革命的罪人，同志们不要忘记了八一革命中所得的宝贵的教训

附二：

张太雷报告

——“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
(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南方局
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席上)

这个报告分开几方面说：

(一) 政策决定之经过

我们首先说明向〔白〕中央决定南昌八一暴动，是决定在四省秋收暴动以后。此时解释要以农民为主力，去进行土地革命，并未丝毫依赖军事力量。后来南昌客观上容许我们动作，中央决定要动。但只认定南昌暴动是四省暴动中的一部分，仅仅是土地革命的一个帮助。希望军队到广东来，能够与广东农民暴动打成一片，绝不是希望单纯军事的胜利，因为这是没有意思的。在南昌开会的时候，平山同志主张干，但他主张干的原因说是：贺龙主张，叶挺也同意干，故他也主张干。这完全是军事冒险的运动，绝不是如中央决定去干的政策一样。当时秋白把南昌的决议由浔带到汉口，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故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同时国际亦决定要干，内容详细我虽不知，但决定要干我是知道的。后中央又派国焘去，意思是要

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平山主张动成为拥护新政策的一个人，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因为这样结果致使这次动成为平山所领导，自然这个运动也变成了军事的投机。

(二) 政治上的错误

这次军行所至，与土地革命毫无关系，未曾帮助农民有蓬蓬勃勃的斗争，沿途只知道叫军士怎样守纪律不扰民。可以说这次我们的军阀〔队〕，不是什么革命军，只算是王者之师秋毫无犯。不准军士抢土豪劣绅地主之财物，甚至鸡犬亦不能擅取，宁愿饿肚，还算在彭湃乡村中杀了几十人。我们军队到的地方，并没到乡村中去骚乱，杀戮土劣，闻在汀州捉了十人，亦只勒索数万元了事。到了汕头，更是沉寂，其情形闻之便要下泪，什么宣传，筹款打反动派，一概没有甚么，闻说曾招集了一个大会，标语传单不多。见警察就跑了，我们不知把工农分子去代替，反去找回旧的，始有人站岗，至兵舰陆战队上岸那天，警察竟为内应。我们对警察还这样不忍杀戮，甚而至公安局的名义都不肯改为政治保卫团，这虽然很小的事情，亦足见他〔我〕们保守关〔观〕念太深。

各地农民亦没有得到军队的帮助，潮汕农民亦可〔未〕动。同阳〔11〕农民自动起来，亦只派军队甚少去援助。普宁城派了一营人，攻西城，军队竟从防军之要求，不准农民入城大杀土劣。农民是非常不满意，觉得我们的军队与其他军队没有什么分别。大家都〔以为〕把敌人打了克复广州，甚么问题都可解决了，遂

不注意怎样趁军队力量所及的地方去负起帮土地革命进行之任务，这与国民党划分军政时期宪政时期的观念错误是一样的。

（三）军事上的错误

军事上的错误亦是跟着政治上的错误而来的，譬如国焘不主张在南昌动作，因为是对张发奎有许多幻想。就是临走的前夜亦与张发奎作很长的谈话，而且说还有希望。军事上的错误在南昌动作开始的时候就有，就是对蔡廷楷部，过于相信，以为他不会背叛，迟迟不解决他，致被中途逃走，同时影响到二十军。不然，多了几千兵或不至有这样利害的失败。同时军事计划因为想急取广州，所以行军是很快的，沿途抛弃枪枝大炮无数，死人亦多，然后至会昌又折回，不由筠门岭^[12]入，以为给养困难，其实并不是事实。裕叶^[13]去平远回来报告，筠门岭一带给养都可能的。这又当进不进的贻误时机，使敌人能够集中。

其次军队中的侦探工作做得不好，敌军作战计划与人数完全不知，汤坑之后仍是乱摸的。还有就是主力军队不集中，二十五师竟调去三河坝，遂为敌人击断不能援救。总之，这次失败，是军事行动与东江农民没有联络，鼓起土地革命之高潮，与农民暴动打成一片。

（四）我们应有之认识

此次的失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单纯军事的投机，没有唤起广大农民起来，必然失败的。但经过这次之后，有些人根本会怀疑到农民，以为农民没有力量，这个错误观念，我们应该严厉反对的。

（五）目前的方针

目前工作方针，与前大不相同的，就是以前还有些妥协存在：一、以前五十亩以下土地不没收的，这实在是土地革命的障碍，以后便一切地主（小地主在内）的土地都要一概没收，澈底的干去；二、以前还是用国民党旗帜去号召，以后便不要了，改用红旗。以前只限于宣传苏维埃，以后便要真正建设工农兵代表会。表面上似乎与前所差无几，实际已大大不同，就在换红旗一点看来，已表现出我们的坚决。

我们现在要放胆去干，不应象以前太规矩，要平民式的干，不要有仁慈，打破好人的观念，对土豪应该乱杀，绝对不要恐怕冤枉了。我们必须接近新的精神，抛弃一切旧有的观念，甚至以前是很好。根据此政策，我们的工作：

一、二十五师已退彰〔漳〕州，约二千余人，二十四师已到海陆丰一带，约有千把人，贺部师长已叛，但闻兵士脱离者数百人。我们现在要决定他们去做政治的流寇，不应象过去只注重掠夺政治经济的中心，他们每到一地，便要杀土豪劣绅，帮助农民起来便要组织工农政府，扩大宣传，我们不是希望一定要这个政权能够稳固很久。

二、军队一律改工农革命军，指挥在参谋团，实则直接受南方局指挥，不致再成为单纯军事投机行动，旗帜改红旗。

三、各地且仍应积极准备，有机会便起来。

四、革命委员会要改组，权属中央，名单更要中央决定。至各省要不要革委，由中央决定。至将来革委之产生，或可招集全国工农兵代表会，或某一种形式。其余各条，在目前工作纲领^[14]上面已有写出，现不重述。我们有个问题，就是以后是否

还有希望，革命前途是否高潮？我们可以肯定说，是高潮的，有希望的。我们从主观方面说，自军事失利后，海陆丰农民仍继续的奋斗，打贺部叛军，十四日广州海员示威大运动，自动夺取工会，打工贼，至海南农民占据五县，组织政府，现仍有占据全岛之希望，武汉湘农民仍旧在奋斗中。再从敌人方面说，全国已入混战局面，冯张之争，晋奉之争，唐生智与南京之冲突已明显，周凤歧何应钦亦交恶日甚，李张因我军失利，而成李张黄鼎足而三之势，日在准备伙并之中。我们的失败，并未促成敌人的团结，反促成敌人的冲突。反一方面说，我们因这次失败使我们不再幻想单纯的军事行动，而知道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假使这次我们胜利了，前途可否乐观还是怀疑的。因同志中多仍充满旧的观念，党的力量又弱，同志中竟有争领袖的表现，胜利了恐也不是革命的胜利。

总之，我们得到了此次教训，必须抛弃过去的错误观念，澈底执行党的新政策，这样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

附三：

张国焘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月九日）

此次潮汕可痛之失败消息，谅兄等已于报章中略得一二。弟与立三、代英、伯承、伯渠、玉章、贺龙、彭湃、平山等均于七号来陆丰等处，陆续逃至香港；太雷、倚〔绮〕园诸兄先弟一

日起程返港，但至今未到，不知是否遇险；恩来、希夷^[15]诸兄尚在军中。二十五师原在三河坝，现向闽边退却，二十军及二十四师剩千人现在陆丰。欲知详情说来话长。回忆弟奉命赴浔时，我军已集中南昌，当即赶赴南昌与前委同志会商，诸同志都主张立即与张发奎分裂，彼时箭已在弦上不得不发。惟发动为一事，发动后如何进行又为一事，主张发动者，内有少数同志多不明白争领导权的意义。然集吾党国民党工作人员及政治工作人员于一处（吾党政客及平山等），虽主发动实在无出路之心理最多，可谓之左派投机主义。故彼时军中同志，亦尚无与张分裂之决心，政客们更是不知道发动之后如何进行，应用何种政策，弟名之为“毫无争夺政权之准备”。彼时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与解决农民条例等，都是仓卒弄成的，停留南昌共四日，仅仅组织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发布了一二篇宣言，毫无显著的政治表现。政治工作人员如章伯钧之流，都是借军队掩护出海逃生之心理。出发南昌军事上却有十师之变，××范荇同志等死之^[16]。假使彼时我们要解决十师，并非不可能，徒以无争夺政权之准备，遂为人所卖。出发南昌时，实现固有许多困难，最困难者为夫役缺乏，故从南昌到抚州一路甚为狼狈，大炮丧失殆尽，机关枪亦失掉不少，枪枝二三千枝，子弹更不知其数。行军毫无精神，从军官一至兵士不知为什么地〔到〕广东去。同时同志中有几件表现：一、实在没有法子我们就上山；二、我们在这种〔里〕无法生存，跟军队到广东去再说；三、反对汪精卫等的宣传并不热烈；四、对于革命认识不清。这些都代表逃亡失败的现状。南昌起义是对的，可是在起义中党的作用实在很少，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毫无准备，虽然平山常说中央历来是取让步政策，只有南昌八一革命是真正领导权，开中国党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可与十月

革命并称，但是事实上证明其为左的投机无疑。如此无争夺政权之准备，亦不可不谓吾党历来之遗毒。

从抚州至瑞金一路只是简单的行军状况。在南昌时，我们得到七十万纸票，十万现洋，可是纸票不好用，积极方面无所表现，消极方面因行军不易得到佚子及粮，故亦不能说是很有纪律的军队。拉夫者有之，抢人鸡子者有之，而尤以二十军为甚。及到瑞金、会昌，幸而战胜钱大钧。此时我军战斗兵只剩八千人，出发时共有二万一千人，十师变，去掉五千人，沿路疾病落伍及逃亡者不下七千人，瑞金、会昌之役损失千人。到瑞金时政治意识始稍明显，吾人所讨论者：一、政府的组织形式；二、政府的政策——土地革命；三、利用国民党旗帜至何程度；四、财政政策；五、军队的补充问题。然会昌战胜后，吾人不走会昌出寻邬到粤之平远，反折而走闽之汀州、上杭，实为最大之错误。政治上同志对于土地革命虽积极宣传，然土地革命应如何进行，则极少明了者。政权形式则尚欲利用国民党旗帜，故主张县市区乡政府则建设工农占百分之九十的政权，上级则主张利用国民政府名义，并主张用各省县市革命委员会名义以及以左派清党的办法改组国民党，召集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盖欲与汪精卫等争正统也。对于财政筹款方法，始终采择于利用土劣摊派款项之旧式办法之间，惩办土劣尚未能坚决进行。从抚州到粤边，一路毫无我党组织及工农势力之可言。

吾人抵粤前以为广东之工农必有相当之准备，乃事出意外，所经大埔、三河坝、高陂、留〔隘〕隍、潮州、汕头等处，工农势力均极弱。然吾人又不先于梅县、兴宁、五华占潮汕之△背，而竟直下潮汕。敌人占住梅县、汤坑、丰顺等处优胜形势，我军遂成为斧〔釜〕底游鱼，焉得不败。

汤坑之役，敌陈济棠、徐景唐、薛岳、王俊等部约一万五千人，我军二十军二十四师只五千人，敌黄绍雄部围攻潮安，我只一困守，廿五师又远在三河坝，汤坑战两昼夜，我军死伤二千人，敌死伤四千人，然终不能胜敌，潮安失守。如是二十军二十四师既不能退饶平与二十五师联络，遂不得不仓卒退潮阻〔阳〕之关埠走贵屿〔屿〕，聚于普宁之流河〔沙〕。及抵流河〔沙〕开紧急会议，而又为敌所截击，我军遂一败不可收拾，弟等即于是处四散逃至海边，雇民船逃香港矣。

抵港后与省委会议，知粤局张李冲突在即，吾人仍须集中工农势力争取政权。集中地点：二十五师在闽边之韶〔诏〕安，二十四师及海陆丰之农民集中海陆丰，江西农民及琼崖农军均设法集中，以及仍用革命委员会名义，不用国民党名义，军队用工农革命军名义，废止国民革命军名目，积极发展工农斗争等，革委预备立即发布宣言。总之，此次运动之中，同志死者极多，同志忠实能奋斗者亦最多，然十一军尚不能说是C.P.军或工农军，只能说包括很多C.P.分子之有纪律的国民党军，二十军只说是表同情于我们之旧式军，革命委员会则甚复杂，党的组织极松懈，党亦无职权，军事上政治上均甚幼稚，毫无夺取政权之准备。如此溃败，实堪痛心，中局对此次事宜有表示。同志如贺龙、伯渠等均欲赴俄，请中央送之往，弟不日即返沪，报告一切。对于八月七日之决议及告同志书已略知一二，弟完全拥护，并欲日内回沪，面受处罚。船即开，甚急。并致党礼！

国焘

十月九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出版的
《中央通信》第七期刊印

注 释

- [1] 马夜政变，即马日事变，因事件发生于五月二十一日夜晚，故当时又称马夜政变。
- [2] 本文在《陕西省委通讯》第四期登载时，此后还有：“直到今年八月一日，叶贺军队因此而暴动，反抗武汉政府——反抗这摧残土地革命压迫工农屠杀共产党的所谓国民政府，叶贺军队，是中国革命之中第一个真要站到工农贫民方面来，真要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及军阀政权的军队。八一暴动主要的是在此。”
- [3] 王俊，当时任国民党潮梅警备司令。
- [4] 本文在《陕西省委通讯》第四期登载时，此处为“苦战”。
- [5] 南方局，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决定成立，代表中央领导广东、广西、闽南等地党的工作，负责在上述地区传达并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十月二十三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取消南方局。
- [6] 高雷，今广东省湛江地区，民国初年称高雷道。
- [7] 本文在《陕西省委通讯》第四期登载时，此处为“宣布耕者的田是全国人民的”。
- [8] 特立，张国焘。
- [9] 今译布尔什维克。
- [10] 原文如此，疑有误。
- [11] 原文如此，疑为“揭阳”之误。

〔12〕筠门岭，在江西省会昌县南部。

〔13〕裕叶，兰裕业。

〔14〕这个纲领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的。由广东省委第十四号通告发出。纲领认为“广东土地革命运动仍是高涨，暴动的计划仍应继续实现，现在的暴动不应停止，而应努力扩大。”纲领决定了当前的行动方针十条，主要内容是：一、只有靠“土地革命的主力军”工农力量起来，才能得到胜利。军队应与农民的革命力量打一片，不应认为是土地革命的主力。以后应当注意于工农群众自动的革命运动之发展与扩大。二、废除国民革命军的名义，改称工农革命军，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三、革命武装绝对受南方局领导，应成为农民暴动的有力导火线，切忌作成“单纯军事行动”。四、各地工农应扩大本地的政治或经济斗争，扩大到夺取政权。五、扩大土地革命与建立工农兵政权的宣传。六、加强敌军工作，促进敌军的分化，发展在士兵中的组织与影响，反对幻想与军阀妥协或其他“政客式的军事投机的行为。”七、发动农民武装起来，争夺土地与政权，杀戮土豪劣绅，没收其财产。八、有计划地筹措工农革命军的给养，不得扰乱农民。九、中央革命委员会仍秘密存在与活动。十、公开宣传党的主张与共产主义，发展党的组织与农民协会、工会的组织。

〔15〕叶挺，字希夷。

〔16〕××，应为徐石麟，又名徐石林，南昌起义时任第十一军第十师二十八团参谋长。范荪，又名范孟声，南昌起义时任第十一军第十师三十团团团长。当时报载徐石麟、范荪等

人被害消息不确。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

——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
党的暴动政策*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中央常委通过)(1)

一、现在的政局，已经是全国的军阀大混战：北方阎锡山冯玉祥张作霖张宗昌的战争，南京政府参加津浦线上的战争，南京和武汉又已开始战争，广东也派范石生方鼎英许克祥等与唐生智开战，广东内部李济琛与张发奎之间又酝酿着战争。其他各省，如福建等，内部还有许多小战争和冲突，——总之，可以说实实在在的全国军阀混战的局面。这种混战，无论他的名义是甚么，北伐也好，讨伐党贼也好，实际上都只是反映买办豪绅资产阶级内部各派各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反革命的军阀的战争。国民党清党反共之后，完全变成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党，他的内部仍旧是不能一致，仍旧是互相冲突；国民党的各派，所谓西山派，蒋介石派，汪精卫派，唐生智派等等，都只是各系新军阀的代表，他们之间互争甚么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威信或者第四次执监会议的正统，都只是自欺欺人的鬼话，实际上只是各系军阀

争夺地盘的招牌而已。军阀之间的这种混战，国民党内的这种纷争，证明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不能稳定自己的统治。

二、中国革命因为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暂时胜利，而受着很大的挫折。今年四月间蒋介石李济琛的东南反动，摧残上海广东的工人和农民的革命势力。五月廿一日湖南的政变起直到七月十五武汉的排共会议止，完成这种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胜利于两湖江西。最近九十月间两湖暴动的挫折及八一革命的叶贺暴动军失败于潮汕，使全国反动势力庆祝自己反革命的“最终”胜利。但是反动政权的不能统一不能稳定，立刻在他们自己之间的纷争和战争之中表现出来。中国革命虽然受着三次的摧残，但是反革命的势力并不能完全将他消灭，这是很显然的事实。

三、广东，湖南，湖北的农民暴动没有能胜利，并非农民群众的力量已经爆发而被反革命的强力的力量所扑灭，乃是我党当地指导机关，中着很深的机会主义的余毒，不曾去发动群众，大半变成军事投机而致于失败（参看上次中央政治报告〔2〕及关于叶贺失败的通告）。现在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之下，国民党军阀屠杀压迫民众的局面之下，广东，湖北，湖南，江西，江浙，山东，北方的工人和农民群众，仍然急遽的革命化，工农的经济状况因战争及经济恐慌而愈加困苦。只要看广州工人在叶贺已失败之后（十月十四日），仍旧群众的起来示威，

□夺取工贼的工会机关，苏州工人群众反对总商会及厂主而示威游行，逮捕总商会会长及商团团长，上海工人群众起来捣毁工统会的各区机关；广东琼崖高雷的农民暴动仍旧占领着许多县城，海陆丰的乡村中仍是农军的势力，湖北，湖南的农民暴动势力仍旧存在着，江浙的抗租运动日益爆发，江北的农民都有武器，时时有反抗的趋势，河南，陕西的工〔红〕枪会天门会群众往往夺得到乡村中甚至县城中的政权；最近山东阳谷范县一带亦有农民暴动，鲁北饥民更将普遍骚动起来。工农民众的革命力量，在这军阀混战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不能稳定的局面之下，客观上有一触即发，起来推翻一切豪绅军阀政权的趋势。

四、我党的职任，便是指示工农群众以正确的革命的路线：

(1)工农贫民兵士群众武装暴动，反对国民党及军阀的祸国殃民的战争，变军阀的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中央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最近中央反对军阀战争宣言已经指示得很明白）。如果在这种军阀混战中，要说民众应当赞助国民党北伐，或者赞助南京讨伐党贼唐生智，或者说武汉政治分会较好，要赞助他反南京，或者勾结张发奎倒李济琛，……这种策略便是卖阶级卖革命的策略。民众在这种军阀战争中不应当想望某一方面胜利，而应当努力使交战的双方面都失败，这就是民众起来反对战争，一直到暴动推翻双方的军阀国民党政权。

(2) 工农民众暴动，建立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权（苏维埃政权）。暴动之中要完全以发动群众为主要的革命力量，要广大的民众自己起来，自己感觉到非夺取政权不可，要在暴动期中及暴动胜利之后立刻能组成当地工农代表会议，为革命的权力机关。如果早就存着“继承国民党正统”的心理，或者采取国民党的办法，例如随便派定几个军事领袖的人，委任各机关的官吏，便算夺取了政权，——这便是非常错误的政策。同样，这种暴动之中用不着任何“中国革命委员会”等类类似国民党式的大元帅府或国民政府的空名义，拿他来委任军长师长。这种悬空的“中央政府”的名义，只足以勾结土匪首领杂色军队的小军阀，使土匪及兵士群众认为自己的参加暴动，完全是为着首领或长官受着了高高在上的某政府的委任，而不是参加工农群众的暴动。总之，暴动的权力机关，应当是革命群众自己的机关：暴动之前，由当地工农秘密团体组织临时革命委员会，指挥暴动；暴动之后，立刻召集工农兵代表会议，举出当地的革命政权（乡村中是某村农民委员会，县城便是某县工农代表会议的执行委员会）。

(3) 工农民众暴动的武力，应当从民众之中创造出来。当地的民众如果能够发动，他们群众的猛烈的搏击反动的政权机关，他们之中虽然只有很少的武器，也必定能够夺得反动派的武装，广东历年来的农民斗争，上海最后两次的工人暴动，以及最近九十月间湖北的农民

暴动，都有极显著的经验。如果，一说起暴动，便只想着军事行动，想某地有杂色军队几团，有土匪几股，可以勾结运动起事。这种对于“暴动”的国民党式的旧观念是机会主义的余毒。工农暴动的武力必须是群众中创造出来，即使联络土匪军队，也必须由工·农·民·众·和·兵·士·群·众·的·结·合。应·从·民·众·的·直·接·行·动，夺·取·武·装，编·成·工·农·革·命·军。

(4) 工农民众的暴动必须实行群·众·的·革·命·独·裁·制，——这就是说必须无可顾惜歼灭一切豪绅，摧毁豪绅资产阶级的种种权力机关——政府官吏军事长官，都要无情的歼灭他们，不可以存着妥协观望的心理，尤其不可以借着“治安”“秩序”的名义抑遏群众的这种革命行动；我党只应当领导群众，在这种风暴的革命行动中逐渐建立革命的权力机关，领导群众，使成为更有组织更有战略的行动。

(5) 现时的暴动前途，农村之中比城市之中更加多些客观上的可能。土地革命的怒潮，将要在农民的群众暴动中发展开来。农村之中的农民自发的减租减税运动，必须领导到抗租抗税的直接斗争，杀戮征收人员，发展到杀戮一切豪绅，夺取武装；立刻便应指导这种斗争到群众自动没收土地分配土地，征发豪绅地主的财产，——农·民·自·动·手·实·行·耕·者·有·其·田，是·现·时·暴·动·的·主·要·内·容。应当在一切实日常琐屑的斗争中，使一般农民群众明了感觉到夺取政权土地的必要：“或者是农民有政权而得

着土地，或者是豪绅(国民党)有政权而减租也减不成!”

(6) 城市工人中的经济斗争亦是如此。虽然极小的劳资纠纷问题，如今在国民党的政权之下，解决起来总是工人受损失，或者受欺骗。我党在城市中的准备暴动工作，所以决不是单在于准备武器，练习战术等（这些事固然是万分必要的），而主要的是在政治上准备工人群众以及贫民群众的革命认识，使广泛的群众感觉到：非自己起来取得政权不能得着解放，甚至于不能得到生活状况的丝毫改良。工人在这种经济斗争中必须建立秘密的广大群众的工会——阶级的工会；如果在通常的经济斗争中，尚且不能团结一般非党的群众，那么，城市中的暴动，便不能有群众的基础。总之，城市工人的斗争，现时应当集中全力于武装暴动的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这种准备工作是不能和经济斗争分割开来的。

(7) 这种暴动政策之下，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应当是非常坚决的：固然这于暴动没收地主大资本家的财产时，对于小商人，并不须没收，但是群众的斗争剧烈，切忌顾忌破坏“秩序安宁”，会失去小资产阶级同情的摇动态度。我们对于店东小资本家励行澈底的劳动法，反对者便没收。我们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小贩，贫民……），应当吸引他们参加革命。

(8) 关于这一总政策的宣传，应当避免过去机会主义的倾向，根据中央最近宣言的精神，号召群众自己起来，相信自己的力量，要求自己握得政权。这种宣传应

当从党内开始，使个个党员懂得，个个党员能成为群众中的宣传者。

五、总之，我党现时的政策是号召工农民众反对军阀的战争，工农民众武装暴动推翻一切种种的统治军阀，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以发动群众，实行群众的革命独裁，创造群众的工农革命军，来实行暴动；从抗租抗税的斗争中领导农民自动手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杀戮毫〔豪〕绅，一直到暴动；从工人日常经济斗争中扩大阶级的工会组织，直接的群众行动反对资本家，一直到武装暴动。

六、客观的中国革命发展之阶段及群众的革命力量，不但确有这种武装暴动的可能，而且急迫的要求这种暴动。不过主观上，群众的革命力量没有能充分的团聚和发动，这是因为我党党的力量薄弱，各地党部机会主义的余毒很深；如不信任群众的力量，只想着练几军的正式军队才是革命的力量，群众已经爆发而我党指导者临阵脱逃；有着强大的军队力量（如叶贺），不使之工农化，反而在政纲上策略上使之国民党化；有爆发的可能而不发动群众，只进行土匪首领的或农军的军事行动……（参看中央最近政治报告及关于贺叶失败的通告）。所以现在的形势之中，只有坚决的抛弃机会主义的思想，坚决的去发动群众，在各地尽可能的实行武〈装〉暴动。只有在这种积极的斗争中，能够团聚发动群众中的革命力量，也只有在这种积极的斗争中，能够改造我党。锻炼提拔出各

级党部工农分子的干部，重造我们的党，强健我们的党。

七、在这种总政策之下，中央已经决定各地应当实行领导工农民众起来暴动：——广东的农民暴动应当积极领导群众起来，叶贺的残部已经编成工农革命军，还要与农民群众中的农军合组起来，受当地农民政权的指挥，实行土地革命，摧灭豪绅政权；广州的工人虽然又受李济张发奎的压迫，但是他们已经进到夺取政权的认识，应当领导他们准备暴动起来。两湖的农民也应当发动起来，尽所有的武装力量继续奋起，同时一般农民群众起来解决当地驻军，推翻唐生智等的政权。江浙的农民与工人也要领导起来暴动，以推翻南京政府为目的，至少是扩大土地革命的潮流于农民群众之中，摇动南京政府的政权。张作霖与冯阎之下的工农民众也是如此，尤其是山东——那里的农民群众部分的已经起来。这种暴动政策之下，完全要靠发动群众的广大与否，来决定暴动胜利的程度：各地自动的尽可能的发动，至少可以使国民党军阀的政权不能达到乡村之中，不能收着丝毫税捐餉粮草谷车船，至少可以使一般地主不能收着丝毫租钱租米债息，不能自由运输军队餉械，不能任意压迫剥削工人；或者发动范围能够扩大，联合好几县而成立某省临时革命政府……或夺得省城，根本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如此汇合而成全国，或某几省的暴动军联合的局面。

八、各地党部必须坚决的执行这一政策，各在当地发动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如果：(1)存着互相等待

的等待政策，心上想着别的地方应当先动，应当占领如何广大的区域，然后本地方能发动，或者，为要便利发动起见，虚张声势说某地某军（如以前说东征，最近说叶贺）已经革命成功，因而使本地群众不信任自己的力量，而有依赖别地方或军队势力的心理；或者（2）预先有着恐惧失败的心理，因而认为不可“轻举盲动”，少些斗争，多“保存着”党的组织；如果有这两种心理，那就又是机会主义毒发作，势必至于阻碍群众暴动的发展。应当知道只有各地自己努力的发动群众，方能造成汇合而为全国总暴动的局面；只有积极的发动群众起来斗争，能发展党的组织，健全党的组织，在斗争中扫除机会主义的分子，提出新的革命的工农的新的干部。各地党部（南湖〔湖南〕，北方，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的特殊工作，中央已经有信去指导，都应当赶紧积极的计划，定出更具体的工作步骤，来实行这一总政策，宣传这一总政策。尤其要注意的是：派遣工作同志到农村中去发动暴动及农民斗争的时候，必须注意选择工人同志去（知识分子则必须确实坚决革命没有机会主义的倾向的）；否则每每智识同志，因为本身或戚属是小地主绅士，而自己根本妥协犹豫，以至出卖农民的革命。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出版的《中央通讯》第九期刊印

注 释

- [1] 原件未标明时间。据会议记录，本文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的。
- [2] 指一九二七年十月《中央最近政治状况报告》，这个报告发表在《中央通信》第七期。报告主要通报了八七会议关于武装暴动新政策提出以后，两湖、广东农民暴动及南昌起义军队进入广东的情况。

中央临时政治局 扩大会议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中国现状与党的 任务决议案

(一) 中央最近的策略及客观 的革命形势

本年八月里中国共产党中央通过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已经考察武汉七月反动之后中国的一般政治状况，断定那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的稳定，在现时中国这种社会经济政治的基础上，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央那时指明：一般政治军事经济的大危机，因资产阶级军阀反革命的结果，必然要大大的扩大发展起来，这是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事实。中央曾经指出：虽然中国革命受着两次巨大的失败：四月间沪粤的反动，七月间武汉的反动，然而中国革命决不会就此长期的消沉，所以中央认为这种悲观的观念是绝对不正确的。中央那时认为必须继续扩大深入革命的斗争，并且要坚决的采取组织工农武装暴动的政策。以后的政局，完全证明中央这种考察是正确的，中央的大政方针是对的，固然南昌暴动及南征广东的革命军队失败于潮汕，固然广东两湖的农民暴动一处也没得确定的

大规模的胜利，但是革命虽然又遇着了这几处部分的新失败，然而三个月来一般的斗争经验，更证明了本党的策略完全是对的。最近的一期，各地工农民众的斗争又重新猛烈的爆发，一般政治状况及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经过了很严重的变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考察现时的新时机而决定适应这种客观时机的策略。

（二）中国社会的总危机与农业经济

中国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虽然胜利，然而那些产生伟大的中国革命之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仍旧存着。沪粤武汉的反革命，不但没有解决那些中国社会关系中的矛盾，而且更加使这些矛盾剧烈起来，增多起来，更加使这些矛盾的爆发急遽起来。这就是因为得着胜利的反动势力，竭力在那里巩固中国的旧制度——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是陈旧腐朽落后野蛮的制度。于是这种情形的背景里，那一般的总危机便尽量的大大开展起来。这就必然要引起无产阶级城市贫民，尤其是农民的广大群众之革命斗争的高潮。

农民经济的衰落破败，一天天的更加带着天崩地陷的爆裂性质。今年（一九二七年）是相当的“丰年”（除直隶山东两省已经完全被战祸天灾所破灭之外，其他各省的天时，照例应当使农业经济相当的改善，但是事实上差不多全国都因过去的灾荒与战祸，同样是成千累

万的人饿死杀死，不过是比较灾歉的直鲁略好些)，可是这所谓“丰年”，不但没有阻止些农民经济的崩败，而且更加增进农民经济崩败的过程。因为“丰年”的结果，人民反而要多出些钱米租费给地主和政府（例如浙江今年借口丰年迫缴历年欠赋），地主和重利盘剥者要追取农民的旧欠，买办和商人要抑低农产品的价钱，军阀更借口增加税捐至两倍三倍（江苏今年增收田漕的亩捐）。所以所谓“丰年”即使不比荒年更加使农民破产，至少也和荒年一样。地主的剥削农民，商人重利盘剥者的剥削农民，军阀的掠夺农民，豪绅官僚等等的压迫农民，现在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弄得农民不但不能恢复自身的生产能力，甚至于不能保存自己的生命。各省有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已经被这些有产阶级剥削到不能一日忍受的地步，农业经济的“重复生产”，即使在极隘小的范围内也简直是不可能的了。除地主商贾重利盘剥者的直接剥削外，军阀还要掠夺农民，他们不但征发粮食牲口，并且要拉夫，再则因为战祸连年的关系，水利灌溉防旱防水的工作，都大受妨害，国家秩序混乱分崩，天灾日益频数（这些天灾亦大丰由于中国社会制度而来的），还有财政金融的紊乱，使乡村中多量的出产品流入城市而不能得着相等的报酬，商业和市场的停滞纷扰，使农业经济上技术方面的准备也日益破毁，乡村中土匪蜂起等等。——凡此种种，都使农业经济崩败衰落。农业经济[济]的危机是一天天的增加，而有天崩地陷似的暴落的

趋势，这种危机的唯一出路，只有工农革命的澈底胜利和剧烈的土地关系的变革。

(三) 工商业的危机

中国工商业及金融中的危机，尤其有明显的表演。中国革命客观上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造成统一全国的国内市场，没有统一全国的国内市场，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一革命任务，在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阶段中就应当解决的。但是国民党的反革命，不但没有走近解决这一任务的一步，而且更加使这一任务的解决远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不但增加中国的分裂离析，而且发生许多新的混战，各省之间有战争，每省之内也有战争，现在全中国都是混战。商业交通在各省之间固然是时常断绝，就是在一省之内也往往东阻西隔，各省都是乱紊〔紊乱〕的金融状况，原料机器燃料的运输减少了不少，有些地方简直断绝了。反革命的屡次政变之后，外国资本家的竞争势力又增加了好几倍。再则中国农民的家庭工业，手艺等类的事业，更加破产停滞。国内国外的贸易都是日益衰落（一九二七年上半年输入减少百分之五十）。外国资本利用银价的低落，财政的紊乱及国民党的屈服，更加在中国多量搜括金钱财货。全国的破产穷困，经济的衰落，都在一日千丈的堕落下去。几百万农民，几十万工人店员，都在失业，都从商业及一

般生产过程之中排斥出来。资产阶级军阀国民党的反动，就是如此的“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

（四）帝国主义侵略之急进

资产阶级军阀的反革命，在国际关系上，便是完全降伏于外国资本主义，而增加帝国主义的侵略。英国帝国主义已经实际上夺回了汉口的英租界，而且完完全全统治了上海。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得着了绝大的胜利，满洲内蒙正在变成完全的日本殖民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完全全投降了外国资本，他已经抛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不敢再争收回租界的问题；关税自主的问题，他竟无耻的完全屈服。他绝对的背叛了民族解放运动。现时国民党的所谓“反帝国主义”宣传，一忽而反英，一忽而反日，都不过掩饰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替帝国主义当走狗的那种无耻的奴性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只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矛盾，而实在则替其中最强的当工兵。从革命开始到现在，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的统治力，从没有现在这样强大的。伟大的中国之被压迫的半殖民地的地位，虽然以前一向是治者阶级向帝国主义做买卖的“投机事业”的对象，但是从没有象现在资产阶级军阀反动（国民党）治下这样厉害的。

（五）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

国内政策方面，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便是只能采取法西斯蒂主义及亚洲式的野蛮专制之凶恶手段。白色恐怖〔怖〕，穷凶极恶的镇压工农运动，屠杀劳动民众；这种反革命政策，在国民党治下，达到了空前的野蛮程度。中国旧式的野蛮毒刑，对于革命党人的非刑拷打，还要加上建立黄色工会的把戏和警察包探所组织的工贼性的“工会”，渗入工人运动。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日益增长，同时他自身之内的分化崩溃的过程却也在急转直下的前进。中国资产阶级，固然绝对没有能力实行反抗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反动的革命使命，而在群众运动高涨的最初期，便背叛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更没有能力做稳定团结反动势力的动力。对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要他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统一中国，建立集权的国家，或者就在资产阶级地主联合的基础上统一中国，都简直是他没有丝毫能力去实行的事。这是他历史上的命运。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地主的联盟，其结果是使中国更加分崩离析，使割据互争的局面更加纠纷，自然要造成继续不断循环不息的军阀混乱的屠杀战争，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各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是最不成熟最没有力量的阶级，最不能负起历史上的改造社会制度之责任的阶级。一切建立巩固的国家政权之尝试，就算在一个小小

省县的范围里罢，都是完完全全破产。无间断的屠杀混战及空前的贪婪淫佚腐化，——便是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的国家机关之致命伤。国民党曾经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如今很快的腐化堕落，完完全全变成无主义无目的的帝国主义走狗的狗彘，屠杀工农的刽子手的党，贪脏舞弊杀人凶犯投机奸商的官僚党，这事实很明显的反映着资产阶级反动的全部腐化崩败的景象。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八月间便预言：国民党要变成一个象样的资产阶级反动的政府党，尚且是不可能的事，这是很对的。本次会议完全赞同中央九月间关于取消组织左派国民党之计划及提出苏维埃口号之决议。本党认为国民党左派组织失败之经验，证明国民党的旗帜已经完全变成白色恐怖的旗帜，凡是真正革命分子，只有团结在共产党旗帜之下。本党不但要号召一切革命分子退出国民党，而且要努力揭发国民党的欺骗压迫民众的罪恶，要领导民众起来推翻国民党。

中国资产阶级是历史上的流产，甚至于连造成自己政党的能力都没有。他们不能造出一个有一定政纲的党，更不用说要他造出一个真有政治意识的政纲了。

（六）中国革命的前途

中国资产阶级这样特别的作用，使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完全没有稳定的可能。经过革命的三次失败，仿佛

反动稳定是件可能的事。但是必须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及政治制度能够由改良主义的方法解决一些，同时，必须在现时国际国内之中，有渐进的，作算是非常迟缓痛苦的改变社会制度之可能，可是实际上现时在中国没有这些条件。中国没有这样一个阶级，能够负起责任来，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不过是夺取革命领导权蒙蔽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手段，领导权到手之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立刻便不得不将他转交给豪绅地主阶级，就是完成反革命势力的复辟，结果是反革命的领导权仍旧在豪绅地主阶级手里，而不在资产阶级手里。如汪精卫等类的政客，想“改良”土地关系（如应允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等），可是这种政策在几天之内便完全破产，单是这一例子便证明改良政策不过是公开的欺骗。再则全世界客观的形势是革命的，国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又在急进的施行，这种情形也就是使中国没有由改良主义得着外国资本家的帮助，而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要帝国主义“帮助”中国完成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使中国完全永久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二）帝国主义战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战胜苏联。此外中国不能由改良主义的方法去达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却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革命虽然受着屡次很大的失败，而中国劳动民众革命运动的力量不但还有很多很多没有用尽，而且现在刚在重新爆发革命斗争的高潮。

最近几月的经验，铁一般的证明这件事。中国伟大的革命已经唤起如此广大的工农苦力群众，他们都起来实行独立的政治斗争；民众激愤的革命力量，决非几个月的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所能完全扑灭的。

所有这一些情形，都使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这一观察，并不带着“革命在最短期间必定完全胜利”的幻想。中国的客观情形是如此：直接革命的形势之时期，并非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事，而是好几年的事。中国革命带着长期的性质，但是是无间断的性质。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一）在革命性质上，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行推翻封建军阀的民权革命，所以中国革命进展的过程中决不能有民权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势（所谓二次革命的理论）；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二）在革命速度上，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着历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继续不断的发展，因为治者阶级之间自身的冲突矛盾非常剧烈，他们的统治不能稳定，民众革命斗争，尤其是农民暴动自发的到处爆发，而有汇合起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这种继续不断的革命爆发，显然证明中国革命之无间断性。总之，中国革命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

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澈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

(七) 革命的高涨与低落的问题

中国革命的无间断的性质，只要看最近各重要省份里农民暴动的高涨，就可以证明。九月间农民暴动普遍广东湖南。虽然这种互相隔绝的群众自发的暴动，遭着屡次失败，然而农民运动的爆发仍旧继续着，有些地方（如湖北）甚至于更加厉害起来。十月间农民暴动又在江苏直隶热河山东开始了。同时几个主要的无产阶级区域，如上海广州武汉，经过一期退落情形之后，工人运动又带起比较猛烈的革命性质。农民运动的潮流，已经引起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爆发，不过暂时还比较的弱罢了。南京与武汉军阀争夺地盘的屠杀战争强盗战争开始之后，劳动平民反〔更〕加受着痛苦，广大的工农群众更加愤激。虽然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对于群众的革命运动非常之严重的压迫屠杀搜捕，然而群众的革命斗争，却正在刚经失败损伤的地方，陆续的继起。群众正在自己失败的经验上，学习革命的斗争。

固然，过分估量革命的高涨及群众的革命力量组织力量，因而认为可以有大大范围内立刻的胜利，这是错误的；然而经过革命三次大败之后，在现今这种反动局面之下，群众的革命斗争终于重新爆发；如果对于这种情

形估量太少，那就是不可救药不能轻恕的错误。

因为革命潮流的低落条件，至少是：（一）资产阶级军阀统治的稳定；（二）改良主义的渐次实行；（三）革命群众之溃散与消沉。单是敌人的屠杀进攻，不但还不是革命的溃散，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才使敌人惊惶失措而拚命的严厉镇压。但是，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布尔塞维克的党，不去积极发动群众，领导革命潮流的发展，而以为自然革命高潮的到来，自会胜利，那也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八）现时的总策略

现时形势中之中国共产党的总策略，便是：（一）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性质；（二）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变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三）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中国共产党应当避免过早的明知无希望的武装暴动的发动，那是会变成拚命的“孤注”的，然而党应当去领袖一切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之发动。所以共产主义者应当做一切农民暴动的指导者。如果农民暴动的发动，事实上不能有多分准备起见而推迟，如果这种暴动事实上不能估量到较大范围内的胜利，那么，党应当使这种暴动采取游击式的战争（不去占领县城或巨大的地域，长久的时期，不去费力建立大规模

的军队等等，而以人数虽少却是团结巩固的暴动军，经常不断的袭击政府的军队或地主的武装)。这种游击战争，随后很容易发展而生巨大的农民暴动，进一步而达到在较大的范围内夺取政权。固然，游击战争开始之后，攻袭城市，尤其是小县城，是农民群众常有的倾向，本党尤当领导这种斗争，使适合于战术上的目的，袭其不备，夺其武装，杀戮豪绅，摧毁其各种权力机关。但是，农民暴动之后，如果专意占据县城而忽略乡村中土地革命的根本工作，不去发动更多更广的群众，不使群众自己取得土地取得政权（苏维埃），那么，这便是军事的机会主义。

至于城市之中，则游击战争的策略，比较起来要难实行得多，所以往往在城市之中有不适宜采用这种策略的时候。要到城市之中已经最终决定举行暴动，巷战已经开始，那时，党才可以运用这种游击战争的策略。然而现在在一切工业区域，已经要建立工人的武装队自卫队，训练战术，利用他们在日常的反抗黄色工会的斗争之中；这已经是工业城市之中现时所不可迟缓的任务之一了。城市暴动的必须条件是：（一）工人群众的革命高涨及革命情绪——工人日常经济斗争的加紧与扩大，形成总的政治斗争；（二）治者阶级统治之动摇崩溃的形势；（三）一般市民（中层阶级）的慌乱犹豫摇动，对于治者阶级厌恶而反对，甚至于同情于治者阶级之颠覆；（四）工人阶级之革命力量之组织，技术上的准备。因此，党

不但不应当在城市之中只注意到所谓军事工作之准备，而忽略各市以及各县工人手工工人店员日常的经济政治斗争之指导与发动，而且应当更加加紧这种斗争；每一次极小的斗争之中，也要引导工人群众去了解暴动夺取政权之必要，及与农民暴动联合推翻统治阶级之必要；这样，于〔才〕是切实的在政治上准备城市之中暴动。关于工人暴动与农民暴动的联络关系，是党的最重要的责任，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和赞助，单纯的农民暴动是不能获得最终胜利的；但是，这种联络，只有经过党的组织与规定计画。群众的暴动，不论在城市或乡村，都要适合当地的环境与时机，既不能互相等待，亦不能在明明没有立即暴动的形势中，而以军事投机的方式做军事上的互相影响。

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

再则，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之下，可以发生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是军事投机主义。过早的明知无希望的发动，固然是军事投机主义，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不以发动群众为根本政策，不相信群众的力量，而只相信军事的力量，只知道军事上的布置准备

攻守进退的规画；因此，暴动之中只见军事的行动，并不充分发展群众斗争的根本工作。二是借口准备的不充分或者采取等待政策，而不发动当地的群众，甚至群众已经多数的起来暴动，尚且对于领导这种暴动仍旧是怠工或动摇犹豫；这种倾向的不信任群众力量，不发动群众的政策，甚至阻止群众自发的斗争，可以使党在群众之中丧失政治生命。党对于这两种错误的倾向，应预先指出他们的危险性而努力扫除之。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众暴动的责任，固然是使他尽可能的有最大限度的组织性，但是，一切群众自发的斗争，即使是党所认为过早的，党也有起而领导之[之]责任。

最后，工农武装暴动的策略，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对于一般贫民苦力群众（小资产阶级群众）应当尽力吸引他们参加工农的斗争；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存着犹豫动摇的心理，如惧恐扰乱他们的安宁秩序，因而不去发展革命的群众的独裁制，甚至阻止群众的剧烈的革命行动。

现在虽还没有到总暴动的时机，而党的任务却正在于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党不但要努力去组织农民自发的暴动，而且要去领导贫苦农民，领导起潜伏待发的暴动，发动游击斗争；应当发动工人的阶级斗争，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领导他们汇合而成总暴动，获得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胜利。

（九）〈苏〉维埃的口号与工农政纲

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只能在苏维埃制度的形式里建立起来。党应当在文字口头的宣传上，对于最广泛的群众解释：“为建立工农兵手工工人城市贫民代表会议政府，而实行革命斗争的必要”（“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但是，只有确实无疑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巨大高潮的暴动之稳固的胜利已有保证，只有到了这种时候，方才可以并且应当组织苏维埃，以为革命的政权机关。这所谓“暴动之稳固的胜利已有保证”，是说暴动在一定区域内已经有固守较长时间的可能；只要有这种可能，便应当建立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只要暴动真正是发动群众的，那么，暴动胜利时，这便是事实上不能不执行的任务。至于游击的农民暴动，还只有袭击移动的时候，当然，那组织暴动的当地革命委员会，继续以临时政权的性质为暴动之指导机关。总之各地农民暴动的发动，应当以当地农民的秘密团体（农民协会等）所推出的革命委员会来指导（城市暴动便是工会等推举的革命委员会），应当尽量发动群众，引进更多更广大的群众参加，实行自动手（“民众式”）的没收土地，杀戮豪绅，工贼，摧毁中国一切旧社会关系，实行游击式的战斗——解除敌人的武装，组织工农革命军；这种暴

动在一定范围的区域内得胜而有固守的规画之可能，便应当建立苏维埃（农民代表会议）；如果已能占据城市一县或数县，以至于一省，工农暴动已经联合起来而获得胜利，那便有建立苏维埃之必要。城市中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之建立，尤其要吸引广大的工人手工工人店员的群众；城市暴动一开始，甚至尚未开始之前，已经要有群众斗争组织的雏形，如总同盟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大会，革命委员会等，要积极领导这种群众斗争的组织，使成为革命的暴动的中心机关，实行革命暴动独裁的机关。暴动胜利一有巩固的可能，这类的群众组织便要变成苏维埃，而为革命的政权机关。暴动的胜利，只有在建立苏维埃的过程中，能使工农群众真正自己获得政权，而更加尽量的来发展革命巩固革命的胜利。——所以苏维埃的组织既不能在胜利绝未巩固之时开始，因为这可以陷于忽略军事战斗而专事选举，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成见，因而减弱革命的独裁制以至党的领导权之危险；苏维埃的组织也更不能借口于军事尚未了结，基础尚未稳固，而延迟推宕，因为这便更加要增长暴动中的军事投机主义，这便将工农暴动完全变为军事行动，只去攻城夺地，只知道军事上的规画。

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是武装暴动的总口号。城市贫民应当包括工匠手工[农]业者及一般非剥削者的小资产阶级。

党应当在斗争的过程中组织农民于农民协会等类的

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依各地的情形群众的信仰而定）。这种农民组织必须是贫苦农民群众（破产贫困之自耕农，佃农，雇农，失业农民）之阶级斗争的组织，且是暴动的组织（决不能视为类似工会的经济的组织）。然而党应当确定方针：暴动胜利之时，要农民协会变为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现时就应当宣传苏维埃的口号及农民协会的过渡作用。所以苏维埃口号并不与组织农民协会相冲突，可是“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的口号，应当取消。苏维埃口号之外，还要团结农民于土地革命的旗帜之下。农民暴动未发动的地方，秘密的农民团体是有需要的，本党应当引导他们到抗租抗税不还债的斗争，一直到武装暴动没收土地。本党对于土地问题的总方针，已经载在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之中。党应当坚决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分子犹豫圆滑的修改或谬解土地问题上的党的主张。土地革命的主要口号应当是：完全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耕者有其田，完全取消租田制度，同盟抗租抗税，取消一切苛约，重利债务，没收豪绅重利盘剥者的财产，歼灭豪绅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本党坚决的反对用减租，没收大地主，打倒劣绅恶地主等改良主义的口号，来替代上述的革命口号。本党应当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即使在很小的游击战争之中也是如此。

城市之中，除苏维埃口号以外，还有劳动问题党

纲：八小时工作制，绝对的增加工资，规定休息日，社会保险，要求监督生产等。再则，应当对于工人群众及城市贫民解释，并且要在暴动胜利之时实行下列的事：例如没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财产，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大工厂大商店银行矿山铁路等，收归国有，工厂归工人管，厉行劳动法，如果小厂主怠工闭厂，便也没收他的工厂，歼灭一切工贼反革命派，征发有产阶级的财产，改良贫民生活，如建筑工人贫民住宅等。只有在这种革命的口号之下，本党才能组织被压迫群众的暴动，而得到胜利。

（十）反对军阀战争与军事问题

反对一切军阀战争的问题，是中国现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赞成中央最近所发反对军阀战争的宣言，认为对于军阀战争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的政策，是非常之对的。“失败主义”便是要使交战的双方军阀都失败，因为军阀的失败崩溃，就可以开展群众革命运动的环境，而使工农暴动容易得胜。本次扩大会议更特别的指明：“失败主义”的革命策略，在南北新旧军阀战争的时候，对于本党是天经地义。对于劳动民众，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的统治，与白崇禧唐生智汪精卫的统治是一样的。北方军阀大半自身便是很大的地主和重利盘剥者，是最大的官

僚买办资本家的代表（商业资本与重利资本及官僚大地主的政权）；南方军阀是豪绅地主（重利益剥者）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他们双方虽然现在还是反动之中互相不同之种类，可是工人阶级及农民对于他们的态度是一样的。本党的任务，便是在一切军阀战争之中，努力将这种军阀战争变成革命战争，将这种屠杀掠夺的战争变成劳动民众反对富豪军阀的国内战争。本党应当向劳动工农民众解释的，对付军阀屠杀战争之唯一方法，便是各地工农兵士群众起来实行推翻自己当地的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之革命暴动。本党应当组织群众以备暴动，在优越的时候发动群众而指导他们暴动，领导工农群众起来夺取这些混战殃民的军队的枪支武器。

中央认为必须更加加紧在一般广泛的平民群众之中做反对军阀的宣传。“反对战争”的口号，中央认为是对的。但是宣传这一口号的时候，必须解释，要能永久消灭这种军阀的掠夺战争，只有劳动贫民的革命的胜利，而建立苏维埃的政权。

军队之中的革命工作，因为战争的关系，更加重要而更加要加紧破坏这些军阀军队的工作。中央现时特别指明：虽然中央政治局屡次提及这一工作，但是这种工作到处受摧残，或者简直没有做。农民暴动屡次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央认为就是这一工作没有丝毫成绩的缘故。本次会议现时特别命令各级党部立即开始在兵士及下级士官中的秘密工作。除主要的革命口号之外，军队

中的宣传，可以加上下列的要求：例如，增加兵士餉项，要求发清欠餉，给士兵好衣服好住所，废除肉刑，反对军官侮辱士兵，兵士监督军官的财政收支等等。本党应当号召兵士参加工农暴动，没收军阀财产，兵士选派代表参加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

同时，中央认为必须特别指出：中国革命总经验，尤其是屡次失败的教训，都证明要使中国现在的雇佣军队，变成革命斗争靠得住的工具，是不可能的，因此，凡是暴动胜利而有可能组织正式的革命军队的地方，本党应当组织完全与雇佣军队不同的工农革命军。工农革命军组织上的主要原则，便是志愿兵制度，工农革命军的主要成分，应当是阶级觉悟的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党代表政治部的制度，应当在新军队的各级组织之中建立起来。新军队中应当有集权的军需供给机关。新军队的名称定为工农革命军。

（十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八七紧急会议以来的一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阶级斗争剧烈的时期，这种情形自然的结果，竟使本党以全力去指导无产阶级农民的斗争；在这种艰苦困难的条件之下，本党所以没有能分一部分注意到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国际〔民〕运动上来。同时，正在这一时期之中，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及其保镖的军阀（国民党）逐步

屈服，实行其卖国的亲帝国主义的使命。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汉工人苦力群众赤手空拳夺回来的英租界，国民党竟归还了英帝国主义者，这是何等的耻辱。九月一日实行关税自主，也竟取消了。南京政府曾经企图使盐务署的外国督办服从自己，但是英国领事几声抗议便把国民党吓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蒙满，而国民党政府一句硬话也不敢说。所有这些事实都更加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是澈底的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无产阶级领导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引起极广大的农民与城市贫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锋，应当领袖中国劳动民众的民族解放运动，——严格的揭发治者阶级的卖国行为，以及国民党虚伪的“反帝国主义”的口头禅。本党应当号召无产阶级及广泛的被剥削〔剥削〕民众起来奋斗：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要求立刻撤退外国海陆军，没收外国资本家的工厂，企业，银行——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中国人民所有，取消一切外债——满清政府及军阀政府零毫出卖中国所借的外债。

同时，本党应当经常不断的对工人及一般劳动民众解释：中国人民要完全战胜帝国主义，只有推翻治者阶级，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真正的平民政权——苏维埃政权，同时，也只有得着国际无产阶级的赞助。

(十二) 机会主义的遗毒

八七紧急会议虽然严厉的反对以前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半孟雪维克主义的政治方针，中央临时政治局虽然屡次纠正地方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然而党内仍旧有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之遗毒。叶贺潮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南昌暴动政治上意义的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前敌指挥者不是实行革命的策略，而是在各种主要问题上采取妥协的改良主义的方针（只提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之土地，主张减租到收获百分之三十，不注意农民群众的革命宣传，不准工农自动的独立的实行杀戮豪绅地主反革命派，抛弃征发没收地主豪绅财产之政策等等）。军事上很坏的策略，也表现前敌党的指导，没有革命的建议力，没有果断的意志和方针。许多次的农民暴动之中，指导者犹豫动摇，没有革命的坚决的意志，都是多次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种机会主义的特点，便是不相信群众运动的力量，不去依据工农民众，而总想依靠靠不住的军队力量，总只想做勾结杂色军队的把戏。中失这次会议认为必须以全党的力量，来排除这种危险的致命的机会主义之遗毒，这种机会主义遗毒犹存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党的指导干部是非无产阶级的成分，本次会议命令各级党部立刻用最坚决的方法，使指导干部工人化，肃清其中的机会主义的分子。

要知道最近两湖广东及叶贺南征的失败，其原因由于主观上的错误的占极大部分，没有强固健全的非机会主义的党的指导，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再则，本会议认为还要预防党内别一种危险倾向发生之可能，——这种倾向便是对于工人阶级日常的经济斗争，部分要求的斗争，职工运动的工作，估量太少。其实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不但和指导部分要求的斗争的工作不相冲突，而且更加要党积极的去领导工人阶级要求改善自己生活的日常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共产党发展成为群众的革命的组织。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
版的《中央通信》第十三期刊印

最近组织问题的 重要任务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1〕

(一) 组织任务之重要

最近的革命斗争之中，组织问题更加占了第一等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组织之布尔塞维克化，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组织之革命化，都是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在于他的组织，全在于他有革命的阶级的组织，尤其是对于工人阶级的先锋——共产党。共产党应当有布尔塞维克的组织。没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式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决不会成为群众的力量，决不能尽他在工农革命里的领袖及领导者的历史使命。最近劳动民众革命运动所受的历次失败，就是我们本党所受的历次失败，很明显的暴露出革命营垒里组织上的弱点和缺点，这许多弱点和缺点，不仅是表现本党在组织上乃〔不〕能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奋斗，而且党员的本身在有些地方（如湖北），当反动势力比较严重的时候，便公开的脱党以至为敌人当侦探；有些地方整

个的党的组织甚至根本瓦解。同时本党自从放弃机会主义之后，虽然在极反动的政局之下屡次遭着失败，但是工农群众对于本党的信仰大增，尤其工人同志的积极，大增长起来，提拔工人同志负指导职任的工作，虽然还很不充分，可是已经使党日益健全起来，可见本党组织的健全与发展，只有在反机会主义的政策及组织原则之下更加努力，更加切实执行新的方针，战胜这些缺点和弱点，便是中国共产党现时第一等主要的任务。

（二）党的组织之大弱点

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主要缺点：一、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的——就是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形成一个政治派别，形成一个政党，还在中国无产阶级没有自觉的成为一个阶级的时候，还在工农阶级运动初具雏形的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资产阶级曾占着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智识界，这种情形影响到中国被压迫民众之阶级自觉，及阶级斗争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去时期之中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最主要的，最激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渗入了我们的党。这种成份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最初干部。工人贫农群众的加入共产党固然随着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发展而日益众多，但这已经是比较〈迟〉的一时期里的现象。因此，中国

共产党的指导作用，竟留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当时这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澈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在政治上不坚定，不澈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这种组织成份，就是武汉反动以前本党政策机会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2〕的策源地——这种机会主义一直影响到叶贺军队中党的领导机关的行动。

最近许多正确的澈底革命的党的决议案和方针，如土地问题，农民暴动的策略问题，劳动问题，国民党问题（八七紧急会议及其后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决议），往往在各地并不执行，谬解而成机会主义的实际行动，这是因为实行这些决议的分子，仍旧是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代表的旧干部。八七紧急会议就已经指出：党的下层群众是行动的革命的，党的指导干部却是机会主义的，这种情形便是党内有两种不同的社会成份，因而有两种不同的阶级政策之反映。只有小部分党的干部，团结在党的中央之下的，能够坚决的抛弃小资产阶级式的观点，抛弃机会主义的方法及犹豫动摇的政策，以及其他种种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特性，——必须全党都经过

如此的改造，才能锻炼出澈底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布尔塞维克的党。

过去各省委在组织上更加犯了不集体化的毛病，各部处理各部的事务不是太专门化了，但是干预到党的整个行动，如工农部不经过党的组织系统而直接〔接〕派人往各工会各县担任党的工作，军事部因有其离开组织部一贯的组织系统，致使各地党部时有工党，农党，军党之称，今后这种组织上的错误，中央必须负责纠正！务使这种各省党的各部的分裂的活动完全打消，并建立党的民主集权制，使一切工作都集体化于省委委员会及其常委中。

（三）党的改造之重任

因此而得的结论，自然便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于一切非工农的分子完全不给工作，或者完全开除出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不如此主张，这是要使党的指导干部之中无产阶级及贫民的成份占最大多数。支部书记，区委，县委，市委，省委的成份，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员的成份，尤其是农民中党的工作员的成份，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工会机关的干部，则须全部换成工人。这一改造工作，当然不是一下子可以做成工〔功〕，

但是必须愈快愈好。应当开始建立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制度，去切实这一改造工作。同时从最低支部起，提出工农分子，使担负实际指导的工作。各省在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以前，要开各省党部代表大会，或者省委扩大会议，在这个过程中，澈底新造各级党的指导机关。尤其重要的是：各地群众党部的工作，譬如组织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军事部，要由最靠得住最坚决的工人同志担负，在乡村中呢——由贫农同志担负。工会中的指导干部，也要立刻换工人分子。总之，最主要的是要使党成为斗争的组织，要使一切斗争都变成为党的集体指导，以消灭个人的英雄式的领袖和指导之弊病。至于一般党员的思想与行动，党的组织的责任便是要监督与训练他们，团结与熔化在八七紧急会议以来中央的政策指导之下，洗刷一切旧有的机会主义的遗毒。

(四) 党的基本组织与民主主义化

党的组织上的第二个弱点，便是许多大工厂大商店尤其是乡村和军队之中，至今几乎没有党的支部。乡村之中，严格的说起来简直没有党的组织，各地乡村中，至多只有特派员或者隘少的知识分子的党部委员会，他们之下并无支部，甚至并无党员。农民运动的经验中，已经可以看出：没有先进的贫民分子所团结而成的党的组织，本党便很难指导农民斗争，或者简直没有指导的可

能，至于农民暴动便成了完全自然爆发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最近各地农民暴动军比较的抗御力很弱，农民暴动的持久性比较的少，大半就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没有能在农民之中实行“群众之组织者”的作用。而农民广泛的群众组织，完全要靠党在乡村之中有扩〔广〕大的支部组织，网罗全境，结合乡村贫民及苦力中最坚决最革命分子。再则在军队之中没有支部（兵士党员），也就是军阀能够很容易的调动军队镇压屠杀工农暴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党对于拆散军阀军队的工作，如果没有在军队中的支部去团结革命的兵士和下级官长，那么，简直是不可能的。当然，主要的还有在大工厂大商店之中建立并巩固党的支部的工作。学校中的支部当然也要注意。总之，支部工作在党的组织现状之下，占极重要的位置，过去因为支部工作不好，以至本党不能在群众中起广大的作用，而党员之散漫，党的政策不能深入群众，甚至不能深入党内群众，都由此而生。今后须特别注重支部工作，经过支部起群众的作用，至于支部的经常组织工作如按期开会等要严格的执行，这些都是树立党的基本组织的工作。再则全党〈党〉员应严格的执行交纳党费的义务，党费以有收入者为标准，各级党部都要按月计算党员的实数，要做到依党费核算党员的数目。

现在很严重的秘密时期固然不能实现完完全全的党内民主主义（党部机关自下至上全属选举，重要问题由全党党员讨论等等），但是就是在这种严重条件之下，引进

党的下层群众，使他们参加党的一切工作与政策的决定，仍旧是非常重要的，应当比以前更加百倍的努力去实行。并且要使尽可能的支部书记由党员群众选举的办法，尤其是产业工人的支部，此等区域更须进一步尽可能的实行区委由各支部选举的办法。

（五）工会的组织问题

组织广大的无党工人群众于革命的阶级的工会之中的工作，也有非常之大的缺点。革命的工会现在只有很不健全的很薄弱的革命的机关，而没有工会会员。只在很少的几个工厂之中，有些工会现在的下层组织，如半公开或秘密的工厂委员会，至于一般而论，差不多完全没有工会会员的群众。其实组织工人，尤其是无党工人，却是工会的主要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工会中工作的党员，应当认清自己的主要任务便是吸引各个工人到工会里去，组织工人群众，使各厂都有工会的组织，使工会成为群众的组织，必须使极广大的先进的工人，党外的工人，各个的加入工会做会员，必需每月的统计工会会员的实数，按时收工会的会费（宁可定到极少的会费），必须在各工会中实行发给会证，必须在下级工会机关（工厂委员会）除共产党员以外加入无党的工人，绝对要避免〔免〕党代工会的形式，因而不发展工会会员的流弊，党应当建立工会独立的组织系统，使支部在工人群

众中起核心的作用，吸引广大的非党的群众加入工会。

（六）农民的组织问题

乡村之中党的支部应当是很秘密的，除党的支部以外，必须组织广大的农民群众于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组织之中，这些农民协会在革命的高潮时，劳动者夺得政权，就要变成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

（七）党与青年团的关系

党与青年团差不多完全不发生关系，这亦是组织上非常之大的缺点，必须在最近期间改正。党与团的支部，区委，县委或市委，省委……必须互相发生密切的关系，互派代表。党部的各级委员会必须定期的听团的工作报告，而给他们以指示。党应当对于团给以经常的政治上物质上的帮助。

（八）党与反动团体

从前党曾经派遣党员到我们阶级仇敌的组织之中（如黄色工会，工贼工会，国民党党部等等）去做侦探的工作，但是经验上所得的结果，大半是很坏的。因此，如今在一般的通例上决定抛弃这种政策，除非有非

常之大的必要和意义，才可以偶尔使用这种方法，而且所派遣的党员必须是确实可靠而忠实于共产主义的同志。

（九）党的组织与纪律

严格的整饬纪律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实在是党的工作成效之最必须的条件之一，对于违背组织上政治上的纪律的分子，必定要严厉的处分。秘密组织的规律，不容任何轻忽而破坏，秘密机关的地址，绝对只准在工作上必须知道的党员知道。保存秘密文件的数量应当减到最少限度，绝对不容保存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单。通信上必须用密码的方法。各级党部的常务委员会不得超过五人至七人。五人以上及两点钟以上的集会，非极端的必需不得举行，凡是稍稍破坏党的秘密组织纪律的，立刻应当停止他的工作，或者简直开除党籍。

（十）发展党员的数量问题

党员的数量自从国民党反动以后有极大的减少，从五万余党员减至万余党员，这虽然一方面证明过去吸收党员与训练党员的方法错误，但欲使本党新的策略深入群众，党的组织重要责任之一便是吸收新的工农兵士革命分子入党，必须多吸收新的工农兵士革命分子扩大党

的力量，然后本党才能担负新的使命。

十一月十四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
版的《中央通信》第十三期刊印

注 释

- 〔1〕 本文在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讨论通过后，又经中央常委会议修改审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是中央常委会议通过的时间。
- 〔2〕 “布尔塞维克主义”有误。据《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应为“半孟塞维克主义”。本文其他版本也作“孟塞维主义”、“半少数主义”。

政治纪律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1]

(一) 本党第五次大会对于党内政治纪律的整顿，非常主观，只有最严密的政治纪律，才能够增厚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力量，这是每一个共产党所必备的最低条件。

(二) 自从今年七月事变公开宣言退出国民政府之后，决定抛弃以前迁就资产阶级领袖的妥协政策，坚决的领导工农群众起来武装暴动，“八七”会议更加详细的指出：一、以前本党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今后应当毫不犹豫的信赖群众的力量，澈底实现土地革命的政纲。并且决定于秋收时间于湘鄂赣粤四省领导农民举行暴动，去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

(三) 这一政策的执行，不应有丝毫犹豫的余地，但是在各省暴动过程中本党的指导机关与负责同志做出许多违背策略的严重错误：

一、八一事变中前委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决定南昌暴动是四省暴动的一部份，应以农民主力发展土地革命的斗争，绝不是希望单纯军事上的行动与胜利，但是前敌

委员会的指导在政治军事上而做成了极大的错误，仍然是继续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属于政治上的错误，就是没有明显的土地革命及工农贫民政权的政纲，不坚决的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而徘徊于没收二百亩五十亩土地主张之间，实际上只是实行了“耕者无其田”的政策。属于策略上的就是军行所到之地，对于豪绅资产阶级没有采取屠杀并摧毁其一切政治社会组织完全没收其武装的策略，及沿用军阀“不扰民”的观念，枪毙了乘机抢掠的贫民，再则没有实行没收豪绅财产以解决财政问题，却想用旧式军阀经过豪绅筹款的办法以剥削贫民和劳动民众。属于军事上的就是拘泥于原在武汉预定的军事保守政策，不走农民运动较有基础的赣西直入广东的路，而只顾避免敌人攻击，采取农民运动完全没有起来的赣东荒凉道路；在瑞金会昌战胜敌军之后，复不直往南下进攻梅县，惟恐伤兵辎重运输之困难而折回走上杭汀州绕道取潮汕，使敌人从容布置以致完全失败！再则从暴动开始一直到潮汕失败始终幻想与张发奎妥洽，甚至写信与张发奎联络，委任小军阀的杂色军队，在南昌暴动的后路而对于不稳的蔡廷楷部队不敢采取非常手段，以致中途叛变，使我们军队受很大的影响与打击，这种指导上的错误徒使我们军人同志在南昌瑞金会昌汤坑三河坝诸役很勇敢而决无退却的牺牲了三百多，兵士群众亦极其勇敢的蒙了很大的损失，而结果仍不免于失败。此种错误的根本原因乃在前委因袭着军事投机的遗

毒，不信赖群众力量，没有发动农民创造真正工农民众政权的决心，完全是一次软弱的军事投机的尝试，违背中央政策的行动。

二、南方局广东省委对于农民暴动指导也做成了严重的错误。当南昌暴动军队向广东发动的时候，广东党部应即鼓动农民在土地革命政纲之下起来暴动，实行夺取政权，不容有丝毫的犹豫与等待。但是广东省委的指导仍然是动摇不坚定，表示不信赖群众能作暴动的主力，重要错误就是：（一）政纲口号上拘泥规定五十亩以下不没收，另提减租百分之三十的口号；（二）战术上农军只取侧面攻击——仅仅作帮助贺叶牵制敌人之计，而没有号召农民群众自己起来夺取政权和土地，因而没有猛烈搏击的战术；（三）根本上没有发动农民群众，完全靠已组织好的农军势力行动——或为纯粹军事行动，而不是农民群众的暴动，南方局反而只注意介绍小军阀的杂色部队与前委，只注重于军事上的牵制；（四）地域上海南高雷虽起，而无关大局，西江方面简直只接洽有枪的零星部队农军或土匪，没有到群众中去号召，因此这地始终没有暴动，黄绍雄部队遂得安然渡过，东江农运除普宁五华海陆丰外都极其涣散无组织，党更失其指导作用，以致叶贺军队到达潮属后，农民暴动转反停顿而不能扩大；（五）既没有把广东农民运动做主力，又根本没有发动群众，所以使群众之中发生等待叶贺的心理，自然一般农民自己没有深切知道自己起来夺

取政权——这是政治宣传之大错误。

三、湖南省委对于农民暴动的指导更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中央屡次指出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并且向省委书记彭公达同志当面警告其军事投机的错误，要省委改正此错误，把暴动主力建筑在农民群众上面，遵照中央两湖秋暴计划切实准备，当时经过反复辩论，结果彭公达同志虽勉强接受，但省委的指导仍然没有改变旧的军事投机的错误：（一）公达违背中央的指示，把暴动看做一种单纯的军事行动，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不引起极大农民群众起来暴动，以致暴动开始除安源的工人很勇敢的参加斗争外，各地农民群众实在没有一点行动；（二）在暴动区域以内完全没有提出土地革命和政权的具体政纲，以致农民只以为是共产党的捣乱，甚至省委怀疑农民应需要土地，反对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三）在工农军所经区域以内没有执行屠杀土豪劣绅的策略，以致农民视若客军过境，因这些指导上的错误与怀疑的结果，湖南农民暴动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

四、鄂北暴动中央在“八七”会议后便指定特别委员会前往发动指导，孰意特委至鄂北对于农民群众反抗赋税钱粮，反抗军阀情绪不加重视作发动之指导，反转轻视民众力量，坐待张兆丰军队之到来。及张军被解决，又拟令张往联络农民反对樊钟秀以图军事投机之尝试，这都是根本上与中央的策略和付托的使命相反。鄂

南暴动已经引起广大农民群众的行动，湖北省委与鄂南行动委员会，决定会攻蒲圻城的战略，但行委恐农民武装缺少，战斗力量薄弱，而临时决定停止攻城，以至溃散，这也是充分表现不信赖群众力量临阵退却的错误！

(四)除上列暴动区域党部指导机关犯了严重的错误以外，王若飞同志未经过省委指导上海国民党市党部以内工作同志组织革命同志会，欢迎来沪投降蒋介石的汪精卫，亦属组织上与政治上的极大错误。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同志在汉口时因为怕环境险恶，不执行中央分配之工作，私自逃出汉口，显然违反党纪。

(五)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上列执行错误政策之党部执行机关及负责同志，决定下列的处罚。

一、谭平山同志自第五次大会后当任国民政府农民部长一直到南昌暴动前后的行动与主张，完全反对土地革命的政策。其行动更多离开党而自由行动，最著者如当今年七月武汉国民党及政府开始排共之际，曾秘密与邓演达等联络主张取消中国C.P.而另组织第三党，并向智识份子同志中作反对中央另组织第三党之宣传；同时忽视党的决议，不得中央许可私向汪精卫请假，在请假呈请书内复大骂农运之棘手；与汪精卫代表陈春圃谈话，更大骂本党中央及农运；最后中央政治局决定其赴莫，亦未遵命前去；及至九江南昌更充分发展其个人行动，在九江因为他和贺龙谈话之投机和贺可反张，便在负责同志会议中，鼓动不管中央不管党而自干的反党空

气，至南昌仍继续其第三党的宣传，在同志中在国民党员中；其后在革命委员会中更多先做而后通知或径不通知前委的举动，其于屠杀豪绅和没收〈土地〉等政策，亦时妨碍其行动，这些表示都是违背本党组织的行动，应立即开除党籍。

二、张国涛同志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涛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的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这些违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敌指导使命之结果，反给前敌同志以更坏更右的影响，前委亦因之更加摇动。国涛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三、这次前委指导做出极大的错误，前委全体同志应予以警告。

四、徐光英同志在汕任公安局长时，取缔工人〔2〕擅自逮捕并杀乘机抢劫贫民三人，应处以留党察看一年之处分。

五、南方局广东省委指导农民暴动的错误，在于不了解土地问题策略的口号，不发动群众而只有军事行动，应全体予以警告。

六、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消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

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七、鄂北特别委员会，违反中央命令，应予以全体警告，陆沉为特委书记，其主张更多军事投机心理，根本不做农民运动工作，应开除中央委员资格。

〔八、鄂南行动委员会傅××〔3〕同志，应留党察看半年。〕

九、王若飞同志因指导党团工作的错误应予警告。

十、杨匏安同志应开除中央监察委员资格。

十一月十四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
版的《中央通信》第十三期刊印

注 释

〔1〕本文在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讨论通过后，又经中央常委会议修改审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是中央常委会议通过的时间。原件第五项纪律处罚条款中所缺第八条，按《中央通讯》一九二七年第十三期（油印本）补全，并以〔 〕标明。

〔2〕原文如此，疑有误。

〔3〕傅××，符向一。

关于第六次 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

(一)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决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初至三月半之间召集。

(二)大会会期和地点，由中央常委决定，中央常委应只通知各省被选的代表。

(三)第六次大会的代表选举法如下：

一、各省党部得选举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应由各省党部代表大会选出，如因秘密组织的环境关系，不能开代表大会，则由各省委全体会议派出代表，然而应当尽可能由扩大的省委全体会议选派。

二、各省党部派选代表以五百党员选出一代表为标准，五百人以下的党部，亦得选一有表决权的代表；无表决权的代表各省党部亦得选派，但必得中央的同意。

三、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如果没有被某一省党部选为代表，因而无表决权，则可以无表决权的参加大会。

四、共产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得派五人出席大会。

五、出席大会代表必须入党一年以上的方能当选。

(四)第六次大会的议事程序现在大致相定如下：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国际状况与共产国际的任务及策略。

二、中央的政治与党务报告。

三、中国革命过去的分析及将来之前途与党的任务及策略。

四、土地问题党纲。

五、革命的工会之任务。

六、党的组织任务。

七、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八、选举中央委员及出席第六次共产国际大会代表团。

(五)各省党部代表会议的日期及议事程序，由各省省委决定之，函知中央。但是各省党部会议，至迟当在第六次全党大会两星期以前。各省党部会议时，应当将大会议事程序中的议案，择要先行讨论，中央当在全党大会以前一个月将大会议决案的重要草案送到各省。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
版的《中央通信》第十三期刊印

关于土地问题 党纲草案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公布土地问题党纲草案，各级党部及一般同志都可以：一、参加讨论这一草案；二、搜集当地的土地问题材料；三、提出书面的增改意见；四、以及一切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或分析的意见。这些意见和材料应当临时寄来中央，在党报上公开讨论。这一草案及增改的意见，应当提出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作最终之决定。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
版的《中央通信》第十三期刊印

附：

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

（本草案为立夫同志所拟，要大家公开讨论，以待第六次全

党代表大会作最后的决定。同志等如有意见，修改或增补，理论分析之改正；或者自己另提一整个草案，都可以在本报刊布。）

绪 言

中国共产党认清：中国乡村之中地主豪绅富农的成份不在少数，他们依据自己的暴力机关（民团、团防、商团、军阀的军队，以及他们所勾结收买的土匪），他们依据帝国主义的助力，对于土地制度之革命的变革，竭尽全力以抗御。

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农民最剧烈的阶级斗争能够消灭劳动民众敌人的经济政治上的权力。

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用最“民众式”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才能完成土地革命，才能真正实行革命的变革土地制度，组织乡村中的农民代表会议政权，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府。

在这一斗争之中，苦力和雇农将要有很重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坚决的反对并驳斥一切蔑视雇农苦力之反革命的理论（如谓农民运动不应是“流氓地痞”的运动等等），而且要努力去组织苦力雇农于阶级的组织之中，引进他们的代表参加革命政权之指导机关。同时，中国共产党要尽力吸引乡村中的中农分子，使他们站到贫民方面来，这些中农也是要推翻旧制度的。

中国共产党认清这一斗争是非常之艰巨的，但是，同时要指出：广东、湖北、湖南的农民已经在本党指导之下实行许多次英勇的武装暴动，这种情形证明在好些省份之中，已经形成了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共产党要组织农民于农民协会等类的战斗的组织之中，竭尽全力以赞助农民的一切斗争，宣传以城乡劳动民众武装暴动而建立苏维埃政府之主张，并且在群众运动相当的阶段上进而组织苏维埃。中国共产党认明：农民之中对于国民党的幻想迅

速地消灭，国民党欺骗民众的甚么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减低利息到年利百分之二十等的主张，无论甚么地方也不能实行，即使实行也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要坚决的反对国民党欺骗民众的政策。

各省红枪会等类农民组织的发现，以及这种组织的奋起斗争，也就证明农民了解武装斗争之必要。中国共产党要努力去肃清这些组织之中的反动分子，肃清农民意识里的反动遗毒，努力去改变这种组织，使成为真正阶级的组织，能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共产党员应当到这种组织之中去进行适当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要组织农民，实行同盟抗租罢税不还债，拒用无价纸币和军用票等类的纸券，并且要竭尽全力去赞助这种斗争。

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群众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并且赞助农民自发的这种斗争，反对军阀的征发拉夫派粮等等。中国共产党在每一次这种斗争之中，宣传农民武装暴动以反抗农民之阶级仇敌的必要。

（一）

中国的农业经济与土地关系，不但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欧美不同，并且和欧洲中世纪时代（资本主义前期）的土地关系也不同。这种差异的最重要的前提，实在就是中国生产之自然界的环境与历史发展之特殊条件。中国农业生产的方法上，有许多特点，使农村经济呈特殊的状态，这些特点就是：自觉的整顿水利之重要（必须人工灌溉），多量的调剂水旱器械与建筑之必需，中国本部之主要区域没有畜牧事业，农村经济中用以耕种的牲畜比较的少，多量的肥料之需要，绝对没有停耕若干时间以与地休闲之办法，必须耗费多量的徒手劳动。如此的农业生产方法，再

加上商业重利资本的早期发展,防御游牧民族侵犯及水灾必须巨大的工程(如长城、运河、黄河河工、堤工等),应付天灾又须有种种救济组织,对于游牧民族要能征服他们,强迫他们变成农业民族:这些情形综合起来,便造成中国这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就是马克思列宁所称为“亚洲式的生产方法”制度。中国如此之多的小农经济,实际上不相关连,可是中国很早便有貌似统一的国家政权,这种国家政权的物质基础之一,便是人工灌溉。中国官僚制度的作用向来非常之大,这个原因便在于此。中国的官僚不但是地主和商业重利资本利益之政治上的代表,他们并且就是直接实行重利盘剥和大商业的本人。诸侯制度的采邑以及闾阎专有土地的制度(如贵族闾阎专有土地之制度)之在中国已经很早就根本崩坏了(秦始皇之后,约当基督纪元〔1〕前三世纪)。此后经过很长期的无政府状态,经过非常残酷的阶级战斗,然后最终的形成所谓亚洲式的生产方法。中国的国家便从细小的许多诸侯采邑变成亚洲式的专制政权,有极发达的官僚制度。农业与农民的家庭工业(纺织等)相联结,又使亚洲式的生产方法有很大的内部稳定的状态。商业重利资本,对于资本主义前期的地方市场,互相关联很薄弱的地方市场,有极大的威权。诸侯采邑闾阎式的土地制度崩坏之后,中国的土地关系经过许多种的变更,都是由于种种历史形势而来的,或者征服其他民族,或者受外来的影响,或者经过很大的民众运动,各地市场关系之扩大或缩小等等。可是农业劳动的方法,根本是没有变更的。中国农村生活的特点是:人工灌溉有能决定一切的重要意义,官僚的作用非常之大,官僚和土地私有制及商业重利资本有密切的关联,欧洲中世纪所未有的地主与商业重利资本大规模的剥削农民,土地使用时分割得非常之琐碎细小(同时,并不妨害土地所有权的集中),资本主义前期式

的地方市场对于农民经济有相当巨大的威权。过渡于新的生产方法，发展全国的生产力，农业技术的进于更高的阶段，在现时都阻碍于这旧社会制度的遗毒。

（二）

中国各省的土地关系并非一致相同的。本党各地党部应当细心研究各该省的土地关系，必须估计到各地的特殊情形，要收集各地的经验，适应各该区域特别的情形，而实行党纲及政治命令。南方各省农村中的中心人物，绝无疑义的是佃农及半佃农（粤、桂、鄂、湘、闽、浙等）。北方有几省农村中的中心人物都是自耕农（晋、直）。殖民地域的土地关系又有特殊的情形（吉林、黑龙江等）。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宣言承认内蒙古民族有自决的权利，一直到分立国家，并且要极力赞助内蒙国民革命党力争自决的斗争。对于回族地域，本党也应估计当地特殊的土地关系。中国有几省还有土著的苗黎等等。本党应当努力奋斗，消灭对于这些土著民族之一切种种方式的剥削，而赞助他们进于更高的文化程度。

（三）

农民分做三种：一、佃农，二、自耕农，三、半佃农。三种农民之中，都有贫农、小农、中农与富裕农民的区别。分辨农民中的这些种类，在农业生产方法的条件上，必须不仅以生产范围（耕地亩数之多寡）为标准。水田旱田，田地之肥瘠，每年收获次数等，都要估计到。各种农民之中，在中国本部最大多数是贫农和小农，贫农和小农都是每年收入不够维持最小限度的一家生活的（这些农民在各省之中有的占百分之五十，有的占到百分之八十，以省份而不同的）。富裕的农民只是农村中的一小部分，

可是重利盘剥，剥削雇佣劳动，出租耕牛及农具，强租贫民田地，或者将自耕所余田亩出租，兼营农业，商业或农村副业，与乡绅及官署有交往联络；这些事情，富裕些的农民都可以做的；因此，富农虽然少，而他们在农村之中却比较的有些势力，当然他们的势力比地主商贾重利盘剥者的势力要小得多。

中国阀阅制度(贵族)很早就消灭，族长制度有很大的影响，地主家族里的分家，使田地分割，现时更有地价高涨的情形，农村中的资本流入城市商业，变成重利盘剥的资本；这些情形使地主阶级之中的中心人物并非大地主，却是中小地主。中小地主的贪狠，他们对于佃农剥削的残酷，并不让于大地主，甚至于有过之无不及。表面上宗法社会的旧俗，不能使佃农的地位比较好些，反而更加坏些。除地主，商贾，一部分富农，重利盘剥者之外，中国农村中的剥削者，还有土豪乡绅也有同等的重要。乡绅虽然常是有田地的，兼营商业和重利盘剥的，或者做官的，但是一般而论，他们是多余的知识分子，专靠农民的余剩生产品而生存，他们用租税课捐的方法，有时简直用强迫贡献的方法，榨取农民的余剩生产品。他们是官署与农民生产者的中介人。土豪和民团一样，亦是压迫农村劳动平民的寄生虫的暴力机关，这些寄生虫是反动势力在乡村中最靠得住的根基。

荒地沙田等官产，都被治者阶级所霸占。祠田族田庙田等的收入，都是乡绅所榨取。地主商贾乡绅所办的公司，或者各个军阀乡绅重利盘剥者，都能以极贱的价钱收买屯垦的官地。治者阶级霸占官地，以及侵吞祠族庙宇田产的收入，更加增加他们的权力。

(四)

中国的租佃制度有特殊的情形：分租大半是用谷物，并且大

半的习俗是佃农有永佃权的。租佃制度，一般而论，都没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地主的对手方，极大多数并不是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租户，因投资于农业有承租地亩的；地主的对手方，都是穷饿的农民，租田耕种以求生的。只有沿海几省（粤、苏、浙）接近大都市的地方，有极少数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租户。地主对于佃农无限制的剥削，一般而论，都已经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地主不但将“绝对地租”与“收益地租”以及水田灌溉设备中所放资本的利息都拿了去，并且连佃农所耗费于田地的成本上的利息也拿了去（此处所有名词都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经济名称），不但如此，甚至于将佃农生产者及其家族所应得的工资之一部分，也拿了去；如此情形，自然使佃农的收入，往往低于他们维持生活之最小限度的数目。但是，除出这种习惯上旧式的剥削方式以外，新式的租佃关系也在发展起来。地主竭力在设法使永佃权变成定期的租佃制度，而且力求其为短期的租佃。旧式以谷物交租的方法，以及每年看收成交租的习惯，都渐渐的变成新的方法。铁租（每年不论丰歉，佃农须交一定的租额）的办法已经很广泛。押租（佃农预先交纳一定的押金方得租种田地）的办法，也在实行起来。这些新方法之外，旧时的剥削方法仍旧保存着。佃农一定要替地主做工，所得报酬非常之少，佃农一定要替地主送礼，有种种奇怪的名目，还需请地主或收租人吃喝等等。佃农欠债之后，便要替地主当奴隶（广东、山东），卖男卖女还欠租，不能还租的佃农须要坐监牢（广东、浙江等省），土豪民团可以任意毒刑拷打佃农，或者是因为不能交租，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如此之类的剥削方法非常之多。

尤其在中国中部各省（江、浙、皖、赣等），租佃关系之中有所谓“共有田地”：地主有田底，佃农有田面。这种情形大半由重

利盘剥而来的，或者是由于佃农代垦地主荒地而来的。中国永佃权的存在以及“共有田地”的制度，很明显的证明中国农村之中并非资产阶级式的私有制度占优势。直到最近，地主方才开始用全力夺取那种“共有田地”的所有权，要想使旧式的“共有田地”，变成完全地主所有的田地。

地主竭力要想取消有碍于剥削的旧式的永佃权及收租时的旧习惯（荒年照例减租，每年只收一次收获的租，贫民可以自由检拾稻场上遗落的稻梗等等）；地主要想变更旧式的亚洲式的土地所有制度，使成为比较现代式的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然而农民的倾向，却是要使地主的土地，变成农民所有。

（五）

贫农小农甚至中农所有的土地，仅仅是形式上的所有权罢了，形式上享有这些田地的生产资料罢了；其实治者阶级用课税贸易诈骗种种方法，不但将“佃租”收去，并且收地价的利益之极大一部分，甚至于将农民生产者及其家族所应得的工资之极大一部分都收取了去。自耕农占多数的省份，现在也在自耕农迅速的变成佃农的过程之中（山西、河南）。赋税的压迫，经常不断的军用征收，根本破毁农民的经济。军阀的战争，匪乱的蔓延，商业交通的停滞，往往造成地价暂时低落的局面。地主军阀官僚商贾豪绅得以大批的收买田地，使自耕农变成佃农。时常不断的灾荒（直隶、山西、山东），预征钱粮，每年勒捐数次，更使重利盘剥的现象加增。重利盘剥者强逼农民将田地零星的抵押，农村中的治者阶级用种种方法掠夺农民的所有权。自耕的农民变成佃农。

（六）

水利的使用上，也有极剧烈的阶级斗争。地主竭力抢夺灌溉水利的支配权。商人的公司或豪绅地主的公司往往掠取河流溪沼，而使农民付钱买水。农民方面，自己也知道各个小农经济没有能力改良水利，开辟水源，甚至于不能保存原有的天然水利（水利是农民生产的最重要的前提），于是他们总是想望国家政府来解决这一问题。农民可以深切的明了：只有劳动者的政府能够实行改良人工灌溉的方法，应用新发明的技术。

农村之中金钱货币的势力日益增加，于是重利益剥者的威权也就扩大。农民之中最贫苦的分子（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以各省而不同），甚至于连维持生活之最小限度的资财也没有。天灾战祸，因而不断的破产失业，还要履行种种旧习惯中糜费的礼节（婚丧赶节等等），都使农民不得不向重利益剥者借钱。借钱的利息，从月利二分到十分。重利益剥之中还有一种借货〔货〕谷物的办法，这种办法的残酷更是无以复加，简直是公开的掠夺农民。收获前借一石谷，收获后便须还一石半，甚至二石谷。收获前几个月借的债，收获后即须照全年付利还本。荒年天灾的时候，重利益剥甚至于可以剥削到几个几十个的村庄，剥削到全体的农民。

军阀的统治根本破坏农民的经济；他们的重税杂捐，军事征用，派车封船，派粮，拉夫，拉马匹等等，完全是破坏农民经济的。地主还要转嫁一部分赋税杂捐到佃农身上，以及一般农民身上，这种税捐一年之中收到两三次，甚至于六次。厘金杂捐式的关卡无限的增加，商人所受的榨取，也转嫁到农民身上；输出时，商人因为估计所负捐税，而更加抑低收买原料的价钱，如此

转嫁税捐到生产者身上；输入时，又如此的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军阀制度之下，以前征收赋税的旧习惯与相当的限度，完全消灭了；中国贫苦农民所负租税，远过于普鲁士或美国的农民。巨商地主与官署勾结，并且有些权势，反而可以比贫民少担负些。地方税的种类和数量都在日益增多。再则，农村的破产使匪乱日甚，匪乱的蔓延又使农村破产更甚。

帝国主义对于农民经济市场的权威，也更加厉害更加深入。外国工厂生产品的输入，机器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式的手工工场及家庭工业的发展，都使帝国主义侵入的地方农民旧式的家庭工业（纺织、豆油等）受着非常之大的打击。同时，农业与家庭工业相联合的中国旧经济基础，根本破坏，其崩坏的速度，比工业的发展快得多，农村中多余的劳动者因此没有地方可以吸收，所以极大多数的失业群众的到城里当苦力，变成土匪，流入军阀的军队，南方各省的人便到安南、暹罗、南洋群岛，北方各省的人便到满洲、蒙古去。

帝国主义的侵入，使农业中各种种植的分配，大有变动。例如茶的出产，因为印度、爪哇资本主义式的茶叶大农场竞争的力量很大，日本茶叶生产的组织也比较的好，中国自身则厘金杂捐日多，所以中国茶叶生产大受破败的影响。种蔗的生产也是如此，爪哇、台湾等处蔗业大农场之竞争，外国糖的输入，都使中国蔗业生产衰落。

欧洲化学工业的发展，破坏了中国土靛的生产。帝国主义的侵袭，以及中国本国纱厂丝厂的发达，使国内植棉种桑的亩数大增，然而欧战之后，中国棉业受着美棉印棉的竞争，小农的棉场自然抵敌不过——中国小农还受着重利盘剥者的压迫呢。中国重利盘剥的资本家本来正在努力侵入与工商业有关的农业之

中来。制油植物的种植也大大的发展，但是与植物油(豆油、菜油、桐油、花生油等)及豆类菜类同时输出的本来还有一种肥田用的重要物品——豆饼。满洲方面输出于日本的，就有大批豆饼。同时，种植鸦片及烟叶的地方也多起来。英国帝国主义用枪炮强迫输入鸦片于中国，完全是为着赚钱。现在军阀便强逼农民种鸦片，以便他们抽收鸦片税。福田多变成鸦片烟叶等的田。水利不整顿，灌溉的设备破坏，于是农民往往不能不将稻田改种番薯(马铃薯)。贫民的食料一天一天变得更坏了。

商业却日益扩大起来，但是尽旧式的商业方法的范围之内。贫农和小农不得不在收获之后立刻出卖谷物，简直无暇顾及市价如何，他们只能照村中最低的价格出售，因为急于要付田租，赋税，债息。等到第二次收获以前，他们早已完全用尽了，只得出很高的价钱去买米、借米吃。商业重利资本将与工业有关系的农产品(丝、棉、茶、豆、烟、靛等)完全握入自己掌握之中，他们用极低的价格向农民生产者收买这些农产品。农民中最贫苦的分子受着市场的一切痛苦，而不能得着市场的丝毫好处，至多也只能得着很少很少的好处。与工商业有关的农产品之极大部分的利益，是国外贸易的输出商(外商洋行)所得的，是中国商业重利资本所得的。乡村中的货物流入城市不能得相等的代价，中国的货物流出国外，又不能得相等的代价。

这一过程，因为帝国主义霸占铁路内河及沿海的航路，造成扩大商业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前提，于是更加厉害。外国财政资本引起中国的采取工业(煤、铁等矿)，后来又发生几种制消费用品的工业(如纱织、烟厂、榨油、食物制造、酿酒等)。农村中剥削所榨取出来的资本，投入运输业商业，亦有些投入工业。

但是，同时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协定关税，国内市场容

量的有限，军阀统治，货币制度的不统一，财政机关的混乱，商业重利资本的优势等等，都阻碍工业的发展；频数的经济恐慌使资本溢出生产范围而停滞，甚至于商业之中也不周转，于是这些资本及城市中一般积蓄的钱财转而购买田地及经营重利盘剥，于是小地主的数量增多而农民之佃农化的过程更加急。

帝国主义利用银价的低落掠夺全中国。中国的银行家巨商及重利盘剥者受着了这种损失，便转嫁给农民生产者。同时，在欧战之前便开始一种过程：农村中及城市贫民中最流通的货币（铜元）之价格，日益低落，欧战之后这一过程继续的厉害起来。铜元的购买力，因为军阀政府的滥铸，而日益低落。再则，军阀政府发出许多纸币，军用票国库券等等，这种东西过不了几天便不值钱了，使农民及城市贫民受巨大的损失。银行公司及单个的商贾，也各自发出纸币剥削农民。中国经济日益成为货币经济，然而乡村城市中流行的货币，仍旧带着资本主义前期的货币之种种特质。

中国农村中绝无因〔田〕地的农民有极重要的意义；苦力、雇工、船夫、渔夫等。做搬运夫的苦力有好几百万，土木作及其他农业工作的苦力也不少。这一阶级是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始祖，昂格思所称谓“前无产阶级”〔2〕的。他们受着最残酷的剥削。他们往往几星期几个月找不着工作做，所以他们的境遇更加苦。

农民的失地和农民家庭工业的崩败，尤其主要的是田地的零星分割（贫农小农所耕田地非常之琐小），都使苦力农场工人的数量增加。中国条件之中，播种灌溉插秧等工作时，甚至于小农都不能不添请别人帮助。富农等便可以雇用长工。有些地方，地主给农具种籽牲畜，叫雇农替他耕种，收获之后雇农只得极小的一部分，或者很少的工资。这种农民，中国亦称谓佃农，其实已经

是雇农。他们的地位很象半奴隶的农奴，却不象现代的农业无产阶级。按日计算的雇农，或者按期雇定的雇农，一到田忙过了之后，便无从找着工作。

对于农村的剥削，最近还有些新的方式发生。旧式的家庭工业，如缫丝等，现在固然已经崩败渐灭，同时，却发生新式的家庭工业，为领取资本家的原料而在家织布、制花边、绣花、制草绳、制帽、制扇、制伞、制中国旧货的估衣等……这些新式家庭工业，大概有商店定制包销，对于农民，尤其是农妇的剥削非常之厉害，他们所得工资简直不能养活。

中国卷入国际贸易的漩涡之中，帝国主义攫得中国经济的最高权，中国劳动民众受帝国主义者与中国地主官僚商业重利资本联合的统治，交通与工业之中资本主义的原素增加，旧国家的崩坏，军阀制度的发展，凡此一切对于旧式生产方法给了非常之巨大的打击，根本上使他崩毁。然而同时要过渡于新的生产方法，却有许多困难与阻碍：一方面帝国主义阻碍中国的发展，别方面地主及商业重利资本依靠着帝国主义及旧官僚机关与军阀军队的权力也阻碍中国的发展。帝国主义利用剥削中国劳动民众的旧方法去剥削全中国，中国的治者阶级又在竭力巩固剥削民众的旧方法，还要运用剥削民众的新方法，以稳固自己的威权和地位。

所有这些情形结合起来，便形成中国农业的一般的衰落，收获减少，旧时的水利设备破坏，天灾频数，水旱饥荒相继，农村破产，土匪蜂起已成一般的现象，重利盘剥的加重与扩大。阶级斗争便在如此的背景上急遽起来。

旧社会制度崩溃下来，渐灭下来，而过渡于新的生产方法便只有两条路：资本主义的与非资本主义的。

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之中造成巨大的生产机关，应用极新的技术，列强竭尽全力以互争世界市场，互争销售货物与搜取原料的场所，财政资本运用极新式极巨大的军事技术机关及海陆军以争夺市场，以服征〔征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在如此的时期之中帝国主义剥削与新旧军阀压迫之下的中国，只能够非常痛苦迟滞的发展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而且必须外国资本输入中国的速度大大的加增。资本主义的道路对于中国，就是几千百万农民苦力之死亡，几百万女工童工在工厂之中磨折惨死，流血的掠夺的战争（如此的混战局面之下，军事上简直不用甚么技术器械相斗，而只是用几千几万人的性命为牺牲，以相搏战），极巨大的天灾水旱，极残酷的剥削工人，陆续相继的国内战争，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更加侵略，更加要攫取矿山铁路租借地，瓜分势力范围，或者简直是默契的瓜分，很快的几辈工人相继死灭，一般劳动农民的死亡，全国人口的大减少。从崩溃的旧中国社会非常迟滞痛苦的转入新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道路，便有这些不可免的结果。

第二条路——非资本主义的道路，便是劳动民众反抗中国治者阶级与帝国主义之联盟统治的极艰苦的斗争，以群众的武装斗争统一中国解放中国，推翻帝国主义，消灭一切剥削制度，除尽一切种种的剥削者，将劳动民众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从地主豪绅重利盘剥者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与全世界革命的工人运动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经过第一期艰苦的斗争之后，运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之辅助，而进于新式技术的生产方法，工业农业大大发展，造成新的习俗，提高一般民众的文化程度，行向劳动平民解放后之光明的将来，自由的劳动，一直到进于自由世界，没有一切阶级的世界——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联合农民及城市贫民，组织并准备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以推翻地主豪绅重利盘剥者及其代表之军阀官僚的政权，而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以实现第二条道路，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认为要澈底变革中国的土地制度，必须肃清一切崩溃混乱的旧社会关系，所以主张为解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起见，必须实行下列的办法：

一、一切地主的土地无代价的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

二、一切没收的土地之实际使用权归之于农民。租田制度与押田制度完全废除，耕者有其田。

三、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是乡村中的革命政权机关，他要按照土地之肥瘠水旱位置而分配上地，使旧时佃农中的富裕者不能变成富农，并使革命军队的战士及无地的农民能够分到土地耕种。同时，共产党要努力实行革命的土地改良。

四、寺院教会的土地，皇族旗地官地公产等类的土地，一概归农民代表会议支配。此等土地的租田制度，亦一律取消。

五、祠产旗产的土地一律归农民代表会议支配。共产党要赞助农民去根本消灭这一种陈腐恶化的土地制度。

六、官荒沙田湖田等的土地，亦一律归农民代表议会〔会议〕支配；并且要努力设法，使实行垦殖政策时得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以及工农军的兵士。

七、一切豪绅反革命派的财产完全没收。

八、农民代表会议要措筹基金，保证无产而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寡老病废等）的生活。

九、一切森林矿产完全归苏维埃国家所有，苏维埃国家之中

央及地方政府应当设法保护森林种植森林，并开采矿产。

十、整顿水利改良灌溉方法之工程，由农民代表会议执行，井泉溪沼等完全归农民使用，农民经过农民代表会议而行使这种权利。

共产党并认改良水利扩大灌溉源流，采用新式技术机器电力等，为自己的重要职任之一。共产党组织并赞助农民之改良灌溉的合作社运动。

十一、共产党要努力设法实行防止水旱的工程，建堤导河填筑淤地筑造牧场等等；并实行预防饥荒的设备。

十二、一切苛约重债一概取消。共产党要组织低息的农业借贷，设立农业银行及农民之借贷合作社。

十三、共产党组织并赞助农民之合作社运动；销售农产品及农民之家庭手工艺产品，贩买农民日常的必需品及家庭手工艺的原料等。共产党要发展工业而使农民得着廉价的现代新式的农具，禁止贩售肥料的私人垄断，——贩买肥料归农民的合作社办理。共产党还要实行乡村中筑路修道的建设事业。

十四、军阀政府的一切赋税，完全废除，厘金废除，包捐包税的制度废除。革命政权重定单一的统一税制，税收的一部分应当用作乡村的公费。一年只在收获后收一次税。确定统一的货币及度量衡的制度。

十五、颁布保护雇农苦力的法律。政府当以发展工业而开办公共事业的种种工程，修筑道路，奖励农村手工艺，以保障苦力失业者的工作。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版的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六期刊印

注 释

〔1〕 基督纪元，即公元。

〔2〕 昂格思，即恩格斯。前无产阶级，今译无产阶级前身。

职工运动决议案

在初期北伐的过程中，仅只两湖的工人斗争得到短期的进展。但因为党的机会主义的领导，终于中途受了阻碍。至于河南的工人，在帮助北伐军得到胜利后，不但没有得着丝毫解放，反而更加遭受压迫和剥削（铁路工人欠饷多至十二个月少六七月，卫辉纱厂工人在经济斗争中被冯玉祥惨杀三百余人）。从蒋介石四月十二在上海向工人阶级开刀始，继而四月十五李济琛在广东的屠杀及长沙的马夜事变，江西朱培德河南冯玉祥的反叛一直到七月十五汪精卫公开反动，照理，在这些省份的工人阶级应当对反动派严重的反攻。可是因为党的机会主义的政策影响已深，不但没有反攻，反而在职工运动中表现两种极坏的事实：一是根本屈服于敌人放弃职工运动如河南湖南江西等；一是进一步投降加入国民党的黄色工会如上海安徽等。至于北方各省如直隶山东山西则自“五卅”高潮低落以后即无形放弃职工运动，北伐军兴而后更专一等待北伐解放，停止了一切活动。如此种种，全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经过一度国民革命的斗争，并且他们曾经参加此一斗争而受了莫大的牺牲，然而他

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并没有得着丝毫解放，我〔他〕们的阶级意识反而一时陷在模糊的状态，他们的革命情绪，反而表现一时的消沉，“二七”“五卅”的悲壮的斗争不能复起于国民党背叛的过程中，这是什么原故？主要的是我党的机会主义整个的运用于职工运动中的结果。

“八七”会议，适当国民党左派背叛，社会阶级激剧变化的时候。会议主要的目的是改进党的政治路线，决定新的工农斗争的策略及改造党的组织。当时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的主要点是：激剧的发动工人经济斗争，发展秘密工会，反对黄色工会，提拔新的领袖。这样的决定无疑的是很正确的。但是，实际，这些决议并未能有相当的实现。本来党的组织上的改造就没有相当的完成，“八七”精神仅仅走到几个省委，没有到下面去，自然这些决定，还大部分只是白纸黑字的留着，我们只要看下面的事实就可以明白：在四省秋收暴动的期中，没有看见工人起来。尤其是在许多农暴区域中的城市常常不能成为农暴的中心指导者，事实上反而等待农暴，甚至乡村农暴已大大起来，城市一点也不能予以帮助。同时党在工人中关于农民暴动事实的宣传亦异常缺乏，广州武汉的工人斗争一直到两湖秋暴及叶贺失败以后才起来，湖南江西河南现在才开始有计划的工人运动。直隶山东农民暴动已经起来，工人斗争则依旧寂然无闻。上海一直在湘鄂粤失败了之后才开始反统运动，至今工人斗争尚不能有广大的有组织的发动。就全中国说一般的

成为农民激进工人落后的现象。不仅没有激烈的斗争，就是秘密工会的组织亦没有进步。各地党部对于农民斗争虽做了不少的军事投机的错误，还算是有意的不断的在那里领导。而对于〈工人〉斗争则确不免有忽略的倾向，至少也是无意的或顾此失彼的忽略了。这是“八七”以后职工运动主要的现象。如果这种现象继续发展下去，无疑的要使工人阶级在土地革命中失掉领导地位。此后在策略上亦表现两种极严重的坏的倾向：一种是旧的机会主义的余毒，不敢领导工人向前斗争，而想与政府国民党工会妥协保存一点与工人群众的关系，最显明的如浙江工运负责同志不愿坚决的退出反动工会，上海一部分下层同志留恋“统一委员会”及最近安徽省委同志决定加入西山会议派的芜湖市总工会等等。至于“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就是在很重要的城市和工人区域也很迟的才提出，公开的反国民党运动除上海广州市外也没有什么工作。另一种倾向便是军事投机，不坚决的去发动群众，而靠一种偶然的机，强迫工人起来，工人因为不明了斗争的意义，一旦失败，则情绪消沉，不易复起，如蒋介石下野时沪西纱厂之罢工及最近沪东纱厂之罢工是，或则根本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此不深入群众做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而迷信暗杀万能（非群众的红色恐怖），不暗杀几个工贼和反动派，则不敢到群众中去（浙江省委山东省委中的一部分同志以及上海的一部分同志很明显的表示这种倾向）。上面这两种倾向，虽然表现出

来的形式不同，所取的手段不同，根本上则同是机会主义的余毒的爆发。不把这两种倾向肃清，则我们党终久不能深入群众而要被群众唾弃。至于工会的组织工作亦异常缺乏，在白色恐怖严重的进攻以来到处工会组织都无形消灭，而以党的支部替代了工会，或则虽有工会，亦只是一个变相的支部组织，底下并没有非党工人群众（如上海），而事实上，党员群众又每多退缩不前不能领导群众。因此工人根本没有自己的团结，一切斗争更加难得起来。

右面所述是“八七”会议后职工运动中主观方面主要的缺点。但是，虽然我们主观上做了不少的错误，全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却确在逐渐的往上发展。新旧军阀不断的战争使中国工商业愈趋衰落，中外各厂大多关厂或缩减生产，失业工人日益增多，在业工人因为工钱缩减，纸币低落，厂家欠饷，待遇苛刻，一般生活程度的增高，生活愈加陷于痛苦。南方各省屡次反革命的政变，和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不仅不能改良这些现象，反而使之变本加厉，对于工人群众的屠杀较之北方军队还要凶残。无论政府国民党部或蒋记唐记冯记阎记李记所委任的黄色工会，无不是公然帮助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工人，而不能对于工人群众维持其暂时的欺骗。全国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已逐渐开始，武汉上海广州已经有激烈的发动，特别是广州工人十月十四以来八次大的罢工示威，已经足使反动阶级骇惧万分。“国民党”三字无论在南方北方一般工人群众对之一点没有信仰，

黄色工会成了工人群众眼中的锋刺，武汉上海广州的工人群众已经公开的枪杀国民党的工会改组委员和工会特派员，广州工人已在高呼“撕毁白色恐怖的青天白日旗举起革命的红旗”。总之全国工人阶级已经逐渐认识国民党的反动，而开始凭仗自己的力量起来与资本家豪绅军阀和一切反动势力宣战了。依这种描述，证明党的中央“八七”以来的策略完全是正确的合于实际的。

这次中央扩大会议政治任务决议更加明白指出要力争得工农政权（苏维埃）而奋斗。因此党的职工运动的基本任务便应转注于这一政治重心，使工人阶级在政治组织上真能负起为实现工农政权而战斗的领导者的任务。为达到这一目的，中央扩大会议对目前职工运动的策略和方法有以下的决议：

一、要把政治决议所指出的任务实现于职工运动方面，首先便应坚决的与有意或无意忽略职工运动的倾向奋斗，事实上使职工运动成为党在群众中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工作，事实上使工人阶级能成为农民贫苦民众的领导者和先锋队。同时应坚决的肃清职工运动中机会主义的余毒，从同志和工人群众的脑海中洗去一切妥协，退缩和军事投机对国民党幻想等反革命思想。在组织上应当从工会指导机关和党内职工运动指导机关中澈底撤换一切投机腐化退缩消极的分子，代以积极勇敢的工人分子。

二、党的职工运动主要路线是从不断的领导工人作

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从斗争中严密工人的组织，加紧工人的政治训练，扩大工人的武装组织和训练，一直发展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这就是说我们在工人群众中一切组织宣传工作要经过实际斗争一直为达到这一目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而前进。现时应立即开始全国工人的经济罢工和反军阀战争的争斗。对于经济罢工，党的各级党部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形提出各业各种工人的经济要求，以这种要求组织号召工人群众爆发罢工争斗。现时无论矿工路工海员纺织工人以至种种苦力手工业工人店员都有极切迫的经济要求。现时经济罢工是开创新的职工运动的唯一道路，而且是如干柴着火一般极容易爆发的，我们党应当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站在工人群众前面勇敢的领导他们。党的中央应当以各地能否爆发经济罢工为考察各地改造职工运动之成绩的标准。同时党对于罢工的策略（尤其是在某种产业恐慌时）及罢工失败后如何继续发展争斗以及现在一部落后工人之畏缩心理如何救正，须特别加以注意，求得适当的指导方法。

党在工人阶级中应作的政治工作应不仅限于宣传工作，应当利用机会实行政治的集会示威游行，以至于政治罢工，特别是当现在新旧大小军阀的混战时期，在战争的区域中应当发动反军阀战争的争斗，至少应当做到开会游行示威并在紧急的当中夺取武装的工作。在一般政治要求中应当提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自由，和反对白色恐怖，逮捕工人及要求释放被捕者等等。同时

应当知道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虽然由于其斗争的目标不同，但在事实上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经济斗争必然进到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在未能最后夺取政权时每人〔每〕归结于经济的斗争，在一切经济斗争中必须提出政治要求，在一切政治〈斗争〉中必须提出经济条件。如此才能使工人明白经济争斗与政治争斗相互的关系而继续不断的奋斗，直至最后的胜利。

在一切争斗中须扩大而深入的宣传“苏维埃政权”，宣传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青年团，宣传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罪恶，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政府的口号，提出工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及土地革命的口号，举出镰刀斧头的红色旗。

三、在宣传上必须特别注意向工人群众解释无产阶级与农民联合的意义及其重要，尤其要利用每一个农民暴动的事实详细向工人群众宣传。党必须使无产阶级与农民缔结亲密的联盟而成为农民领导者，为达到此目的，不独应当在工人群众中作口头上与纸上的宣传，并应当从组织上和斗争中求其实现，各城市乡村的联合暴动，如矿工铁路工人与附近农民的结合，如派遣失业工人到农村中去指挥暴动等等是。

四、最近重要城市所发生的罢工运动，实为“八七”会议以来新政策之下无产阶级继续不断的壮举，但是其中大部分终为资产阶级获得胜利，其原因不独在于黄色工会与官厅之掣肘及彼等与厂主联合一致向无产阶级反

攻，同时更因为我们的工会组织薄弱，党的指导不力，运动之散漫无组织及罢工工人相互间缺少联系等等。因此各级党部应当坚决的做发展与巩固秘密工会的工作，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吸收广大的非党的积极工人群众加入工会，并且使他们参加秘密工会的工作，坚决的改正“党即工会”或整个的包办工会机关的积习和错误。在最短期间内，上海，广州，武汉，天津，青岛，必须完成所有最重要的工会委员会的组织，并须在保存党的势力之下，使新的非党积极工人干部人才参加其工作。

尤其要紧的是在大产业中进行从下而上的组织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的产生必须经过群众的选举。工厂委员会的存在在原则上是公开的（在保持秘密工会正确的指导之下尽量使广大的非党工人参加这些委员会的工作）。为扩大工作范围起见必须做到组织公开的工广委员会。因此，现在已经应当造成为将来争工会公开有所保证的一切必要条件。平时对于工人大会，工人代表大会须利用一切机会尽可能的举行，要尽可能经过工人代表大会或工厂委员大会解决关于工会及日常斗争的重要问题，使工人群众自觉其组织上的责任并加重对于工会的责任，一方正所以改正几个领袖包办工会的积习。

在工人运动高涨或白色恐怖稍微缓和之时，党必开始作公开选举工会机关的运动，并将国民党政府所委任的工会指导员一概驱逐撤去。中央对于全总海总铁总的工作须加以整顿使之起积极的作用，同时对于矿工，邮

务，纺织亦须促成其全国组织之产生。秘密工会与党的支部必须尽量的利用公开之可能性组织一切工人团体，如工人俱乐部，工人学校，公共寄宿舍，公共饭堂等等以团聚于工会之周围。

五、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政府与政府国民党委派的黄色工会，眼见共产党在工人群众势力很大，他们已经改变了他们自己对于罢工运动的政策而图谋于罢工工作中把工人阶级夺为己有。他们有时也给罢工工人一点小利，如提出秘密工会所提出的要求再加上他们自己提出的欺骗工人及罢工救济等等。自然，在白色恐怖之下，他们的工会是唯一的公开工会，因此他们有把一部分工人从我们领导之下夺取之可能，但是他们的企图始终不过是暂时的，终究要归于失败；因为他们——反革命的政府绝对不能向工人稍事让步，更不愿抑制厂主们贪求无厌的欲望。党必须研究他们的政策之改变，与目前政府工人政纲之内容。党与秘密工会必须在日常斗争的事实中不断的向工人群众指出他们所以予工人以经济帮助或其他种种欺骗，其用意不过在于使工人放弃自己的要求和斗争，转而在资产阶级摇尾乞怜。

对于反对政府国民党或冯记阎记……等所委派的黄色工会，除开右面所述我们敢勇〔勇敢〕的站在工人前线领导他们作经济政治斗争，从不断的日常斗争中宣传揭破黄色工会之罪恶，使工人阶级脱离他们的影响而外，在组织上我们应当提出“工人自己选举工会，反对任何

机关委派工会”的口号，并实行工人选举工厂委员会和工会，使各工厂工人共同议决实行反对政府国民党以工人部之职权改组工会并指派工会指导员，抵制他们的机关，拒绝缴纳会费。同时厉行红色恐怖去对付右派工会的委员也是可以的，在能有广大的工人群众参加如此种斗争的时候，更有必要（如广州工人之反工总会运动）。

六、为帮助罢工工人，必须筹备罢工救济费，我们应当提出“不要给右派工会一个铜板，大家共同筹备罢工救济费”的口号，并指导工人实现这一个口号，那怕每个工人每月只能蓄储三五个铜板，也是有异常重要意义的，同时全国总工会必须向国际无产阶级不独要求政治上的帮助，并当要求他们在经济上帮助中国无产阶级。

七、因为关厂缩减生产，休业及开除工人等所引起的失业与饥饿使一部分工人起工团主义的妄想，以为夺取工厂自行生产或毁坏机器可以挽救工人失业与饥饿的危机。党与秘密工会的任务在于指出这种倾向对于工人阶级之不利，同时应当提出“工人管理生产”的要求。说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实际冲突起来，资本家便使成千累万的工人失业之事实，只有进攻资产阶级是政治斗争最有力的武器。

八、党对千失业工人，须使之团结于下列口号之下：

(一) 向商人与工厂主征税救济失业工人。

- (二) 政府开发社会工作给失业工人做。
- (三) 开办公共饭堂与公共寄宿舍。
- (四) 发给失业工人经常的津贴。
- (五) 失业工人津贴费由失业工人自己管理。

为使失业工人为这些口号而奋斗，必须组织示威游行，向政府商会要求上列条件或以捣毁政府国民党工会，捣毁政府管理发给津贴费之机关相威吓。

失业工人必须组织失业工人委员会于秘密工会指导之下。党必须注意组织失业工人纠察队的工作，并设法派遣失业工人到农村中去作农民运动的工作。

九、海员铁路工人矿工为中国主要产业工人，亦即中国无产阶级的重镇，现时党在这些工人中的工作非常之微弱，党的高级指导机关应根据下列之原则规定各个的工作计划，督促各级党部执行，并尽可能直接指挥监督其工作。

(一) 海员曾经有名的斗争，至今还成为广东工人斗争的重心，可是除开广东一隅外，别的地方极少工作甚至于完全没有。党应当有计划的发展海员工作，在邮船和大轮船上发展海员工会支部和党的支部，在重要的商埠成立海员工会分会，于最短期间于已有基础的工会中发动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战争的斗争。从这样的斗争以加强他们的工会组织和政治觉悟。党应当分派一批人才去担任海员工作。

(二) 铁路工作自“二七”失败后，即渐渐消沉和腐

化。除开极少的铁路如广东如株萍外，党的支部和工会机关多落在工人贵族手里，成了不战斗的机关。同时因为过去铁总党团组织系统的错误，铁路党团另改一系统，不受相当的当地党部之指挥，铁总特派员亦多离开党的指导，铁总又无法给以灵敏的监督指导，于是铁路工作愈益离开群众，许多铁路的工人群众反对工会反对C.P.，因为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原故。“八七”会议以后铁总虽努力企图改造，然因人力关系，亦仅限于京绥京津铁路有部分的改进。在此反对军阀战争和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时期，铁路工人的作用尤其异常的重要，党应当派人在几条重要的干路如京汉津浦京绥陇海京奉粤汉沪宁沪杭正太等重新开始工作，恢复并改造工会，发展下层组织，改造并发展党部，恢复党的威信，发动群众的经济斗争。同时改正党团组织上的关系，上级党团绝对不直接指挥下级党团，各级党团完全受相当党部的指挥管理。铁总特派员同时受相当党部之指导监督。

（三）“五卅”前后全国矿工中，我们党有相当工作的将近二十万人，“五卅”高潮低落后，至今一方因为产业恐慌而致部分的或全部停业，如汉冶萍三公司及枣庄之煤矿，一方则因党的自动的停止工作，如鲁普〔晋〕豫各矿省，因此，此二十万的矿工工人中仍旧留有基础而尚在继续不断奋斗百折不挫的仅只有安源之数千工人（湖南秋收暴动安源二千余工人为先锋攻萍乡醴陵浏阳）。北方各省不仅工作停顿，连党的组织亦形瓦解（唐山只剩

二十几个同志，工人根本不信任C.P.，下级同志要杀区委负责人)。这是何等可耻可痛的事情！现在党应当重新建立矿工运动的基础，尤其是对于直隶之开滦五矿（五万人），门头沟（二千人），山西之阳泉（三万人），井陘〔陘〕（数千），山东之淄博（五万人），枣庄（一万余，尚余一部分未歇业），河南之六河沟，焦作，江西之安源（尚有五千人），湖南之锡矿山（约二万），水口山（三千），炭塘子，湖北之大冶，奉天三〔之〕本溪湖须派专人去进行秘密工会发动斗争，发展党的组织。

十、同时党的中央对于大的工人区域，上海武汉广州天津青岛香港等处以及其他重要城市的职工运动工作，须特别注意加以指导和监督，目前尤须注意工作上和组织上的改造，尤其是在这些城市中的市政工人运动须特别加以努力。这些工人的厂家不是帝国主义者便是当地的军阀政府，斗争一起来即是直接的与当地统治阶级的冲突，特别在工农暴动的当中，足以制统治阶级的死命。各地党部须战胜一切困难，开始并发展这种工作。

为要使城市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指导者，那么各级党部对于各县城市工人运动便应当加紧工作，不仅要发展工人的工会组织和经济斗争，而且要充分给以政治的训练（如反对国民党夺取政权，武装联合农民，土地革命等等），使之不断的为夺取政权追求根本解放而奋斗。

一切城市的工人运动中，党须坚决的领导店员手工业者对于店东手工业主的经济斗争，必须如此我们才能

取得广大的下层资产阶级⁽¹⁾的拥护，才能在各县城市造成暴动的主要力量（当然还不是中心力量）。

十一、工人秘密的武装训练已成为中国工人斗争中迫切的工作。重要的工人区域须派专人担任训练工作，同时党应当尽可能帮助先进的工人得到武装，尤其是在军阀混战的时候，应当有组织的领导工人夺取武装。关于工人武装训练和工军的组织，武装暴动的技术，中央须另制详细的计划和规定。

十二、根据党一般的政治任务 and 策略，在工人群众中的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和运动，要更加积极的做起来。特别是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之下和外国资本家的工厂中更应把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融成一气，利用每一个机会激烈的发动起来。

十三、女工工作与童工工作必须较前加紧，必须吸收女工及青年工人到工会中工作。尤其是在纺织业工厂中，资本家每每利用童工女工以抵制成年男工，在一切斗争中辄大抵开除成年男工代以女工童工，以逐渐消灭工人队伍中中心的力量。党的策略就是要使成年男工了解提高女工童工特别的经济要求之必要，如帮助童工女工改良待遇，增加工资运动，提出童工女工工资与成年男工平等等以激发动女工童工的斗争，使之与成年男工结成亲密的战线，以抵制资本家挑拨离间的阴谋。

十四、训练工作在目前有很重大的意义和需要，在训练工作中，必须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罢工斗争胜

利之条件及反对黄色工会等工作详为解释，使工人都能了解才算尽事，在各重要工人区域中，必须出版象《上海工人》一样的印刷品。

党必须在纸上或口头宣传上猛烈的批驳右派工会领袖高谈阔论之阶级调和政策，并尽量的批评他们在《劳工日报》成〔或〕其他反动报纸上发表之文章及他们〈在〉工人会议席上之演说报告等。

十五、为使本决议案能切实的实现，党的中央须注意以下几点工作：（一）派遣积极的能干的同志到重要工人区域和重要产业工人中去工作。（二）改换旧的工人领袖和工运指导者中的机会主义分子代以新的积极的分子。（三）党的职工运动经费须直接指定分配于各重要产业工人，重要工人区域和重要城市，不交由各省党部自由支配。帮助各种总工会党团及各省党部制定所属范围内工人运动总计划。

各级党部对于所属范围内各种各业的职工运动，须随时制定一个月或两个月的工作计划，以尽领导或创造的责任，不可限于零碎的应付的状态。各省委必须每月对中央作职工运动报告，尤其是单独受补助费的区域，或产业，每月必须有一专门报告。如一个半月不作报告，中央应停止其补助费，两个月不做报告，便撤换工作人员。

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四期
刊印

注 释

- [1] 本文在《河南省委通讯》第六期登载时，此处为“下层小资产阶级”。

中央致两湖省委信

——两湖军阀混战形势下党的任务*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湘鄂省委：

唐生智系军阀已日趋败溃，据沪报载唐已出亡，武汉交何健，湖南交刘兴，八军亦退湖南。这虽不足证明唐系军阀纯全溃败，亦不足证明南京系军阀程潜，李宗仁等之大胜利。但两湖大小新军阀从此混战的局面将益趋激烈而不可收拾。现在两湖的局面，不是南京系军阀程潜等可以平定，亦不是唐走后何健，刘兴等可以长久维持。新军阀与老军阀不同之点，在于冒革命的招牌，做他个人的企图，至于抢夺地盘则一，两湖地盘为程潜，谭延闿，鲁涤平并李宗仁，胡宗铎等所欲得，同时何健，刘兴，李品仙等亦不至因唐走而双手送交程谭。他们之间将有更激烈的冲突，何况唐走的消息尚未纯全证实，而他的亲信力量可都集中于武长铁路与湖南，这显然是以武汉交何健作为缓冲，湖南则用全力保守。唐之力量一时并不至根本消灭。此外在湖北之方振武，贺国光，刘佐龙，李燊，湖南之方鼎英，许克祥，范石生，周西

成等又各盘踞数县，跃跃欲试（有些已经动作），唐之失败，将更引起他们积极抢夺地盘的行动。总之，两湖大小军阀混战的局面将益趋激烈而带较长时的性质。两湖的财政工商业因此而更要走入纯全破产的地步。凡此都是促成两湖土地革命发展之最好条件。两湖在现状之下在极短的时期内有造成两湖工农大暴动夺取政权之可能。中央特命令两湖省委注意两湖革命最近发展之前途，同时命令两湖省委利用唐生智系军阀崩溃与大小军阀混战，工商业财政破产的局面更积极的发动两湖的革命，创造部分的暴动，汇合而成为总的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政权的暴动，乡村与城市都应一致的動作与准备。至于目前急须进行的工作，中央特命令坚决的勇敢的执行下列各项，同时两湖省委接到此项命令后应更具体的定出工作计划即刻执行。

（一）在城市中当战争激烈以及某一部分军队的败溃时应：一、有组织的领导广大的群众捣毁反动派的总工会以及改组委员会，即刻当着群众宣布恢复老总工会，老工会，但同时须注意保存秘密工会之组织，最好开始建立工厂委员会；二、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三、尽量发动工人的经济罢工以至总同盟政治罢工；四、组织工人群众夺取溃兵与警察的武装，在未实行这种行动前即应组织工人革命军或工人武装自卫队；五、领导失业工人捣毁失业救济局，劳工部，警察局，以至抢米，抢银行；六、在汉口长沙如

工人群众的行动可领导其打外国人。

(二) 在乡村中大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分地主的東西,分配土地,捣毁与抢劫所有政府的征收机关,停止缴纳一切田租捐税,停止一切缴还一切借债^[1],集中力量割据某县或数县。鄂省委应当在极短的时间内领导农民割据公安,石首,当阳向极西发展,并与湘西联合,割据天门,沔阳向四周发展,割据麻城,黄安向鄂东与京汉路发展,恢复鄂南的工作成为一独立割据的局面,与湘北联合,恢复鄂东的工作;湘省委,应当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割据湘西,湘南,湘北各数县与鄂西鄂南联合。应当恢复长沙附近数县的农民运动,以至与长沙工人联合扑城。在割据的县分应根本肃清乡村一切反动势力,改变所有乡村的旧关系,按照中央最近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充分执行。为执行上面的工作,两省委应很迅速的各派二百至三百同志到乡村中工作。

(三) 两省委均应发表宣言,反对军阀战争,提出争斗的政纲,各省总工会亦应发表宣言,提出争斗的政纲。

(四) 应特别注意敌人兵士的宣传与破坏敌人军队的工作,两省委之下应设立一特别反革命军队运动委员会;其主要方面为煽动兵士暴动,杀戮高级反动长官,参加工农暴动,改编工农革命军,关于这项工作,两省委应有一详细而即刻可执行的计划。

（五）目前主要口号，应当是：工农兵士暴动起来，消灭新军阀战争，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代表会议，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没收地主的土地，耕地农有，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企业，工农政权万岁，土地革命胜利万岁，打倒欺骗民众的国民党，打倒新旧军阀，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资随物价高涨，抗租，抗税，抗粮，抗捐，停止一切借债，集会结社言论罢工绝对自由，工人监督生产，革命的兵士暴动枪毙反动的军官，革命的兵士参加工农暴动，工农兵士联络起来建立工农革命军，分配土地与退伍兵士。

十一月十五日

附：

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两湖秋收暴动以及广东的失败，土地革命的发展虽然受了一些打击，但整个的革命潮流仍然是要愈益高涨的，这是由于下列的情形决定：

（一）沿海以及长江流域一带新军阀豪绅与资产阶级的政权

并不因我们在两湖与广东的失败而比较的稳定，他们本身不可调和的利益的冲突，且日渐酝酿而纯全爆发，最近唐生智系军阀与所谓南京派军阀的武装冲突（同时亦是英日的冲突）便是一显明的事实，这个冲突的范围，将要继续发展而扩大，且将有发展成为新旧军阀混战的局面之可能。这个冲突之继续发展与扩大，无论某系军阀之胜利都是新军阀豪绅与资产阶级的政权稳定之大破坏，即是客观推翻革命潮流益愈高涨的动力。

（二）因为新旧军阀战争之爆发与扩大，战争区域，城市与乡村直接受战事之破坏与痛苦（如军用捐拉夫封船等），战争的影响的区域，间接亦要受苛捐杂税，预征钱粮，特别捐等等的恩赐。工农以及一般的劳苦群众反军阀战争以及谋解放争斗的意志与觉悟必益愈坚决而发展，换言之他们的阶级意识与争斗必益愈扩大与剧烈。在工商业方面因战争的影响，交通的断绝与阻碍，货物生产金融都要受重大的打击，势必减少停顿以至破产，这些情形又要引起城市与乡村中暂时或长期的恐慌，而益愈促工农以及一般劳苦群众与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冲突，最近武汉工厂倒闭，资产阶级整个的向工人阶级进攻，失业的工人日日加多，工资减少，工人的待遇上愈益恶劣便是具体的事实，由这些事实发生出来的工农群众日常争斗的总和，便是整个的阶级争斗之发展，即是革命潮流的益愈高涨。

（三）两湖秋收暴动与广东的失败，因为本党土地革命的策略未能深入群众，下级党部未坚决的执行以至未能唤起广大的（广东与湖北有几处不在此例）群众的行动，在群众的本身方面除了少数地方，并未受如何的打击，他们的观念至多不过是大势改变，还须等待新的时期，即此便武断革命的潮流不能发展是绝端的错误，这种错误的观念纯全由于不懂得本党正确的策略深

入与坚决的领导广大的群众奋斗的作用。

（四）因为工农群众之一致掘〔崛〕起，劣绅地主与资产阶级之阶级意识亦益愈发扬，他们对于工农群众之残忍非人的压迫亦益愈奇特，如鄂南地主对待鄂南农民之“宁肯误杀一千不肯走掉一个”之坚决行动等等事实，将要引起工农以及一般劳苦群众之反攻，加以两湖大部分的地方土地革命之进展，正在开始，这些情形都是革命潮流将要高涨的象征。

总之目前的革命潮流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它虽然受了相当的打击，暂时不能有总的爆发，但他将因新军阀战争之开始而益愈高涨。长江局认为目前本党策略上主要的责任是继续广东未失败以前中央政策的精神，积极领导工农以及一般的劳苦群众反新军阀战争，聚集与扩大工农群众的阶级力量，加紧一般的劳苦群众的政治的宣传，加紧乡村中土地革命之发展，创造一新的革命的大潮，准备一夺取政权的总的暴动，但目前绝非继续总的暴动时期。

在这一总的策略之下应即执行下列各项具体的工作：

一、长江局所管辖之下的八省〔2〕，在最近的时期各省均须特别举行一总的全省动员的反新军阀战争的宣传周。在这一宣传周中指明新军阀战争之内幕，国民党之反动，工农以及一般劳苦群众必须靠本身的力量发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革命政权，才能铲除新旧军阀，才能解除压迫。在这宣传周中各〔省〕委均宜用本党某省委名义发表宣言，这一宣言必须罗举新旧军阀统治下工农群众被压迫的事实。

二、在宣传方面除反对新军阀战争鼓动土地革命外，须加紧苏维埃政权意义之宣传。

三、积极发展土地革命，目前主要的争斗方法为实行与扩大

游击战争，各省并须依照各省农民组织力量与敌人空虚的情形划成若干区域，动员大批党与团的同志前往指导，占据县城或割占数县以为各地土地革命发展之村镇。

四、加紧大的城市如长沙武汉等工人的经济争斗，秘密工会的组成，并开始工厂作坊委员会之建立，反对与消灭反革命的改组委员会等工作。

五、开始兵士中的宣传，其方法为个人谈话，拜把，发通俗的小传单，联络伤兵并开始注意敌人军队中重要部分（如手枪队炸弹队机关枪队）的破坏。

六、准备在战争区域内夺取敌人的武装。

七、发展党员与团员的数量与质量，吸收大批新的工农革命分子入党。

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四期刊印

注 释

〔1〕原文如此，疑有误。

〔2〕据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中共中央对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长江局所辖范围为七个省，即：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十月二日，长江局第一次会议提到的是八省，即加甘肃。

中央通告第十六号

——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与意义*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此次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召集的时期,正是九月两湖农民暴动失败及叶贺军队与广东农民暴动失败之后。武汉反动本党八七会议以来,革命力量在三省(湘鄂粤)农民暴动及叶贺南征之中的继续兴起,又受着挫折。这种挫折的原因,主观上大半是由于我党各级指导机关机会主义的遗毒。此次中央会议的主要任务,因此不但要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指出我党今后斗争的策略,并且要指出根本上重造我们的党,强健我们的党,澈底肃清机会主义,严厉的整顿政治纪律。此次大会的主要精神可以说是继续完成八七会议扫除机会主义的任务,澈底重造我们的党,并更加确定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斗争的路线。此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如下:

(一) 考察中国的现状,指出国民党新旧军阀之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根本不能稳定,根本不能经过任何改良政策而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根本不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民权主义与民族解放的任务,所以中国革命客观上必要是继续发展,要由工人阶级领导极广大的农民群众,

实行平民式的澈底的土地革命（完成革命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革命是无间断性质的革命。

（二）因此，本次会议所以定出土地问题的党纲草案，确定的指出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歼灭一切豪绅的权力及中国旧社会关系。指出工业国有的党纲上的要求，指出工人要求实行完全的监督生产，工厂归工人管的口号。指出暴动的工农民众应当建立自己的军队，破坏军阀的雇佣军队，吸收一般兵士群众加入工农暴动，工农武装起来组织工农革命军。指出工人阶级今后更须努力领导一般反帝国主义斗争；提出取消一切外债，收回一切帝国主义攫取的特权，租界，海关，税务等等。综合起来，便是指出中国现时革命的发展，已经直接的要求我党提出“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口号，明显的定出推翻新旧军阀国民党政权，而建立中国“劳农政府”之目标，必须由我党率领工人阶级与农民夺得政权，建立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府，才能解放工农民众，才能统一中国，而使他脱离帝国主义的统治。

（三）客观上工农民众虽经最近历次的失败（叶贺之败及两湖广东农民暴动的不能胜利），然而各省反动军阀自相混战，同时工农的斗争仍是日益爆发（直隶山东的农民暴动，最近江苏宜兴无锡江阴苏州的农民暴动，上海广州工人斗争的兴起，两湖工农的艰苦斗争……），显然证明革命并未低落，而正在高涨，中国革命的发展，

就在速度上，也是有无间断的性质。现在虽还不是全国工农总暴动立时爆发而有必然胜利之形势，但已经是工农民众四处自发的奋斗起来，有汇合而成较大范围内的工农总暴动夺取政权之趋势。

（四）于是我们党的总策略，便是：一、发动农民间潜伏待发的暴动，组织农民自发的暴动，努力使农民自发的暴动有最大的限度的组织性；二、发动扩大产业工人手工工人店员之日常经济斗争，引导这种斗争使发展而成广大的城市劳动民众的革命高潮，一直到武装暴动；三、联合工农暴动的力量，汇合各处自发的工农暴动，夺取政权，——一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而。

（五）因此，必须坚决的率领民众实行抗租抗税不还债的斗争，坚决率领农民实行耕地农有——自动手（平民式的）夺取土地，坚决率领工人力争改善日常生活，从减时加资改良待遇，一直到要求监督生产。这些日常斗争必须切实的领导，发展工农群众的阶级意识，一直到夺取政权之清楚的认识，鼓动他们自己起来武装暴动，建立劳动民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

（六）关于日常的革命斗争一直到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则根据过去之经验及机会主义遗毒之教训有详细的说明，要知道在如此革命暴动无间断的爆发过程中，能否汇合而有较大范围之胜利，全靠本党的指导是否完全脱离机会主义而言，是否本党各地党部全力去发动当地群众，创造群众力量，不存依靠某某军队等机会主义心

理而定，所以特别指出并纠正策略上可能的错误倾向：
一、忽视城市工人店员等的经济斗争及城市的暴动，或者等待农军来解放工人，或者仅只视城市为军事上响应农民暴动之力量；二、农民暴动中专靠武装的力量（农军），甚至专靠杂色军队土匪首领的力量，而不发动群众，不执行土地革命的根本任务（杀戮豪绅，分配土地等等）；——这是单靠〔军事〕机会主义之第一种；三、对于农民自发的暴动，认为过早而不去领导，甚至阻止群众的革命行动，只想着有组织的“自己”军队的力量的发动与行动，根本不顾群众；或者群众方面很少去注意发动，只想一面军事上的发动，因而在群众中暴动情绪尚未成熟之时过早的发动，徒然做孤注一掷的牺牲；——这是军事机会主义的第二种；四、农民暴动之中只注意领着武装势力去扑城，甚至完全不考察敌我军力方面的战术，以夺得县城，固守县城，为暴动之唯一目的，以取得县政权，发布告没收土地为土地革命之唯一方法，同时却忽视乡村中的土地革命工作，不去更多更广的发动乡村群众，不去率领他们肃清暴动沿途乡间的一切豪绅反动势力，不去率领群众自动手的解决土地问题，这当然亦是军事机会主义（上述关于乡村的几点，自然同样的关系到城市暴动）；五、城乡暴动之时，对于小资产阶级多所顾忌，唯恐惹起反感而想保存安宁秩序，其结果，可以对于豪绅工贼反革命，采取犹豫动摇不坚决之政策，同时对于一般工人贫民群众反而远离，反而要限

制或禁止其革命行动；六、因为对于武装暴动有一般的军事机会主义的错误观念，而只注意军事技术的工作，或只是等待暴动时机之降临，对于工人的职工运动部分斗争渐加忽视，对于农民自发的部分要求不加领导，总之，这是不知道本党只有努力去领导这种日常斗争，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上去，亦是很大的错误。这些错误倾向，此次会议的决议已经明白指出，应努力的纠正避免。

（七）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则指明：农民暴动的游击战争应尽可能的发动，以秘密的农民团体所组织的革命委员会指挥之，尽可能的摧毁一切豪绅的权力，一有固定的革命地域，即须建立农民代表会议的革命政权。城市之中则须于革命委员会或其他暴动的指导机关发动之时，即尽量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机关，使能在暴动爆发的胜利之后，很快的变成苏维埃。农村与县市之间的暴动必须努力团结势力而联合起来，从游击的暴动进于建立革命政权并向外发展的局面。

（八）关于军事运动有更新的决定：应将极大部分的力量，用到兵士方面，从提出兵士切身要求，运动兵士反抗反革命军官，一直到参加暴动，令极下层的兵士群众发动起来，并且派代表出来参加劳〔暴〕动的指导机关，以至于加入苏维埃。其他的军事工作完全更以这一方针为目标。

（九）至于组织方面，则认定本党目前主要的任务是造成真正布尔塞维克的党，没有如此的党，客观的革命

潮流无论如何伟大是不能胜利的，即使胜利也不能真正巩固革命的胜利而自发展。本党目前急迫的任务便是：一、建立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上的健全干部与下层基础（党部组织之具〔集〕体化，工人化，巡视制度自中央至地方的实行，工人，农民，兵士等支部之确实建立等等）；二、建立布尔塞维克的中心思想，各地负责同志参加中央党报（布尔塞维克）的工作，各地地方党部对中央党权〔报〕定期通讯的责任，依照新的方针，在党的群众中公开讨论党的一切政策，并于中央党报上讨论。

（十）关于职工运动则特别组织一委员会，有专门的决议案，尤其特别指明的，便是建立广大群众的革命工会的系统，注意恢复发展全国的海员铁路工作。

（十一）最后，此次会议实行整饬政治纪律，对于不坚决的执行布尔塞维克的策略，甚至故意违背中央命令，以及显然有叛党行为的党员，都有明显的批评与分别的处罚。

总之，此次会议所给的总路线，是非常之重要，与八七会议同样是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关键，各级党部接到此次会议的议决案，应当本着这次会议的精神，切实执行党的策略和组织上的整顿工作。

中 央

十一月十八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
版的《中央通信》第十三期刊印

中央通告第十七号

——关于党的组织工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

十一月九日中央扩大会议组织问题的要重〔重要〕任务决议案严重的指出：我们党在武汉反动以前所以成为机会主义半孟塞维克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形成一个政治派别，形成一个政党，还在中国无产阶级没有自觉的成为一个阶级的时候，还在工农阶级运动初具雏形的时期。当时正当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占重要作用的是最左翼的最激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因此这些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首先渗入我们的党而形成我们党的最初干部；至于工人贫农群众的加入我们党，固然随着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发展而日益众多，然而已经是比较迟的一时期里的现象。因此我们党的领导作用竟留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手中。但是这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当时仅仅是受着最初一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农

[人]贫农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澈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在政治上不坚定不澈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气成见幻想……带到我们党里来。因为如此，所以在政治上造成武汉反动以前的机会主义半孟塞维克主义，一直到现在，这种主义的余毒，还潜伏在各级领导机关中，不容易铲除。因为如此，所以党没有工农群众化，不能尽“群众的组织者”之职任，不能成为领导群众战斗的核心。因为如此，党不能成为铁一般的无产阶级战斗的党，而只是小资产阶级浪漫的集团，一切党内生活和日常工作都只是自由的浪漫的不规律的，反动势力的压迫一来，整个的党即完全瓦解：逃亡的逃亡，消极的消极，怠工的怠工，反叛的反叛。武汉反动至今，由五万而降至不及两万，不及两万的党员中，积极的分子至多不过五分之一，而且多半是在那里无计划的无组织的执行个人的英勇斗争。因为如此，“八七”以来，中央许多正确的确

[彻]底革命的决议案和方针，如土地问题，农民暴动的策略问题，劳动问题，国民党问题，往往达到各地，
 是……的问题
 此……的问题
 是……的问题

部和委之主任自然而然成为分业的专门家，党的组织自然而然分裂成数多的独立系统，特别是军委工部农委，简直成了军党工党农党。本来中国的党是封建社会之产物，很容易流于首领个人的独裁形式，因为组织法的不完善，这种现象更容易发生，因此党的指导集体化亦为改造党的主要问题之一。总之，根据“八七”以来斗争的教训，组织问题已占了党中第一等重要地位。党的组织之布尔塞维克化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组织之革命化，都是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在于他的组织，全在于他有革命的阶级组织，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共产党。共产党如果没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组织，决不会成为群众的力量，决不能尽他在工农革命里的领袖及领导者的历史使命。中央今正式警告全党同志，只有自中央以至各级党部坚决的切实执行这次扩大会议的组织决议案，才能使我们党变成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组织而能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使命，否则必然在此反革命势力与工农阶级革命高潮的冲突激荡中完全溃散而至于灭亡。如何执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呢？主要的是在扩大会议精神和本原则之下进行下列的工作：

一、改正各级党部的组织法。

二、从斗争中改组各级党部，提选多数积极的工人贫农分子到各级领导机关。

三、从斗争中洗刷一切游移，胆怯，消极，怠工，

投机的分子。

四、从斗争中发展党员，特别努力在工人贫民军队中发展党的支部。

五、切实改造支部的工作，须健全支部的组织。

六、纠正职工运动中和农民斗争中组织上的错误。

七、改正各级党部日常工作的方式，并练习秘密工作的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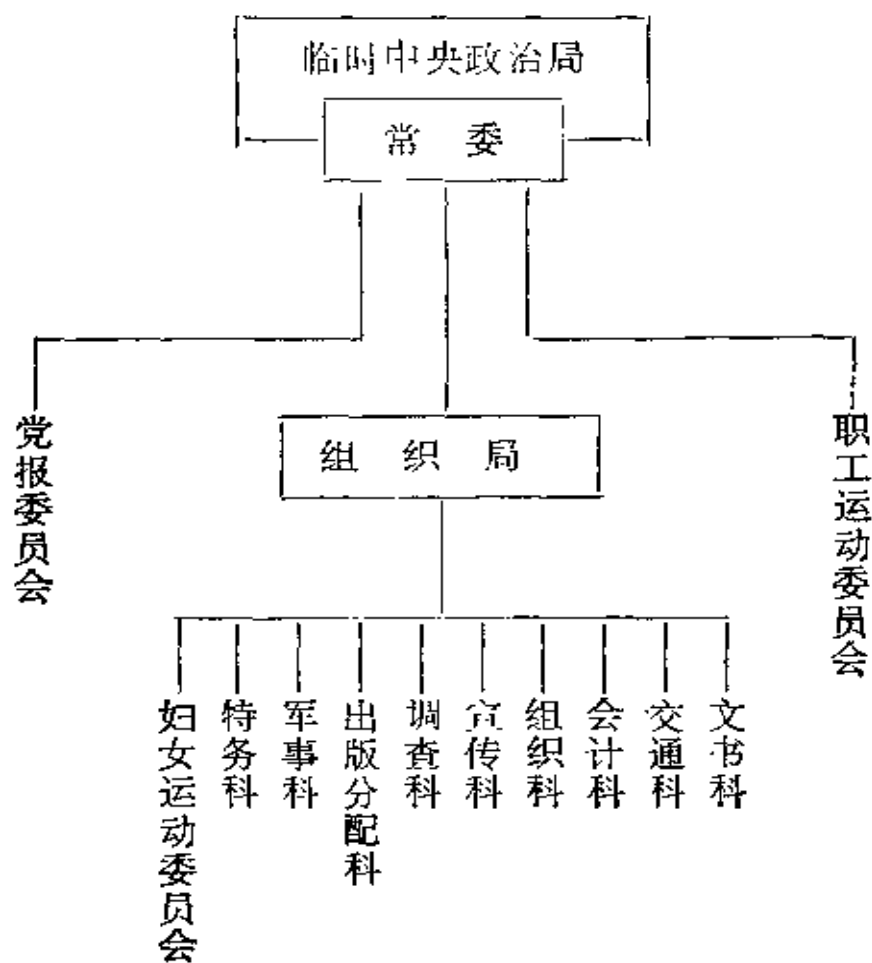
八、严格的执行党的纪律。

九、练习武装暴动的技术。

中央为实现上列的目的除派人巡视各重要党部实地指导外，并准备分别讨论出具体的计划训令各级党部执行。首先对于各级党部机关之组织上和成分上的改造有以下的规定：

一、中央，省委，县委，市委以至大区委，废止设部制度，集权于常委（小区集权于区委）。组织宣传改为科，为纯粹技术机关，其他部分如军事等在工作有必要时可设科，科之主任无需执行委员兼任。大的省委或县委可以成立组织会议（常委代表，C.Y.代表，工委主任及其他指定参加之人）讨论组织工作计划，工委必须组织（非工人区域的区委不须组织），工委主任必须为常务委员之一；农委取消，因为现在阶段党对农民斗争的指导根本是政治的策略的，无单独设立农委之必要；有劳动妇女群众的地方可以设立妇运委员会；有工农正式军队的省分可以设立军事委员会，此外可斟酌需要组织

“破坏反革命军队委员会”。凡委员会对于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只是搜集整理材料和对于工作计划建议的机关。中央之组织现时如下表：



二、常[省]委以下各级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人数及其成分应如下之规定：

(一) 省委：

大省——执委十一人至十七人，工人贫农成分须占半数，常委五人至七人，至少须有工人贫农分子二人或

三人。

小省——执委七人至十一人，至少须有工人贫农分子三分之一，常委三人至五人，至少须有一工人分子或贫农分子。

(二) 县委：

大县——执委七人至十一人，须有工人贫民分子占半数，常委五人，至少须有一贫农分子，工人区还须有一工人分子。

小县——执委五人至七人，至少须有工人贫农分子二人；常委三人。

(三) 市委：

执委九人至十三人，工人分子须过半数，常委五人，至少须二个工人分子。

(四) 区委：

大区——执委七人至十一人，城市须有工人过半数，乡村则须贫农分子过半数，常委五人，城市至少须工人分子占三人，乡村至少须贫农分子占三人。

小区——执委三人至五人，城市须工人分子占过半数，乡村须贫农分子占过半数。

(五) 有支分部或有小组之支部，设干事会由三人至五人组织之，工农支部的书记及干事会应尽可能由工人贫农分子充当。

三、中央，省委，县委，市委必须经常的有一人巡视下级党部直至支部小组的工作。

四、党的基本单位为支部，支部之下可分支分部或小组，支分部之下可分小组。每一工厂成立一支部，工厂中之各部各间则为支分部，支分部超过十人以上则分成小组。街道支部有零星分子六人以上时得分小组，一街道中有同业或同商店同作坊之同志三人以上时得分组支分部，党的组织系统仍受街道支部管理。惟一街道中有大公司或大商店，其中同志满三人以上时须独立成立支部。各街道之同业支分部为职工运动便利起见，得以其名单同时报告于该业总工会之党团。党团干事会得党部之许可，于必要时得召集同业支分部书记联席会议，讨论工会本身问题，但不得视为党的经常会议，与街道支部相混（从前有些地方每一手工业工会中同志成立一支部，这样支部的作用与党团相混，应解散编入到居住地的街道支部）。农村支部，在南方各省以乡农协范围为支部单位，北方各省以村为单位。农村区的范围以农村中直接于县政府的行政单位为范围。

五、省委所在地之城市党部，必须由省委兼（即分成若干区直辖于省委）。非大都会（如南京，北京，广州）及大工业区（如天津，上海）不能设市委。省委县委之下可以有特支特区。特委之组织是临时性质的，即为工作需要的临时组织，如为某几个区域或某几县分的工农联合暴动而组织的指挥机关，其权力当然可以指挥当地整个党的工作，但不是经常的党的系统。

六、党对群众的组织，只能经过党团去指导，绝对

不可妨碍群众组织的独立性，如工会即党，党即工会。所有工农会纵然在秘密的时期，亦必须组织党团。并须吸引非党员的工农积极分子参加指导机关。另一方面上级党团绝对不许直接指挥下级党团，致破坏党的组织系统。全国各路各级铁路工会党团，须受当地相当党部指挥，不能由上级工会党团直接指挥命令下级工会党团，致有形成铁路党的危险。

七、各级党部必须按定期开会，区委，支部，支分部，小组，支部干事会必须每周开会一次，省市县区的常委至少每周须开会二次，区委书记联席会议，支部书记联席会议，活动分子大会，须斟酌环境尽可能时常召集。

八、严格征收月费必须视为改造我党的重要工作之一，除开失业在狱者以外，党员的统计须于三个月内做到以月费的实际征收为标准。

九、过去党与团的关系异常之坏，须迅速的改进，各级党部须切实的执行互派代表出席，党对团须尽其指导与帮助的责任。

十二月一日

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四期刊印

中央致广东省委信

——关于广州暴动问题*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广东省委：

你们二十八日来信已接到。

(一) 关于广州暴动的计划，中央赞成。应注意广州市及四郊工农群众之发动。广州市现状如何？如有可能，即当由群众自动手的公开工代会，造成“第二政府”之局势。——自然应当尽量扩大群众的斗争，以达此目的，工代会应当做成群众斗争之公开指导机关，做成发动暴动的机关。四郊农民斗争起来之后，即可加派代表进工代会；兵士的革命群众开始斗争以至发动反抗时，亦加派代表入工代会，使工代会如此变成工农兵代表会。

(二) 广州以外的农民暴动，仍可用革命委员会(即你们通告中所称临时政府)。东江革命委员会，为陆丰一区的暂时指挥机关。各县则组织革命委员会为发动暴动之机关，直到苏维埃成立为止(中央以前所说取消的革委，是单指叶贺军队的革委而言)。各县之上，如东江或将来的南路等，有暂时一区域的联络之必要时，则可以

组织某区的高级革委(如现有之东江革委)。这种高级革委,应尽可能的由群众代表参加——如东江革委会中,即应由海陆丰等各县苏维埃加选代表进去——这是一种临时政府的性质。广东暴动胜利——广州工人暴动占领广州之后,这些分区的革命委员会就可以在广东省苏维埃成立之后取消。

(三) 苏维埃之组织,依照此次会议决议进行。如今海陆丰的成立苏维埃是很对的。但应注意:使群众真切了解感觉苏维埃是他们自己的政权。故苏维埃成立之后,在此紧张群众斗争之时,必须(1)多开苏维埃会议,一切重大政策办法都经过这种群众代表会议决定,一切执行政策,须在会议上报告——不要将实权尽归之于县苏维埃执委;(2)代表对选举人实行负责报告;(3)选举人应能实行撤换代表之权……;(4)县城内实行职业选举,工厂选举。苏维埃政权不可轻易忽视,——如果海陆丰城市不守,县苏维埃政府不应轻易解散,必须仍为指挥作战之机关,退至可守地点,指导进攻。

(四) 苏维埃(海陆丰)事实上选举后之社会成份,行动,状况等详情,速来报告,至要至要。

(五) 关于失业农民的问题,应当(1)在群众中鼓动提倡分给土地与失业农民,尤其是农军;(2)苏维埃政权设法筹措基金给他们以资本(买耕具等);(3)农民群众的意见之采纳——分配土地等办法,都须经群众中广泛的讨论,然后由革委或苏维埃颁布办法;(4)乡村中多余

的人民自然要加入工农革命军，鼓动他们来当志愿兵——农民暴动的发展与新政权形成过程中，工农革命军的扩大（正式军队）是事实上部分解决这一问题的地方；(5)关于雇农问题，则海陆丰等处土地已在分配中之时，一部分雇农应当分给土地（与上述之失业农民同），主要的是要组织雇农工会，定出并实行改良他们劳动条件工资的法令与条例。这一进一步的分化是土地革命过程中不可免的，我们应当现在就做这种准备工作。

(六) 海丰织造厂据报告是说：“归工人”，这是不对的，应当宣布归县苏维埃所有，苏维埃政府派人做主任，而厂中工厂委员〔委员〕会参加管理。要实行我们的劳动政纲（八小时……女工童工的优待等等）。报告中有“分给工人”字样是否是将织机分给工人领去？如果是如此，是不对的。

(七) 广州以外各县之发动，须迅速。虽说以广州为集中的目标——夺取省政权是对的，但是，千万不要忽略了乡中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工作。

(八) 工农暴动发动前发动中，土地革命（土地党纲草案）劳动政纲及政权目的的宣传应当竭力深入普遍，使群众知道暴动的目的。否则原始的农民暴动极易趋于一枪〔枪〕便跑的倾向（如陆丰群众手拿麻布袋的心理）。苏维埃的宣传须极普遍。

(九) 省委反张黄战争之宣言〔1〕，虽然在反对张黄之一点说得澈底，然而在暴动的积极目标说得太笼统。

廿八日信中说，“广州工人必须起来保卫广州”之“保卫”两字不可解，广州尚在张黄手中，尚是反革命的，何以要“保卫”呢？

（十）海陆丰等处，党应做极广大的公开宣传，应努力在群众中发展，广东全省的党务要尽可能的实行选举，由下层党的群众选择他们的指导者，不好的或不中用的同志应无情撤换，使同志群众公开的批评。

现在情形如何？宜速详报，并做文章来。

中央

十二月五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版的
《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五期刊印

注 释

- 〔1〕张(发奎)黄(绍竑)战争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爆发的粤桂战争，亦称张、李(济深)冲突。广东省委反抗军阀战争宣言认为，此次张、李的冲突，只是两派军阀互相争地盘加重剥削工农群众的战争。所以广东的党要率领两广工农全体起来反抗这次战争，利用军阀战争之际，扩大各地工农暴动，以联合各地零碎暴动，成为广东全省的大暴动，建立工农兵的政权。

中央致江苏省委信

——关于乡村暴动问题的答复*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

江苏省委：

你们十二月份的农运计划，因为写得很具体，中央昨（六）日常委会不能冒然作答，但关于急需解决的数事经同志口头提出当场解答如下：

一、目前农暴可以发展的区域是无锡常州宜兴苏州一带。这一带的客观情形，统治阶级蒋白两派军阀久已箭在弦上，时时表现两方互相冲突的可能。最近的国民党中央会议有人从中竭力斡旋，主张牺牲西山派改组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广西派让出全部上海以换回广东，但这个协调终无多望，并且益发证明统治军阀两派的冲突益甚爆发益近就是了。统治军阀由摇动而冲突而战争，自然是乡村斗争由游击战争发展到暴动的一个极好时机，不过这个地带的乡村斗争虽曾经过宜兴无锡常州的先后暴动，然因为发动以后形成了军事投机局势[的]，以致一经失败便溃散无余，土地革命始终未能深入。暴动失败后各地负责同志又多避难来沪，现时省委所根据

的乡村斗争生活还多是以以前的事实，若于此冒昧地定了一个全省或无锡等地暴动的日子，于发展农暴有碍，便对统治军阀将生的混战也尚不能有此确切的估定。因为定期暴动的条件是应该在统治阶级趋向崩溃群众斗争加紧时的必要根据上。现时我们在江苏乡村的工作方开始派人去加紧或仅开始去工作，而统治军阀的混战也正日近；在这样情形之下，不应是预定一个暴动日期，而应是预定一个发动暴动的期限，以催促各地加紧斗争加紧游击战争之预备和发动，庶几军阀混战到来不致坐失时机，并且可避免我们工作同志因为有了定期而坐待而不发动日常斗争，不作游击战争的预备和发动之危险。譬如十二月内，〈各〉区域按照当地情形必须将乡村斗争做到如何地步——或是抗税抗债，或是发动游击战争，或是打杀豪绅地主及卡丁官吏……，将城市斗争做到经济罢工，组织秘密工会，公开群众集会……，更普遍地宣传暴动夺取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这反是于暴动大有助力的，并且这也就是发动暴动时必要工作，而借此可以考察工作同志是否努力加紧此斗争工作以准备暴动。

二、乡村的暴动是可以从游击战开始以发展到暴动的，但不是派几个武装的游击队到乡下去便可以发展游击战争的。须知游击战争本不是单纯的武装行动，真如军队游击队之专门袭击敌人，而是应包含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武装的四方面意义。一个游击战争的发动，当然需要一点武装，当然需要些武装行动，但当打杀豪绅地主官

吏一开始，便应使土地革命的意义在群众中愈为明了，分配土地即使不即实行焚地主房屋，毁契约债券，分配富室财产物与无产贫民实属必要。改变乡村封建关系固不是嗟咄间事，但打破族长的信仰绅士的秩序，这于江苏是最切要的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也必须在斗争中广大的宣传，而这一斗争更必须是群众的。（一）假使群众并未发动起来，遽以武装行动去开始去领导这一斗争，势必又是军事投机，并且有些斗争，没有群众便无法发动。本来游击战争与暴动之不同点只在暴动是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而立即要夺取政权的，游击战争是因夺取政权尚无可能而群众斗争尚未发展至最高点时，或因统治阶级的力量足以扑灭一个暴动局势于极短期间而群众又无退路可守时的另一个斗争方式。（二）游击战争扩大了发展了，自然会走到夺取政权的形势，而群众斗争更会发展到最高点无疑，故游击战争也可以转变为一个暴动或一径发展到一个暴动。但游击战争不是没有失败的，它比暴动实更易失败。因为暴动不应轻易玩耍的，而游击战争在可能时便须发动，应视为乡村日常斗争之带有武装性质的一个方式，所以乡村的日常斗争而不带有武装性质的便不得视为游击战争，不过这种非游击战争的乡村斗争在农暴运动发展的区域一定日益减少罢了。

现时江苏各县最切要的工作便是发展这游击战争，有些地方如无锡常州宜兴这一个区域便可从游击战争发展到割据的暴动局面。但如果不在此等地方发展游击战

争，并不从引导群众抗税抗债，打杀豪绅，宣传土地革命，暴动夺取武装夺取政权作起，则一个总暴动局面永远不会形成的。便是定了一个时期，也不过是几个游击队的军事投机而不是群众的武装暴动。

三、城市职工运动与乡村农运关联问题在扩大会议政治任务决议案中说得很明白，省委问无锡等处的农运既有可能，这几县城市工人是否需要响应，这一个问题答案不应是预备响应或不预备响应，而应是在这儿县中给职工运动同志一个同样的限期，告他们在此期中如何发展工人的日常生活斗争，如何组织工会，如何让工人懂得政治斗争的重要和扩大政治斗争，如何引起工人对工农革命的需要，如何使工人受得武装的秘密训练。这些工作如能依期做好了，自然是一个暴动的准备工作。时机好了，也许工人群众为暴动的发动者，也许为农暴的响应。时机不好，农暴只能在乡村成一个割据的局面，则响应亦不需要或只需一个骚扰。在现时无锡等处的农民尚不能确定一个日子，则城市工人之响应与〈不〉响应自更不能先决。并且冒昧预决了，不响应固然要不得，响应也是使工人群众与职工运动者发生倚赖的观念，忽视工人本身力量，甚至不努力本身工作。(下略)⁽¹⁾

中 央

十二月七日

根据一九二八年二月出版的
《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八期刊印

注 释

〔1〕“下略”是《中央政治通讯》原有的。

中央复陈独秀函

——关于革命形势的估计和暴动问题*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九日)

独秀同志：

我们得到你寄来的信，非常之欣慰，兹答复如下：

(一) 国民党的统治长久与否，全看民众暴动的力量能否汇合而成较大规模之胜利。国民党的统治巩固（稳定）与否的答案却不同了。现在民众暴动虽未推翻国民党统治，而国民党自己已经不能巩固其统治。现在所谓国民党统治是冯阎广西派蒋介石派张发奎派军阀统治之总名而已。他们自己互相混战而任何人不能巩固统治，此其一。国民党党部之内，每省都有好几派，互相冲突，你倒我，我倒你，任何一派，不能巩固其统治，此其二。国民党的各省政府，完全在当地军阀之手，其所谓长衫同志，省政府委员，财政官吏等等之内，又有许多派别，你造我舞弊，我告你贪赃，同在军阀之下，也是互相争宠互相倾轧，任何一派不能巩固其统治，此其三。党部与政府之间，最近如叶楚傖公开的承认亦是互相冲突：“省政府与省党部，县政府与县党部，不相融洽……见面不说，背后

批评”；这种现象，仍旧是当地某派豪绅倾轧别派豪绅，霸占党部的豪绅，总想推翻现任政府人员，而自己取得肥缺，足见任何一派不能巩固其统治，此其四。因此，一般的局面之下，现在可以说工农的任务是发动一切武装暴动，组织群众自发暴动，汇合联络各方面的暴动，其目的便在夺政权。这种形势是〈无〉间断革命的形势，是比较长期的斗争，所以说中国革命可以由某地工农取暴动一击中以夺取政权的时机已到，固然是错的，但是简单的说，以群众力量扫荡国民党而夺取政权的时机还未到，则亦有语病。

（二）发动工农的经济斗争，以引导到政治暴动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唯一的方针。以前湘鄂粤暴动中指导的错误，正在于只有军事的行动，而没有经济政治的行动。最近江苏暴动^{〔1〕}中的错误，亦是如此。然而说“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为目的，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则我们不能同意了。群众反抗的目的，在于改善经济生活，同时，现在尤其在农民便不能不急转直下的以取得政权为目的，要取得政权，便不能不暴动。宜兴无锡事件^{〔2〕}的大弱点，正在于我们没有能深切指示群众，以他们自己取得政权之必要。因此群众没有广大的起来。现在的问题，在农民暴动中正是最迫切农民群众取得政权（苏维埃）的问题^{〔3〕}。现在的斗争，固然可以说共产党国民党争政权，其实是工农群众与豪绅资产阶级争政权。共产党用不着在社会

上避开争政权之嫌疑；重要的是共产党是否能率领起群众来争政权。如仅仅有军事行动(即使是农军)，自然形成共产党徒(并非共产党)，指使有枪杆子的人马来争取政权之形势。这当然是很错误的。宜锡暴动的错误，是偏重于军事，并非偏重于政治的错误。实际上忽略农民群众经济要求，自然就可以忽略政治，而偏的〔重〕于军事行动。农民群众在现在的阶段，已经分不开经济与政治的。所以以“四不”口号(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发动农民群众是非常之对，非常之必要；然而由此便必须走到暴动；为要在某地实行“四不”运动，便必须准备第二步的暴动，因为治者阶级不遇着武器和群众的暴动是决不许你“四不”的！农工群众不拿武器暴动，也决不能“四不”，此其一。再则既然是“四不”，那就早已是不承认现存的政权。“四不”之后，谁的政权呢？所以接下去立刻就是政权问题，唯一的答案是：实行“四不”的群众自己拿政权，举代表会议(苏维埃)，来指导自己的革命行动，来歼灭豪绅，来分配土地，此其二。无产阶级政党指导农民暴动之任务，正在于指出这种事实上的暴动目的，原始的农民暴动，红枪会天门会式的农民暴动，他们实际上取得某地某县的政权，而自己还不懂得怎么一回事，这种农民暴动的弱点，正是使他们永久不能胜利的原因。

(三) 上海市暴动的问题，却是另一的问题，若飞同志的意见是错误的。江苏省委八号通告说：上海现在

暴动时机的成熟，已远过于三月暴动之时。这也是错误的。中央早已和苏省委共同开会而纠正了。上海工人斗争的问题非常之严重。关于城市暴动的条件，已经写在此次扩大会议议决上。工人斗争必须在经济斗争，例如总同盟罢工……形成一般的革命高潮，而后转入武装暴动的形势，使暴动的城市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与指导者。此次江苏省委，因“吗啡针主义”发出这一“刺激性”的八号通告，其结果，使同志指导罢工时，只以强力打厂手段扩大罢工，他们的理论法是：罢工如此扩大，一直到总罢工，便已经可算暴动了。这可确是错误。应当去真正发动群众，从普通的群众的不满意，引导到群众的经济斗争，从部分的一两厂的罢工，引起同业或同区的工人群众的斗争情绪，而扩大罢工，从经济斗争真正引起群众的政治斗争，引起群众取得政权之必要的认识，而走上武装暴动。苏省同志不是如此做，却只以极少数勇敢工人之恐怖行动去“扩大”斗争，其结果，可以使这些工人一部与其群众相离。这本是非常错误。这是一种变相的军事投机主义。总之，应当注意经济斗争，应当以经济进于政治，不应当只注意军事行动，这说是非常之对的。至于说只准备做经济斗争，而不要指出政权的目标，这就不对了。

黄色的工会农会的力量，正在于他们的秉承国民党的命令，使工农不要政权，而只要经济上小小改良，但是如今经济上改良的可能非常之少，豪绅资产阶级正在

积极进攻，黄色改良运动只是很公开的欺人面具。我党只有这样指出这种事实，告诉工农，非工农自己取得政权是不能得着改良；如此才能打倒黄色运动。

（至于宜锡事件“奉了唐生智命令”那全是反动派的故意宣传。）

（四）关于中国革命性质，此次会议决议案已有说明，政纲虽无条文，然已大致在决议案上规定，并已公布于公开的布尔塞维克报上。

常 委

十二月九日

附一：

陈独秀来信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常委诸同志：

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因此，我们以群众力量扫荡它们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在实际行动上若取时机过早的政策，更是错误。因此，我以为此时的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当然不回避政治（更不是阶级斗争与民族争斗对峙），以发展我们的实在力量。固然因经济争斗而不可避免暴动，尤其在农运非暴动恐难发展。问题是在只能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为目的，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取得

政权”的幻想。前在汉口，我对湘鄂运动，也把这样的意见告诉过亦农。若飞对于江苏运动，偏重在夺取城市的政权（有些似毛润之的意见），他且幻想会占得沪宁。我当时曾表示不赞成。略说了几句，他似乎还不大以我的意见为然。这如果是他自己的意见，望常委急需纠正！如是常委的意见，我提议要切实讨论估计，万万不可随便做政治的暴动，尤其是上海。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宜兴无锡事件所表现的，也是偏于政治方面，经济的意味太少了，这样的暴动，使群众只看做 C 与国〔4〕的政权争斗，和国之北伐有什么不同（我们脑中的不同当然无用）？在各地的运动和暴动中，今后务要使经济的意味着实加浓，如此才能推动广大的群众，如此才能使一般民众了解 C 与国的显明的不同。现在一般人都觉得连我也承认是 C 与国的冲突，而不是农民革命，因为在宣传上在行动上都未曾表现农民的经济要求，与群众的骚动。我以为单是“耕者有其地”，这个口号还不够，因为太文雅了，不能使广大的农民了解，而且农民的痛苦不单是土地问题。我提议用“四不”口号（不缴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更简单明了容易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而且又可以通行全国。我们此时若不用最澈底适合于农民自身经济利益的口号深入农民广大的群众，而只是幻想政治的暴动，暴动失败了（当然的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并且还会因此使农民离开我们，使国民党有组织黄色农民协会的可能。宜与〔兴〕无锡事件报上说是奉了唐生智的命令而做的，不知是反动的宣传或是幼稚同志胡来，望注意！

独 秀

十一月十二日

附二：

陈独秀来信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5〕

中央常委诸同志：

昨函谅达。

顷阅中央通告第十三号，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纲，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的政纲，且明言是“武装暴动的工农革命”；而国际屡次议决案都说：“认为说民族革命已告终，另一革命即工农革命已开始，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彼此仍是大大的争质，不知最近国际已改正否？此问题不弄清楚，将来的政策，又会有异见发生。我以为现在的革命性质及吾党政纲急须确定，应速速由中国党起草送国际批准。与国分离之后政纲尤十分紧要；现在若不宣布一明确的政纲，党内党外不明白我们究竟要做什么。诸同志意见如何？

独 秀

十一月十二日

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四期刊印

注 释

- [1] 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宜兴、无锡、江阴、崇明、海门、常州等地领导和发动的农民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先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而失败。
- [2]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宜兴农民在双十节群众大会时，将反动县长逐走。十一月一日，发动起义，夺取宜兴县城，成立了工农革命委员会。第二天，决定退回乡村实行土地革命。起义农军在掩护农民撤退时，遇到反动军队伏击，遭到失败。随后，反动地主豪绅对起义群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无锡暴动于十一月九日发动，占领安镇、查家桥等十三个镇。最后，起义遭到反动派军队的残酷镇压。
- [3] 原文如此，疑有误。
- [4] 指共产党与国民党。
- [5] 疑为十三日之误。

中央通告第二十二号

——关于组织工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一〕

各省委，县委，区委，支部，小组，全体同志：

党内的组织上的改造是我们党目前最紧急最严重的问题。从“八七”会议以来，至此次中央扩大会议，党的政治任务和目前斗争的策略，已有更明显更具体的决定，同时工农阶级的革命亦日益高涨，军阀反动统治者之间的混战纷争亦日益激烈，而且继续不断的崩溃。当前的问题，就是我们党的主观力量是否能在新的政治任务和策略之下领导这高涨的革命潮流，向前奋斗以至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最后胜利。扩大会议《组织问题决议案》已很明显的指出我们党因为组织上特别是各级指导机关有极大的缺陷，——机会主义的余毒，必须经过一次澈底的改造，始能担负此一任务。而党员群众在“八七”以后更始终未能深切了解党的新政策，并且党的上级指导机关更多于有意无意之中不尽职地将中央决议搁置起来不传布到党员群众中去。所以“八七”会议以来的新精神，党员群众只是从群众斗争中了解了一些，但这

样的了解于党的行动党的组织是有极大缺陷，而不能产生出一个行动的革命的组织的。现在这个决议案便要把我们党组织上缺陷的根源和改造的出路告诉了我们，同时扩大会议从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又已定出适合扩大会议改造原则的各级党部新的组织法。在这里中央再通告实现这一改造的五项具体办法，各级党部务必严格遵守，否则以故意反抗党的改造论：

一、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从小组以至省委，必须经过全体会议或代表会议的选举，重新改组一次，具体办法如下：

（一）小组组长或支部书记由所属全体党员选举。

（二）支部书记支部干事会由支部大会选举，支部党员在三十人至五十人以上时得因当地环境关系分次开会选举，总计票数最多者当选。

（三）区委在三十人至五十人以内的（依照当地环境关系而定，下仿此）由区大会选举；三十人至五十人以上则由各支部大会选出三十人至五十人（每支部选一人或数人）的代表会议或分次大会选举之。

（四）县委市委由各支部选举三十人至五十人的代表会议选举之（支部数目超出代表数目时，得适用复选法）。

（五）省委由各县委各特支各直辖区委选举三十人到五十人之代表会议选举之，正式代表中之工农分子须占二分之一以上，并须有重要工厂支部的代表。

二、无论选举代表或选举指导机关之会议，在选举前，须提出中央扩大会议之决议及全国党的问题材料特别是当地党内的问题，在会议中引起群众的激烈的辩论，使群众了解党内组织上的一切缺点和改造的意义后然〔然后〕开始选举。

三、省委市委县委须派出真能了解“八七”会议，扩大会议的种种决议和具有澈底改造组织的精神的分子出席下级党部选举代表及改组领导机关的会议，指导“党内讨论”，中央须派出同样的分子到重要的省分及重要的工农区域指导改组并巡视。

四、扩大党的民主化至最高限度，激发党员群众对党内问题的讨论，一切实际斗争的策略上的决定，尽可能经过党员群众的讨论，务打破党员群众对党之政策不敢讨论或不懂得怎样讨论的成习，即在极困难的环境中不能先经过群众的讨论，亦必须使上级党部的策略得到党员群众的了解。

五、除非该地党部极端没有基础（如新成立的支部），或因发生特殊问题该党部不能行使职权时，或因事实上必要经过下级党部的请求时，上级党部不要派人去作书记，或常务委员。

中 央
十一月十日

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四期刊印

注 释

- [1] 原件标明时间“十一月十日”有误，根据本文内容和中央通告序号判定，应为“十二月十日”。

中国共产党为广东工农兵暴动 建立苏维埃告民众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同志！

广州的工人兵士已经暴动起来，将反革命的国民党军阀张发奎黄琪翔打倒了。广州四乡的农民也已经起来参加革命的暴动。广东各县的农民暴动正在发展，尤其是海丰陆丰等东江一带的农民暴动，早已得到胜利。如今全广东几千万的工农兵士都在剧烈的奋斗，要根本推翻土豪乡绅资本家国民党的政权。

这是工农兵士群众第一次革命暴动的胜利。这是工农兵士群众第一次自己起来取得政权，——广东工农兵士群众已经自己遣派代表，组织工农兵代表会的政府，组织工农革命军，实行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实行没收反革命资本家的工厂公司，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及真正保护工人利益的劳动法……，广东的工农兵士自己动手解放自己了！全国的工人农民兵士赶快起来，继续着广东工友农友斗争，争得我们自己的解放。只有这样，才能免除豪绅资产阶级的剥削，才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压迫

之下！

自从国民党背叛中国革命之后，不但北方军阀更加凶暴的压迫屠杀工农，不但国民党的新军阀蒋介石白崇禧李宗仁李济琛张发奎黄琪翔唐生智何健程潜等等，残杀我们工农，而且这些新旧军阀互相混战，驱遣我们兵士同志做炮灰，又使我们工农贫民的生活更加痛苦，又使豪绅资本家更加重的压迫我们。同时，国民党的各派，虽然各自依附军阀，互相争权夺利，然而他们一致的站在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方面，来压迫工农。国民党军阀互相的混战，苛捐杂税，拉夫派粮，破坏全国的经济，使全国几万万的工农贫民兵士流离失所，冻死的冻死，饿死的饿死，杀死的杀死。国民党的政府还要定出法律来，帮着资本家，实行强制仲裁禁止工人的罢工，组织工贼走狗的所谓“工会”压迫真正工人的集会结社自由。……国民党的政府，还要帮着豪绅地主，强迫农民交租纳税，勒收种种苛捐，满布贪官污吏，敲剥民脂民膏。国民党的政府，为要巩固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权力，并且和帝国主义去勾结，将工人夺回来的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英国，禁止抵制日货；国民党的反动，英美日帝国主义者得以横行中国，动辄惨杀中国的人民和兵士。总之国民党背叛革命，使全中国都在白色恐怖之下，全中国都在军阀混战之中。

国民党以前说革命“唤起民众”，但是，他唤起了民众，却并不是甚么与之“去奋斗”，而是屠杀民众。

民众是起来了。民众起来革命是要推翻豪绅地主，是要实行耕地农有，是要实行劳动保护，是要推翻一切剥削和压迫，是要实现真正的民众政权，是要澈底解放中国，使中国真正成为几万万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的中国。国民党却正反对这些事的实现。国民党看见民众要实现这些要求，他便立刻反动，——所谓清党反共，便是排斥代表工农兵士群众利益的共产党，便是压迫工农的革命运动，国民党便由此而变成纯粹军阀官僚的党，变成豪绅资产阶级的党。现在国民党的各派，不论是蒋介石汪精卫李济琛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何健李品仙冯玉祥阎锡山，没有一个不是已经屠杀了成千成万的工农的，没有一个不是克扣军饷搜刮民脂民膏的。从今年四月蒋介石上海屠杀以来，经过两广浙闽的大屠杀，经过武汉汪精卫唐生智等的反动，经过张发奎黄琪翔汪精卫回粤残杀示威的工人群众，国民党所杀的工农民众，至少总在三四万人以上了。这些屠杀表示甚么呢？这就是表示国民党要保护豪绅地主资产阶级而剥削工农，国民党成为工农民众和全中国的敌人，国民党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代表和刽子手。中国的工农民众和兵士，实在不能再忍受这种残暴的剥削和压迫了。中国的工农民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暴动起来，推翻这些军阀国民党的统治，推翻豪绅地主资本家！

中国的工农民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屡次起来暴动反抗，日常不断的奋斗：湖南湖北及最近江苏的

农民暴动，武昌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叶贺军队的南昌暴动和占领潮汕，——虽然这些争斗都被反革命的国民党所摧残，但是群众的革命势力始终是存在着。如今广东的工农始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起来暴动而得着胜利了。这一种革命力量是从工农群众自己的奋斗之中生长出来的；他们不是靠甚么军队来替他们革命，可是他们能够自己创造出真正革命的民众的武力——工农革命军；他们自己暴动起来夺取敌人的武装，他们和兵士群众联合，兵士群众自觉的参加暴动反对反革命的军阀长官，他们不想望任何官僚军阀政府的“法律政治”来解放他们，他们早已看出国民党的所谓农工政策完全是欺骗和屠杀压迫的政策，他们自己起来组织工农兵代表会的政府——苏维埃政府，自己来定出法律政治，真正保护工农的法律政治，真正打倒豪绅地主资本家势力的法律政治。这是全中国工农兵群众的革命先锋。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同志们！我们的胜利，已经在广东开始了；我们大家要一致起来拥护这一胜利，扩大这一胜利。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同志们！我们敌人的势力还有很多很多没有铲除，他们一定勾结起来，一定勾结帝国主义，来进攻革命的广东，他们正在各地死命的压迫剥削我们的工农兵士贫民。我们应当以全力来进攻反革命的势力——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势力；我们应当拥护革命的广东工农，我们要一致拥护广州的工农

兵代表会政府——苏维埃政府，中国第一个真正民众的革命政府。我们并且应当团结起来，打倒当地的军阀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势力，我们大家都要象广东的工友农友一样，起来组织自己的政府；赶快准备我们的力量，赶快团结起来，赶快武装起来；只有这样，我们工农兵士民众革命的斗争和暴动，在各地打倒一切反动势力，才能真正统一中国，创造真正民众的独立中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才能真正解放中国的工农，铲除一切豪绅工贼，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实行耕地农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实行工业银行矿山铁路航轮国有，与世界的革命无产阶级和苏俄社会主义的国家联合起来。

全中国的工人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扩大巩固我们阶级的组织，造成群众的工会，反对资本家的进攻，准备武装暴动。不要替反革命军阀运兵去打广东的工农兵代表会政府。

全国的农民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群众一致的抗捐抗税抗租不还债，武装暴动起来，铲除豪绅地主，没收土地。不要给反革命军阀的粮饷，解除他们的武装；不要让他们军队通过去打广东的工农兵代表会政府。

全中国的兵士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杀死你们反革命的军阀长官，不要听他们的命令去杀工农弟兄们。你们原都是贫苦的工农，你们应当赶紧和工农联合起来

暴动。你们都是穷得没有田地才当兵，你们即使有田也不能耕，你们即使要做工也不能做，这都是因为军阀混战扰乱全国，使你们穷困失业，这都是因为军阀豪绅地主霸占了你们的田地，还要教你们去做炮灰。你们的出路只有和工农联合暴动起来，夺回田来耕种。你们应当和广州的兵士同志一样，自觉的起来参加革命。

中国工农兵代表会政府万岁！

苏维埃的革命万岁！

拥护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政府！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一切军阀！

打倒国民党政府！

中国工农兵大联合万岁！

铲除豪绅地主资本家的一切权力！

解除豪绅地主资本家军阀的武装！

工农兵武装暴动胜利！

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实行土地国有！

一切土地归农民耕种！

没收中外大资本家，实行工业国有！

工人监督生产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颁发土地给兵士和贫民！

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

国家救济失业工人和贫民！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九期刊印

中央通告第二十三号

——广州暴动形势下党的任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政治任务决议指出：中国革命虽受了三次挫折，而有部分的失败，然而目前的局面，一方面新旧军阀的混战日益扩大，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日呈崩坏之象，其对于民众不仅绝对没有实现一点改良的事实，反而变本加厉的执行其剥削压迫屠杀的政策，一方面全国范围农民暴动的普遍发展，工人阶级对于资本家反攻的日渐剧烈，——客观的革命潮流，无疑的是继续往上涨，党的历史的使命便是要善于领导革命潮流，一直发展到工农暴动夺取政权，实现土地革命。

扩大会议后，中央根据此决议与几个重要省份的负责同志讨论决定各省工作计划训令各省党部执行。尤其对于广东，中央坚决的训令广东省委，须于最短期间变张李的军阀混战为工农夺取政权的战争。对于两湖，中央亦曾训令两湖省委于最短期间布置出一个总暴动的局面。

一个月以来，客观的事实，完全证明扩大会议和中

央策略的绝对正确。新旧军阀间旧的战争还没有表现能决定最后的胜负，各个营垒内部新的战争又正在酝酿爆发（如西征军入湘，程潜李宗仁之冲突，何应钦白崇禧间之冲突），国民党内军阀政客官僚的领袖们——豪绅资产阶级的代表已经公开的互相攻击和倾轧，所谓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预备会议^{〔1〕}之经过，不过是在民众前面公开他们互相冲突的丑史，宣布国民党临死的丑态而已。而在他们敌对的一方面，一般的工农阶级的斗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正有光明的发展，在两湖境内农民暴动彼仆此起的走向更激烈的状态，武昌的数万纱厂工人，在军警严重压迫之下，自起动手杀死十几个改组委员。一般的小资产阶级，在国民党内部战争和因战争而兴的种种苛捐暴敛之下，已表示游离，怨恨，一小部分有重复倾向革命之可能。特别在广东，东江的农民暴动早有伟大的胜利，海陆丰一带已有五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实现了党的土地革命的策略。在十二月十一日的早晨的四点钟，霹雳一声，广州的工农和革命兵士几个小时之内，从张发奎黄琪翔之手夺取了广州政权。广州暴动是全国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一个“信号”。他开始了广东的总暴动，即使会有暂时的部分的挫败，甚至退出广州，可是广东工人及农民群众这一暴动力量的发动，不是反革命军队所能很快的消灭的，群众的力量还正在发展，一天一天的要有更广大更多的群众力量来拥护革命。这一广州暴动，他不仅向全国工农群众证明他们凭自己的力

量可以解决一切，而且是向豪绅资产阶级证明了他们的末日降临。

为了全国革命局面的激剧的转变，尤其是为了广州暴动的胜利，中央对各级党部有以下的通告：

（一）在广东总的策略是：广州的力量应迅速扑灭附近的敌人向外发展与海陆丰等势力接合，尤其要紧的是立刻发动全省各地的工农暴动，以全省各地的暴动来保卫决定广州的胜利，同时广州应立刻宣布苏维埃政权，颁布没收土地给农民的法令，颁布劳动法，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一切反革命资本家的工厂公司，没收一切反革命的财产，由政府分配，组织赤卫军拱卫革命的广州，扩大工农革命（军），征调大批党员团员加入。

（二）在两湖党团应全体动员加紧准备在新的战争（西征军入湘）中实现总暴动，农民游击战争，工人经济斗争，应立刻尽可能大大发展。农民割据的局面要立即开始，特别是湖〔湘〕南应立刻割据起来，使之变成海陆丰第二，因为那边有很好的环境和我们的军事力量。在江西应集中党团的力量到赣南赣西发动，与湘南湘东联合造成割据的局面。赣南湘南须立即发动，可以直接声援广东。总之，现在要以两湖及赣东南的暴动保卫广东的胜利，扩大全国的总局势。

（三）在全国各地党团全体动员，根据中央宣言，实行一个广东暴动的宣传周。在这宣传周的工作是尽可能利用种种方式如群众集会，游行，飞行集会，文字标

语，画报等等，把广东暴动的事实和意义向工农群众作一个普遍而深入的宣传，以唤起他们继广东而起的斗争。

（四）在全国各地，凡有党和团的地方，要从这个宣传中和宣传后发动农民群众的斗争，或发展农民游击战争。在工人群众中，特别是武汉上海天津青岛无锡等有广大群众的工人区域〔外〕，应尽可能举行一天或几小时的同情罢工，在罢工的时间开会演说，或游行示威。并且事后利用群众热烈的情绪发展工人经济斗争，并领导他〈们〉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总之，工农群众对于广东暴动不仅要有一个同情的表示，尤其要认识广东暴动是工农阶级整个暴动的开始，同样在当地发动激烈的斗争，才是真正给予广东以有力的援助。

（五）在广州的暴动中，因为有一部分的革命兵士参加，所以更能迅速的取得胜利。广州暴动应当继续扩大敌人中的军队工作，广东而外的各省，今后要有计划开始兵士工作，暴动发动时，敌人中兵士的响应是能给暴动以异常的助力的。特别在准备总暴动的两湖，这种工作更为迫切。

（六）党和团应利用广东暴动的实际材料，在党团的支部中举行热烈的讨论，从广东问题可以讨论到整个的革命的局势和党的整个的策略，当地的实际争斗及党的改造……等实际问题。

除对于广东两湖江西中央另有具体的指导外，特此

通告，务望切实执行。

中 央

十二月十四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五期刊印

注 释

- 〔1〕指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这次会议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到十日在上海召开，共开会四次。谭延闿、李济深、蒋介石、汪精卫等参加了会议，会上由于蒋介石取得了日本的谅解和美国支持的许诺，并策划了反汪的攻势，迫使汪精卫等不得不提出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并愿将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之事交蒋介石办理。

中国共产党为广州暴动 再告全国民众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全国工人农民兵士们!

全国劳动群众们!

全国亲爱的同志们!

十二月十一号是我们每一个都应当深记着的日子!我们将永远记忆着这个日子,因为这一天在广州高揭起了苏维埃政权鲜红的旗帜,因为在这一天广州英勇的无产阶级与广州近郊的农民联合一致推翻资产阶级军阀反革命的政府,建设了苏维埃政权——工农兵代表会的政府!

在这一天我们精悍的兄弟们,勇敢的同志们磨拳擦掌同向资产阶级反动底炮垒进攻,终于占据了一切政府行政机关!暴动的无产阶级,成千成万由广州近郊奋勇入城的农民以及投向革命的兵士们,大家都随手的武装起来,异常英勇的实行争斗,虽然军阀竭力反对,而广州终被劳动群众占据了,军官们都被从司令部中驱逐出去,警察都被从他们的警署之内赶出,银行电局一概被占,监狱概被开放,两千多被监禁的工农也全被解放

了。

拥集在成千累万的群众大会之上的劳动群众在李福林军队底枪林弹雨之下，而意志始终坚决，终于将李福林的军队击退河南^[1]，在广州建设了工农兵代表会的政权与广东革命政府，政府委员大多为工农分子。

农民与工人，苦力与水手，铁路工人与海员，人力车夫与手工业者，共同宣告：他们不能在豪绅地主资本家买办阶级商董及军阀们底政权之下再忍受下去了，他们不甘愿使自己的家庭再继续着被掠夺遭破产，使自己的婴儿再在工厂中消失其几尽的血液，他们不愿再交出用自己的血汗积聚起来的最后一粒米，去养活军阀豪绅。

劳农革命政府在成立的第一天便宣布革命政府之成立正为执行民众的意志：一切土地概交给用尽自己的力量耕种他的农民，立即除消使农民破产之杂税苛租等农民不能担负的重荷，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保护劳动与保障失业者……等等。这些都订为革命政府的法律，这些法律都是劳动群众亲自拟订的，这些法律都是劳动群众的名义颁布出来的。为保障这些法律，全广州的工人群众坚决的决定以保障这些法律的名义号召成千累万的农军奋勇入城，使广州的劳动群众与工人联合一致，号召革命的兵士都投向民众方面来。

为保障自己的政权，劳农政府使全广州的劳动群众联合一致，在战争之中立即组织起新的工农革命军，兵

士大部均为工农分子而非旧的兵士，他们随手武装起来，从商店中夺取了长剑短刀斧头，一直杀到城中杀出城外，占据了广州兵工厂复换用枪械。

工农兵代表会联合了所有劳动群众成为整个铁的团体，在两天的短期之内组织了这个政权，震动了全中国任何一隅的劳动群众，燃起了每个工农的心房对于胜利的新希望，确信与决心，……。

工农兵代表会实现的第一秒钟已经引起所有的民众刽子手之痛恨，仇视与莫大的惊吓与恐慌。他们一致在扑灭劳农政权的目标之下联合起来，企图使这个政权化为血污之海。

在劳农政权实现的第一秒钟已经使一切民主派，自由派，国民党以及其他资产阶级的杂种，王八蛋们忘记了自己口口声声高呼的“爱民”等甘言蜜语，同他们昨天还认为是自己的仇敌的杂种们一致来扑灭第一个工农政府。李福林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在仇视图谋解〈放〉自己的工农群众之下，一致联合起来，由各方面进攻革命的广州，把广州铁桶也似的包围着。我们同志们的英勇终难于匡救自己，……。

工人与农民经过了三天的血战，至本月十三日，才被追不能不放弃广州以冲出重围。

四千英勇战士的尸首纵横于广州街上。成千成万的工人冲出了广州，为保留自己手中的武器，以继续在广东已经开始的事业。

十二月十三日失陷了广州，苏维埃政权——工农兵代表会的政府，只存在了两天，但是同志们，我们在任何一刻能忘记了这两天吗？

残酷的反动不以屠杀四千英勇战士为足。新被逮捕的二千同志严遭拷问，嘲弄，而后尽被斩决，烧死。在广州被诬为共产党员者不知有几千百万，所有粗掌巨臂的工人和农民都被诬为“民众的公敌”，而胜利的军阀，张着血污的口残笑着假借民众的名义。他们的凶残在历史上只有法国资产阶级扑灭巴黎公社及白党反对苏联两事可比，他们的凶残掀动了残酷血潮扑入广州。新的所谓“讨伐”之师正向广东开拔，他们的目的在于扑灭广东一切民众运动，军阀们正在庆祝欢迎。

同志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十一十二两日。存在两天的苏维埃政权——工农兵代表会的政府可为我们的团结一致继续争斗直到博得胜利的标帜。

我们不能忘记，在猛烈仇视无产阶级之下不独军阀，资产阶级，地主及买办阶级互相联合起来了，而且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也锁在一起地携手起来，他们忘记了前仇，现在成为至亲好友。

美国与日本的船舰载运着兵士前往广州。英国帝国主义者正在煽动鼓吹军阀从事此举。将来由广东的讨伐必定是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共同压迫。现在他们——蒋介石李济程潜胡宗铎为此事都联合一致了。

现在他们唯一的敌人是工人与农民及苏维埃共和

国。打倒帝国主义本是国民革命开始举起的旗帜，为什么现在把“反对帝国主义”这几个字样都忘掉了呢？为什么全世界劳动群众的至友，存在十年工农得安适生活的唯一无二的苏维埃联邦偏是中国政府唯一的仇敌？为什么在他们夺回广州之次日全中国各地的苏联领事馆都被封闭并被撤消承认呢？为什么把广州苏联领事署的办事员整个的捕去，斩决，而且污辱呢！为什么汉口苏联领事署署员也都被捕？为什么包围上海苏联领事署驱逐领事出境，而每一个从领事署出来的人都被检察呢？

为什么没有一个文明国家的代表，没有一个西欧列强的代表提出反对已经确实的广州惨案？

同志们！这是因为一切资产阶级，一切地主，一切军阀与一切帝国主义者，现在结起了联合战线反对中国劳动群众及苏维埃联邦共和国。

他们把女工们活活的烧死，诬她们为共产党。军阀们亲自枪决工农国家——苏联的领事，原不过因为他们是工农共和国的代表。

同志们，我们应当知道苏联的代表也同我们一块儿死难了，我们应当记忆着苏联领事署署员之被斩决死难，原因为苏联领事署内高悬的镰刀斧头红色旗已经招展了十年之久，正是全世界资本家怒目仇视的标帜。英国与苏联断绝了国交，他们也望中国资产阶级照他们一样动作。

中国资产阶级重复博得胜利，其实正是他们的失

败，一切被压迫民族唯一的至友被逐出中国之境，中国资产阶级便完全依靠着帝国主义。中国资产阶级消失了他最近的独立性，现在中国一切资产阶级军阀不过是帝国主义者掌上的玩物，驯服的奴隶。

反动重复庆祝胜利，白色恐怖的潮流淹没了整个的中国，但是是否能持久呢？就在他们胜利的第二天，他们又重新互相争斗起来。重复分占地盘割据中国依旧是他们目前的问题。我们敢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各派的纷争与互斗必将重新加厉起来。资产阶级现在虽然在广州得到了胜利，但是他始终不独无力满足工农群众的欲望，并且自顾不暇。

他们虽然在反对苏联与中国劳动群众的目标上结成了联合战线，但是怎样分占地盘，怎样剥削中国，及怎样分据中国富庶省区等问题依旧是他们纷争的焦点。

同志们，我们不要灰心丧气，我们必须知道，资产阶级的胜利不过是暂时的，我们必须使他们这次胜利成为最后的一次。我们必须知道，从广州退出的革命工农兵士的争斗仍然是继续下去，我们必须用全力去帮助他们。我们反对反革命政权的争斗不应一刻放松。

我们要记忆着死难同志底鲜红血液正是争斗中的旗帜，我们必须高举着这个旗帜勇往前进，坚决我们的意志誓死争斗，不达到胜利不止。

今后，我们必须使一切劳动群众团集于工人阶级的周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作更有组织更团结一致

的争斗，如此方能胜利。我们必须准备自己的力量作坚决的斗争，但可不是立即总暴动起来。现在立即总暴动，将必败于残酷的反动之手。他们正希望全中国的工人以及上海工人现在就手持枪械出作巷战，以造成新的血海，使一切革命争斗长期沉没于血海之中。

同志们，我们不能作如此的盲目争斗。我们必须继续着我们勇往直前的工作，以推翻军阀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我们必须百倍的加紧这种争斗。我们同志们为坚决的目的而流的血正浸润我们，工人和农民。我们全副的精力必须注重于建设我们秘密的组织，我们继续作农民游击战争，我们必须推翻一切反动的统治，努力以博得胜利。

同我们携手前进，帮助我们的，有全世界的工人。同我一气的，还有苏联劳农共和国。我们的队伍不会有一分钟的分裂，我们有铁的决心去博得胜利。且让他们在今日庆祝胜利，我们以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一致的力量回报他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你们——全国的工人，举行定期示威罢工，以反对发生于广州，普遍于全国的兽类行动，向他们表示全中国工人阶级的愤怒，这种愤怒刺入全中国劳动群众的血管。

全世界的工人在共产党旗帜之下正在不断的争斗，广州的工人与农民在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已经争斗起来，而领导广州工农革命军作争斗的共产党，号召全体工人

同志作定期示威罢工。共产党号召全体农民继续着反对豪绅地主的游击战争。共产党号召你们——全国的工农与劳动群众立即起来巩固自己的组织，准备着作新的斗争。共产党号召全体同志一致起来讨伐广州。共产党特别转告兵士们，你们不当为军阀之玩物，你们不当甘为民众之敌，你们自己都是工农底子弟，为什么任军阀们的指使去屠杀工人和农民？为什么以自己兄弟们的血污染自己的手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共产党确知在广州事件之中已经使许多兵士醒悟过来，深信兵士们将必与工农群众联合一致在鲜红的革命旗帜之下共同奋斗。

最后我们高叫：

（一）打倒一切工人阶级及农民的刽子手！

（二）打倒资产阶级军阀的政权！

（三）推翻帝国主义者的统治！

（四）广州被压迫工农兵代表会政府万岁！

（五）全中国工农兵代表会的政府万岁！

（六）一切被压迫民族及全世界劳动者的朋友——苏联万岁！

（七）纪念着苏联代表者的血液，一致拥护苏维埃劳农共和国！

（八）在红旗之下，严紧我们的队伍，锻炼我们自己武器以备新的争斗与胜利！

（一）〔2〕我们热烈的请求全世界的工人援助我们的争斗，共同打倒全世界帝国主义者的压迫！

(二) 全中国的工友们我们要表示我们队伍的一致，一齐举行定期罢工！

(一) 海员们及铁路工友们，农友们及兵士们不要让一粒弹丸一个兵士去打革命的广东！

(二) 农友们继续的和地主豪绅争斗，夺取土地，与工人联合起来！

(三) 兵士们转过枪头打人民的刽子手，打军阀官僚，一枪也不打工友们及农友们！

(四) 中国的劳动者，广州之暴动是我们争斗的旗帜！

(五) 全中国劳动者胜利万岁！

(六) 全世界劳动政权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版的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期刊印

注 释

[1] 河南，指广州市珠江以南，白鹅潭以东地区。旧称河南街。

[2] 此处（一）和以下的序号为原文所有，未予改动。

中国共产党反对反动的 国民党政府对俄绝交宣言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被压迫剥削的民众：

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豪绅资产阶级新军阀的政府，已公开命令“对俄绝交”，枪杀广州之苏联副领事，驱逐各地苏联领事出境，没收各地苏联领事馆及一切国营商业机关了。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对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这样的攻击和侮辱，甚至不惜破弃最反动的国家所不敢破弃之国际公法，如政府官厅公然枪杀外国领事等，实在是公开投降于帝国主义，靠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为护符，以与中国人民的良友——苏联，为敌。

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及其教唆者——帝国主义，为甚么这样毅然决然的仇视苏联呢？因为近日来中国的工农兵贫民群众正酝酿着一全国的革命大暴动，此暴动已在广州开始爆发，此暴动一起来，足以推翻全国豪绅资产阶级新军阀的政权，铲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他们，这些反动派，看见自己的统治权力岌岌可危，便不惜准备并实行以最残酷手段镇压民众的暴动，而且迁怒于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以为这个无产阶级的国家之存在及其活动是足以鼓励中国民众，使之加紧革命斗争的。因此，反动的国民党内各派，自白崇禧经过蒋介石以至汪精卫，都联合一致，不惜公开背叛其总理孙中山联俄的遗嘱，而完全投降于帝国主义，当帝国主义的先驱走狗向苏联进攻。反动的国民党的代表人之一——蒋介石，曾经公开的宣言：“必须联合各国（帝国主义者的国家）以反对第三国际。”在帝国主义的唆使和逼迫之下，他们遂宣布“对俄绝交”，隔绝中国革命势力与世界革命势力之联系了。反动的国民党甘为世界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工具之事实，从此就完全揭露于中国革命民众及世界革命民众面前。

苏联是世界革命的祖国，它是以发动世界被压迫剥削人类反对帝国主义及各地豪绅资产阶级为天职的。苏联的工人和农民，尤其时时刻刻准备着，以精神和物质上的力量，援助中国工农兵贫民的革命。苏联的工人和农民及其国家，绝不隐讳它援助中国革命之事实。即现在反动的国民党军阀及官僚，以前也曾假借革命民众的名义，得着苏联的帮助，然后能战胜北洋军阀，而造成现今统治过半个中国的地位；——谁想他们竟也投降帝国主义，加入世界反革命战线，反认中国革命群众的良友——苏联，为仇敌了。

苏联对于中国首先自动废除一切旧俄不平等条约。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经过中国工人民众极大的革命努

力，方才从他们手中夺回汉口九江的租界及其他“让步”；现在，因为国民党叛变，而帝国主义者重新向中国革命进攻，取回租界，侵占新权利，在这种时候，国民党政府更进而“对俄绝交”了。就这两件事事实比较看来，我们益加能够认识国民党政府之卖国求荣至于何等可耻的程度！

本党是中国工农兵贫民群众的先锋队，是领导中国革命唯一的党；本党明白宣言：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绝对不能代表革命的中国，其一切“对俄绝交”的命令绝对不是中国广大多数人民的公意，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认苏联是仇敌，而我们民众则仍然认苏联是中国的良友，永久与之联合为中国革命及世界革命而奋斗。

中国全国的革命的大暴动，目下正在酝酿待发之中；广州的暴动绝对不是此大暴动之流产，而仅仅是此大暴动之一序幕。中国全国的革命的大暴动，不久将象火山般爆发出来。反动的豪绅资产阶级新军阀呵！你们切勿以为有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武力为靠山，可以任意屠戮苏联的外交官吏，可以任意驱逐苏联领事出境，而苏联是无力反抗你们的；你们须知广大的民众暴动即将推翻你们的政权；今日借去的债，明日将要加倍偿还啊！

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对俄绝交”了，然而中国工农兵贫民群众高呼：

打倒反动的国民党政府！

铲除一切帝国主义势力！
全国工农兵大暴动起来！
建立苏维埃中国！
土地归农民耕！
工厂归工人管！
和平给一切民众！
苏维埃大联合万岁！
中俄革命民众联合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第三共产国际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版的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一期刊印

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

——对国民党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九月十九日《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对国民党工作有以下的决定：“……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可见土地革命的急剧的发展，已经使一切动摇犹豫的上层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的战线。澈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中央根据此点，所以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假设在国民党中有这些单独的，革命的，‘对〈抗〉派’的成份发现时，我们应赞成他，推动他到继续革命斗争的道路，使他完全与国民党的反革命上层分子断绝关系，但同时应当知道，这种工作比起党的主要任务（组织暴动）是占次要的意义。关于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当然无论如何说不上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即使以后在自然的群众运动基

基础上，或许另有发现国民党组织之可能（现在还不是这种现象），则我们应当知道这种力量不是主要的决定成败的力量，而是革命之临时的，不可靠的，不坚决的同道者罢了。……”自此之后客观的事实愈加证明国民党只是豪绅资产阶级新军阀的工具，是空前未有的压迫和屠杀的象征，其本身更反映豪绅资产阶级新军阀的内部冲突而分裂互斗日趋于消灭死亡。因此中央不断的在对各地工作的指导中和《布尔塞维克》上暴露国民党的罪恶，指示反国民党的必要和我党领导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直接革命的任务和策略。但是最近以来，各地党部如江西安徽陕西福建云南等仍然不明了中央决议，而对国民党保持政治上的幻想，甚至仍然保留一部分同志于国民党内想借其名义以发展工农斗争。其实，国民党部既已纯粹成为豪绅资产阶级的工具，极残酷的屠杀工农共产党，则利用国民党名义以发展工农斗争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而恰恰是代表旧的机会主义的余毒。因此严重命令各级党部对国民党执行下列的工作：

一、命令同志一律退出国民党，并绝对实行反国民党的工作，如有对此犹疑的分子，即断然开除其党籍〔籍〕。

二、绝对退出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如有犹疑不退出的开除党籍〔籍〕。

三、对国民党军队和对一切反革命军队一样，须设法派遣同志进去充当兵士和下级军官，在绝对服从党的

命令和纪律之下，做破坏反革命军队的工作（遵照中央军事工作计划）。

四、经过党部的决议，得派遣一二个极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的工作。但必须限于有这两种作用才可派遣。

五、在每一个斗争和运动中，向群众提出反国民党的口号。并且告诉群众撕毁青天白日旗竖起镰刀斧头的红旗。根据国民党屠杀工农共产党勾结帝国主义的种种反革命事实，不断的向群众宣传国民党的罪恶和死刑。——在暴动的地域绝对禁止国民党的存在。

六、根据中央的策略和布报的文章在理论上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驳斥国民党一切反革命的决议和宣传。

七、对于国民党御用的黄色工会和假农会，须利用种种事实向工农群众宣传其罪恶，使群众退出，来组织自己的真正工会和农会。绝对不许幻想利用国民党工会和农会去做工农运动。

八、在群众的斗争和游行示威的运动中，须利用种种事实鼓动群众捣毁国民党的反动机关（如党部工会农会……等等），毆杀反动领袖，特别是在暴动的时候须毫不容情的去做。

九、在党的组织上，党员中如有国民党反动领袖的子侄和戚友，如党部认为工作有不便时，须令其退出党籍〔籍〕（十二月十日的长沙暴动事前被市党部反动分子

之儿子 C.Y. 同志向其父亲泄露了)。

中 央

十二月三十一日

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六期刊印

附 录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

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是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是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级〔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不会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党〕员群众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惊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将

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冲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弟兄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自省察！勿至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

汪精卫 陈独秀

十六年四月五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申报》刊印

注 释

- [1] 本文原题为《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在报上发表时所加按语为：“近来外间有种种谣言，挑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合作关系，企图破坏中国国民革命，故中国国民党领袖与中国共产党领袖，乃发表联合宣言，以释革命同志之疑。”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 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五月)

(一) 中国革命之意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认为，最近事变完全是证明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之观点，更明显的证明了列宁对于中国革命的国际作用之预言。

伟大的中国革命将更成为意义重大之动力，成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之全部组织及其最重要的国际的中心。

因此，社会民主党及黄色职工国际之政策，是淹没中国革命意义之政策，是蒙混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意义之政策，是毫无内容的口号，和平主义的半截行径之政策，直接为压迫中国革命的屠杀战争作辩护（陶姆士 phomas^[1]，麦克唐诺 Mac Donad^[2]之徒）——是帝国主义者的直接帮凶。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革命之重大的国际意义还要加大，正因为帝国主义要实行压迫中国民众之反革命的强盗战争，帝国主义军队已经集中中国（外国军舰，外国步兵，日本事实上霸占满洲，英美等国事实上占据各重要通商口岸等），他们这种政策与他们向苏联挑衅的政策同时并进的。

因此，社会民主党及黄色职工国际领袖对于中国革命之具体态度，——就是积极在思想上准备大战，用资产阶级的和平主

义掩饰其社会帝国主义——。

共产国际以为，一切政党及其他组织，凡自命为工人政党工人组织者，如不坚决反对干涉中国，仅仅鼓吹消极的态度，以麻醉工人阶级之注意力，则客观上（也有主观上的）是帮助帝国主义。这不仅是帮助帝国主义去绞杀中国工农，同时巩固帝国主义制度，而且是帮助帝国主义去准备压迫苏联的战争并普遍的准备新的世界大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用最积极的手段拥护中国革命，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反抗，以阻止军队军械之输送，最积极的与干涉中国奋斗，是一切支部的义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向无产阶级及劳动广大群众，解释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与作用，解释反革命的干涉中国与准备新战争间，特别是准备反苏联的战争间之关联，以及与帝国主义在本国内进攻工人阶级（英国的反工会法，法国的军事法，意大利的法西斯蒂恐怖等）之关系，这是一切支部的义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百折不屈的揭破社会民主党及黄色职工国际之勾当，揭破他们步步和帝国主义勾结，对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捣乱行径，这个工作也必须同时进行。

（二）民族革命运动的危机与中国的新形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中国革命中事变的进展，证实了共产国际最后（第七次）扩大会议之革命动力的估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尤其认定事变的经过，完全证实了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于资产阶级必然脱离民族革命联合战线转到反革命方面的诊案。

这个过程的表现是蒋介石及其他军事领袖的反革命政变，是右派离开国民党后组织南京政府，假借国民党组织，成立他

们自己反革命的组织。

蒋介石政变，暴发了中国一种普遍的新政局，产生了主要阶级力量之新离合。蒋介石所掀起的政变是各阶级重大的联合转变，因此共产国际的策略也要从这新形势中出发。

企图与蒋介石或国民党右派妥协之任何尝试，必会变成直接投降蒋介石，显然背叛中国革命的利益。

资产阶级与其军事领袖背叛革命之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工农群众运动之发展与中国共产党之胜利，他方面在于帝国主义联合压力之加大。民族资产阶级看见群众运动发展，看见那革命的阶级要求与口号，必然要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不愿革命继续进展——他也真这样做了。这样一来，民族资产阶级便离开了民族战线，跳到反革命的营垒去。革命虽有部分的失败，虽受了蒋贼之徒的叛变，但是走进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的联合分裂了，开始转变为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同时加大。

在中国革命的进展中，那已告终结的阶段的特征，在乎两个营垒对峙：一方面是外国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与买办阶级——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营垒，另一方面是民族革命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工人的营垒。这个阶段有由两营垒对峙变为三营垒鼎立之趋势，划去资产阶级，使之与无产阶级，手工业者，农民之“左派联合”相抗。

目前的局面，正以此三派鼎立为其特征。蒋介石屠杀工农，但仍反对北方军阀。

然而战斗的全般逻辑，仍将变三派为两派，为新式的两派，因为蒋介石白崇禧等所领导的大资产阶级必然日与封建反动的领

袖及外国帝国主义接近，以促成这个过程。

中国革命的危机与社会阶级力量目前的组合说明并证实，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农民革命属之，只有这样，才可说到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只有在反对已经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可完成。澈底的民族自由斗争不仅与发展工农群众运动或土地革命的要求毫无冲突，而且要直接以下层广大民众奋起推翻帝国主义之革命运动的扩大为前提。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在革命的过去阶段中，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完全是正确的。仅拿北伐战争来说，他遍处扩大了工农群众运动，工会，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以及中国共产党，已可为这个策略在历史上的辨〔辩〕护。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认为，主席团同时指令揭破蒋介石，取得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机关中战略上最重要的地位，以孤国民党右派之势，而集中视线于群众等，这样做的是对的。

同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主席团在蒋介石事变后所即刻发表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言内，对于蒋介石叛变所持的态度。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反复提明，蒋介石政变及其表见〔现〕的剧烈的阶级转合，是将来全盘策略之出发点，资产阶级既背叛了民族革命运动，成了反革命的积极势力，不能再与他统一，妥协或联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社会民主党及黄色职工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内部问题之路线，是直接由他们对于帝国主义在华政策的态度演出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口头上是赞成上海工人的，实际上，把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间划条鸿沟，反对中国工人的先锋——共产党人——，反对民族革命中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因此他们是赞成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联合的胜利的。正统社会民主党与黄色职工国际愈趋于拥护蒋介石之途，联合黄色“工人组织”，希图以反革命的工会代替革命的工会。国际少数主义诬蔑共产党人，不说他们分裂了中国革命运动（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这样说），便说他们拥护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不力（这种中伤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发出的），而实际上，他自己不仅成了帝国主义的盟友，而且是他那中国通信社人的把兄弟——南京那伙工人阶级刽子手的把兄弟。

（三）中国革命的部分失败 与反革命的主要力量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政变（上海，南京，广州等处），是中国革命的部分失败，相当的加强了反革命的联合。

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若说这个失败便决定了革命的全部命运，这是错误的见解。

这见解之所以不正确，仅举一端便可明了。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大敌，而置帝国主义势力与资产阶级间之关系不顾，且同时看轻了劳动群众伟大的无间的运动。要晓得帝国主义用尽手段向革命进攻，在民族革命战线中，一切动摇分子中间，布满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如果反革命的策源地不得国际帝国主义的保障，蒋介石的全副力量早被胜利的革命军打得粉碎。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一切支部的必要任务，是向工人阶级及农民说明事实的本相，要知帝国主义的军队事实上占据

了全中国的工业区域，正是中国反革命的主要力量。

那比较弱小的中国资产阶级，若不直接间接受外国武装干涉者的拥护，必不会成中国革命之大患。外国武装干涉者集中战斗力，封锁海港，困围革命的中心，接济反革命的军队，离间破坏革命的武力，用尽外交上的压迫手腕。在革命政府下资产阶级的阴谋破坏势力，驱策外国和土著资产阶级组织生产上商业上金融上种种怠工封锁的政策。

至于帝国主义之狂暴猖獗，以扑杀工人，扑杀共产党，压迫农民运动，孤困苏联，尤须特别提明。

但是革命虽有部分的失败，而另一方面，过渡于更高阶段的发展，更有力的动员群众之发轫，农民运动之扩大，暴动武装队之组织，此项与日俱增的组织武力屡次战胜了叛军，虽然反革命的恐怖猖獗万分，而工人阶级的组织继续保存，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之增大无已，——凡此种种，都是中国革命继长增高之主要征象。

武汉国民政府及左派国民党，就其主要的趋势看来，是城乡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联合之表现。虽然某个军官某派军官以及国民党“左派”某个政治领袖某派政治领袖有继续叛变之可能——而且必然不可免——，但是阶级斗争的进展，必将调动群众；此群众运动正是将来胜利之担保。

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取消派意见根本错误，这派意见竟以为中国革命目前的危机是胜负已决的失败，必然造成一种国际的局面。这种显然错误的意见，只会成为破坏无产阶级队伍的工具；在这共产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特别必要的现在，这种破坏组织尤其危险。

(四) 组织工农群众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中国革命中艰巨的困难，尤其是因帝国主义联合势力的武装干涉或他种干涉，以及中国国内动摇的社会成分叛卖革命投降敌方所生的困难，造成了目前斗争的条件；为战胜这种困难计，必须广大劳动群众加入斗争始可。只有这些群众参加积极斗争，才能造成一种政权，打退内部的反革命及帝国主义的干涉，消灭封建制度的残余，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造成中国革命程度〔转变〕到社会主义发展的轨道上之先决条件。

要想引导群众加入斗争，只有在乡村实现土地革命，在城市满足工人的政治和经济要求，才有可能。毅然取消缴纳富豪之佃租，重新分配土地，没收大地主官僚寺院等等之一切田产，禁止商〔高〕利契约，取消贫农受重利盘剥之债务，大减赋税，课税摊派于富豪之家等等——这些口号必须在全国，特别在武汉政府统制区域内实现出来；必须拿这些口号推动群众，使之反对叛卖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北方军阀。

农民革命（没收土地和国有土地包括在内），这是中国革命中新阶段之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使千百万农民从下面以“平民式”的直接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共产党站在前线，指导这个运动，在目前最为重要。同时共产党必须在政府内努力，使政府促进土地革命之暴发扩大。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在目前发展的阶级〔段〕中成为实际上工农革命的组织政治中心，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权独裁的机关。另一方面，只有在这种从上面和下面协同实现土地革命的政治之原则上，才能在坚固的革命的基础上，造成真正可靠的武力，改编一切旧有的军队。

在城市中，必须设法提高工人群众的物质生活，改善工人在工厂内在社会上的法律地位，其铃〔籍〕制工人成为毫无权利的“等级”之一切法律，须一律废止，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承认工人组织之权利等等。

同时必须迅速，大胆，果决的实施武装工农群众之政策。最先武装那已经有组织的觉悟的部分。此政策务须以全力使之实现。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尽力量，直接的，间接的，以及联同国民党左派，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在工人中极力发展党员，在城乡劳动群众中极力为国民党发展党员，必须使国民党以最大的速度成为最广大的组织——这是目前中国共产党之主要任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促中国共产党极力注意一切工农群众组织须各方面的加强与扩大之必要，如职工会，罢工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工人自卫团等，以及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乡村工人组织，农民自卫军，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组织，小手工业工人，家庭工业工人组织等等。在这一切组织中，必须宣传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工人阶级之强大的群众组织。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的否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之任务可以和民族革命之任务相互对峙。他以为，象那欧洲极左派和社会民主党抬〔提〕出的这种对峙说法，没有别的作用，只有使无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放弃领导权，名义上是为保护那所谓“无产阶级的”行会精神，其实这种行会精神，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的变相，因此，这不过是使无产阶级成为民主派的附属品而已。资产阶级退出革命转入反革命的营垒以后，无产

阶级却逐渐成为整个民族革命运动中可公认的领导者。只有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可完成的中国革命，如不提高工人阶级的作用，不使之成为整个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则必不能继续发展与最后胜利。

(五) 共产党与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要想把他肩上的任务完成，只有保有自己工人阶级先锋的政治面目，和那最急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面目划分清楚才行。

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共产党不许融解于别个政治组织之内，他必须成为独立的力量，他是一特殊阶级的组织，是无产阶级的组织，是全国最澈底最革命的阶级的组织。因此，共产党在宣传自己的政见时，在自己的旗帜下动员群众时，不能为外力所阻，对于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不定，尤不能放弃批评的权利，恰恰相反，须知只有这种批评，才可推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向左，才可在革命斗争中，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不过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不可解作是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尤其是与农民断绝关系。从这点出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坚决的反对那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反对那根本上必然弄到退出国民党的态度。目前提出“即刻勿须退出国民党”，与提出“退出国民党”两个口号，一般荒唐，因为在目前的瞬间，无产阶级的政党恰要在国民党内，确定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固有的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合作的党。在目前的情形下，共产党——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在国民党内取得领导作用，则无产阶级便不能在全国取得领导

作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如果看轻国民党这个革命运动的特殊组织形式，实际上便是助成右派攫得国民党的旗帜，正因为国民党的旗帜是国内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因子，所以蒋介石引着资产阶级的领袖们，千方百计，要打起国民党的大旗前进。共产党的策略，万不可为蒋介石的机变作保障（退出国民党路线，便不能免这种结果），而要揭破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是民族革命的叛贼，是国民党的叛贼，是中山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叛贼，是投奔帝国主义者的降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说民族（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已经“告终”，另一革命即工农阶级革命已经“开始”，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在蒋介石政变之后，便是广大的群众也明了了民族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继续进展。正因为这样，所以不能把国民党的旗帜，不能把民族自由斗争的旗帜让给民族自由斗争的叛贼。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既要大胆的坚决的扩大群众运动，也必要一般大胆的坚决的努力变国民党为真正的群众组织，使他包纳城乡劳动民众才行。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为完成其自身任务，须使其组织形式能相当适应。赶快改组，尽量接近群众，实为必要；其次，要在工农手工业者中间大征党员，容纳工农兵士手工业者之整个组织入党（工会，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手工业者行会，军队组织，农民游击队如“红枪会”等，惟须肃清其反革命分子，以及工人自卫团等等）；国民党的地方及中央指导机关励行选举等。

只有把定这个坚决的路线：国民党发展为真正广大的，群

众的，革命民主的组织，指导机关真正是由选举产生——才能为中国民主革命之巩固与胜利的发展，造下先决条件。

只有把定这个路线，才能为防止那国民党左派某个动摇部分之可能的而且必然的退伍(如广州的事实)，为防止那某个动摇军官及其他军事领袖之叛变，造成制裁手段。应时的揭破一切勾结蒋介石或帝国主义之动摇趋向，并在宣传煽动上采用具体办法，或竟用组织上的制裁手段，这是共产党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除维持且扩大自己党组织外，尤须极力影响国民党的行动。要想实现这种任务，必须先完全了解自己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澈底把定自己思想的政治的路线，加强巩固自己的组织，使工人同志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在工农群众中加强党的影响和党的威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在中国共产党中，恰恰对于这点有无数动摇存在；党在批评国民党的领导时，不能常常表现充分的坚决，而且在党内对于发展群众运动表现相当的畏怯，尤其是在农民运动中，关于没收土地，驱逐豪绅地主等问题上，可以看出。这些动摇，在目前阶级〔段〕中特别有害于革命，在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内同志，并非人人都能充分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路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大规模的说明中国共产党同志内上述的错误和动摇，是必要的；不然，则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中，相当的动摇之危险便加高了。

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工人阶级的政党站在农民的土地革命运动之前端，要最无情的和遏制此运动高涨之一切企图奋斗。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确信，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发展极速，已经做下了革命的英勇的模范，必能很快的改正这些错误，须知这些错误是由事变的异常复杂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幼

稚中发生的。

（六）武汉政府，政权问题，军队 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看轻武汉政府的意义，因此实际上否认他极伟大的革命作用，这种见解是错误的。武汉政府及国民党左派领袖，就其阶级成分而言，不仅代表工农及手工业者，亦代表一部中产阶级。所以国民党左派的武汉政府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但他已经走到工农专政的路上；在阶级斗争中，如果无产阶级获得胜利，赶去了那些跟着资产阶级跑的人们，战胜了无数叛变之后，则武汉政府便必然发展到这个专政的方向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武汉“临时革命政府”的活动，是必要的。那个不主张参加，或对于此问题抱一种不定的怀疑的态度，他形式上很是“激进革命”，但在实际上是重演一九〇五年俄国少数党的错误；俄国少数党^[3]那时以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不可能的，宁愿组织“极端左派的在野党”，但是实际上跟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背后，摇尾乞怜。

少数党的态度的特点，正因为他反对参加革命的政府，而参加反革命的混合政府。

参加武汉革命政府与欧洲资产阶级社会党的混合政府，并无丝毫相同之处，因为武汉政府的确用革命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者，反对封建制度，现在更反对本国资产阶级之大部。

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共产党必须积极参加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同时，对于自己最亲密的盟友之不十分坚

决，也要加以批评，并确定政府的政策之正确路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促中国党特别注意，革命政府与民众间的亲密联合，在目前实在是空前的必要。只有靠着这种亲密的联合——这种联合是特别要国民帮助才能做到的——，只有坚决的打条走向群众的路线，才能永久加强革命政府的威信和地位，使政府成为革命的组织中心。

为武汉政府划定这条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实现此项任务，不扩大群众运动，没有农民革命，不坚决改善工人阶级地位，不变国民党成为劳动群众的真正的伟大的组织，不继续加强职工会，扩大共产党，不造成武汉政府与群众间之最密切的联络，则胜利的完成革命是不可得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共产党人参加政府，仅仅可用这项策略辩护。不是这样，则参加政府将成为领袖结合政客勾结的戏剧，受了实际生活的冲刷，受了伟大的阶级斗争之进展，必至烟消云散。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桩任务，便要把政府中的活动和群众中的活动联结一起。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在目前的条件下，扩大国民党内民主化，收容最广大的群众，迅速发展各种工农的群众组织，最合革命的需要。中国发展中的特点，象革命的国民党这样特殊的组织，可以直接决定政府的成分，是绝不可忽略过去的。用国民党收容广大民众，使群众选举国民党的指导机关，经过这些在选举制的基础上建设的组织，成立民族革命政府——这是劳动群众和革命的国家政权间联合的特殊形式，此形式适合中国革命的目前阶段。因为武汉政府统治下各省状况之不同，则地方政权的组织，在最初时期，必然采取种种色色的形式（在乡村间，“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政权，以及国民党委员会

政权等等)。共产党人在组织地方政权时的主要任务，便是领导广大劳动群众，领导千百万工农参加组织，组织成后，参加工作。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在目前提出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是不适宜的；这个口号没有别的意思，（在武汉政府统治区域内）只可作为布告苏维埃政权解释。

在中国革命进展目前的阶段中，即刻成立工农兵苏维埃，必然被认为是两个政府，是推翻武汉政府的路线，是越过国民党这个群众的组织及国家的政权，直接拿苏维埃政权作为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但在革命的继续发展，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已经开始，则成立工农兵代表委员会即成必要，这时，成立苏维埃的口号便成了党的中心口号。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更以为，改编军队的问题，编制绝对委身于革命的队伍，军队与工农组织间之联络，建立军队中干部，改编佣兵为革命之常备军……在目前特别需要。至于武装革命的工农，编成绝对可靠的队伍，在军队内确立共产党及坚确不拔的国民党左派之影响，肃清军队中反革命分子，组织工团军，尤须特别注意。

（七）目前中国革命政策之 几个策略的根本问题

中国共产党站在极端复杂的任务前面。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的斗争与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之并进，帝国主义大批军队之驻华，实际上中国之分裂为三部，经济状况及政治状况之综错万分，帝国主义之统一战线与此统一战线内之冲突，中国各

部革命成熟程度之极端参差，革命之特殊的“军事”形式，以及国民党左派内及军队内部之种种矛盾……凡此种种，都使革命在进展中，发生无数非常的困难。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武汉政府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纵衡排〔横〕的策略，根本上是完全可用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反对那借口“国家政权既是非无产阶级的性质，根本上便不能用纵衡排〔横〕的‘布列斯特’策略”的意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这项意见是建筑在疏忽的理论和政治的错误上面。

在无产阶级革命日形成成熟的条件下，如果无产阶级的政党站在革命的对派，与政府对峙，他照例是反对战争的，是赞成推翻现政府的，是绝不救济现政府的困难的。

在中国目下现有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是赞成武汉政府所进行的战争的；他既参加武汉政府，则他对于武汉政府所行的政策，是负责的；他是要尽量救济武汉政府的困难的。所以，共产党不能“根本上”反对纵衡〔横〕的策略。负责武汉政府政策的共产党，如果永远而且在一切条件下，反对妥协的策略，这就是说，共产党要无条件的同时向各方作战，这明是大愚特愚。

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这个问题必须最具体的，拿各种具体条件去解决；这些具体条件不能够事前看到，因为交战各种势力的比例不能事前精确看到，不能绝对精确估计的原故。

这纵衡〔横〕策略的可用性也必须适用于政府的经济政策。政府绝不能无条件的即刻没收一切外国企业。在这里，妥协也是基本上可以应用的。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民族及外国资产阶级在各种企业内（工业，商业，银行业）怠工破坏，产生失业，希图制造经济之紊乱与破产，政府便须没收，国有这些企业。民族革命政府不能姑息革命的敌人任意破坏经济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采用严厉手段，改用自己的机关和无产阶级组织的帮助，经营此项企业。

何时应该妥协，何时必须转守为攻，这要就具体条件决定。共产国际特别以为，有些同志在蒋介石上海政变时建议实行暴动的策略，十分谬误。这项策略的究竟，非以暴动进攻帝国主义及蒋介石作先发制人之计，便须广布阵线，用武装力量和他们斗争。须知暴动的策略乃是暴动既发，便要采取攻势。所以有了相当胜利的希望存在，才可着手暴动。暴动是“玩”不得的。“无论如何都要暴动”的策略，不是列宁主义的策略。假使上海工人发起了广大的武装行动，则必被蒋介石帝国主义联合武力扑灭，中国无产阶级的鲜血，在一个毫无胜利之望的战争中，便会平白洒尽。

在中国目前一般形势看来，共产党须采用如下之军事政治的战略：共产党拥护向北发展之军事计划，而同时无条件的加深武汉政府统治全区内之农民革命，极力破坏蒋介石之后方与军队，以图扑灭此贼，这自然不是说在适当时机也不该以直接军事行动进攻蒋介石。须知“向着群众”之足以克敌，在内战中亦然。加以政策正确，革命之胜利，是靠得住的。

共产党必须尽力从各方面加强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战线。除以全力扩大农民革命外，尤宜同时保障小资产阶级劳动财产不受侵犯，并助其反抗高利资本等等之斗争。除这样去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的真正革命势力之联合，并以全力团结这些阶级力量在

武汉政府管区内组成强有力之组织外，在反革命的区域内，共产党也必须站在群众运动的前端。

自党组织到农民协会，建设强大之秘密组织，组织且领导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准备群众行动，以及兵士中的工作，这些统是党的最重要的任务。

(八) 共产国际之各国支部与中国革命

从中国革命之一般意义作用出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

一、国际大部分支部未曾充分了解这个意义，在拥护中国革命的工作内，表现积极之缺乏；

二、参加“反帝国主义同盟”之共产党人同样表现积极之缺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加速纠正此项错误，极为重要，因此建议于各支部，种种方案宜在下列各项严厉执行：

甲、报纸上的煽动和宣传；

乙、职工会内及其他工人群众组织内之工作；

丙、在各国殖民地内及依附其宗主国之各国内的工作；

丁、预备派往中国之军队内的工作。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促各党部注意，必须加十分严重的准备，不仅口头上，要实际上阻止军队军械运往中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令各支部担起这项任务，在帝国主义军队中最积极的活动，并宣传这些军队直接转到中国民众革命军队方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令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制成上项之各种具体方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支部以弟兄的敬礼，誓以全力拥

护他伟大的革命斗争。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
《中国问题决议案》刊印

注 释

- [1] 陶姆士，英文名应为 Thomas, James Henry, 今译托马斯，詹姆士·亨利。英国工党内阁的大臣。
- [2] 麦克唐纳，英文名应为 James Ramsay MacDonald, 今译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英国工党领导人之一。
- [3] 指孟什维克。

全国农民协会之重要训令

——农运新规划五项

(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 (1)

为令遵事，前此蒋夏诸逆，相继叛变，均以反对农工运动为旗帜，最近许克祥在长沙谋乱，亦以农工运动过火为号召。此虽反革命派一贯之口号，而非农工运动本身真有所谓过火与否之问题；但一方面因革命潮流飞涨，初期农民运动之原始现象，未能完全免除；他方面上级机关之指导能力，不能与需要相适应，确为不可否认之事实。中国农民运动，已进到一个新时期，必须采取新政策，始能适应新环境，已由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中明白指出，现为使此新时期之新政策，更能顺利执行起见，再指出下列五事，务望各省农民协会，立转各级农民协会切实遵照办理：

(一) 注意强固组织严重〔肃〕纪律 各级农民协会，过去因为发展甚速，难免不有土豪劣绅等不良分子乘机混入，以遂其破坏农民运动之企图。他们每每假借农民协会名义，作出种种妨害大多数农民利益及农民协会名誉之事实。现欲改正此种不良事件，必须多数农民积极参加各级农民协会；各乡区农民协会，更当尽可能的随时召集代表大会，审查过去工作，监督会员行动。如有不良分子发现，必须立即执行革命纪律，予以严厉制裁！并为执行新政策起见，各级农民协会，应即日召集代表大会，增选新职员，增加新的指导工作人员。同时使耕田的贫农佃农雇农及自耕农，成为农民协会之坚固的社会基础。

(二) 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 农村中的小商人为流通金融

之主要分子，并为〔与〕农民同立于被压迫的地位，农民协会应即领导农民，与之建立亲切的革命联盟。煮酒熬糖，以及其他商业品，虽为商人之利益，同时亦与农村经济有关，农民协会必须予以护保〔保护〕。农村谷米，在乡村自治机关未成立时，应由农协计算农村需要，使有余的谷米尽量流通，使小地主及富农不致感受不便，而军米亦得充分的供给。农村中之其他重要出产品，亦宜与城市商业，发生良好的经常关系，使中小商人之贸易，得以无障碍地发展。以前有些地方，因为抽捐派款及其他原因，遂使城市商业与农村之关系，日益恶化。今后对于此种情形，亟宜纠正；并当有组织的扶助商业之发展，以妨〔防〕奸商过度之剥削。对于革命军人之家属及财产，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已明令各级农民协会指导农民，予以切实保护。此项工作，目前尤须与慰劳救护革命军人之运动，一致加紧进行。

（三）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 乡间禁酒席，禁斋果香烛，反对一切迷信及宗法社会之旧习，改良乡间妇女之地位等运动，因为打破封建社会恶习之必要的行为，但必经过长期间的宣传，使一般民众，俱能了解，社会文化亦已提高，方可行之而无碍。倘必操切从事，则不惟得不到良好效果，反使反动分子利用落后思想，造谣煽惑，向进步的农民运动进攻，以破坏乡村的革命联盟。

（四）开始乡村建设事业 乡村自治机关之建立，为镇压反动封建势力，巩固农民已得胜利，消灭乡村无政府状态，而使农民运动适应于革命新环境之重要工作。已由本会呈请国民政府早日颁布乡村自治条例，各级农民协会，应即联络乡村革命平民，努力进行，务于最短期间，使乡村自治机关，完全建立起来。农民银行，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及其他建设事业，各级农民协

会，亦应与其他革命平民，共事建设。

(五) 加紧宣传工作 农民运动一有相当发展，土豪劣绅等反动封建势力，除一面集中力量残杀农民外，一面复收买走狗，捏词诬陷，造谣煽惑。贫苦农民，初得相当自由，对于组织农民协会，既无经验，幼稚行动，万难全免。土豪劣绅更复小题大做，以耸听闻，夏逆叛变以后，其行动尤为猖獗。各级农民协会，过去对于宣传工作，非常懈怠，土豪劣绅颠倒是非淆乱黑白之宣传，遂得以充满于乡村及城市，甚至革命同志，亦受其影响而怀疑农民运动。以后各级农民协会，不但要切实将贫苦农民受土豪劣绅压迫摧残之事实，充分呈露于革命同志革命民众之前，用以解除土豪劣绅进攻农民最大之武器，并须真实将农运详细情形，尽量发表出来，使上级农协得以随时指导其工作，纠正其错误。对于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更须作一度很普遍的宣传，使一般农民俱能澈底明了，农民运动的新方向，而积极按照本会所示途径，努力工作。

凡此五端，均为巩固革命联盟，促进国民革命之要务，各省农民协会必须领导各级农民协会，切实遵行。倘有奉行不力或阳奉阴违者，本会必当绳以革命纪律，立予改组！其有反动派假借农协名义，滋生事端，或捏词诬陷者，各级农民协会亦须报告上级农民协会，转请政府，立予扑灭，毋〔毋〕使滋蔓！是为至要，切切此令。

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务委员
谭延闿 谭平山 邓演达 毛泽东
陆 沉〔2〕

根据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一日出版的
《农民运动》第二十七期刊印

注 释

- [1] 原件未标明时间。《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六月八日)登载本文时所加按语说，训令由全国农协“昨日发出”。据此判定，本文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按语全文如下：“中国革命已进展至□新阶段，全国农民协会，为使农民运动适应此新阶段，曾训令湘鄂赣三省农民协会，切实执行新策略。该会为使此项新策略，更能顺利执行起见，更于昨日发出临字第□号训令，训令各省农民协会，强固组织严肃纪律；保护革命同盟者之利益；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开始乡村建设事业；加紧宣传工作。并谓倘有阳奉阴违或执行不力者，必绳以革命纪律，立予改组！其有反动派借名滋事或捏辞诬害者，亦须立予扑灭，毋使滋蔓！自此以后，中国农运必能在该会指导之下，获得伟大的发展。”
- [2] 原件无下款，此是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加的。

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

——反抗土豪劣绅之武装袭击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

为令遵事，农民运动过去因为发展甚速，组织上未能健全。加以土豪劣绅猛力反攻，遂使乡村斗争日趋急剧，上级机关之指导偶有不周，即不免发生无组织之行动。已经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及第二号训令明令各级农民协会，极力纠正。务使各地农民，俱在农民协会指挥之下，有组织有计画的继续与一切土豪劣绅反动封建势力斗争，以尽我农民在革命过程中推翻帝国主义剥削中国乡村的经济基础及军阀统治的政治基础之职责。并指出各地农民目前的斗争目标，应为建立乡村自治而奋斗。现据各方报告，在湘鄂赣三省中，土豪劣绅进攻农民，非常猛烈。在江西六月五日当局遣散党务政治工作人员后，各地土豪劣绅，纷纷乘机蠢动，吉水劣绅则勾结流氓，进攻农民协会，下乡捉人；南昌一区，劣绅则拘捕执行委员；新建土豪劣绅则逮捕农协会会员，牵去农民耕牛；铜鼓革命团体，均被捣毁；弋阳反动军队，更大行残杀农协职员；泰和四区农协，不但为反动派所捣毁，并被捕去职〔执〕委二人。在湖南五月二〔十一〕号事变〔日〕，许克祥即屠杀省农协，省工会，工人运动讲习所，党校等处同志及农民

工友共三十余人。事变以后，更派兵袭击湘潭常德各县民众，而农民死伤枕藉者，将及万人，并将湘潭总工会委员长斩决而以脚踢其头，并用洋油注其腹内而焚之；旁观民众，莫不愤怒万状。在湖北尤为凶猛，湖北各县土豪劣绅不但勾结土匪及会党的腐败领袖，惨杀农民，如新阳〔阳新〕土豪劣绅用洋油烧死农民九人；沔阳土劣勾结硬肚会惨杀农民五十余人；天门土劣勾结土匪惨杀农友二十余人；钟祥土豪劣绅勾结硬肚会惨杀农友十余人；汉川土豪劣绅勾结流氓杀伤农友十余人；麻城土豪劣绅勾结红枪会黑枪会白枪会残杀农友百余人，烧毁民房数十村皆是。他们更利用反动军队力量，以图根本扑灭农运，因以动摇革命根据地。夏逆〔杨〕许张于〔印〕诸逆相继叛变，每到一处，即将在押土豪劣绅释放，使之率领逆军到处屠杀。嘉鱼杀死农民卅余人，咸宁武昌均杀五十余人；天门烧农民房屋三百余间，杀二十余人；公安烙死数十人；枣阳残杀五百余人；沔阳残杀二十余人；宜都残杀数十人；麻城〔沿〕乡捕杀，烧毁房屋，奸淫妇女，共杀死五百余人；随县前后杀死一千人以上；罗田惨杀六十余人；黄安惨杀一百余人；钟祥劣绅王恕堂更占领县城，挨户搜索，惨杀二百余人。其他夏口，黄冈，应山，应城，圻〔蕲〕春，江陵等县的豪绅，亦莫不闻风兴起向农民进攻。挖眼拔舌，剖肠斩首，刀割沙磨，洋油焚烧，红铁火烙，均为豪绅对待革命农民的残酷刑罚。对待妇女，则以绳穿贯其乳而驱其裸体游行，或零碎割死。农民之死难者，已达四五千，而荆门松滋〔滋〕宜昌等县，仍在继续屠杀中，即国民政府首都武汉，仅距汉阳县城十余里之地，亦不免发生土豪劣绅围杀农民之事实，湖北全省完全为白色恐怖所笼罩。总计湘鄂赣三省党贫农民工人之牺牲者，不下一万数千人。其挑拨革命军人与农民感情之毒计，亦正积极进行，往往捏造事实，指鹿为马，

故甚其辞，希冀军人向民众团体发生剧烈之冲突，离间军民感情，分裂联合战线，破坏三大政策，予以推翻党国，虽人民痛苦，亡国灭种，亦所不惜。同时贪官污吏起而与土豪劣绅，互相响应，共同捏辞诬蔑农民，以图离间政府与人民之关系，如黄冈农民协会本无铲挖烟苗事项，而贪官污吏，竟蒙呈中央予以解散即其著例。现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因已明悉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买办洋奴以及一切反动派，乘我军北伐与奉军战斗剧烈之际，向我国民政府联合进攻之毒计，而训令全体武装同志，对于指鹿为马，过甚其辞之传言，谨〈慎〉调查毋堕反动派之阴谋。然日来各城〔地〕土豪劣绅勾结土匪溃军屠杀农民事实仍有愈演愈烈之势，贪官污吏离间政府与人民之阴谋，亦复屡出不穷。各机关近来接得诬控农民之状纸，每日不下数起。在此种严重情形之下，各级农民协会极应一致请求国民政府：（一）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并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后方之反动派，使工会农会共产党等革命组织，享有完全自由，团结革命势力，实〈行〉讨伐蒋介石。（二）肃清湖北各县勾结逆军土匪屠杀农民工人之土豪劣绅，严惩造谣离间的蒋介石奸细及一切反动分子以巩固武汉。（三）明令惩办许克祥仇鳌彭国钧萧翼鲲，解敌〔散〕其救党委员会清党委员会等反动机关，恢复湖南省政府省党部省工会省农协及〈一〉切被摧残之革命团体，接受湖南请愿代表团之请愿，并令湖南省政府唐主席从速镇压湖南之反革命派。（四）明令制止江西驱逐共产党及工农领袖之行动，并严惩屠杀民众之反动派。农民协会之本身，尤应更加努力，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以反抗土豪劣绅武装袭击，而镇压一切反动封建势力之挑拨离间。因为土豪劣绅之火焰不灭，则创设乡村自治建立民主政权，终属不可能之事，经济上之建设，更

无从可以实现，而国民政府之基础，亦末由巩固也，此令。

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谭延闿 谭平山 邓演达 毛泽东 陆 沉

六月十三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

十七日《汉口民国日报》刊印

注 释

〔1〕夏斗寅、杨森、许克祥、张联升、于学忠。

湖北全省总工会解散纠察队布告

(载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汉口民国日报》)

为布告事：现在武汉反动派，企图挑拨工兵之感情，制造种种谣言，中伤本会纠察队，以致飞短流长，淆乱外间闻听，影响工兵联合战线。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并经交存政府，一面仍请政府派兵保护工会。深恐外间不明真相，致滋疑窦，为此布告，仰各界人等一体知照。此布。

根据《汉口民国日报》刊印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

(一九二七年七月)

中国工农的斗争，乃是共产国际第一线阵地上的斗争。中国革命，仍继续为共产国际底注意中心。

在注意到下列各点时：

一、中国事件底疾速的展开速度，使该国的政治局面和社会阶级力量之相互关系，不断发生变化；

二、中国革命，因军阀和雇佣部队之叛变，因反革命力量之结合，因最近一时期所受的一连串的局部的失败，而遭受了特殊的困难；

三、最后在注意到最近中国共产党领导所犯的一连串的最严重的错误时，——

共产国际认为必须以如下的决定（为了发挥共产国际执委随时所发出的指示而采取的），诉于全体同志、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一切分部之前：

（一）共产党人正确策略底最重要和最必需的先决条件，乃是对革命局势当前阶段之一切特质加以最严格的冷静的马列主义的估计，对革命所经过的阶段加以正确的规定。只有了解了当前时局之特质，才能正确地规定斗争着的共产党之特殊任务，才能提出合于实际生活的革命的口号，才能确定无产阶级先锋队之正确策略。需要十分明确和十分具体地规定中国革命现时阶段

的内容，并且为了这一点，需要批判地认识革命过程底全部进程。

(二) 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曾把中国革命的性质规定为资产阶级民主的——在发展的现阶段上——而同时其锋芒又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共产国际执委曾指出，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长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之趋势。七次扩大会议在规定中国各种斗争的社会力量之位置和比重时，同时曾指出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分化之势必加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之势必日益分解，并首先预先预言了大资产阶级之势必退出革命。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这一点出发，曾作了指示，叫准备工农去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武装力量。这是在蒋介石叛变前几个月的事。以后的事件（本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屠杀上海工人达到了其流血的顶点）证实了共产国际底这种预测：各阶级发生了根本的变动，资产阶级叛变革命而投到敌人的阵营里去了；革命遭受了局部的失败，而推移到新的更高的阶段了。

(三) 本年五月所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曾又作了详细的决议案。这次全体会议已将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当作既成事实为出发的。这次全体会议，曾规定了蒋介石叛变以后所造成的局势之具体特点，并对中国共产党确定了相适应的处理路线。这次全会的总指示曾是：面向群众，竭力解开土地革命，武装工人和贫农，扫清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道路，坚决使国民党民主化。这次全体会议曾明确而毫不含糊地描出了独立的共产党方面跟国民党左派在武汉政府内可能进行共同工作的那些必要条件。这次全体会议认为，当前局势之微妙地方，乃是三个阵营（一是封建军阀张作霖的阵营，二是还在与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作斗争但已屠杀工农的蒋介石的阵营，三是武汉的革命的阵营）之存在。共产国际执委在其决定中，曾

谓强调军阀与某些军事部队的不可靠，乃是非常重要的，与此相联系，并认为“改组军队，创立绝对可靠的革命部队，与工农组织保持联系，保证军队中的干部人员，将雇佣军队改变为革命的正规军队等等问题，特别尖锐地提出来了”。

共产国际根据这些决定的精神，随时给中国同志作了指示。

（四）最近几个礼拜来，事件更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共产国际认为这些事件中主要而特殊的有以下各点：

阶级的矛盾更加而且非常显著的尖锐化了。中国无产阶级之群众运动，已经广泛地展开了。群众的土地农民运动也广泛地展开了。对于该国一切毫无例外的政治集团，都露骨地提出了对于土地革命态度的问题。军阀和军队官佐都公开地投入反革命的阵营，而宣布自己为农民的敌人了。长沙叛变了将领，大肆屠杀农民，不论武汉国民政府，也不论国民党底上层领导者，对此种叛变都没有予以制止。冯玉祥也叛变革命了，他与蒋介石勾结在一起（徐州会见），要求武汉政府投降。武汉总司令唐生智，也在屠杀工农，残杀共产党员，把他们逐出军队。反革命的军阀，从蒋介石起到唐生智止，正在携手言欢。同时，武汉底统治分子，掩饰反革命军阀底行动，帮助他们，解除工人的武装，搜查无产阶级的组织，制止土地革命，进行反对共产党员的斗争。而国民党底上层领导者，也赶急准备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开除出去。这样，武汉已成了反革命的力量了。

事件的发展就是这样的。中国斗争的当前时局的基本特色与特质，就是这样的。不过这种特殊的环境，在关于政权、关于对武汉政府态度、关于合作、关于以后斗争方针等问题上，却给中国同志们指出了相适应的策略方向。

（五）共产国际依靠着列宁的学说，过去曾经认为而且现在

也认为，在一定的阶段上，在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斗争的范围以内，与它的联盟和联合，是正常的，是完全允许的和必要的。在革命进程底一定阶段上，援助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或其军阀、买办势力之军事行动，“也是可允许的，而且甚至必需的，因为这种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对革命事业有益的。

从列宁主义的这个观点看来，（把中国革命）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比，那是应加以驳斥的，而且已经驳斥倒了；在俄国，布尔塞维主义抛弃了与反革命的自由主义之一切和任何妥协，那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与资产阶级各集团的联盟及对其军事力量予一援助，只有在此举不妨害中国共产党底独立工作的范围以内，只有在自由主义资产阶级还没有出面反对工人和农民，只有在资产阶级还能够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历史任务以前，才能许可的。当北伐解放了群众的革命运动的时候，援助北伐，那是完全正确的。当武汉还在反对蒋介石的南京的时候，援助武汉，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种联盟的策略，自从武汉政府投降革命底敌人的那一刹那起，就根本变成谬误的了。那在革命底前一个阶段上所适用的，现在已经绝对不适用了。

自然，党的领导底一定的困难，也正是在这里，对于象中国共产党这样年青而无经验的党之领导，尤其如此。加以事件之自发的、不可制止的突飞发展，在时间上缩短了斗争的阶段，使过程迅速地转移，并减少了所采取的某一策略方针还可适用的时期，因之，上述的困难，更形增加了。在紧张的革命局势之环境下，必须要高度迅速地抓紧时机之特点；必须要善于临机应变；必须要迅速地、适时地更换口号；必须要随时改编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队伍；必须要对已经改变了的局势，作强有力的反应；当联盟由革命斗争之因素变成它的桎梏的时候，必须要断然

地撕破这种联盟。

(六) 如果在革命发展底一定阶段上，中国共产党方面援助武汉政府曾经是需要的，那末现在援助武汉政府的方针，对中国共产党便是自取死亡，要把它投到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的。不顾共产国际底劝告，国民党底上层领导者，在事实上不仅没有援助土地革命，而且放纵了土地革命底敌人。他们批准了解除工人的武装、征剿农民、以及唐生智之流的弹压政策。他们在种种借口之下，把讨伐南京延期，而且实行怠工。武汉政府底革命作用已经完结了，现在它变成了反革命的力量了。武汉急进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可能还敢作出“急进的”、假革命的“英勇姿态”，如宣布讨伐南京之类（如果解除了工人的武装，压迫土地革命，那末，这种讨伐底革命意义，就等于零了）。不过这种装模作样并没有改变事情底社会阶级的本质。武汉已成为反革命之帮凶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底领导核心和中国全体同志所应当十二分明确地考虑到的新的和特殊的东西。

(七) 中国共产党底现今的领导机关，近来曾犯了一连串的重大的政治错误。中国共产党应当依照共产国际底指示，展开和领导土地革命，公开地批评和揭穿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底“急进”的领导者之不澈底的和怯懦的立场，警告群众预防军阀方面叛变的可能，武装大量的工人，十二分坚决地推动国民党和武汉政府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没有执行这些指示。中央不是领导土地革命，而在许多场合之下，作了制止土地革命底因素。党的个别领导者，提出了显系机会主义的口号：“只有在革命扩大以后(?)，再加深革命”，或如“先占领北平，然后再进行土地革命”，这些口号，曾被党的代表大会所推翻了，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代表大会表现了党的

群众的情绪。中国共产党大批党员群众在社会下层人民中间——在农民、工人、城市贫民中间，曾经进行了自我牺牲的真正革命的斗争，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所进行的却是逼迫群众后退的路线。共产国际执委底革命指示，却被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所拒绝了。而且甚至达到这种地步，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竟然“同意了”解除工人的武装！不顾武汉政府头子们底显然反革命的行为，谭平山毫无勇气公开宣布退出国民政府，而代以毫无原则的和怯懦的“请假”。共产国际在秘密的指示中，一再最严厉地批评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共产国际曾经警告，如果中国共产党中央不纠正自己的错误，那末，它就要公开地批评它了。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拒绝了共产国际底指示，共产国际执委认为，公开号召中国共产党党员起来反对中央的机会主义，乃是自己的革命责任。

(八) 共产国际认为，必须马上纠正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底这些错误，并将此事通知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

共产国际认为：

1. 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刻不容缓地公开宣布退出武汉政府；
2. 在退出武汉政府时，需要发表一个原则性的政治宣言，说明采取这个步骤的理由，是因为武汉政府仇视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要求严办一切迫害工人和农民的分，从各方面揭穿武汉政府底政策；
3. 但不退出国民党，仍留在该党内，即使国民党领导者正在进行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开除出去的运动。与国民党的下层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他们中间提出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行动的决议案，要求撤换现在的国民党领导机关，并在这一基础上，筹备召集国民党的代表大会；

4. 用一切办法加强在无产阶级群众中间的工作，建立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巩固职工会，准备工人群众去进行坚决的行动，领导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

5. 展开土地革命，继续用“平民”式的方式，即用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人、农民、城市贫民联盟之革命行动，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斗争；有系统地武装工人和农民；

6. 鉴于压迫和惨杀，应建立战斗的不合法的党的机关；

7. 采取种种办法，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底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共产国际认为，关于党的一般政策，特别是关于党的领导之政策问题，获得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共产国际执委号召全体党员根据共产国际底决定，团结党的队伍。共产国际执委号召全体党员与党的领导底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坚决斗争。共产国际执委在满意地指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底正确立场和党员群众底英勇斗争时，确信中国共产党显露了自己有充分的力量，足以改造自己本身的领导和否认破坏了共产国际底国际纪律的领袖们。必须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他们因与党的全体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用这种办法可以克服现在党的领导之机会主义。

共产国际执委认为，伟大的中国革命之进程，已把这样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群众唤醒起来参加政治生活和政治行动了，以致任何力量都不能压服他们的运动了。在正确的领导之下，胜利将是属于中国工人和农民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根据一九四四年七月出版的《列宁、
斯大林、共产国际论中国》刊印

谭平山苏兆征辞职书

(一九二七年七月)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全党同志公鉴：

今平山兆征谨宣言退出国民政府，敢以退出之理由为全党同志及全国人民一详陈之，庶便平山兆征此举之意义昭然于世，以示郑重。

平山兆征之加入国民政府本为国民党内一切革命分子亲密合作之一种表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孙总理即认定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为国民革命成功之必要条件。此诚中国革命人民伟大领袖所手订之明确政策，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历次中央全体会议，复加以肯定的阐明与承受。

直至民国十五年五月十五日蒋介石所主持之中央会议，乃以所谓整理党务案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工作之权利，此种破坏孙总理容共政策之行为，使国民党受巨大之损失，盖自此以后，蒋介石式之军事党羽乃渐足而攘权，于是党权遂日以丧失。然共产党员素视其为国民革命之工作，在于如何使革命日益进展，绝无视国民党内工作为猎取高官厚禄之意，共产党员及一切国民党忠实党员之任务，皆在使国民党以工农小资产阶级之群众运动为根据而日达于革命。故虽有五月十五中央会议之整理党务案，而共产党员仍努力继续实行合作政策。于此可见首先破坏孙总理合作政策者非共产党员，乃冒充孙总理信徒之叛徒也。此等为〔伪〕国民党员以限制共产党为名，实则图谋以军事独裁压制

国民党。不宁唯是，破坏孙总理革命分子集中国民党的政策者，其目的尚不限于阴谋以军治党，且在于修改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国民党之主义乃代表大多数民众，尤其为农人以反抗半封建制度的余孽力求解放之理论。而封建余孽之肃清又为全国人民埠〔根〕据三民主义而争得解放之必要条件。今蒋介石等之政策则恰与此相反。故其行为乃为抛弃民众运动之正轨，而走入与人民公敌合作之歧〔歧〕途，其始终与豪绅反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军阀相妥协，固无足怪也。

然共产党员终为忠实于孙总理之主义及政策之信徒，始终留在国民党内，至今不稍动摇，盖吾人之希望，乃在国民党以党的力量战胜其少数领袖之具有反革命的阴谋或其他犹豫动摇之政策。

国民党内及国民革命军内真正革命的孙总理信徒以及共产党员，以最大的努力向前奋斗，复类〔赖〕世界革命民众之代表共产国际与以伟大的赞助，中国民众始终团聚于国民党旗帜之下，而同向军阀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进攻。于是去年第一次北伐乃大异于畴昔，盖此次北伐得工农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之参加，乃能继续摧灭许多人民之公敌。人民之希望于北伐者，在于其能除去中国民众之内外国压迫，故虽有如此巨大之牺牲仍不惜赴汤蹈火以赞助之也。为国民革命而死者以数万计，伏尸累累，或死于敌人之枪炮，或死于敌人之虐待，或且为响应北伐军而死。死者之中，谁为国民党员谁为共产党员将不可分析！彼等之英勇的牺牲，使军队及民众皆随之而益加奋励。

综览北伐的整个过程中，真正国民党员及共产党员曾以万分的努力保持革命的联合战线，造成广大民众中之基础，使革命得以进展至于长江流域。民众运动及军队之英勇，曾经屡次打击国

民党中反革命的及犹豫妥协的领袖之阴谋。此等所谓领袖，当时即已图谋出卖革命，以便走入豪绅反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军阀帝国主义之反革命的营垒。

革命军占领长江流域之后，北伐告一段落，方将补充增加新的力量，而准备最后决战以达到完全之成功。然广州三月二十日之故技，复发现于长江流域，为〔伪〕国民党的领袖以及永久犹豫动摇之分子，又起而破坏革命的联合战线，阴谋根本推翻集中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之政策，而欲使革命转入反革命的途径。当时蒋介石要求中央党部及政府均迁赴南昌；此种要求，实欲使革命及党的指导机关，尽入其军事独裁之掌握，以便实现其将国民革命转移于买办资产阶级及反革命营垒之企图，终至屠杀工农以逞其欲。迁都南昌之要求，实为三月二十日反革命政变及五月十五日背叛孙总理政策之复演，且为其更扩大更详尽之计划。

当时国民党中央即觉南昌方面之要来〔求〕，对于国民革命含有危险性；虽国民党中央当时所见之危险仅在党权军权之争，而大多数未深察其军事独裁之社会基础，然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之运动已造成相当的基础，使国民党内一切革命分子得以亲密合作，而武汉遂成真正国民党之中心。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完〔全〕体会议予以召集，对于南昌方面加以纪律之制裁，并通过各种议决案明定国民革命进行之方针，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之议决案，如能诚意的履众〔行〕，则国民革命之完成指日可期，而反革命的一切根株皆当断绝。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之议决案不仅可为国民党内一切革命分子亲密合作之基础，且予共产党员以义务，使分负国民政府对于国民革命之艰巨的责任，而革命战线亦因此而愈益巩固。共产党员之加入政府，即为国民党承认群众运动为国民革命中之伟大动力的表示，并以对抗南京政府所依赖

之买办封建资产阶级。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决定推举共产党员加入政府，实有历史的意义，盖中国国民运动已显然分为两个营垒，一方面为半封建的分子及买办资产阶级，别方面为广大的劳动民众以及一切真正民主分子，武汉之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实能继承孙总理所领导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精神，决然与劳动民众民主分子相结合，而认明革命的道路。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决定共产党员加入政府之决议，其意义如此。非然者武汉中央与南京方面叛徒之决裂，即毫无意义可言，至多不过是各个私人之争权夺利而已。共产党员之加入政府，决非为个人之争权，乃欲以国民党内一切革命分子之共同努力的继续发展国民革命以至于最后的成功，而反对南京方面叛徒之反革命以救革命于渐灭也。

自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以来，革命运动中乃有极重大之事件，即所谓湖南问题是也。湖南农民运动之进展，已至于与封建余孽决死斗争之阶段，或且为反抗千百年来积重的压迫及不堪言状的穷困而发生之民众暴动。农民运动之如此伟大的进展，乃使阶级矛盾更深一层的暴露出来，甚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中亦发现此种矛盾之存在。此等极严重的问题，使国民党中央不得不与以明确的答复。解答此问题之道有三：（一）赞助农民运动，以党及政府的积极办法领导农民运动，使渐达革命之根本目的，（二）为所谓过火所震惊，其实所谓过火即革命的急剧风潮，及〔乃〕一切有历史意义的群众革命运动所不能免，如为之震惊失措，则势必进而反对农民运动，压迫农民群众；（三）立于旁观地位，任令反革命势力消灭一切革命运动，施行残暴的屠杀。此三者之中，中央所择者为何？

或谓湖南问题之解决当为和平方法。诚然，为保持联合战线

以反抗奉张宁蒋之反革命起见，共产党员不但不反对和平的解决方法，且竭力赞助之。此则更可见只须尚有丝毫保持联合战线之诚意，共产党员终为联合而牺牲。

今事实上则所谓和平的解决方法，已变成空前未有之屠杀，国民政府领域之内屠杀之事迭见不鲜，党部则被捣毁，工农团体及其自卫之武装则被解散。中央委员之中如徐谦顾孟余等方在日夜咒骂民众，凡民众救护革命之行动，概视为不当；又复曲解孙总理之理论，谓中国不能有阶级斗争。实则中国国民革命之全部历史，皆阶级斗争之历史。唯反对垂死的反动的封建阶级及买办资产阶级之阶级斗争〔斗〕，为发展国民革命之最大动力。帝国主义对华之经济上财产〔政〕上的独裁，固经过买办资产阶级以实行者也；而买办资产阶级之剥削工农，未有不经过豪绅等类不〔之〕封建阶级。反抗此等阶级之阶级斗争，实为国民革命之要素，非此不能完成三民主义之革命。

然国民党中央委员之中，竟有人敢于与民众运动宣战，甚至与国民党历史上之革命的主义及政策宣战。

此种情形之下，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之议决案，已为中央自身所背弃，当然更不能见诸实行。国民党而不能实行此等议决案，则其结果将不免回复到改组以前之状态，即完全依赖极不稳定之军事结合。尚何遵照第三次〔全体〕中央全体会议议决案之精神以发展国民革命之可言！

因此共产党员同意于加入政府之基础已经消失。共产党员既为革命的国民党员及共产主义者，则在此种状况之下退出政府，乃其天职。

平山兆征之决然退出政府，其理由如此。平山兆征之引退，乃对于国民革命与民众明认自己之责任。国民党中之革命同志

当能谅解平山兆征退出政府之意义。平山兆征之行为，实为国民革命之利益起见，始终遵循孙总理之革命的遗训，忠实于吾党。此后当为国民革命努力奋斗，益加奋勉，愿致〔与〕全体同志共勉之。

谭 平 山

苏 兆 征

一九二七年七月 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出
版的《向导》第二〇一期刊印

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

瞿 秋 白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 革命是低落吗？

中国革命经过了三次失败：一、四月十二日蒋介石的反动，二、七月间汪精卫的反动，三、十月初叶贺南征广东的失败。但是，中国革命是否因此而完全失败，完全消沉呢？固然，中国国民革命战线之中，资产阶级几次陆续的退出革命战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豪绅地主阶级的反革命势力扩大起来，小资产阶级的上层由动摇犹豫而终归走入反革命，去当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因此，整个儿的国民党，从革命的各阶级联盟变成反革命的官僚政客军阀工贼土豪乡绅的党，所谓清党反共，便是从这革命联盟之中将最革命的力量排除出去，将工农阶级摒弃，所剩的只是一切种种的反革命势力，自然，国民党变成完全反革命的政党。固然，如今是这个反革命党攫取了政权和北方旧军阀分治中国，他们共同一致的屠杀工农摧抑革命，但是革命潮流始终并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何以呢？革命潮流的低落与消沉，在现时的中国必须有三个条件：一、反革命的统治能相当解决中国社会关系中的严重问题（如土地问题劳资问题等）；二、反革命的统治能够逐渐稳定；三、革命的群众溃散而消沉。如今事实上

中国绝对没有这些条件。再则帝国主义虽然利用国民党的反动而逐步进击中国，但是他自身并不能在世界范围之内战胜社会主义的革命，——苏联的国家日益巩固，而且他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日益发达。帝国主义自相冲突没有能力协助中国反革命的势力稳定他的统治。

如今反革命的统治绝对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与民族解放的问题：土地问题上，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及减低债息至百分之二十，算是国民党的改良政策，实际上丝毫不能实现，——豪绅地主正在当权，他们根本不许农民少交一粒米，少得一个利钱，他们遇见减租运动便动手屠杀农民，至少，他们也要退佃，使佃户根本失业，他们遇见减息运动，至少也要拒绝放债，使贫民根本没有法子度日。劳动问题上，就是极端改良主义的劳动法也不能实现，工人的工作时间正在延长，工资正在减少，生活程度日益低落，全国的财政金融大紊乱，全国极大多数的工农贫民的革命需要只有更加剧烈起来，阶级斗争已经走到最剧烈的程度，成为公开的武装的斗争。民族解放问题上，关税不能自主，租界不能收回，外国资本的竞争不能遏止。——这都是显然的事实。

如今北方从直隶山东起一直到南方的广东广西止，不论是国民党也好，非国民党也好，是蒋介石派也好，非蒋介石派也好，都在军阀的纠纷冲突混战之中。每省都有若干派别互相争夺，互相战争。豪绅资产阶级的内部纷争，而不能稳定自己的统治，——也是显然的事实。

再则，七月间武汉反动之后：武汉的总罢工立刻便起来，九十月间鄂南湘东农民暴动，广东各县的农民暴动，山东直隶河南陕西安徽，无处没有农民暴动，最近，叶贺失败之后，广州工人还是直接起来奋斗，十一月初江苏的农民也暴动起来。暴动的

民众一动手便是杀戮豪绅没收土地，他们澈底的感觉到非自己拿着政权不能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一丝一毫，非举起武器来不能取得政权！斗争形式的剧烈到了极点，并不因为受着屡次的大损伤而消沉。这更是很明显的事实。

可见国民党虽然偷取政权而背叛革命，但是他并不能消灭革命。革命仍旧陆续的爆发，革命仍旧继续着。最近半年以来革命虽然受历次的打击，而已是很严重的打击，然而革命的发展仍旧是继续着。事实已经表示得很明白：中国革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的高涨而且是无间断的性质，——各地农民暴动的继续爆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的日益剧烈，显然有汇合而成总暴动的趋势。

（二）国民革命完了吗？

国民党偷取政权而变成反革命的政党，中国工农民众的革命潮流立刻便向着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道路。这是不是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完结了，从此开始了第二次的纯粹社会主义的革命呢？不是的。国民党是背叛革命，并未完成国民革命，而且还是取消国民革命已得的胜利，帮助着统治势力的复辟。“第一次”革命并没有完成而是中断，根本上无所谓“第二次”的革命。国民革命的任务，至少应当是统一中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之下，推翻封建式的剥削。如今事实上国民党背叛革命之后，立刻投降帝国主义，不但一条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废除，反而将工人所夺回来汉口九江租界都要交还英国，他们立刻造成千百军阀分裂宰割中国的局面，军阀的大混战的局面，中国不但没有统一，而且比以前更加混乱，财政交通不但没有统一整顿，而且比以前更加紊乱，——绝对没有发展自国工业的可能；资本家地主对于工农的

剥削更是日益加重，生产状况显然退化，尤其因为豪绅资本家的榨取利钱不能在发展工业方面去图谋，于是他们都只在竭力加重对于土地的剥削，买田买地，加租加税，——半封建式的土地关系不但不能废除，反而更加厉害。中国革命中民族解放及民权主义的任务，丝毫都没有解决，没有实现。因此，可以断然的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并没有完。中国的国民革命的任务，并且必须工人阶级负起全副的责任，联合最澈底的民权革命的伟大力量——中国的农民，来实行。中国的资产阶级根本是懦弱妥协的，他一遇着民众的革命高潮，立刻便转入反革命的营垒。固然，他们想着以为可以用改良的方法，稍稍和缓工农的革命情绪，稍稍哀求帝国主义放松些侵略政策，这样可以避免工农的社会革命，同时还可以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但是这始终是幻想。中国资产阶级自己本身非常之薄弱，他们对于工人的待遇根本不能实行丝毫的改良，更不能劝豪绅地主改良土地关系，帝国主义也无论如何不能放松侵略政策。而且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工业的不发展，自己大半和土地的剥削相关联，自己大半就剥削农民的重利资本，自身大半要倚靠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所以中国资产阶级根本不能完成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与民权主义的任务。只有工人阶级能勇猛的澈底的推翻中国的旧社会关系，澈底的领导农民消灭地主阶级，澈底的反对帝国主义。

所以中国革命虽然现在已经是革命国民党的命，已经是工农的革命，然而他的任务仍旧首先便是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澈底的土地革命，本来是民权主义的性质；只有澈底的革命——铲除中国的半封建的土地关系，铲除帝国主义剥削中国几万万农民的一切种种走狗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这一革命的性质，由他的主要领导者来说，如今更显然是工人阶级（共产党）

领导的革命，由他的社会内容来说，却还首先是澈底的民权主义革命。

(三) 中国革命只是民权主义的吗？

中国革命中民权主义的任务，要在工农反对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之中，方能实现。可是，即使为着澈底实现土地革命，工人阶级就不能不领导着农民根本推翻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基本上与剥削农民的豪绅地主相联结相混和。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何况工人阶级自身既是革命的领袖阶级，他便不能不在革命斗争之中，力争自身利益的保障，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最近一年来工人店员力争改善生活状况的斗争，其势不能不一直要求到监督工厂管理，参加管理店务之事实，便是证明；城市之中这种工人的斗争不能胜利，乡村中农民的斗争始终不能超出游击战争的限度而得到巩固的胜利，乃因为单是农民暴动而没有暴动的城市做他的中心和指导者，便不能团结集中而形成伟大的胜利的革命权力。中国革命要澈底推翻旧社会关系（半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前期的社会关系），也就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所以中国当前的革命，显然是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的革命。何况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胜利了已经十年，全世界是资本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相对峙的形势。中国革命势必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相联结，而在中国开辟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革命是由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恰好是马克思主义所称为由民权主义生长而成社会主义的最明显的实行。中国革命根本上不能在民权主义的阶段上再成一

个段落，象法国大革命似的；中国只有一个革命：中国革命除非不胜利，要胜利便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暴动获得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

总之，中国革命，不论是在速度上或是在性质上，都是无间断性的革命，要说中国革命已经是纯粹社会主义的革命，固然不对，要说中国革命仅仅是民权主义的革命，仿佛革命之后，只开辟些“民治气象”得着纯粹资本主义的，更是不对。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的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五期刊印